

白公馆·渣滓洞·采访纪实



红岩

纪实

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

红岩纪实

第一章 浓雾笼山城

国民党陆军上将朱绍良大发雷霆，共产党办的秘密报纸竟然摆到他的办公桌上。

1948年春，浓雾笼罩着山城重庆。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中国的“大后方”，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创伤。蒋介石又把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到这里，再加上沦陷区的大批人才、资金向这里涌入、集中，于是这个西南重镇一时高度繁荣。

到了1948年春天，虽然眼见得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北两线大举反攻，但重庆偏于一隅，表面上还是一片歌舞升平景象。很多国民党大小官员成天花天酒地，饱食终日，醉生梦死。

蒋介石在川、滇、黔、康四省苦心经营八年，连日本人都没打进来，共产党能打进来吗？蒋家王朝就是丢了东北、华北，也一定能保住西北和西南。他们认为，在这个年头，躲在西南就好像躲进了保险箱。

西南地区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即《红岩》中徐鹏飞的原型）却不敢这么乐观。

抗战期间，共产党在重庆派有代表团，中共四川省委公开活动，《新华日报》天天发行，“赤化”分子该有多少呀！可是他又抓到多少呢？往大街上瞧去，他觉得人人都像共产党，可是又一个抓不住，他真是又急又气。

更让他感到气恼的是，去年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新华日报》已被查封了，四川的共产党肯定转入了地下活动，而且活动得还很猖狂。学生们三天两头就闹罢课，闹请愿；华蓥山的农民动不动就起义；还有那张名叫《挺进报》的秘密报纸，平均每两周就出现一期，先前不过是普通毛边纸，后来用上了彩色打字纸。开始时一期不过二三版，现在出到了六版。上边登的全是从延安新华社发出来的消息。《挺进报》影响很广，据说在远离重庆的合川、垫江地区，还有人翻印再版《挺进报》。很显然，共产党在重庆有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地下组织，一定还有地下电台。

可是，作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的处长，整个西南地区军统特务的总头目，他却至今连重庆地下党的一根毫毛也没摸着。他感到耻辱，感到气恼。

这一天上午，他接到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陆军上将朱绍良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趟。听口气，好像出了什么大事。

朱绍良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反共悍将。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就是蒋介石手下的参谋长，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捕杀工会领袖，什么坏事他都干过。江西五次“围剿”，每一次他都参与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出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后又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伙同军阀盛世才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烈士。他的两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1947年，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来西南坐镇，朱自以为对“反共”有多少年经验，坐镇西南绝无问题，所以每天仍是豪饮名贵的白兰地和威士忌，喝得醺醺大醉。有时陪着如僵尸般的花夫人抽几口鸦片烟，有时还为他如花似玉的几位小姐的浪漫行为呕点闲气，有时又找四川地方军人政客聊点闲天。

最近一段时间，朱绍良却忧心忡忡，坐在上清寺范庄公馆里，燃着雪茄烟在想心思。他不担心蒋介石会丢掉西南，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却令他坐立不安。西南地方势力很大，他们和蒋介石从来都是离心离德。共产

党一旦打来了，他们很可能会倒戈相向。为了研究对策，他多次找他的“耳报神”——徐远举听取汇报。为了避免拘束，每次密谈都是在他的范庄公馆进行的。按国民党大官僚的习惯，在公馆里谈问题可表示特别重要和亲切，不像在办公室里要装模作样，乱打官腔。

今天，他一大早就去西南长官公署办公。这一天要在长官公署里举行党政军干部例行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方面的头目都要参加。除了朱绍良要到会外，还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肖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 24 团团长沙吉夫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报处）处长徐远举。

走进办公室，他一屁股坐进了一张宽大的皮沙发椅里，休息片刻，便随手把摆在办公桌一角的一摞信件拿过来。他随便翻了翻，没发现什么重要信件，正要推开，一个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写着“朱主任亲启”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他好奇地拆开封口，一张报纸从里边滑落出来。报头上的三个大字赫然夺目：

挺进报里边还附有一张警告信：蒋家王朝的末日就要来临，任何追随蒋介石的人如不及早停止作恶，必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一下惊得朱绍良目瞪口呆，也气得他火冒三丈。徐远举来了。《红岩》小说中对他的外貌描写还是很准确的：身材粗大，脸色黝黑，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眉浓眼大，肥肥的下巴。黄呢军便服领口上，嵌着一颗金色梅花，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徐远举的军衔是少将，这在军统中是最高的军衔。因为军统的老板戴笠是带着少将领章死的，所以在他之后的军统人员不管干得多么出色，也不能超过戴笠的级别。“啪！”朱绍良把那张《挺进报》重重地摔在办公桌上。

“解放军还没有打进来，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这不是反天了吗？共产党在我们眼皮底下这么嚣张，你是干什么的？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把这个案破了，把《挺进报》消灭。”

说着，他提起毛笔，三下五除二就写了一个措辞严厉的手令：限期破案。

徐远举唯唯听令。

国民党全国各地的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都设有第二处，它是一个一处三管的特务机构，即一个婆家两个娘家。在公开形式和行政系统上第二处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人事、经费、业务也都属于西南长官公署的建制范围，按特务机关的术语，这叫掩护机关。这是它的一个婆家。实质上第二处受国防部第二厅和保密局掌握领导。各地第二处所获得的情报，都以最迅速的方式报告第二厅，其次再报保密局。这是它的两个娘家。国民党政府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的任免，必须经过国防部第二厅和保密局，当地军事长官不能过问。第二处对当地军事长官的态度，则看他们与蒋介石的亲疏，分别对待。

朱绍良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徐远举在他面前当然不敢放肆，只能言听计从。

在紧接着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上，朱绍良那股火气仍然未消。

“你们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撤走了，《新华日报》停印了，就天下太平了。在重庆，在整个四川，共产党还在大肆活动，对党国危害很大。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中共地下党组织清查破获。要人、要钱、要物我都给。远举，会后你找几个人商量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来。”

朱绍良当场授权徐远举统一使用军(长官公署军官大队)、警(警察局)、宪(宪兵24团)、特(二处和军统重庆站)的力量,从侦破《挺进报》入手,力争尽快破坏地下党的核心组织。

朱绍良走了,会议也就散了。几位国民党重庆地区的头面人物面面相觑,一个个腆颜而退。

徐远举暗中又着急又冷笑,出了这么大个祸事,大家头上都落上了一点,他的责任无形中小了不少。他从心里感谢朱绍良,没有把担子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对他还真是照顾。

大特务头子徐远举在家里摆下宴席。整个川东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徐远举回到了老街32号,这里就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外边的铁门上横着两个篆字——“慈居”。从这个名字上,人们会联想到这儿也许是某某要人的公馆。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一处人间地狱,龙潭虎穴。

徐远举坐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这里的装饰十分豪华,地上铺着彩色地毯,正中放着一张宽大的黑漆办公桌,墙角摆着精巧的盆景。与这一切稍感不谐调的是墙上挂了不少军用地图。

徐远举点燃了一支烟,皱着眉头沉思起来。

朱长官已经拍下“令牌”,可谓急如星火,自己也拿到了双锋宝剑,不怕军警宪特不听话。可是,重庆是个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地分三处,横跨两江,各阶层居民五方杂处,到哪里去找中共地下组织,到何处去找那个油印的小小的《挺进报》?

他的心里一片茫然。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18岁时就加入军统,1935年就当上了军统西昌站站长,以后又任保密局川康区副区长,后来又任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仕途上可谓一路顺风,对付共产党也有一些“成绩”。在军统内部,他一直被上司视为很有本事的人才。可是如今,他却犯难他胡乱翻着桌上的公文,忽然,他发现了一份过时的丙种会报记录摘要,眼前不觉一亮。

丙种会报本来是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是秉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破坏革命、镇压学潮与工潮的联合行动机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导各地丙种会报的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按南京丙种会报指定,由徐远举和施觉民、沙吉夫、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为了便于对付重庆工潮学潮,他们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徐远举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丙种会报已经好久没有召开了,徐远举在无计可施之际,把它想起来了,就想利用它来作文章。一来是人多办法多,也许真能扯出什么高见;二来是如果不能如期破案,也好让大家帮着分摊责任。

事不宜迟,徐远举马上吩咐人往外送请帖。他要自己的住宅——曾家岩戴笠公馆作一回东道主。

接到请帖的人全都如期而至。谈什么问题,大家心里都明白。虽然摆了

满桌子酒菜，却无人吃得下。

首先说话的是御前侍卫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他操着浙江宁波口音说：

“我兄弟是老粗，追随总裁多年，才从总统府调来，对重庆的情况还不大熟悉，全仗远举、子政（徐政的别号）两兄多多操劳。遵照朱长官的指示，如期破案，警察局全力协助。”

中统特务头子徐政听了施觉民的话，谦虚而迟疑地说：

“中统方面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虽有些材料，尚不具体，还要大家群策群力。”

徐政真是奸滑狡诈，一句话就轻轻把麻烦推掉了。

比较老实的宪兵团团长沙吉夫说：“宪兵团没有什么办法，全靠你们军统、中统，宪兵团‘特高组’可以协助配合行动。”

久闯江湖熟悉重庆社会情况的稽查处处长罗国熙献计道：“只要全市突击大检查，把警察局掌握的特种户口册和过去与重庆《新华日报》有来往的订户都进行检查，不怕《挺进报》找不着呀！”

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是破坏重庆学生运动的老手，颇为忧虑地说：“这个问题我看并不简单，《挺进报》在学校中都有发现。有些青年秘密出走，有的家属阻挡都阻挡不了，我们要设法破获他们的组织，遏止青年出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还挺热闹。徐远举作为主人，却很少说话。他今天打定主意是要先听听别人的意见。

渐渐地，他心中的算盘打好了，这才做出一副笑脸，招呼大家喝酒吃菜。

看到大家酒足饭饱，肚子上的货色也差不多倒完了，徐远举立刻换上一副冷峻的面孔，提出了六条措施。

第一，按照《挺进报》的寄发情况来看，《挺进报》的印刷地点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筒，严密监视《挺进报》投邮情况，派人守候缉捕，特别注意早晚时间和邮局的邮工。

第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是几家民营报纸。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

第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续派得力人员驰赴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招抚被诱骗的青年。

第四，多方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

第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目前不必打草惊蛇，请宪警在郊区多加巡逻。

第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查戒备，对工运组织要多深入下去。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徐远举见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便宣布散会，会后各自令其所属按照分配任务行动。

顷刻之间，山城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宪兵、警察和特务倾巢出动，大街小巷满眼都是巡逻的宪警。警备车不时地飞驰而过，满载着无辜的受害者。

邮检特务加班加点，检查每一封信件的疑点，以杜绝《挺进报》的流传。邮筒和邮局的周围，三三两两的特务守候着，随时准备猛袭上来。民生路到七星岗一带的书店一次又一次遭到突击检查。光明书店、生活书店里的每一

本书都不放过，进步书刊统统遭到没收。书店的职工一次又一次遭到盘问传讯。沙坪坝和北碚的每个书店的门前门后，布满着特务，紧盯着进出书店的青年读者。

沙坪坝、北碚、南温泉三个文教区，向来是特务们注视的工作重点，军统、中统、三青团派在各学校的职业学生显得特别紧张。三青团的青年馆，每晚都是灯烛辉煌，特务头子们都亲自下去检查工作，听取汇报。

嘉陵江两岸各个兵工厂戒备森严，周围加岗放哨，警卫稽查组的特务随时在工人宿舍、工人住宅进行包围封锁突击，只要搜出一本进步书籍、一张《挺进报》或一张旧《新华日报》，都是迫害工人的好材料。

徐远举当然更不能落后，他命令二处的学运组，每天都要向他汇报情况，特别要注意在进步学生身上寻找线索。他还特别布置保密局重庆站站站长颜齐、副站长吕世琨以及二处所辖十个谍报组，在川东地区以及重庆警备区周围各县进行严密侦查，以期破案。

尽管布置得如此周密，徐远举觉得这还不够，又特派两个军事谍报组，前往华蓥山区，配合国民党清剿部队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

徐远举被戏弄了。《红岩》中那个浑身发抖的云阳县参议员，其实是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者。

“嗒嗒嗒……”

“嗒嗒嗒……”

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那幢黑沉沉的大楼里，电报员日夜不停地敲打着电键，指挥着整个川东地区的特务网加速活动。

徐远举很快就等来了消息。

万县来电，那里抓住了一个共产党，这个人叫盛超群，曾经参加竞选当上了云阳县参议员，公开身份是县税捐处的一个职员，但实际上是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徐远学看过特务送来的材料，写得确凿有据，看来此人确系共党“要犯”无疑，于是就下令逮捕，严加审讯。

主持审讯的人是二处侦防科科长陆坚如。他连用三天酷刑，把盛超群打得遍体鳞伤，却什么情况也没问出来。

到了第四天，当行刑特务再一次把烧红的烙铁伸向他的胸膛时，他竟开口说话了，不仅承认自己是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准备在云阳领导武装暴动，还供出了云阳地下党组织情况及开会情况。他又提供了一张名单。这份名单上一共有 12 个人，包括云阳县警察局长、督察长、北乡联防办事处主任在内，都是共产党的首脑。

徐远举大喜过望，立即派出吕世琨和二处渝组二科科长雷天元率特务及万县两个保安部队直下云阳，按单抓人，一个不漏地押回重庆，严加审讯。可是不论特务们怎么拷打，这些人就是不承认自己与共产党组织有关系。特务们一无所获，只好将他们分别关押到渣滓洞楼下八室和楼上七室，盛超群则关押在楼下六室。

在小说《红岩》中，对这一事件的过程描写得很具体：

审讯室里烟雾沉沉，空气十分污浊，他瞥见老虎凳上，捆着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旁边一盆火，几个人正把冒着烟的烙铁，伸向被审者的胸脯。徐鹏飞不管这些，独自走到窗前，用力拉开窗帘，推开紧闭的一扇窗户，他需要

摆脱烦恼，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窗外，蒙蒙细雨一阵阵飘到他的脸上，阵阵寒意勉强帮助他平息心潮的起伏。背后，受刑的人一声惨叫……传来泼水的声音，徐鹏飞转过身，走到狞笑着的行动科长面前，冷冷地问了一声：

“谁？”

“云阳县的。”

“已经三天了，怎么还没开口？”

行动科长讨好地迎合着他说：

“马上，他就要开口的！我先搞他两下，这家伙已经吃不消了。”

昏厥的人，渐渐醒转来，恐怖地望着面前的人影，粗声喘气……

徐鹏飞向前靠近一步，怀着复杂的侥幸心理，厉声问：

“甚么职务？”

醒来的人盯住他肩章上少将官阶的金星，全身抽缩起来，吐着白沫，像自言自语地哆嗦着：

“县参议员……”

“问你党内职务！”徐鹏飞大声追问，皮靴朝地板上一蹬。

“党内职务？”他望了望徐鹏飞旁边的行动科长，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县委书记。”

受刑的人喃喃地蠕动着焦裂了的嘴唇。

徐鹏飞冷冷地命令道：“松刑！”然后就背起双手转身向室外踱去。看样子，这个人的嘴巴已经撬开了，也许，共产党里也有容易对付的角色，但愿能多遇上几个就好了。

……

行动科长呈上一份审讯记录，挺直身体，站在办公桌旁，声音急促地说：

“弄出来了，全部招供了！”

徐鹏飞毫不在意地翻阅着口供笔录，行动科长毕恭毕敬地站着，不敢多话。

“怎么？警察局长也是……”

“是呀！”对方赶快补充：“云阳县警察局长，县参议长，县府的三个科长，中学校长，还有法院院长都是共产党。这一回，硬是一网打尽！”

“法院院长？”徐鹏飞迟疑起来，“还有警察局长？”他有点怀疑这份口供……

“都是他亲口说的，警察局长负责搞武装暴动！”

“我记得他除了是县参议员，还是云阳县的清共委员。”

“报告处长，他供认是共产党叫他打进来当清共委员……”

徐鹏飞不讲话，也没有再翻阅口供，沉默起来，他的脑子里闪动着许多假设、推测和判断，需要考虑一下。

“处长，我签呈了一个意见……”

“看到了。”徐鹏飞冷冷地说。

忽然，灵机一动，徐鹏飞马上提起笔来，在行动科长签呈的意见上批道：

“准予按计划全部逮捕。”

《红岩》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的虚构成分并不多，即使是虚构，也是在真实素材的基础上进行的。上边这段描写显然是以盛超群的事迹为素材虚构的，仅就过程而言，可以说是真实的，但在关键之处却与事实有重大出入。

盛超群确实“招供”了，但他并不是叛徒，因为他供出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同志。

盛超群，1938年秋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经组织部长张际春同志批准，和另外七名同志一起回四川发动群众，必要时建立游击根据地。可是等他迂回辗转回到四川时，在事先规定好的接头处却接不上头了，失去了组织关系和同志间的联系。这可怎么办呢？

于是他开始了孤军奋战。

他宣传抗日，反对横征暴敛，曾经被抓进过监狱。后来他进入《春秋新闻》任主笔和总编辑，因为写过揭露万县贪官污吏争权夺利内幕的文章而受到迫害，不得不逃离万县，回到家乡云阳。

在云阳，他与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共产党员盛腾芳等人来往密切。1947年底，他在云阳县搞了一个轰动全城的“诉讼案”，控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兼任孤儿院长的杨秩东贪污孤儿口粮的犯罪事实。云阳县法院不敢得罪杨秩东，判他无罪。盛超群不服，又上诉到万县中级法院。

杨秩东怀恨在心，就和因为贪赃受贿被盛超群抓住过的税捐处长邹新校等人联合起来，诬告盛超群是共产党，要在下川东组织暴动。二处接到密报后，立刻下令万县专署逮捕盛超群。当时，盛超群正从云阳乘船赶到万县准备和杨秩东对簿公堂。就这样，他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在遭到敌人严刑拷打时，盛超群忽然心生一计，决心使用“攀仇不攀亲”的方法，戏弄这帮狗特务。

于是，云阳县的警察局长周勃、财政科长薛迪之、三青团的干事长毕澄清等人都被他说成了共产党。他怕敌人不相信，又把他們与什么人联络，各负什么责任，编造得活灵活现，使特务不能不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特务们才发觉受了戏弄。

徐远举不得不把云阳县抓来的人全都释放，还特请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云阳籍的军统特务头目许乾刚出面，招待这些人大吃一顿，又是安抚，又是道歉，又花路费送他们回家，才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

徐远举出了洋相，脸上实在无光，当然不会轻饶盛超群，接连给他动了几次重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11月14日，他与江竹筠等人一同被押到电台岚垭秘密处决，连尸骨也一同被毁，无法辨认。

《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听说过盛超群受过重刑，也听说过他没有出卖过党和同志，因而不会在小说中故意往他脸上抹黑。他那样写也许是为了揭露敌人滥施酷刑，造成屈打成招。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确实时有发生。

不过，我们一定要记住，真正的“云阳县参议员”盛超群是一个经得起酷刑考验的革命者。幼稚的陈柏林受骗上当。曾加入过特务组织的任达哉叛变投敌，让敌人找到了缺口。

三月里的一天，细雨霏霏，一个年青人急匆匆地走在重庆城区民生路上。

他绕过胜利大厦，来到它的侧面。这儿有一个小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即《红岩》中的沙坪书店）。

他推开虚掩的门走进去，这家书店铺面不大，但书架上摆了很多书，显得有几分拥挤。

天已经很晚了，书店里早已不见顾客，但店堂里还有个人没有离走。他就是这家书店的店员陈柏林（即《红岩》中的陈松林）。

陈柏林只有 17 岁，但却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曾大哥，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陈柏林向来人打着招呼。

来人叫曾纪纲（即《红岩》中的郑克昌），年纪在二十七八岁左右。

“噢，我去找工作，看来还很有希望。”曾纪纲随口答道。

陈柏林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认识曾纪纲的。通过他的自我介绍，陈柏林知道他已经失业好长时间了，生活挺窘迫。尽管如此，他却很爱好文学，有时还写写诗歌什么的。听他说话，对国民党统治十分不满。像这样思想进步的青年人，当时在重庆有很多，陈柏林对他也未十分在意。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陈柏林十分感动。曾纪纲听说书店要出一份刊物，但经费不足，他竟然卖掉了自己的大衣和铺盖，把钱一分不少地全交给陈柏林。

陈柏林也是个热心人，见曾纪纲生活暂时没有着落，就让他到书店楼上，与自己一起住。

一来二去，两人熟悉了，话谈多了，也越来越深入。曾纪纲表示，他很想与共产党接触，但苦于没有机会。陈柏林答应以后帮他想想办法，又拿出《挺进报》给他看。他觉得，像曾纪纲这样的进步青年，看《挺进报》比较合适。他甚至想到，如果时机成熟，可以把他发展成党员。

斗争经验不足的陈柏林哪里想得到，此刻坐在他对面的人竟是一条豺狼，所谓的“红旗特务”。这些人专门深入下层，伪装进步，骗取人们的好感，以便发现地下党的行踪。

不久，曾纪纲就发现，有一个叫老顾的人经常来找陈柏林，而老顾每次来过之后，他就能从陈柏林那里看到新出的一期《挺进报》。

他断定，这个老顾就是陈柏林的上级，而文城出版社就是《挺进报》的一个发行据点。

刚才，他并没有去找工作，而是跟随他的直接上级保密局重庆站副站长吕世琨、渝组组长李克昌面见徐远举。

徐远举在曾家岩自己的住宅里听取李克昌和曾纪纲汇报情况后，当场指示：

“这种做法很好，还要深入进去，最好与中共地下党直接发生关系。不要轻率行动，以免扑空。”

这次汇报很快就结束了。曾纪纲害怕回去太晚，引起陈柏林的怀疑。

曾纪纲按照徐远举的指示，继续以迫切要求进步的面貌接近陈柏林。这一招果然见效。有一天，陈柏林答应介绍他与上级领导见面，见面时间约定于 4 月 1 日上午，在观音岩红球坝一家工厂里碰头。

曾纪纲把这个消息传给吕世琨，吕世琨火速报告徐远举。

徐远举沉吟不语。按他原来的想法，是想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打入地下党高层组织。他不相信小小年纪的陈柏林能带曾纪纲见到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但是，急于破案的朱绍良成天追逼，甚至拿出蒋介石的旨意来压他，他也坐不住阵了。看来，只能以近水救救近火了。

徐远举下令，让吕世琨率二处警卫组特务按时进入埋伏地点，一定要抓住陈柏林和那个“上级领导”。

第二天下午，陈柏林和曾纪纲来到约定地点。等了不大一会儿，那个领导就来了。他就是那个老顾。

埋伏在四周的特务蜂拥而上。

老顾很快就被押进了二处的审讯室。

徐远举亲自出面审讯，在他的身旁坐着侦防科科长陆坚如。

军统特务有个刑讯惯例，一抓到革命人士，问不上几句话就动刑。按徐远举的说法，这就像古代时牢营里新发配来的囚犯，一进监门就先打五十大棍，打得你昏头转向，头脑就失去了冷静，就容易落入特务的圈套。

这一次也不例外。徐远举一挥手，就冲上来几个膀大腰圆的特务。

很快，老顾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的嘴巴却很硬，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

徐远举一声冷笑：“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有 40 多种刑罚。每一种都能使你不死即残。二处的行刑队员都在中美合作所的特警班受过刑警训练，他们会用美国朋友提供的刑具让你开口说真话的。”

老顾痛苦地把头扭到一边，一句话也不说。

徐远举说的并非虚言大话。

当时二处使用的毒刑主要有吊杆子、水葫芦、踩杠子、钉竹签子等。吊杆子就是用麻绳把受审者的手或脚捆起来吊悬空中，用鞭子使劲抽打；水葫芦就是往鼻孔里灌凉水，有时是灌石灰水、辣椒水或煤油；踩杠子就是把大木棍横放在受审者的腿上，两边站上人使劲踩；钉竹签子就是用竹子做成的签子往人的身上、手指头里钉。

最常用的是老虎凳。用刑时，使受刑者两腿并拢伸直，后背紧贴墙壁，坐在一张长条凳上。先用一块木板将受刑者的大腿压住，然后用绳索将木板、大腿同条凳捆绑在一起，再把受刑者两手的大拇指和脚的大拇趾捆在一起。审讯时，行刑特务一面用小木棒敲打受刑者的膝骨，一面用扁担挑起小腿，往脚后跟下塞砖。如不按特务要求回答问题，特务就会继续往脚后跟加砖。即使在冬天，受刑者也会痛得一身大汗。然而，受刑者一时也不致晕倒。从一块砖加到三块砖，差不多已快使人痛晕过去。最多塞到五块时，腿骨就会被折断。

经过一天一夜的轮番审讯，老顾终于招供了。

他的真名叫任达哉，公开身份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印刷工人。他还供认，他是印刷工人出身，曾参加过进步工人运动，以后失业潦倒，参加了特务组织，担任军统通讯员。不久又隐瞒历史，混入共产党内，但已与特务组织疏远，断了联系。“你的上级是谁？”“我只知道他叫老杨，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的职务和住址。每次都是他和我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

徐远举知道任达哉说的是实话。他说的情况符合地下党的工作通例。

“你们下一次的接头地点在哪里？”

“磁器街嘉阳茶馆，保安路警察局对面。”

在这期间，陈柏林也受了刑，而且受刑绝不比任达哉轻，但是他却什么也没有说。特务们没有想到他这么小小的年纪，竟会如此坚强。

《红岩》小说中的陈松林没有被捕，而生活中真实的陈柏林却被关进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夜里壮烈牺牲，年仅18岁。

在狱中的时候，他一直努力学习英文，希望出狱后通过组织办一个书店。他十分喜欢读书，也十分喜爱书店工作。可惜的是，他的愿望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任达哉叛变后，也没有得到好下场。特务们不愿让他分走“功劳”，仍然把他当作“共产党”关进了渣滓洞，解放前夕将他枪杀。

第二章 不该流的血

许建业迎着叛徒走去，掩护同志脱险。徐远举动用各种酷刑，却未能从许建业嘴里掏出一句他想要的话。

4月4日上午，任达哉供出的那个老杨按照约定时间走进磁器街上的嘉阳茶馆。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茶馆。像这种茶馆，在重庆市里几乎处处都能找到。不少四川人喜欢喝茶，而且喜欢“摆龙门阵”。于是，茶馆便成了消闲的好去处。这里人来人往，各种喧闹声、茶房的叱喝声、茶碗茶碟的叮叮当当声响成一片。

这种地方正是地下工作者用来接头和商谈工作的好地方。

这位老杨名叫杨清，其实他的真名实姓叫许建业，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而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的委员。小说《红岩》中那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许云峰，就是主要根据许建业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许建业长期负责工运工作，和工人们同吃同住，生死与共，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另外，他为人正派，工作认真，深受群众的爱戴。要说缺点，那就是他有些马虎大意。

任达哉还没有来，许建业就利用这个时间和另外一位同志碰头谈工作。

在小说《红岩》中，当时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是地下党川东特委的领导。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当时究竟是谁和许建业碰头，现在已无从查考。

许建业一边和那个同志交换情况，一边用眼睛的余光向街上扫去。

忽然，他看见任达哉向这里走来，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而且身后还跟着几个人，行迹很可疑。

许建业当时还不知道，跟在任达哉身后的那几个人都是特务，领头的是二处渝组组长季缕。他也不知道任达哉为抓住他，已经带着特务们在马路上转悠两天了。

许建业觉得情形有些不对，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使他警觉起来。

他马上想起来，前几天在《新民报》当编辑的陈丹墀提醒他已被敌人注意了，可是他当时有些麻痹，竟没往心里去。

他示意那位同志赶紧离开，自己则站起身来，向任达哉迎去。

任达哉看见了许建业，眼睛一亮，暗中打了个手势，立刻快步向前。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也加快了脚步。

许建业又走了几步，突然一转身向厕所方向走去。他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为了敷衍敌人，就带着敌人到街上转悠，明明见到敌人要抓的人也装作不认识。他希望任达哉也是这种人。

很快他就知道自己想错了。他往厕所走去，任达哉也紧追不舍地追上来。

几个便衣特务冲上来，把许建业围到当中。

那位脱险的同志混在人群中，望着老许被敌人押走了，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忍。老许要不是为了掩护自己，本来是可以脱险的。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不使眼泪流下来。

在《红岩》中，带特务来抓许建业的叛徒是甫志高。甫志高这个人物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像他这种人在当时并不少见。当时叛变的人不止一个，而

且很多像甫志高一样，在党内都有一定的职务，有的职务还很高。比如，当时的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就成了叛徒。

在文艺作品中，写一个叛徒当然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革命队伍中有不少人平日里高谈阔论革命，动不动就对别人指手划脚，可是一旦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就会露出真面目来，成为破坏革命的重要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要比外部敌人更可怕。

解放后，被关押在战犯看守所中的徐远举曾在坦白材料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听什么人说过一句名言，‘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之所以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经不起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

他的话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许建业被押进了曾经审讯过任达哉的那个审讯室。审讯他的还是徐远举和陆坚如。

徐远举很快就意识到他可能抓住了一条“大鱼”。

这个姓杨的身材强壮，气宇昂扬，好像根本没把周围的刑具放在眼里。陆坚如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在他身上搜查不出半张纸片。给他动刑，他也一声不吭。

吊刑用了，老虎凳也上了，辣椒水也灌了，可是他是什么也不说。

他多次昏迷过去，又多次被用凉水泼醒。醒来之后，他圆睁双眼，怒视着特务，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

“你们有多少刑罚都搬出来吧，叫一声疼就不是英雄好汉！”

“给我用大刑！”徐远举狂吼道。

新一轮酷刑就要开始了。

徐远举恶狠狠地威胁道：“你受得了十套八套刑罚，可你受不了48套美国刑罚！”

许建业轻蔑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别说你们有48套刑罚，就是有84种，我也不怕！”

行刑特务把许建业拖上了老虎凳，他的腿骨咔嚓一声断了。特务又给他用上了夹竹筷的刑罚，这是从明代特务机关“东厂”流传下来的酷刑，是用又粗又长的毛竹筷子连在一起夹受刑者的手指。竹筷子如刀刃般锋利，一下子就切入皮肉。

许建业双手血肉模糊，拇指断了。

他的肩骨裂了。

他的臂骨裂了。

连行刑特务的双手也开始发抖了。

“你给我说一句话呀！”已经气急败坏的徐远举跳起来，揪住许建业的衣领嚎叫着。

刚刚苏醒过来的许建业愤怒地瞪了他一眼，又昏迷过去了。

一天一夜过去了，徐远举命令停止行刑，他怕弄死了许建业断了线索。

陆坚如从负责记录的特务田光辉那里要过记录本，上面空空如也，只有几行字。如果说有什么有用的线索，那就是许建业说出了他住在过街楼的一家旅馆里。他立刻派特务去查找，可是刚刚接到报告，过街楼根本就没有那个旅馆。

直到现在，徐远举连这个硬汉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真有些灰心丧气

了。

徐远举下令给许建业戴上镣铐，交给警卫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必须随时报告。

许建业受骗，悔恨交加，一头向囚室的墙壁撞去。

徐远举一觉醒来，不知道睡了多久。刚才他做了个恶梦，不知道被什么人抓去了，让人家给上了重刑。虽然是梦境，却那样清晰，好像现在浑身上下还有些隐隐作疼。

看守徐建业的特务送来一张纸，说是许建业早上写的。

徐远举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封许建业写给母亲的绝命书：

亲爱的母亲，我被疯狗咬伤了。我决心以死殉党，我的死是光荣的，你不要为我难过，不要惦念我。你以后可以向人民政府要求抚恤，人民政府会养你老的。

底下落款是“你亲爱的儿子杨清”。

看来，这个杨清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既然如此，他还怎能开口招供呢？

徐远举心中暗暗着急，也不由得连连摇头，他弄不明白这些共产党员为什么这么倔强。不怕死，不怕受刑，他们真是钢铸铁打的吗？

此刻被关在单人囚室里的许建业，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浑身剧痛也能忍受得住，只是内心的焦急有增无减。

他住在志诚公司的宿舍里，床下有一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一旦有失，危害无穷。

在自己的宿舍里存放党的秘密文件，这是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作为像许建业这样的领导同志来说，这是不应该有的疏忽。但事已至此，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能不能有什么补救措施呢？

囚室门口，一个特务看守兵在踱来踱去。

也许是太无聊了，那个看守兵在囚室门口停下来，往里边张望了一会儿，竟然开门走了进来，站到了许建业的面前。

“怎么打成这个样子？”看守兵的脸上露出了不忍心的表情。

许建业没有答话。

“去年 11 月份，有个叫叶正邦的人也关押在这里，我也参加过看守。他受的刑可没有你重。”看守兵在自言自语。

许建业一听到叶正邦这个名字，闭着的眼睛微微睁开来。

叶正邦是一位革命志士，去年在成都被捕，秘密押到重庆。后来，有个看守兵把他被捕的消息传给了西大公司内万有书局的陆正科。此后又多次来回传递过消息，并未出现问题。这件事情许建业听党内同志讲过。“你叫什么名字？”许建业努力地动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我叫陈远德。哦……”他欲言又止。“你怎么干上了这一行？”许建业问道。“别提了。我也是个穷人出身，家里在乡下，是被抓壮丁抓到这里来的。”

陈远德左右看了看，又压低声音说：“我真不想干这个伤天害理的差事呀！”

陈远德不敢在囚室里久留，转身离开了。

许建业望着陈远德离去的背影，心头涌起一个大胆的想法：看来这个看守兵还有点进步倾向，再说他曾给我们的同志传递过消息，应该靠得住。如果他肯答应的话，可以让他捎出去一封信，告知自己的同志把那些秘密文件尽快销毁掉。

过了一会儿，陈远德又蹑跖了进来，关心地问：“先生，你被关在这里，家里人一定很着急，要不要我给你捎个口信出去？”

“我家里没有什么人，用不着了。”

“先生，说心里话，我最敬佩像你这样的硬汉子。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你尽管吩咐。”陈远德说的还真动感情。

“我还真有点小事想拜托你。”许建业盯着陈远德的脸，一字一句地说：“我有个朋友在志诚公司干事，我想给他写封信。你能不能给我捎去？”

“干这种事情要是让上司知道了，不是把我关起来，就是把我开除了。”陈远德面露难色。

“我看这样吧。”许建业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又说：“你把信捎到之后，我那位朋友会给你三千万元（法币）作为酬金，这一点我在信上写明白。另外，你要是不打算在这里干了，我那个朋友还可以帮你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职业。”

陈远德高兴起来，使劲地点了两下头。

不大一会儿，陈远德就找来了纸和笔，然后机灵地站到门口放风。

许建业觉得机会难得，立刻动笔给志诚公司的董事、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立即把那个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

许建业写好了信，把陈远德喊进来，告诉他怎样才能找到刘德惠，又叮嘱他一定要把这封信交到刘德惠本人手里。

陈远德再三保证不会出差错，把信揣进怀里就转身走了。

许建业在心中暗自期盼着，这封信能越早送到越好。

他万万没有想到，陈远德是个口蜜腹剑的家伙。他从许建业这里拿了信，转过脸就交到了徐远举手里。

愁眉不展的徐远举正苦干不知下一步如何办才好的时候，见到了陈远德送来的这封信，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个宝贝，高兴地差点跳起来。他破例地拍了一下陈远德这个无名小卒的肩膀：

“这回你可立了大功，我一定要重重地奖赏你。”

片刻工夫，位于新华路上的志诚公司就被大批特务秘密包围起来。按照徐远举的命令，一切都要在暗中进行，所有进入志诚公司的人只准进不准出。

特务闯进许建业的宿舍，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个大皮箱，里边装有18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还有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一些工厂的调查资料和大批照片。按照这些自传材料，敌人轻而易举地就抓住了一大批共产党员。

志诚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董事长由电力公司会计科科长黄大壩兼任，总务科科长周则洵任经理。那个刘德惠是电力公司的会计组长，党内职务是重庆电力公司支部书记，他们都遭到了逮捕。

陈远德拿走信后，就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露面，使得许建业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不久，他看到一批与自己有联系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入狱，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心中如同刀割。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同志，对不起党，就是死上一万次，也抵不了犯下的巨大过

失。

他挣扎着站起身来，一头向墙上撞去，顿时血流如注。他昏死过去了……

陈远德因为诱骗有功，很快就由上士被提升为少尉。1949年1月，他又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解放后参加组织“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政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那时还没有查清他诱骗许建业的罪行。

特务以为他只是个一般的交通员，没想到他就是重庆地下党的市委书记。

4月6日上午，有个人来到志诚公司找许建业，一进门就被守候在内的特务抓住了。

“你是干什么的？”特务厉声逼问。

“我是南岸牛奶场的会计主任，叫刘仲逸。”

这人身上的证件都被特务搜去了，上边确实是这么写的。但是特务哪里肯信，立刻找来志诚公司的职工与他当面对质。

志诚公司的职工不知道这位刘先生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常来找许建业，自称黄先生，只好照实说了。

“快讲，你到底是什么人？”特务们厉声喝斥着，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这个人显然是个孬种，很快就乖乖地说了实话：“我确实叫刘仲逸，是许建业发展我入的党，现在还是个候补。”

“你为共产党干过什么事？快交待！”

“我也没干过什么事，只是给许建业送过几次信。”他深深地低着头，说话的声音低的像蚊子叫。

“收信的人是谁？住在哪里？”特务紧追不舍。

“他叫李忠良，住在嘉陵江南岸。还有个人叫邓新鄂，也住在李忠良家里。”

特务们认为他不过是个一般的交通员，对他也没十分看重，逼他写完了自首书，就把他送进渣滓洞监狱关押起来。

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人是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的真实身份是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名叫刘国定。

在重庆西北郊有一座歌乐山。据史书记载，歌乐山翠靄浓浓，遇风雨则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

1938年，军统局随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强占歌乐山下磁器口、五灵观一带民房，设立军统局乡下办事处，设置了两座著名的监狱——白公馆、渣滓洞。从此，这里便成为关押、迫害革命者的人间魔窟，被称为“两口活棺材”。

渣滓洞，原为人工采煤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隐蔽。1939年军统特务逼死这里的矿主，霸占煤窑及矿工住房，将其改设为看守所。渣滓洞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放风坝，有一楼一底的男牢16间，女牢两间。为了从精神上瓦解革命者的斗志，特务们用楷体大字在内院墙上写着这样的标语：

“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清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在另一处高墙上，又用隶书体一丝不苟地写着：

“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外院为特务办公和拷打审讯革命者的地方，墙上有专供特务看的标语：“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命令重于生命，工作岗位就是家庭。”

渣滓洞监狱配有一个连的武装特务看守。1947年4月，渣滓洞监狱曾一度关闭，同年10月重新关人。被囚禁在渣滓洞监狱的主要是“六一”大逮捕的“要犯”，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起义者，《挺进报》案和小民革案中的被捕人员。

“政治犯”最多时达三百余人。

进了渣滓洞监狱，刘国定立刻绝望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怎样才会出现奇迹呢？他不敢往下想。

他向周围打量了一下。这间狭窄的牢房只有十多步长，六七步宽，却关了二十多个人。一股又臊又臭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着，直刺鼻子。现在还是春天，这里边就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来，要是到了盛夏，还不得把人闷死吗？

他走到风门边，向外边望去。两边都是一排排完全相同的牢房，也看不到那里都关些什么人，他看不到楼下情形，只能从铁门外楼栏杆的缝隙里，望见不远处有一块地坝。每天只有到了放风的时候，牢房里的人才能有机会轮流到那里走动一下。

他渴了。墙角放着一个储水的铁皮罐，里边的水十分混浊，他喝不下去。

开饭了。碗里盛着乌黑的硬饭粒，吃在嘴里的感觉就像咬到碎石头一样，混合着焦糊和霉臭的味道。还有一碗盐水汤，上边漂着几个烂菜叶。他咽不下去。

饿着肚子躺在牢房里，刘国定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虽然是地下党的高级干部，但这样的苦却从来没吃过。

他是四川新都人，抗战时期入党。先后担任过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

1947年10月担任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在长期的地下工作环境中，像他这样的高级领导需要隐蔽埋伏，相对平静安全。但是在脱离了激烈斗争的锻炼，脱离了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后，他们又容易滋长消极思想。

这种人的变化首先是从生活腐化开始的。出门坐车，谈工作找饭店，平时生活阔绰，还多方搞钱，刘国定身为地下党的高级干部，在他领导下的同志都出生入死地为革命工作时，他却打起了做生意的主意。做生意需要钱，而他手头钱不多，就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何说：“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私人，没有钱可借。”刘国定怀恨在心，反诬何经济上有问题。

临委书记王璞（即《红岩》小说中一再提到的地下党川东特委书记石同志）调查之后发现，这是刘国定贪图享受，诬陷同志，要调他到农村去工作。刘国定却以各种借口拒绝下乡，他这是怕过艰苦生活。

想到这里，刘国定还真有些后悔，要是当初去了乡下，虽然会吃不少苦，但总比如今这样生命难保强得多。

太阳渐渐西下，高墙内显得更加阴森恐怖，刘国定坐在黑暗中，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丝睡意都没有，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从这个地方脱身。

徐远举没想到一个豪门公子竟会是共产党。刘国定从特务的眼皮底下

逃跑了。

徐远举撕开了重庆地下党的缺口，他要将这个缺口迅速扩大。

按照刘国定的口供，特务们迅速行动，很快就在嘉陵江南岸抓住了李忠良和邓新鄂。

李忠良和邓新鄂是在年初参加梁（山）达（县）大（竹）边区起义失败后撤回重庆的，与刘国定接上头后，就住在南岸李忠良家里。李、邓被捕后，李忠良首先叛变，供出起义的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起义地区的干部 30 多人，并指认邓新鄂即“余天”，而余天正是敌人镇压起义后追捕的对象。由邓新鄂又牵出了重庆银行的余承安，徐远举指示对余承安采取即捕即放的办法，暗中控制，作为诱饵。

从李忠良的口中，徐远举还得到了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消息：重庆市内有个叫刘国铨（《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的人也是共产党。

这个刘国铨可不是一般的工人或市民。他出身豪门，是赫赫有名的刘家三少爷，当时是四川省银行高级研究员，住在国民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家里。刘家原籍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清初年间到四川泸州谋生，后来开办油粮批发商号万顺行，逐年买田置业成为全县首富。极盛时期，有土地 4000 多亩和几十间街房，先后经营过轮船公司、川瓷公司、盐号永边公司、济和发电厂、钱庄裕泰祥（发行过庄票）以及绸缎庄德和祥等等。当时一提万顺行刘家，本地没有不知道的。

凭着他的社会地位，徐远举便认定他是重庆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

徐远举并没有猜错，刘国铨是当时中共重庆沙磁区区委书记，负责沙坪坝的学生工作。

要抓刘国铨，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大哥刘国铨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四川川盐银行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四川财阀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刘航琛大半辈子贪污所得的外汇都攥在他手上。侯门深似海，特务再凶再恶，也要顾虑三分。

过去军统特务和中统特务，乱抓孙科和翁文灏左右的人，都碰过钉子，受到过蒋介石的处分，徐远举知道这些事，自然不能不慎重。

想来想去，徐远举决定选派最精干的特务，用卑骑直入的办法，以会客为名前往何北衡家中诱捕，抓着后就绑架而去。

这天一大早，二处渝组组长季缕开着一辆吉普车，随身只带了一个特务来到了何家。一去就见到了刘国铨。

刘国铨见来者不善，借进去拿件衣服为名，跑上楼去告诉何北衡的妻子说，外面有人抓他，乘机就从后门逃走了。此时，何太太尚未起床，闻惊而起，把两个特务臭骂了一顿：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

两个特务狼狈而归，向徐远举报告了事情经过，他感到十分恼怒，就将经过情形绘形绘声地向重庆警备司令肖毅肃和朱绍良报告了。

肖毅肃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交人！”

徐远举奉命照办，立即派特务将何北衡家层层密密地包围起来。特务们在何家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搜出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徐远举也亲自前往查勘，把刘国铨的二哥刘国铨、妹妹刘国凤都找到何家。

何太太这时候才感到有些不妙，惊惶起来，见着徐远举就说：“我不知刘国钰是共产党员，他是因为亲戚关系住在我家中的。你们向我要人，我向你们刘家要人，我要和他们刘家的人拼命。”

素称精明强干的何太太被特务们吓得魂不附体，直打哆嗦。

消息很快传到成都何北衡的耳朵里，他立刻把长途电话打到西南长官公署，质问肖毅肃为什么到他家里抓人。

肖毅肃是个暴躁如雷的家伙，从来都是吃软不吃硬，在电话里就跟何北衡争吵了起来。

朱绍良知道了这件事，也大为生气，当场下令把执行任务不力的特务扣押起来，又一个电话把状告到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面前，检举何北衡包庇共产党。

何北衡见风头不好，马上态度变软，到处托人求情说好话。

徐远举对何北衡没有什么好感，但也不想得罪他，仅在电话里劝他识相一些，不要来重庆。至于刘国钰，设法抓到就是了。

话是这样说，但徐远举心里却一点底也没有，按他以往的经验，人一跑，就如同蛟龙入水，猛虎入林，很难再抓得住。

冉益智身为市委副书记，上午被捕，下午叛变，出卖大批革命同志。

4月17日中午，重庆北碚公园门口，有两个中年模样的人不期而遇。他们显然彼此很熟悉，见面后就随便聊起天来。

其实，这并不是一次巧遇，而是一次经过周密安排的会见。他们也不是在闲聊，而是在商量一件大事。

这两个人一个是在重庆主持川东临委日常工作的临委秘书长肖泽宽，另一个是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

许建业和刘国定一被捕，肖泽宽立刻就得到了消息，他立即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向各方告警，迅速转移有关人员。同时约定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主要是以他为原型写出来的）、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北碚公园门前碰头，时间是12点。

肖李二人提前来到了碰头地点，却未见冉益智的影子。他俩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边谈边等。

他俩简短地交换了情况，就一致认为，这一次敌人来势凶猛，一定是与《挺进报》有关。

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委成立。临委和地下党重庆市委都很重视《挺进报》，注意发挥它的作用。报纸遵循对内发行的方针，只在党内和可靠同志中传看。除以刊登消息为主外，还经常配有小言论，反映临委和市委的意图，指导川东各地的地下斗争。《挺进报》直接联系了一些同志搞发行，有的也通过邮寄传送，但主要的渠道是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形成了一个严密庞大的发行网。

1948年春节过后不久，川东临委接到川康特委间接传达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分管西南工作的钱瑛同志的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人的攻心斗争；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可以发展“特别党员”。临委领导决定：为了加强对敌攻心斗争，《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从对内转向对敌，少在内部传看，主要寄给敌方人员。从第15期起，《挺进报》即通过各种渠道寄给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大小头目。报纸的内容也作了相应改变，

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

对于这种作法，很多同志有不同意见。他们指出，本来在特务密布的敌人统治区域里，创办发行这样大规模的地下报纸，本身就冒着极大的风险；如今火上加油，强烈地刺激敌人，硬捅马蜂窝，这就意味着在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李维嘉就这样分析过：所谓“攻心战”纯属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只能是自我暴露，引火烧身，“生怕敌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吸引敌人集中力量来扑灭我们。”

这种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947年以前，敌特通过邮检虽然发现了《挺进报》，检扣了不少，但他们并没有掌握什么很准确的线索，也没有花很大力量来对付。如今有这么多《挺进报》主动送上门来，敌人不能不感到震惊：原来地下党的能量这么大呀！于是就出现了朱绍良大怒，徐远举指挥军警宪特大批出动这一幕。

12点钟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来。肖李二人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

就在肖李二人等待冉益智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徐远举的阶下囚。

冉益智，四川西阳人，抗战时期入党，当时是地下党重庆工委主管学运的副书记。重庆银行的那个余承安是他的下级。

4月16日，冉益智给余承安打电话，向他了解情况。他不知道这时候余承安已经叛变，这个电话已经被特务暗中监视，在电话中，他告诉余承安，明天上午他要去北碚。

第二天，特务押着余承安守候在北碚街上。当冉益智经过这里前往北碚公园时，余承安把他指认给特务，冉益智当场遭到逮捕。

当天下午，徐远举再次亲自出马，与陆坚如审讯冉益智。

徐远举没有想到冉益智是个胆小鬼，还没等动刑他就吓瘫了，问什么说什么。

“那个杨清是干什么的？”徐远举问。

“他叫许建业，是市委委员。”

“你知道刘国钰躲在哪里吗？”

“知道。刘国钰在荣昌有个大姐夫，名叫郭质彬，他很可能藏在那里。”

“有个叫刘仲逸的人，他已经承认是共产党员。你认识他吗？”陆坚如顺便问了一句。

他已经知道了冉益智市委副书记的身份，他不指望冉益智能认识一位还没有转正的候补党员。

“认识。”

冉益智的回答令陆坚如略感吃惊，又追问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不知道。”冉益智脸色大变，声音也突然低下去。

“快说，不然我枪毙了你！”徐远举看出这里有名堂，厉声喝问道。

“他是……市委书记。”

徐远举和陆坚如对望了一眼。他们相信冉益智不敢撒谎，但能把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抓到手里，这却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审讯继续进行。冉益智陆续供出了市委常委李维嘉，他领导的学运系统的北碚特支、沙磁特支、城中心和南岸特支，以及部分学校的党员负责人，并开出党的外围团体“六一社”的组织和部分社员名单。他所供出的人除少数逃脱外，大部分被捕。

由于叛变有“功”，冉益智被军统局授予中校秘书，西南长官公署侦防处专员。他在军统头子徐远举所办的特务训练班上讲授反共课程，把地下党的组织活动、行动规律、交通情况传授给特务。又参加校对《中共在川活动概况》等反共文件，死心塌地为军统服务。

冉益智曾经恬不知耻地说过他叛变的“理由”：“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是落到特务手里，即使不被杀掉，也很难原模原样地出去，出去也就变了。”

刘国钰在等待上级与他联络，却未想到他的上级把他出卖给了敌人。

就在冉益智叛变的当天晚上半夜时分，徐远举派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率特务火速前往荣昌，逮捕刘国钰。

刘国钰从何北衡家机智地逃走后，并没有马上隐藏起来，而是立刻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又指定他的未婚妻曾紫霞（即《红岩》中的孙明霞）和上级党组织联系，报告他的脱险经过。然后，他才离开重庆躲到荣昌大姐夫家里。曾紫霞也很快来到荣昌与刘国钰会合。

曾紫霞是重庆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两年前与刘国钰相爱，刘国钰十分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姑娘，但起初却把爱情埋在心底，暗自决定不到革命胜利不结婚。慢慢地，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于是便订下终身。

在刘国钰的培养和帮助下，曾紫霞进步很快。就在上个月，她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举行宣誓仪式那天，领她宣誓的是刘国钰，监誓人就是冉益智。

曾紫霞还记得，宣誓结束后，冉益智大讲了一通党性锻炼和革命气节。

冉益智是曾紫霞的上级刘国钰的上级，因而她对他很尊重，对他说的话也记得很牢。她在心中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被敌人抓住了，我一定不当叛徒。

在荣昌住了几天，曾紫霞有些担心起来，她怕这里不安全，就劝刘国钰躲得远一些。

刘国钰摇摇头。

他的身份暴露了，不可能再回重庆了，但他还要为党工作。因此，他要在这里等待上级冉益智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成都或昆明。如果他走了，冉益智找不到他，就会与组织脱离关系。

他把组织关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然而，他没有等来冉益智，却等来了特务。

他和曾紫霞双双被捕。

当天晚上，被押回重庆老街32号。

审讯室里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徐远举，一个是保密局重庆站站长颜齐，还有一个是专程从南京赶来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军统）二处处长叶翔之，他是来协助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的。

徐远举高高地坐在沙发转椅上，一开口就带着嘲讽和不满：

“资产阶级的三少爷，家里有万贯家财，搞什么共产党吗！你知道不知道，共产党就是要革你们这样人的命。日后共产党得势了，不但你家的财产保不住，你的家人性命也难保。”

颜齐从刘国钰一个泸州同乡那里了解到了刘家的一些情况，也好言好语地劝他回心转意：

“搞什么共产党呀，你细皮嫩肉的，哪里吃得了那个苦呀！再说你家里有钱有势，你想干什么都行，为什么不替自己的前途着想，非要干这个掉脑袋的差事呢？”

颜齐说的也是实情。刘国钰1940年夏天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毕业后，家里人为他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谋到了一个职位，他五哥又拿出一万美元，供他出国留学费用，两条路任他选择。一个当官，一个出国，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绝好的出路，可是却都被刘国钰拒绝了。

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学习了很多马列著作，树立了坚定的政治信仰，他曾给自己取名叫“弗拉基米尔·刘”，以列宁自认。这倒不是他以为自己比得上列宁，而是表示自己信仰列宁的学说。

那时候共产党的组织路线与后来的极左路线相反，认为家境富裕者一样可以成为政治上可靠的革命者。于是，他在19岁那年就被吸收入党。

大学毕业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到敌后去，到农村去”，主动来到云、桂、黔交界处的陆良县工作。一年后，敌人发现了他的革命活动，准备逮捕他，中共南方局指示他返回重庆。

在重庆，他主要负责做知识分子和学生工作，同时为地下党筹集经费。《挺进报》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就是刘国钰。

刘国钰常常出入上层社会，因而经常身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阔少爷省吃俭用到了惊人的程度，常常饿着肚子，以致得了胃病。

回想起这些往事，刘国钰骄傲地扬起头，大声说：

“你们用不着浪费口舌了，我是从马列主义、从哲学的研究中找到真理的。我自愿背叛我的家庭，我不是受任何人指使而是自觉自愿参加共产党的。我心甘情愿为人民牺牲自己。我是共产党员，你们没有抓错。杀不杀我，你们有权；交不交组织，我有权。要杀是可以的，要我交出组织，永远办不到！”

刘国钰的强硬态度激怒了徐远举：

“来人呀，让他尝尝老虎凳的滋味！”

两个特务扑上来，抓住刘国钰就往老虎凳上拖。刘国钰一边用力挣扎，一边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高声喊着：

“你们这是搞啥子名堂？把我放开！”

徐远举见他事到如今还这么凶，冲上去就打了他两个耳光：

“你的上级把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还充什么英雄好汉！”

“呸！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了，还叫我说什么？”

“给我用刑！”刘国钰的揶揄使徐远举恼羞成怒。

徐远举没有对刘国钰用酷刑，他以为这个资产阶级的阔少爷禁不住拷打，坚持不久就会招供。然而他没有想到，刘国钰很有骨气，任凭怎么用刑就是不屈服，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话：

“叫我当叛徒，休想！”

徐远举知道刘家很有势力，也不想过份折磨他，只得先把他押进渣滓洞看守所，以后再慢慢想办法磨去他的锐气。

徐远举还特别关照渣滓洞的特务看守，要给刘国钰戴上手铐脚镣，不准他出去放风。

徐远举本想从刘国钰嘴里追问出《挺进报》的线索，他推测刘国钰肯定与《挺进报》的编印发系统有直接接触，但刘国钰一口咬定他从来不过问《挺

进报》的事情，徐远举也拿他没有办法。

其实，《挺进报》的一小部分就是由刘国钰发行的，每次大约有两三百份。

据他的堂侄刘以治回忆：“钰叔每次收到《挺进报》后都要紧张工作好半天，首先是拟出分配名单，谁多少份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仅分配就要花很长时间。记得有一次他严肃地说：‘这是同志们冒生命危险印出来的，一张也不能浪费！’分配完之后，按收件人一件件卷好，然后他自己送一部分，我帮他送一部分。我们把卷好的《挺进报》藏在消毒棉花包里，装在精美的礼品盒里，送到银行、商号、学校、报馆以及研究机关。”

在《红岩》中，作者曾经描写过李敬原刻钢版的情节，《挺进报》是用蜡纸印的，每期都要先刻钢板，而这块钢板就是刘国钰提供的。

那时候，他住在何北衡公馆的顶楼上，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了一块刻写蜡纸用的钢版，高兴地说：“嘿，这东西现在很有用。”

说着，他就把这块钢版拿走了。

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是把这块钢版送给了刻印《挺进报》的同志。陈然已经接到报警信，但他却没有及时转移。他要把《挺进报》印完，他要等待上级的明确指示。

“刘仲逸，出来！”

铁门哗的一声被推开了，两个特务冲进来，架起躺在床铺上的刘国定就走。

“是不是要枪毙我？”这个念头刚在脑海里闪过，他就觉得两条腿发软，站都站不起来了。

忐忑不安的刘国定被押进了老街32号。

刘国定虽然惊魂未定，但他还是认出这是他来过一次的那间刑讯室，也认出了坐在对面桌子后边的那个人就是徐远举。徐远举旁边那个叶翔之他不认得，不过看样子是个大官。

徐远举阴沉的面孔上突然露出一丝笑意：

“刘国定，亲爱的市委书记先生，你辛苦了！”

刘国定不禁打了个寒战，心中暗暗叫苦：“我的身份怎么暴露了？这下子肯定完了！”

“你承认不承认都没有用了，你的战友冉益智副书记已经把你供出来了。”徐远举得意洋洋地说下去，“重庆地下党组织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连你这个市委书记也成了囚犯。”

刘国定突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刘书记，你是聪明人，我们也不瞒你。像你这样的人物，要是来个公开审讯枪决，那影响有多大。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打算这么做。我们希望你与我们合作，把《挺进报》的情况说清楚，我保证你安然无恙，不然的话……”

徐远举故意不往下说，嘿嘿冷笑了两声。

刘国定低下头默不作声。

当叛徒？这个念头太可怕了，在狱里他都不敢往这上边想。可是不叛变又怎么办？徐远举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他不敢和他对抗，说不定他一高兴就会要了自己的命。回渣滓洞？那是个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他实在忍受不了那里的非人待遇。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刘国定当了无耻的叛徒。他供出了川东临委成员、城区区委、“电台”特支，《挺进报》特支的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有一个名字引起了徐远举的特别注意：《挺进报》特支代理书记陈然。

4月19日，陈然（《红岩》中的成岗）收到一封奇怪的信：

“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

署名为“彭云”。

陈然知道这封信的寓意是什么。他知道党内不断有同志被捕，也不止一次得到上级“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转移”的指示。

4月11日，《挺进报》的上级领导李维嘉召集下属组织成员开会，通知有人被捕，要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转移，并要求《挺进报》赶印出两期寄给敌人，以转移敌人注意，配合被捕同志的斗争。

4月12日，李维嘉与陈然最后一次碰头，他交给陈然一笔办报经费，指示陈然作好应变准备。

4月18日，叛徒带特务到李维嘉家中抓人，他侥幸脱险，立即给陈然写了那封信，希望陈然认出他的笔迹后赶快离开。信中不仅明确道出了他的处境危险，还暗示不要等人商量。

19日，陈然接信后却没有走。

20日，他拿着信去找另一位新入党的同志，说：“我看不出这是谁的笔迹，但肯定是自己人写的。”

“彭云”是江姐的儿子，陈然多次去看望过他。只有自己人才知道他熟悉“彭云”这个名字。

“莫不是……上面出了问题？”陈然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但马上又自己把自己否定了：

“这可能吗？一定不会。”

最后他下了决心：“有人约好我在星期六见面，一定要和他见见面，问问他。我们还是等两天再说，趁这两天把这一期印好发出去。”

回家之后，陈然就开始紧张地赶印第23期《挺进报》，这是他负责的最后一期《挺进报》。

此时此刻，一群特务（大约有20名左右）正在紧张地搜捕他。上午10点钟，他们赶到了江北中粮公司碾米厂，一通乱翻乱砸，还抓了不少人，但是既没抓到陈然，也没找到《挺进报》。

陈然负责《挺进报》的印刷工作，地点就在他家里。他的公开职业是中粮公司修理厂的管理员（相当于厂长），白天要去上班，只有夜晚才能安全地赶印报纸。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印刷，天亮后满眼血丝，振作精神再上班。

陈然望着一张张新印好的粉红色的《挺进报》，嗅着那一阵阵油墨的清香，又想到这份凝聚着他 and 同志们无数心血的报纸马上就不能出了，心里不禁隐隐作疼。

1939年春，将满16岁的陈然参加了共产党。6月，他向组织申请去延安。当他步行走到宜昌上游三斗坪时，在难民群中失去了联络对象，接着又患了疟疾，这时日军已包围宜昌，逼近三斗坪。他只好随着难民到了重庆。到重庆后，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

“皖南事变”后，和陈然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被敌人诱捕，陈然暴露了身份。党组织指示他马上离开重庆并暂时断绝组织关系。

陈然无法接受切断组织关系的指示。他一向将党比作母亲，把组织关系视为生命。他很痛苦。上级反复对他讲道理：切断关系是暂时的，等待党以后来找你。陈然还是想不通。那一夜他就住在办事处的客房里，彻夜失眠。最后，他用党员应该服从组织铁的纪律这个道理来告诫、说服自己。第二天早上，他领取了路费就到江津去了。

在江津过了半年时光，贫病交加，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他拖着虚弱的病体回到重庆。病好后他去曾家岩中共驻渝联络处多次，要求见领导，领导却因已说明“暂时切断组织联系”而不再见他。陈然在极度失望中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留在办事处，申诉自己的困难，希望得到指示。

自此，五年光阴，他如失群孤雁，独自在漫漫长夜中奋飞。

1946年夏，陈然与几个朋友一起筹办了《徬徨》杂志，1947年元旦公开出版，内容是健康的，但在形式上避免明显的政治色彩，是“灰皮红心”。它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和党培养多年的积极分子。陈然负责通讯联络工作。

后来，省委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徬徨》失去了领导，他们陷入了苦闷之中。这一天，他们突然从信箱中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通讯稿》，上面大量报导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惊喜已极，如获至宝，认为应该让其他同志也知道这些消息。于是，他们把这些消息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以后，每收到《新华通讯稿》都如此办理。这份无名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引起了地下市委的重视，先派刘国钰来联络，接着又派市委委员彭咏梧（《红岩》中的彭松涛的原型）与他们接上了关系。

从此，这份小报就由彭咏梧负责领导，取名《挺进报》（当时刘邓大军正挺进大别山）。后来成立《挺进报》特支，陈然重新入党，任组织委员，以后又代理特支书记。

重新入党之际，他对五年前未得上级同意便擅自离开江津一事痛悔不已，一再向另一位党员说：“当时，死也该死在江津！”

这段经历成为陈然心头烙印极深的隐痛。当他接到暗示信时不由得又想起那段往事，他在心里暗下决心：非得等到明确的通知，印完报纸才能离开。

陈然没有及时转移的第二个原因，在当时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一般党员对上级领导人抱有绝对的信任。按照地下工作原则，党员之间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上级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下级却不知道上级的姓名住址，只能上级找下级，下级却不能也无从找上级。这种做法使地下斗争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也很容易使一般党员群众将具体的某个上级领导人等同于党。陈然接信后曾产生过一丝疑虑：《挺进报》是个绝密机关，除了上级和共同办报的党员，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是不是……上面出了问题？”这个念头倏忽即逝，他不愿意朝这方面想下去，似乎怀疑上级便是亵渎了党。而同一时刻，原地下党市委的正副书记正领着特务四出捕人。

直到下午两点多钟，特务们才发现他们搞错了地方。陈然在中粮公司所属的工厂不假，但这里是长江北岸的碾米厂，而陈然却在南岸的野猫溪修配厂，两地相差甚远。

特务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又集合起原班人马，直扑南岸。

夕阳西下，嘉陵江水一片粼粼波光。

陈然印完了最后一页《挺进报》，这时候，他才感到有些头昏，腰和手

臂都麻木了。他的两眼熬得通红。他已经一连熬了两个通宵了。

假如这时候陈然走还来得及，在特务闯进他家门之前的十分钟里，陈然都可以安然逃脱，可是他没有走……

小说《红岩》对陈然被捕的情景做了真实的描述：

把印过的蜡纸堆在一起，擦燃火柴烧掉。接着，他把印好的纸，一份份清理拢来。这期《挺进报》，有五页，一共是两千五百份，他还得赶快工作，才清理得完。他相信，收复延安的胜利，一定会给群众带来最大的鼓舞，给还在妄想扩大军火生产的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

附近有人在讲话，也许是厂里的工人吧？成岗来不及多想，他得加快速度，赶紧工作。

隔壁，从寝室里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就听到妈妈慌张的声音：

“成岗不在家，钥匙他带走了！”

妈妈的声音很大。她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讲过话。大概是希望让他听到。成岗一惊，突然站起来。他明白这是出现了敌人！在这时候，要想保全机关和印刷品，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逃命，也许可能、但他不能这样，也根本不想这样。此刻他需要做的，是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来找自己的同志和党的组织受到任何损失！他立刻拉开夜里用来遮灯光的窗帘，然后轻轻推开了窗户，把一把经常放在储藏室里备用的扫帚，小心地挂到窗口外面的那颗钉子上去——有了这个暗号，来找他的同志，远远地就可以发现危险的警号，不会再进厂里来。

隔壁，有人正在用力打门。

挂好扫帚以后，他放心了一些，危险再不能威胁党和同志们了。他回头看看，决定在敌人破门以前离开。可是，不能把党的文件留给敌人，他转回身来，又把《挺进报》全部捆成一捆，挟着报纸，纵身跳上窗台，想从楼口跳下去。只要跳下去了，两分钟以后，就可以躲进工人宿舍，敌人再也找不到他了。

“站住！”

“不许动！”

喝叫声从四面传来。晚了。工厂已经被包围，楼底下布满了特务。成岗只好退下窗台。这时，小门已被猛力击破。成岗转过身来，几支手枪对准他的胸膛。在陈然家中，特务们发现了刚印好的《挺进报》，翻出了油印机、钢版、油墨等印刷用具。徐远举接到特务的密报后，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朱绍良：“我们找到了《挺进报》的老巢！我保证《挺进报》再也不会出现了！”

徐远举没有想到，外表文静的陈然却有着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面对死亡和酷刑，陈然放声大笑。

徐远举迫切地要见一见陈然，想看看能办出《挺进报》的人到底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可是，当他见到陈然时，却不禁有些失望。陈然只有二十多岁，眉清目秀，文文静静地像个大姑娘。

徐远举轻蔑地笑了笑，转过身对二处的法官、司法股股长张界（即《红岩》中的朱介）打了个手势，示意让他负责审讯。

张界一直参与对《挺进报》事件所捕共产党员、革命志士的审讯，深知

这次审讯关系重大，因此事先做了很周到的准备，但他很快就发现，不论自己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陈然都是对答如流。很显然，他的准备要比自己还充分。

“《挺进报》是我办的，没有任何背景。我打算先用油印试办，如果销路好，再设法改成铅印。只是因为办大型报纸没有力量，我才办了张小报。”

“办小报也需要钱，这钱是哪来的？”张界以为抓住了陈然话中的漏洞，用手一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急忙追问下去。

“我在工厂当管理员，这几个钱还是出得起的。再说，由刻到印，都是我一个人干的，用钱的地方不多。”陈然的回答从容不迫。

“全是谎话！”徐远举在一旁坐不安稳了，亲自跳了出来。

“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出来吧！”

陈然神色自若：“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不让办，不办就是了。”

“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

“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

“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老实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了出来，你还不交组织？”

陈然笑了笑：“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算晚。至于说到有什么人交出材料，那不是很好吗？那还要我交什么材料！”

“你在强辩！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徐远举沉不住气了。“我看你有什么本领不交组织！”

“不交又怎么样？”

徐远举蛮横地威胁：“不交，就强迫你交！”

“那你就强迫吧！”

徐远举气得又跳又叫，又拍桌子又摔板凳：“好，陈然，你等着吧！看看到底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陈然鄙夷地看着他：“你这个土匪流氓，根本没有资格问我的话！”

整整一个上午，敌人一无所获。

下午，敌人用起了大刑。

陈然被绑在老虎凳上，他疼得满头大汗，脸色苍白，但他仍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

“你交不交待？”徐远举伸出巴掌猛地向陈然脸上打去。

陈然昏了过去。

特务用凉水把他泼醒，他仍然咬紧牙关，一字不吐，两只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火焰。

第二次受刑又是坐老虎凳。刚受过刑伤的双腿，在老虎凳上拗得吱吱作响，骨头快要断了。

徐远举又是一声狂吠，又一次伸出巴掌猛击陈然：“加砖头！”

陈然又昏了过去……

陈然苏醒过来了，看见面前摆着纸和笔。敌人要他写自白书。

陈然是一个书生，写过许多文章，纸和笔就是他进行战斗的武器。写自白书却从来没想过，他也不打算写。

自从加入共产党那一天，他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他集就了中华民族的一身正气，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从

而培养出了大无畏的革命气节。

在1947年第五期《徬徨》的“小论坛”栏目中，他发表过一篇《论气节》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

什么是气节？

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

也就是《礼记》上所提出的“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凭着这种精神，在四千多年的历史中，尽了他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只有那种“舍己为人”、“舍身取义”、为万民、为真理与正义的气节，才是值得我们宣扬和继承的。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气歌》里面所歌颂的先贤们，像辛亥革命时慷慨就义的烈士们，像为科学真理而牺牲的哥伯尼、伽利略、布鲁纳，为“不自由毋宁死”而上断头台的罗曼夫人……，我们试瞑目想想，一部社会斗争史有多少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例子！

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他们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

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学取的。

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惶失措，以致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

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情感是倾向欲望的，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颈上，这时你的情感会变得脆弱无比，这时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担得起考验的重担。陈然也写过自白书，但那不是叛变的声明，而是气壮山河的战斗誓言。让我们来读一读小说《红岩》中的一段描写：

徐鹏飞声调一变，厉声说道：

“你们应该明白，现在能掌握你们命运的人，不是你们，而是我！为了自己，你们应当想想……我不需要你们履行任何手续，不需要任何代价，只要一纸自白书，就可以立即改变你们的处境！”

徐鹏飞摆正桌上的纸笔，避开微微带笑的许云峰，凌厉的目光突然转向成岗：

“我以个人的名誉保证，只要你写自白书，我立刻释放你。”

许云峰不屑地看了敌人一眼，接着又坦然地笑着：

“共产党人从来不怕讲明自己的观点。”

一句话提醒了成岗，他精神一振，竟忘记了周身的创痛，滴着鲜血，拖着脚上的铁镣，一步步迎着敌人的逼视，走向准备好纸笔的桌前。他的目光像利剑一样扫过全室，缓缓伸出流血的手，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几个大字：我的自白书。他沉思了一下，很不喜欢“自白书”这样的字，立刻蘸饱了墨，把笔一挥，在已经写下的几个字的前后，添上引号，变成：

我的“自白书”

几个墨迹饱满的字，布满了一整张纸。成岗的胸脯起伏着，再也无法抑制那烈火一样的感情，他索性扔开了笔，冲着敌人高声朗诵起来：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好，成岗，”许云峰大步上前，扶着成岗的肩头，满怀信心地朗声说道：“让我们迎着胜利的曙光——看共产主义的红日出现在东方！”除了当时许云峰（许建业）不在场外，这段描写还是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陈然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和风采。成善谋和陈然是好朋友，但却不知道彼此从事着同一项事业。他们互相通过信，却不知道接信人是谁。

徐远举可不是个傻瓜，他知道陈然坦然承认《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不过是想掩护他的战友。

在陈然的家中只搜出油印设备，这说明他只管印刷，那么，谁管刻写？谁管发行？谁负责筹集资金？还有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谁写的稿件？

《挺进报》上登的文章大多是根据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稿整理而成的，这就说明起码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天天负责收听新华社的广播，说不定共产党在重庆还有一个地下电台。

根据刘国定的口供，特务扑向临江门韦家院坝。雷电华电器行的经理成善谋的家就住在这里，而重庆市委电台特支的书记程途也在这里落脚。

成善谋是电台特支的宣传委员，掌管一部电台，实际上只能收音。

特务破门而入，大声问：“谁是程途？”

这时候，程途正按约定时间来成家碰头，已经快来到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成善谋挺身而出：“我就是程途。”

特务们一拥而上。

成家的人明白他的意思，急忙趁乱溜走，在路上拦住程途，使他及时转移脱险。

特务在成家没有搜到电台，但徐远举并不死心，他指示陆坚如一定要在成善谋身上打开缺口，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徐远举还指示陆坚如，要对刚刚抓住的王朴进行疲劳轰炸式审问。王朴是地下党重庆城区区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此人出身一个大地主家庭，家资万贯，富甲乡里。去年冬天，他在重庆市内开办了一个南华贸易公司，据说赚了不少钱。徐远举怀疑《挺进报》以及地下党的经费，有不少是他提供的。

如果能挖出地下党的电台，再断了共产党的“财源”，那可真是大功告成了。

徐远举的得意算盘打得未免太早了。

成善谋是什么也不承认：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承认认识陈然，不承认收听过新华社广播，也不承认有什么地下电台。

当特务给他动完刑，又来诱骗他投降叛变的时候，他两眼圆睁，一句话掷地有声：

“宁作文天祥，不作洪承畴！”

仅凭这一句话，陆坚如就认定他是个共产党员，而且是那种骨头很硬的共产党员，他一定给共产党做过很多事情，中的“毒”一定特别深。

成善谋早在1939年就入了党，后来先后在第四飞机修理厂和国民党财政部无线电第三区台任过职。他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电机系，又进入航空机械学校学习过，对于电器和机械修理很在行。1946年时，他又和朋友在重庆市区合开了雷电华电器修理行和建中电机厂。那时候，很多人都羡慕成善谋有钱，因为他做生意发了财。他确实发了财，手里有100余两黄金。但他把这些钱都用来购买各种手枪和大量药物，支援川东武装起义。他自己家里常常穷得连下锅的米都没有。

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朋友，他想请人家在家里吃饭，可是他的妻子却拿不出米来下锅。朋友再一看他那几个孩子，一个个全都是面黄肌瘦。

朋友误会了，没好气地说：“你在外边是做生意的人，赚点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这么不顾家？”

面对朋友的指责，成善谋真是不知道怎样解释才好。

后来，他的这位朋友知道了内情，感动地无话可说，便一次次暗中拿钱给他妻子，帮助他一家度过难关。

成善谋早年曾在四川省无线电收音员训练班学习过，抗战爆发后，他在家乡积极参加“救国会”工作。坚持抄收广播消息，出版油印报。《挺进报》创办后，地下党考虑到他这方面的专长，就把收听、记录新华社电讯稿的任务交给了他，然后再由秘密交通员把他的记录稿转给负责编辑刻写的蒋一苇，最后交给陈然油印。

成善谋和陈然是好朋友，曾经在《科学与生活》杂志共过事，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正在从事着同一个庄重而神圣的事业。

不过，成善谋曾收到过一张由组织上转来的纸条，上边写着“致以革命的敬礼”这样几个字，底下没有署名。组织上说写纸条的人就是印刷《挺进报》的人。

成善谋听了，心情立刻激动起来，回复了一张字条，上边写着：“紧紧地握着你的手”。这个真实的情节也被写进了小说《红岩》：

那些稿件，全是用工整而秀丽的字抄写的，从来没有错误。看得出，那个负责收听新华社广播的同志，是个勤勤恳恳、热情地为党工作的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成岗不能不猜测：也许，在白天，他和我一样，有着公开的职业，而每个晚上，他都得秘密地也是不知疲倦地坐在房间里，轻轻地打开收音机，让来自解放区的广播，从嘈杂的干扰中传播过来，紧张地听着，紧张地记录下来，然后再将记录稿用毛笔端正地抄写一遍。每个晚上，他都得紧张地工作几小时，得不到充分的睡眠；没有星期六，也没有星期天，一年到头，都没有假期……

成岗忍不住提出了要求：“……让我给他写封信吧！……我知道和一个与自己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的人通信、结识，都是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只让我写一次，表示我的敬意，让我不签名地写封信！”

“好吧。”李敬原那一次比较宽和，终于点点头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写简单一点。”

成岗想说的话太多了，不知怎么写，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最后他写上一句简单而准确的话：

“致以革命的敬礼！”

这几天，成岗正在等着对方的回信，谁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人呢？是个老年还是个青年，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无疑的：那是个很好的同志。

成岗兴奋地从李敬原手上接过了回信。他仔细地看了看，回信也只有一句话：

“紧紧地握你的手！”

正是那熟悉的均匀秀丽的字迹。一句话，一张纸条，战斗的友谊建立起来了，共同的理想温暖着不相识的然而又是深深地互相了解的战友的心。

在小说中，这个情节被移植到了刘思扬身上。在白公馆牢中，成岗和刘思扬这两个未曾见过面但却产生了深厚友谊的战友同囚一室，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而真实情况是，他们被敌人抓住后，陈然关在白公馆（一度关在渣滓洞监狱），成善谋关在渣滓洞，根本没有机会见面。直到他们牺牲的时候，才肩并肩地走上了刑场。

王朴从狱中捎出口信，嘱咐母亲坚决跟党走。金妈妈将变卖家产的收入折合成 2000 两黄金，全部交给地下党。

陆坚如没有从成善谋身上打开缺口，又来打王朴的主意。在他想来，王朴要比成善谋好对付得多。王朴长着一张娃娃脸，鼻梁上加个眼镜，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根据陆坚如的经验，只要一动刑，这种人就会乖乖招供。

再者，王朴是个公子哥出身，没吃过什么苦头，没经过什么风浪，社会经验也不多，三言五语吓唬吓唬，说不定他就会动摇。

于是，一见到王朴，他就收起了凶神恶煞的嘴脸，摆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我也知道你是冤枉的。你和共产党怎么会是一路人呢？我们把你请来，是因为有人诬告你。你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

“我不说这事情也很清楚。”王朴现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我这个人老实，也没有什么能耐，经常受人欺负。正好这时候陈然来约我办报纸，我和陈然是朋友，就答应了。”

“你为什么和陈然合伙呢？”陆坚如耐着性子问。

“他这个人心眼好，和他在一起，我不会受人欺侮。”

“《挺进报》的经费都是哪里来的？”

“我家在江北、巴县有 1600 多石地，我就卖了一些，拿来作本钱，想先办报纸，办好了再办个小工厂。”

“你用钱的地方一定很多吧？”陆坚如想迂回出击。

“我只会花钱，不会挣钱。这不，手里还有二两金子没用完呢。”

“你知道不知道《挺进报》的内容是什么？”

王朴摇了摇头：“我从来不看报纸，反正我觉得我出钱，人家办报纸，与世无争，过日子挺自在，也就行了。”

说着说着，陆坚如忽然醒过腔来，王朴这是在跟我装傻，把我当成小孩子耍了。

“啪！”他脸色一沉，用力一拍桌子。“王朴，你少跟我绕圈子！你是共产党的区委委员，专管经济工作。你的上级领导已经把你供出来了。”

“这是诬陷呀！你刚才不是也说有人诬陷我吗？”王朴反唇相讥。

“给我用刑！”陆坚如的花招使尽了，只得搬出了老一套。

可是这老一套却对王朴不管用，他还是那句老话：受人诬陷。好像他真有天大的冤枉似的。

敌人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交给二处警卫组暂时关押起来。

陈远德又来了。

他先是假惺惺地说了一番同情的话，又说自己苦大仇深，不愿干丧良心的事，最后他才道出真意：

“王公子，你要是在外边有什么事情要办，尽管吩咐。”

王朴不敢贸然相信这个特务看守，但又不愿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他望着陈远德的脸盯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

“那好吧，我有个口信求你捎给我姨妈，就告诉她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就行。我姨妈住在桂花园耐园，一打听就能找到。”

“人家怎么能相信我呢？”

王朴从怀里掏出一只烟斗和装烟丝的荷包，交到陈远德手里，说：

“这是我平时所用的东西，我姨妈认识。你就说是我亲手交给你的。”

“这个口信我一定能给你捎到。你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我一起给你办了。”

陈远德的热情反而引起了王朴的警觉，他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陈远德悻悻地走了。

不久，王朴被送进白公馆看守所关押起来。

在《红岩》中，我们找不到王朴这个形象，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却流传得很广。这还不仅仅因为他本人是一个英雄，还因为他母亲也是一位英雄，被誉为“一代风范，百世楷模”。

王朴原名王兰骏，兰花骏马，取意高洁。后来他参加了革命，便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以示纪念。

1944年冬天，王朴在复旦大学（当时迁到重庆远郊北碚）新闻系念一年级，当时他母亲寓居在重庆近郊南岸的寓所里。

有一天，王朴回家来对母亲说，他想要回江北县老家去办教育。金妈妈不禁皱起了眉头：

“大学教育，关系你毕生处世立业，你才念大学一年级，等毕业了再去办教育不好吗？”

王朴的父亲已于上一年去世，家里的事都是母亲和他商量着办。他犹豫片刻，终于告诉了母亲真情。

原来，王朴早已同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建立起了联系，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他的具体情况，青年组认为他最好能回江北县老家去，利用他家的条件办学，以学校为依托建立革命据点，积蓄革命力量，同时普及教育。一旦形势需要，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王朴十分信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这些共产党人，决定按照他们的建议办。

金妈妈听了儿子的诉说，沉思道：

“你在共产党的组织了吗？”

“我还不在组织。但我认为共产党一心一意救国救民，一个爱国青年应该跟着它走。我已决心输家救国。”

金妈妈沉吟片刻，毅然道：

“你既然下了这样大的决心，我支持你，和你一道回乡去办这件事。”

回乡办学是王朴革命道路上的重要里程，也是金妈妈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从此，这母子二人便再也没有回头。

1945年，王朴母子在江北县复兴乡李家祠堂办起了莲华小学和农民夜校。“莲华”这个校名，各取王朴父亲王莲舫和母亲金永华名字中的一字组成，同时也寓含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纯洁向上之意。王朴任校长，金妈妈任董事长。

后来，王朴母子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又相继办起了莲华中学，接办了志达中学，在江北县西部靠近华蓥山脉的偏僻农村，迅速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教育网络和以此为依托的农村革命据点，成为南方局所掌握的重庆附近的中心据点。

1946年夏，内战全面爆发，形势更加严峻。下半年，作为大地主家庭当家人的王朴，终于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金妈妈也更加认定了儿子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她决心跟儿子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准备配合开展武装斗争，急需大量经费。中共川东临时工委通过王朴向金妈妈提出筹措经费的事。金妈妈明白这事非同小可，比用办学方式支持革命要冒更大的风险。如果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出来了，必是死罪。她说出了顾虑：

“我快50岁了，死了不足惜，可还有你几个弟弟妹妹，都还没有长大成人。”

王朴告诉母亲，地下党组织提出，所借钱款，重庆解放后归还；弟弟妹妹，由共产党负责培养教育；学校，也由共产党负责经办。

“共产党是为了老百姓，共产党有困难，有急需，我不能坐视不理。”金妈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作出了决定。

这年冬天，金妈妈开始变卖田产。王朴又用家产在重庆城内办了一个南华公司，既为地下党组织筹集经费，又作为与上级党组织联络的据点。

1948年4月下旬，王朴因叛徒出卖而落入敌人魔掌。王朴被捕后，从狱中托人带出口信，对母亲郑重嘱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

母亲明白儿子的意思，“学校”就是指党组织。

王朴也给妻子褚群捎来了口信：“莫要悲伤，有泪不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取名继志。”

狗狗是王朴儿子的小名。妻子明白丈夫给儿子改名的用意，是要他继承父亲的志向，继续跟共产党走。

接到儿子的口信后，金妈妈更加大量变卖田产。她拥有的田产跨江北、巴县两县，总共1680多石，在重庆市内还有一些临街的铺面房产。她陆续卖掉了1400多石，变卖家产的收入折合黄金2000两，存入银行，换成金条，全部交给中共地下组织，供地下党随时取用。

后来，川东地下党要派一批干部去香港，没有那么多钱买飞机票，她又拿出了六根金条（每根十两）交给地下党组织。

这以后，她生了一场重病。在病中，她把一个负责与她联络的地下党员叫去，拿出身边的一个皮包，里边是一些首饰和碎金子，这是她剩余的最后一笔财产，共计47两黄金的私房钱。她要全部交给共产党。

这个同志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您老人家安心

养病，这些东西还是留在您身边好，以后组织需要时再来拿。”

不久，更沉重的打击落到了金妈妈身上，他的爱子王朴在离重庆解放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被反动派杀害了。金妈妈强忍住心头的悲痛，委托妹妹金永芳去收殓了王朴的遗骨，运回江北暂厝。她仍然回到学校，把悲痛压在心里，神态自若地出现在学校师生和社会人士面前，坚持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一直到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听说了王朴母子的英雄事迹，立刻指示有关部门向金妈妈如数归还所借款项，金妈妈拒绝接受，并将所余财产捐赠给了儿童福利事业。

1984年，金妈妈以84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终时她嘱咐把保存多年的王朴烈士的遗物全部捐赠给烈士陵园，她还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读完金妈妈的遗言，现在应该有多少人感到脸红心跳呢？

他们没有贡献却讲待遇，没有功劳却要伸手要官，甚至有的人还把人民的财产装进自己的腰包。这种人如果有金子，能像金妈妈和王朴那样贡献出来吗？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烈士们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待遇、荣誉、金钱面前，烈士们也以实际行动给今天的人们树立起了光辉的榜样。

第三章 第一片血痕

许建业心乱如麻，他没有想到市委书记居然会叛变。对于敌人的诱降，他保持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许建业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想自杀，但却没有死成。头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凝固的血块和乱蓬蓬的头发纠结在一起。

他恨自己的粗心大意。他知道自己的过失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他不想接受组织的处分，因为他觉得任何处分都太轻了。他还想死，他要以死赎罪。但一来他没有力气了，二来特务已经加强了监视，他无法如愿。

特务又来提审。这次他没有被带进审讯室，而是一个休息室。周围摆了一圈椅子，中间的茶几上放着水果。

许建业的头转向窗外，一言不发。

“老许。”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他吃惊地回过头来。

刘国定站在他身后。

“老许，我也是被逼无奈。要恨你就恨冉益智，他把你出卖了，也出卖了我，人家什么都知道了，我不说又有什么用呢？”刘国定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许建业的心头猛地一震。刘国定叛变了！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重庆地下党和川东临委以至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情况他都知道。他要是说了……许建业简直不敢往下想。

“咳！老许，我本来什么都不想说，可是你也知道，徐处长这个人很厉害，他有办法把你挤干。我只有说得让他相信了，才能脱离他们的掌握。”他突然压低了声音：“像我这样的人，在敌人手里多呆一天，对组织的危险就多一分。”

许建业心乱如麻。他没有想到市委书记能叛变，更没有想到刘国定竟会恬不知耻地来劝降。

“老许，我们还是要争取出去为好呀！在这里坚持，不过是搭上一条命，出去还可以为党工作嘛！”

许建业把头转到一边，没有理他。

“老许，徐处长说了，连朱长官都特别器重你，只要你答应写个自首书，就放你出去。不过是一张纸，几个字，对别人也没有伤害。不瞒你说，刚被抓住那天，我就写了一张。”刘国定见许建业不说话，以为他开始回心转意。

许建业猛地转过头来，两排牙齿咬得直响，脸上的肌肉因为愤怒而抽搐着。

“你就没想到将来会有人找你算账？！”

刘国定的身子往后缩了缩，低声回答：“我已经叛变，哪里还顾得了将来。”

接下来，刘国定又唠唠叨叨说了不少，但许建业根本不听，一句话也不回，弄得他灰头灰脸，泄气地走了。

这次见面是徐远举精心安排的。

他已经不指望用酷刑撬开许建业的嘴。他发现，许建业的坚强来自于他

对共产党的信仰。与这种信仰相比，特务的反动宣传就显得太苍白了。如果能让叛徒现身说法，肯定会给他的思想造成很大震动，说不定就会使他的精神防线全部崩溃。结果，他自以为无比高妙的这一招也没见效。在《红岩》小说中，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曾经亲自出面劝诱许云峰投降，却遭到了许云峰的严辞拒绝，他们之间还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对话——

“这个……”毛人凤嗫嚅了半晌，终于勉强摆出一种推心置腹的姿态，进一步说：“设身处地，我以为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是上策，我们可以给你相当的时间进行考虑。当然，改变立场，对于一个有多年党龄的共产党人是困难而且痛苦的，但短时的痛苦可以换来无限的欣慰。这是我们对许先生有所期待的出发点。我们也考虑过一个中策，我觉得这也值得许先生认真加以考虑：我们保证许先生的安全和生活上的满足，交换条件是秘密支出你们的部分组织，例如说，兵工厂系统的主要党员名单；但这不算自首或告密，因为我们完全负责保守秘密，丝毫不损害许先生的政治声誉。如果许先生今后不愿再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我们也乐意送许先生去香港、澳门这样的安全地带……”

“你们设想的下策，我倒愿意听听。”

“下策？我想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获。”

“我的看法恰恰和你相反，你们从我身上，只能一无所得。”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建业身上，但出面劝降的却不是毛人凤，而是西南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他告诉许建业，只要他写一张悔过书，就可释放他。至于高官厚禄，只要许建业愿意，都是唾手可得。

朱绍良认为许建业是个人才，比他手下那些人全强，他希望能让许建业为自己效劳。

结果和小说上写的一样，敌人的劝降遭到了许建业的严辞拒绝。

和小说上写的不一样的是，许建业当时说的话很少。自从他决心以死赎罪之后，就很少在敌人面前说话。他要保持沉默，一是和敌人无话可说，二是以此惩戒自己的过失。

徐远举彻底失望了。他下令将许建业押往渣滓洞看守所。

许建业并不等于许云峰。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在长篇小说《红岩》和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中，许云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凡是来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参观的人，都想要看一看许云峰的照片和事迹。然而，在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众多名字中，却怎么也找不到许云峰。

《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说过：“凡是在这部小说中没有写明是牺牲了的人物，虚构的成份就更多一些。反之，凡是牺牲的烈士，虚构的成份就少一些。”事实也是如此。《红岩》中写到的很多烈士，绝大部分都与原型人物基本吻合，如陈然—成岗，刘国誌—刘思扬等，但唯独许云峰有些例外。这个人物基本上是按照许建业塑造的，因为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在当时就很有影响，但是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所以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程度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事迹也移植到他身上。

在《红岩》中，徐鹏飞安排了一个别有图谋的宴会，出席作陪的有朱介、

沈养斋（即《红岩》中的周养浩，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等人，客人就是许云峰——

许云峰炯炯的目光，泰然自若地扫视了一下笑脸相向的满座“陪客”，他把双手摆在桌面上，严肃而平静地缓缓说道：

“主人的介绍似乎想请我讲话，好吧，我谈上几句。”

他的目光再一次扫过全桌，四座更加鸦雀无声，所有的“陪客”都用惶惑不解的目光，望着这位神秘而又可畏的“客人”。

“今天这桌筵，使我想起了一件事。从前，我当工人的时候，厂长总想请我吃饭。也像你们这样，摆满了山珍海味。厂长为什么要恭维我这个穷工人呢？因为我是工人代表。厂长想用油水来糊住我的嘴巴！当时，我看了看满桌酒菜，摇摇头说酒席办得太少。厂长给弄糊涂了。我就告诉他：一桌酒菜只能塞住一个人的嘴巴，可是塞不住全厂工人的嘴巴！”

实际上，徐远举从未宴请过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上边的那个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的。

罗世文和车耀先是在1940年3月18日夜同时被捕的。当时，罗世文是公开的共产党员，《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负责人，后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

车耀先是著名的抗日群众领袖，抗战时期发起组织“中华基督教改进会”、“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创办《大声》周刊。他的公开身份是努力餐厅的老板。

1940年3月，成都及其附近郊区发生春荒，大小粮店无粮可售，贫苦百姓家无隔夜粮，一旦发现哪里有米，就立即涌去，争相抢购。

国民党特务害怕事态扩大，就诬陷说这是共产党利用春荒有计划搞的阴谋暴动，立刻加以武装镇压，紧接着又以此为借口，逮捕了罗世文和车耀先。

罗车二人先是被关押在军统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后来转至贵州息烽监狱，那里的监狱主任就是周养浩。

息烽监狱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组织被囚人员搞些行政工作和体力劳动，名曰“工作休养人”。一天，周养浩找到罗世文，要他在工作休养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罗世文旗帜鲜明地正告：“我参加共产党多年，熟人、朋友和生活习惯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国民党方面既无熟人，一切也不习惯，因此不愿、也不能参加国民党；不愿、也不能作政治方面的工作！”

一席话说得周养浩不能不为他对共产党的耿耿忠心所叹服。

周养浩又找车耀先个别谈心，让他出来工作，希望他“将确实的政治身份据实以告”。

车耀先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只是站在国民之立场，从事抗日救亡。”他又抢先对周说：“我是军人出身，少年读书不多，很想借此机会多读些书，最好能让我管理图书。”

周养浩答应了车耀先的要求。车耀先利用管图书的机会，将一些进步书籍加以修补，换上别的封面，混杂在其他图书中出借，还乘机增订一些民办进步报刊。遇见有重要消息，就写在便条上，把线装书拆开，把便条夹进去订上，由出身贫苦的兵伕杨文富转送到指定人手中。小小的狱中图书馆变成了难友们的精神食粮供应处和通讯联络点。

1945年端午节，周养浩煞费苦心专门为罗世文和车耀先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大讲什么“每逢佳节倍思亲”之类的话，企图触发他们思乡、思亲

之情，动摇其意志。对特务的胡言乱语他们充耳不闻，对敬酒、敬菜他们视而不见，指着满桌的美味佳肴说：“桌上摆的都是你们搜刮人民的血汗，我们不能用人民的血汗来灌满自己的肠胃！”

说罢，两人拂袖而去。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毛泽东主席赴重庆，向蒋介石提出释放政治犯，并指名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也提到要释放罗世文、车耀先。

蒋介石当面撒谎，说罗世文、车耀先已死，拒绝交出。不久，周养浩就收到了重庆军统局的密电：“罗世文、车耀先要与外界隔绝会见，并专用化名……”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并入重庆磁器口白公馆看守所，罗世文、车耀先又被押回重庆。

这年8月，蒋介石亲自批准由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签署的密电，将关押在白公馆的罗世文、车耀先两人秘密制裁，并将尸体灭迹，摄影具报。

1946年8月17日，看管重庆白公馆监狱的军统特务告诉被关在二楼重禁闭室的罗世文和车耀先，说是要将他们移押南京了。

一个难友闻讯后前来与罗世文告别，并送了一双新皮鞋给他。当着看守特务的面，罗世文把脚上穿的破皮鞋脱下来，说：“我也没得啥子送给你的，把这个拿去作个纪念吧！”

那个难友把破皮鞋拿回监房后，觉得实在是太破旧了，就不在意地把它扔到了一边。另一个坐牢多年的难友韩子栋（《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感觉到罗世文此举一定有什么用意，便把破皮鞋拣起来，仔细检查了一遍，果然从鞋底的夹层中找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打开一看，原来是从一本俄文书上撕下来的扉页，上面写着罗世文给党组织的遗书：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指宋绮云，小萝卜头的父亲）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弟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8月18日，特务将罗车二人押到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的坪场。这里早已准备好了木柴和汽油，特务们计划先用绳索将罗车二人勒死，然后焚尸灭迹。

罗世文和车耀先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就义前，罗世文高声吟诵就义诗：

故国山河壮，
群情尽望春。
“英雄”夸统一，
后笑是何人？

车耀先在生命最后一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解放后，人民政府逮捕法办了凶手，又找到了烈士的遗骨，在被害地重新建墓安葬。周恩来同志亲笔题写了墓碑：

“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

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胡其芬宁死不受辱。得知自己的心上人成了叛徒，皮晓云病倒了。

许建业拖着几十斤重的大脚镣，双手戴着手铐，被关进了渣滓洞楼上五室。同他一起被押来的还有刘国铨，他在楼下七室单独囚禁，也戴着手铐脚镣。

楼上紧挨着五室的六室是一间女牢。刘国铨的未婚妻曾紫霞就关在这里。当时这里一共关了八个人，其中有好几个人与曾紫霞都很熟悉。李惠明、倪俊英曾是刘国铨的下级。

这里还关了一个人叫胡其芬。

她的公开身份是何北衡家的家庭女教师，是在搜捕刘国铨时当作嫌疑犯被捕的。她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是基督教徒，不是共产党员。”

其实，她早在1938年就入了党，后来在《新华日报》资料研究室任英文翻译。“皖南事变”后撤到延安，抗战胜利后随周恩来来到重庆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后到南方局工作。1946年下半年，胡其芬遵照党组织的安排，第三次回到重庆，任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广泛联系上层妇女和社会名流。后经刘国铨介绍到何北衡家当家庭教师。

特务问：“你跟刘国铨来往密切，这怎么解释？”

胡其芬若无其事地回答：“这是青年男女间的私事，我不能向你解释。”

叛徒说不出她更多的情况，再加上她在二处当官的弟弟和在高滩岩中央医院工作的姐姐的多方营救，敌人把她和另一位叫梅文玉的人一起押回二处，准备释放。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使她险些丧命的事情。

从渣滓洞到了二处的第二天晚上，她同梅文玉住在二处警卫室楼梯下的房间里。半夜里，梅文玉忽然发出一声惊叫：“有人用刺刀挑我的脚！”等到查岗哨的人来时，她为保护梅文玉，立即将所发生的情况报告了，当即看守兵被撤了，又换来双人看守。

第二天，情况异常。值日兵个个脸色阴沉，气氛紧张，人来人去，吵吵嚷嚷，污秽之言难以入耳。辱骂声、恐吓声不断，她把一切都听懂了。

夜降临了，她想到在这里逃是逃不掉的，一个裹过脚又放开的手无寸铁的女人，在这豺狼窝里能有什么办法？她，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能任敌人侮辱之后再被杀害？要赶在敌人动手之前！她果断、准确、迅速地伸出了双手，紧紧握住电源……

等她恢复知觉以后很久，她才知道是训练有素的特务用木棒猛击了她，把她甩出电源老远。

就在胡其芬即将脱离魔掌的时候，刘国定把她认出来了，他还告诉徐远举，胡其芬给周恩来当过英文秘书，也可能给邓颖超当过秘书。

徐远举一听胡其芬是这么重要的人物，哪里还肯释放，立刻下令将她押回渣滓洞。

在女牢中有两个人曾紫霞不认识，她俩一个叫皮晓云，一个叫牛筱吾。她俩是好朋友，又是同乡，一起上的小学，一起离开家乡来到城里，一起到豫丰纱厂当工人，又一起填写了入党申请书。

4月6日，就在许建业被捕后的第三天，她俩一起被捕。

她俩互相约定，谁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是在审讯室，特务把她俩亲笔写的自传摊开来，让她俩自己看。这是怎么回事？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落在敌人手里呢？

当许建业被押上楼来的时候，虽然他已经被折磨得变了模样，但她俩还

是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当天晚上，透过墙上的裂缝，许建业的讲述解开了她俩心头的疑问。

是许建业的失误致使她俩被捕入狱，但她俩对许建业没有丝毫的怨恨。许建业是她俩的入党引路人，是受人爱戴的市委工运书记。她俩从心底原谅了他，要恨只能恨把他出卖的那个叛徒。

这个叛徒是谁呢？

“任达哉。”

这个人名轻轻地从墙缝里飘过来，可是在皮晓云听来，却好像是晴天霹雳。皮晓云一阵头晕目眩。她支撑不住了，倒了下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牛筱吾也有点发懵了。

牛、皮是在中央印制厂做工时认识的任达哉，是他介绍她俩入了党。居然是他出卖了许建业，这已经足以使两个姑娘震惊。更使人震惊的是：皮晓云告诉牛筱吾，她早已和任达哉恋爱，并且快要结婚了。

皮晓云，一个22岁的少女把她纯真的爱奉献给了一个男人，那不是一般的男人。在她的心中共产主义有多美好，这个男人就有多美好！他是她心目中真善美的化身，怎会变成卑鄙无耻出卖同志的恶鬼呢？皮晓云的心阵阵绞痛。她总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牛筱吾相信许建业的话，但她不忍看皮晓云痛苦和希望的眼睛，要弄个真凭实据来。

牛筱吾写了一张纸条传给任达哉，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老许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

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

一切都明确了，幻想破灭了！皮晓云恨自己怎么长了一对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怎么竟爱上了一个叛徒？！渣滓洞本是阴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晓云觉得难友们看她的眼神使她感到倍加寒冷。她经不住这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不送出去治疗马上会有生命危险。经过多方设法，她被送到沙坪坝沙磁医院去抢救了。当皮晓云回到渣滓洞女牢时，红润从她白白的面孔上消失了，胖姑娘瘦了，眼神呆滞了。难友们不忍多看她，也想不出什么语言来安慰她那颗痛苦的心！

当时，许建业刑伤还未愈，但他听说了皮晓云的情况，对她十分关心。他特别嘱咐胡其芬，让她把女牢里的同志组织起来，多关心关心皮晓云，帮助她重新树立起生活的勇气。

当时，敌人对女牢不大注意，女犯有时候可以自由走动。许建业总是等在牢门口，一看到牛、皮二人从门前经过，就抓紧时间和她们说几句话。

“你们俩一个牛，一个皮，合起来就是牛皮。你们的意志要像牛皮一样又坚又韧，割不透，扯不断，革命到底，决不动摇。”

“你们还年轻，活着出去的机会很大，那时候要尽快找到组织，恢复联系。”

“你们与敌人斗争的经验还很少，而这次坐牢正好是个机会。你们身边有很多斗争经验很丰富的同志，要注意向他们学习。”

“我给你俩讲一个故事：刘国钰第一次受审，身上受了很重的伤。在特务押着他回牢房的时候，他大声吼道：‘冉益智叛变了！’特务连忙扑上来掐他的脖子，但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这个宝贵的信息传递给了被捅的同志，减少了党组织的进一步损失。”

尽管许建业每次说的话不多，但是每次听完他的话，牛、皮二人都觉得深受鼓舞，就好像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尤其是皮晓云，阴影逐渐地从她脸上退去了。

曾紫霞与刘国铨的关系，狱中人人都知道。她一被抓进来，特务就公开宣传她是刘国铨的未婚妻。如今，刘国铨就关在楼下，而且还受了重刑，难友们都很关心他，就想方设法让曾紫霞多去看他几次。

趁放风人多做掩护，曾紫霞溜到囚禁刘国铨的那间单人牢房门口。她刚一下楼，刘国铨就已经看见了她的身影，早早地守候在门口。

隔着牢门，两个人的双手握到了一起。

“国铨，你吃苦了……”一句话还没说完，曾紫霞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别哭，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刘国铨安慰她道。“我最担心你的肺结核病。狱里条件不好，你一定要注意保重自己。我已经托人往家里送过信，让他们有机会给你捎来一些奶粉、鱼肝油丸。”

不久，曾紫霞果然收到了刘家捎进狱里的东西。不过，她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难友，并没有自己享用。

刘国铨见曾紫霞止住了哭声，又告诉她：“以后有什么事情，你要找胡其芬大姐商量。她是个靠得住的同志，而且很有斗争经验。”

“我记住了。”曾紫霞点头道。

“还有一件事。你回去替我转告胡其芬、李惠明、倪俊英她们几个，要她们找机会和我取得联系。”

“我记住了。”曾紫霞连连点头。

几天后，胡其芬把曾紫霞拉到一边，低声告诉她：

“国铨跟我谈过话，他让我帮助牢中的年轻难友，教她们如何对口供，如何对付敌人。对于那些身上有弱点，甚至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耐心帮助。他还告诉我，让我把这些话转告给你。”

曾紫霞明白刘国铨的心意。虽然现在是在狱里，但在刘国铨眼里，她仍然是一个由他刚领上革命道路的新党员，他希望自己的心上人能够早日成熟起来。许建业被转移到白公馆，关进地牢。但是，挖穿地牢的却是另有其人。

五月下旬，许建业和刘国铨一起被转移到白公馆。他们在渣滓洞只呆了一个多月。

白公馆在歌乐山脚下，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1939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审讯、关押的保密起见，用重金将它购买下来，改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原大门终日关闭，从侧面开一小门进出，原储藏室改为地牢，原防空洞改为刑讯室。院内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标语。这里关押的多为案情重大的政治犯，也关押着一些军统违纪分子。

许建业被关进了地牢。

在小说《红岩》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了。

地窖，也许是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没有特务来日夜看守。许云峰一开始就觉得：对敌人的这种疏忽，若不充分利用，那是一种软弱和错误。世界上没有奇迹，但是坚定顽强的战士，却可以做出常人认为无法做到的事。

能不能在这毫无希望的地底，挖出一条脱险的通道呢？这个大胆的想法，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却有决心试一试。

许云峰在左面的石墙上反复探索，终于找到了一处条石接缝较宽的地方，那是在靠近墙脚的角落，从左面数过去的第三块条石。他用手指在接缝间用力挖了一下，湿润的石灰粉屑掉下了一点。新的发现，给他很大的启示，他拿定了主意。

许多日子过去了，他的手指早已磨破，滴着鲜血，但他没有停止过挖掘。石灰的接缝，愈挖得深，他的进度愈慢。脚镣手铐妨碍着他的动作，那狭窄的接缝也使他难于伸手进去。困难，但是困难不能使他停止这场特殊的战斗。

他确信自己被囚的地方，必然是中美合作所内的一处集中营，也许，正是敌人威胁地宣布过的那座“魔窟”白公馆？不管是什么地方，被囚禁的决不止自己一人。不断挖掘的这条通道，不仅可以自己使用，还可以给更多的战友使用。如果可能，他宁肯自己不用，也要为将来战友们的越狱，准备一条备用的通过。愚蠢的敌人，将他囚禁在这样的地方，对他来说，真是意想不到的幸运。虽然他并不知道，挖开第一块条石之后，还会遇到什么障碍。

从拾得的那副锈蚀了的铁镣上，他取下了半截铁箍，当作挖掘的工具。渴望着为战友们贡献一分力量的愿望，使他永不停息，尽力挖掘着。后来狱中党组织得知敌人要杀害许云峰，就通知他利用这个通道逃走。可是他没有独自逃生。他说：“我准备的通道，是为了全体同志的安全，不是为了我自己。”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这个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实际上，许建业并没有挖穿地牢，干这件事的另有其人。他的名字叫韦德福。

韦德福，万县人，农民出身。14岁那年，为了糊口，给一个国民党军官当了勤务兵，为军官打饭扫地端洗脚水。过了几年，那个军官见他有点文化，就让他去考宪兵。考上后，宪兵队里一个长官看上了他，又让他当勤务兵。因为酷爱学习文化知识，这个军官让他去考军统局管辖的宪兵特高组。那时韦德福还没接触到革命思想，只求有一个稳固的饭碗，因此就参加了特高组考试，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

从特高组训练班毕业后，分配他到邮局搞“邮检”，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韦德福求知欲特强，每检查出一期《新华日报》就偷看，很受教育。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也使他深受感动，从此萌生了要寻找共产党的念头。

一次，他奉命监视一个进步的新闻记者，被记者察觉。记者见他中毒不深，就主动接近他教育他，他俩倒成了朋友。

韦德福把自己的苦闷向记者和盘托出，表示很想离开宪兵特高组。记者指点他说，好多追求光明的青年不辞艰苦去了延安。于是，他在记者帮助下拟订了一个逃跑去解放区的计划。东躲西藏了两年多，他也没能去成解放区。这时候，正好有人介绍他到陶行知先生办的社会大学听课，他就去了，被分在政治经济学系。

1947年，全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2月8日，国民党特务殴打参加游行的学生，韦德福受了轻伤。他带伤去宽仁医院守护受伤住院的同学。在《新华日报》1947年2月5日第一版登载的《渝市55个大学生慰问被殴打的学生》的报道中，就有韦德福的名字。

二月中旬，同学们发现韦德福失踪了。原来，他被逮捕关进了白公馆看守所。

在审讯中，韦德福态度强硬，顶撞了特务，因而被关进地牢。地牢里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又阴冷又潮湿，只有每天两次开门送饭时能见到一丝亮光。韦德福在牢房摸着墙壁慢慢走，发现一处石头有些松动，就去摇去抠，抠得十个指头鲜血淋漓，终于摇动了，他搬开石头，下面是绝壁深涧。

一天深夜，韦德福从地牢爬了出去，朝山上跑。才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哨兵抓住。

特务看守集合全体难友，当众用扁担毒打韦德福。直打得他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也没听见他一声求饶。难友们都难受得心如刀割。特务见韦德福被打得只剩下一口游丝般的气息，就把他拖回地下室去锁上脚镣手铐。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了，可是每天都看见有人送饭到地牢去，这说明他还活着，奇迹般地活着。

1948年7月29日夜里，也就是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特务骗他说要“转移”，将他提出地牢。韦德福上了一辆吉普车，车开到松林坡下戴笠公馆的停车场外面，那儿预先挖好了一个坑。韦德福被推下吉普车，尚未看清地形，刽子手杨进兴就用左轮手枪在他背后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解放后，在《遇难烈士登记表》补充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韦德福是白公馆最优秀的人物之一。”

徐远举准备枪杀许建业，刘国钰也上了黑名单。刘国钰的五哥从香港专程赶来向徐远举行贿。

重庆中共地下党遭到大规模破坏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和保密局引起了轰动，连蒋介石也被惊动了，他们认为这是解放战争以来在蒋管区大城市对中共地下党最大的破坏。

徐远举一下子成了“大功臣”。保密局和国防部争着给他发奖金、奖章。朱绍良也不怠慢，直接向蒋介石汇报，专请了一笔经费，赏给徐远举办案用。朱绍良还指示在西南长官公署成立侦防处，由徐远举兼任侦防处长，重庆的军、警、宪他全有权调动。侦防处的人事编制，也由他拟订核备。抓了多少人，抓了什么人，全是徐远举一个人说话算，上边没有人过问。当然，放什么人也是他说话算。

刘国钰的亲友们纷纷找上门来，请求徐远举法外开恩，把他放出来。

首先是四川财阀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亲自来到了曾家岩徐远举的家中，和他交朋友。在谈话中，他向徐远举示意，如果能保全刘国钰的性命，可以在他开设的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随便透支用款。

徐远举知道刘航琛这份允诺的份量。但刘国钰是挂了号的共产党员，而且又有如此强硬的社会背景，如果不找个理由就把他放了，一旦有人汇报上去，他就会落个受贿私放的罪名。

“你也要理解我的难处。我知道钱好花，但这个钱我可不敢花，私放共产党这个罪名可不轻呀！”徐远举为难地说。

“徐处长，这就要你给想想办法了。”刘航琛把身子探过来说道。

“办法倒是有一个。你跟刘家是亲戚，你就说句话，让刘国钰的哥哥去做他弟弟工作，把共产党的组织交出来。他只要一交待，我马上放人，绝不食言。”

“这个老狐狸，想让我帮你套口供。”刘航琛心里这么骂道，嘴里却连声道谢。

刘航琛走了，重庆市市长张笃伦来了，他是徐远举的妻舅，与何北衡私交不错。

不用开口，徐远举就知道了他的来意：又是来给刘国铨说情的。

“咱们是亲戚，我也不瞒你。按我的职权来说，我可以放掉刘国铨，但是我却不能放。刘国铨是个豪门公子，在四川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跟着共产党跑呢？我一定要叫他写一个自首书，不然就不能放他。”

当着张笃伦的面，徐远举没有把他不放刘国铨的第二个原因说出口。他有心给刘航琛一个人情，但他又讨厌何北衡装腔作势，两面讨好。凡是何北衡参予的事，他都很反感。

还有一件机密他没有透露给张笃伦，他已经决定将许建业公开枪毙，而在准备上报给西南军政长官的名单上，他已经列上了刘国铨的名字。解放后，徐远举在交待材料中坦白了他当时决定枪毙许建业的三点理由：

一、许建业是一个硬汉，根本无诱降的余地；

二、不杀许建业就不能施展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软化地下党员的狠毒阴谋；

三、怕许建业在监狱中起作用，发生影响。

也许是这个消息走漏出去了，刘家显然加快了营救活动。刘国铨的二哥刘国铮，当时在国民党成渝铁路工程局会计处任职，三天两头往徐远举家里送礼，都是些香烟、水果之类。

刘国铮曾说过给徐远举送几根金条来，但却始终没有实际行动，这让徐远举感到很不痛快。

刘家的活动能力还真强，在特务机关内部也找了不少人。国民党成渝铁路工程处警务处长曾晴初、二处的情报科科长皮世修，都在上下奔走，四处活动。

徐远举暗自冷笑：“这两个家伙这么卖力气，一定拿了刘家的金条。”

大约又过了十几天，刘国铨的五哥刘国铨专程从香港赶到重庆。一下飞机，他就带着礼物来到徐远举家中。他出手很阔绰，一见面就送上一个金烟盒，一只名贵的女用金表，还有一些金银首饰。

第二天，刘国铨又在何北衡家里摆下酒宴，把徐远举和他手下那帮人全请来作客。

酒足饭饱之后，刘国铨提出了个请求，要见见刘国铨。

刘国铨出手大方，办事周到，很让徐远举觉得舒服。他打着酒嗝一口答应了刘国铨的要求，还当场表示。

“只要你弟弟能签个字，脱离共产党，我马上就放他。你可以安排他去美国看看，也让他甩不着担心在这里丢面子。”“徐处长请放心，国铨的工作我来做。”刘国铨满有把握地说。

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刘国铨意外地见到了他的五哥。望着哥哥满含泪水的眼睛，他不得不硬下心肠。

刘思扬被押到二处，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暂时，没有人来打扰他，

勤务兵给他倒上一杯香茶，退了出去。快一年没有尝到茶味了，他端着杯子，慢慢喝着。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将会出现什么新的考验呢？他不知道。但是他的情绪，不像去年刚押进这秘密的地方那样不安。心房的跳动也比较正常。几个钟头以前那种告别集体和战友时的满怀离群之感，已平静下来，变成一股支持他的无形力量。他随意地看着房间里的富丽而又显得十分陌生的陈设，心里什么也没有想，也无需去想。反正，要发生的新的事情，不久就会出现。

芬芳的茉莉花，从茶杯里散发出浓郁的诱人清香。刘思扬呷上两口，望着手上精巧的茶杯出神。

“三弟，你已经来了？”

听见声音，刘思扬缓缓把茶杯搁在茶几上，扭头一看，走进来的，是他的二哥。二哥比以前更胖，脑顶也微秃了，在最初的一瞬间，几乎没有认出来。和二哥一道进来的，还有骨瘦如柴的主任法官朱介。

“三弟，你消瘦多了，看守所里生活很清苦吧？”

“没有什么。”

“我们真是担心！”二哥显出惯常出现的亲人似的关切，“这一次，国共双方举行和谈，李代总统一再下令释放政治犯，大哥特地叫我从上海回来，保你出去。”

在《红岩》小说中，作者拿出一大段篇幅来描写刘思扬与哥哥会面的情形，兄弟俩没谈上几句，特务们就把刘思扬推到他二哥的小轿车上，二哥很快就把他接到家里。后来，刘思扬准备逃走，又被特务抓回监狱。

从艺术角度看，这样的情节安排富有戏剧效果；而从生活的真实看，朴素的故事也许更能打动人心。

在二处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刘国铤和他的五哥见面了。

二处的法官张界没有跟进来，而是坐在隔壁偷听。

刘国铤一见弟弟的面，就把随身带的食品拿出来，催促刘国铤赶快吃一些。他看得出来，刘国铤好长时间没有吃饱饭了，人也瘦了许多。

看着弟弟狼吞虎咽的样子，刘国铤一阵心酸，止不住眼泪流了出来。

“五哥，别哭了。你就不该到这个地方来。你们就当我是死了，或是根本没有我。”

“别说傻话了。”刘国铤收住眼泪。“我已经跟徐处长说好了，你只要签个字，就可以跟我走。”

“我的五哥，你可不要上他的当。那是一般的签字吗？那是让我叛党呀！”刘国铤的声音高起来。

“你就签个字吧，这有什么呀？”刘国铤见弟弟这么个态度，不禁着急了。“人家又没让你出卖你的组织，就是签个字，出去后我就领你去香港，再送你去美国，和你们的人再也不见面了。你也不算对不起他们。”

刘国铤心里十分难过。他认为这样的见面除了增添亲人的痛苦，没有任何益处。他毅然说道：“五哥，我理解你同家人对我的想念。你走吧，你们好好地干你们的事，不用管我了。我不去香港，更不去美国。我有我的信念、意志和决心，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不用挂念我，不要再管我，也不用再来了……”

“你别太犟了！我在广州每天都能看见成批的共产党人被拉出去枪毙，年纪都不大。我听说徐远举对你已经动了杀机，你可不要糊涂呀！”

“一个人白白活着是没有意义的。五哥，我要是死了，也是为革命死的，为人民死的。解放后你们就是烈士家属，也是光荣的。”

“你一个人死了倒无所谓，可你想过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家里的那么多人吗？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不知该有多伤心，要是有个好歹，你能安心吗？”

刘国铨沉默了。亲人们焦急而关切的面孔一个个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做梦也想见到他们，但他心里明白，徐远举正是想利用这一点，让自己动摇。他提醒自己，这个关头绝对不能软弱。

“五哥，你回去以后，把家里人的合影给我寄来一张。如果有可能，多捎一点药品来。紫霞需要什么，家里人都知道。”

刘国铨说完，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刘国铨急忙上前拦住他，紧紧地拉住他的手，久久也不愿放开。

“五哥，我走了。记住我的话，不要再来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刘国铨狠下心来，甩开哥哥的手，大踏步地向外走去。

刘国铨又被特务押回去了白公馆（而不是被放回家），刘国铨站在徐远举办公室的门口，心情十分凄凉。

徐远举进来了，后边跟着张界。

一看徐远举和张界的表情，刘国铨就明白了，他们肯定偷听到了刚才的谈话。

“刘先生，这就不能怪我了。”徐远举双手作出个摊开的姿势，表示爱莫能助。“他今天要是签了字，我今天就可以让他跟你回去。”

“这也得多谢谢处长。我弟弟这个人死心眼儿，还望徐处长多关照。”刘国铨知道弟弟的性命就抓在这位徐处长手里，因而一个劲儿地说好话。

“张法官，”徐远举转过头来对张界说。“你找机会去和刘国铨谈一谈，也可以把他家里带来的东西捎给他，让他知道很多人在关心他。”

张界和刘国铨同时点头称是。

一个月后，张界再次提审刘国铨。

他把刘家带来的食物、药品等东西交给刘国铨。

那些东西中有一张刘家的合影。刘国铨对其他东西看也没看，上前一把就将那张照片拿起来，双手捧着贪婪地看着。

张界注意到，他的眼睛里好像出现了闪亮的东西。

“徐处长还是挺关心你的，让我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转变。”张界先开腔道。

他等了一会儿，见刘国铨没有回话，又接着往下说：“我这次来，你家里的人一再让我给你带话，让你好好保重。他们还在积极活动，要保你出去，不过，你在里边也得配合一下。”

“怎么配合？不就是叫我当叛徒吗？我跟你说，你们杀我、关我、放我都可以，但就是不要逼我交我的组织。你们对我太没有认识了，何必劳烦你们来对我关心呢！”

刘国铨把那张照片放在胸口上，眼睛从窗户向远处望去。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谚语又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签个字，先出去，这不是明智之举呢？”

“我不管什么俗语谚语，我读过几天书，只知道士可杀不可辱。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就是我的自白书。你们杀了我，就是我成仁取义的时候。我只有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党才是我的真正生命，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我的生命。”

刘国钰这一番慷慨陈辞，说的张界哑口无言。过了半晌，他才开口说道：“刘国定和冉益智都比你官大，你知道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徐处长让你亲口说出来，只是想看一看你有没有悔过表现。这时你们的组织并没有损害呀！”

“我不管别人，只管我自己。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也没有把我抓错。我没有组织关系可交，也没有人事关系可交。你们要杀我，只是我一个人。”

“你不怕死，我敬佩你。可是你人都死了，你的那些理想呀，前途呀，还有什么用呢？”

刘国钰坚定地说：“我死了，有共产党，我等于没有死；我活着，牺牲了共产党，还有什么意义呢？”

审问进行不下去了，但张界还有些不甘心，又问了一句：“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刘国钰思索片刻，说：“我想和曾紫霞见一面。”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也是人之常情呀！”张界故意长叹一声。“我马上就可以安排你们在办公室里见面。不过，你最好也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不用再说了。”刘国钰气愤地打断他的话。“我什么条件都不会答应你们。”

提审回来，张界把情况如实地向徐远举做了汇报。

徐远举的脸顿时阴沉下来，让张界不寒而栗。转眼间，他的脸色又开朗起来，露出笑容。

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挥了挥手，示意张界可以离开了。许建业从容就义，视死如归。山城人民暗中垂泪。噩耗传来，狱中难友陷入悲愤之中。

1948年7月22日拂晓，一辆满载着国民党军警的汽车驶进白公馆看守所。

领头的是西南长官公署军法处长王郁芬。

昨天，他接到由朱绍良和蒋介石亲自核准的命令，对许建业处以死刑。王郁芬是国民党的一个老军法人员，主持杀害过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他怕走漏风声，出现意外，事先严密封锁消息，又赶在拂晓的时候将许建业提前押解进城。

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如临大敌。

许建业被带出了地牢。他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衰弱不堪了，脸色苍白，颧骨突出，但是他那双眼睛却仍然炯炯有神。

从眼前的情形看，他知道敌人要对自己下毒手了，但他毫不畏惧。对于这一时刻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在《红岩》小说中，许云峰就义前，当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徐鹏飞亲自来到了关押他的地牢，与他有过一番对话：

“还有一点小消息，我也不想隐瞒。”徐鹏飞再次露出奸笑，端详着许云峰满怀信心的脸。“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是多么个人遗憾的事！我不知道此时此地，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

“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受尽旧社会的折磨、迫害，终于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使反动派害怕的人，回忆走过的道路，我感到自豪。我已看见了无产阶级在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满足。风卷残云般的革命浪潮，证明我个人

的理想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完全相同，我感到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那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

许云峰慢慢站了起来，缓步走到徐鹏飞面前，直视对方，再次微微露笑。“你此刻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听到这意外的问话，徐鹏飞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许云峰不屑再讲下去。死亡，对于一个革命者，是多么无用的威胁。他神色自若地蹒跚地移动脚步，拖着锈蚀的铁镣，不再回顾鹄立两旁的特务，径自跨向石阶，向敞开的地窖铁门走去。他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忽然回过头来，面对跟随在后的特务匪徒，朗声命令道：

“走！前面带路。”而实际情况是，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早在1948年，而且徐远举本人并未到现场。不过，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的许云峰一样壮烈。与许建业一起被押进市内的还有一个人，他叫李大荣，是川东梁山农民武装领导人李生俊的父亲。1947年12月，国民党第79军在梁山一带搞清剿，没有抓住李生俊，就把他父亲抓住押到重庆。这次徐远举主持将他与许建业一起杀害，以便同时对农村的武装起义起威吓作用。

敌人还不知道，这位李大荣也非等闲人物。他早在192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虎南区区委委员，负责川东、梁山、大竹一带的通讯工作，并设厂制造军火，策动武装起义。

一大早，一张白色的大布告就在西南长官公署的门外贴出去了，猩红的大印分外刺眼。这是以重庆警备司令部名义发布的布告，上边列举了许建业、李大荣的几条“罪状”。

在西南长官公署的办公大楼里，一堂煞有介事的公审草草收兵，当堂宣布判处许李二人死刑，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吧许李二人押上大卡车。

张界也跟着上了车，他被安排了个监斩官的角色。

敌人要押着他们俩在市区里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一煞革命者的志气。

站在卡车上，望着熟悉的重庆街道，望着街道两旁那黑压压的人群，许建业反而有些高兴了。今天早晨敌人来提他的时候，他以为敌人是要对他秘密处决，心头还有些遗憾。现在他明白了敌人是想玩“借人头”的把戏，他决心趁这个机会，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为党尽最后一次力量。

起来，饥寒支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高昂的《国际歌》声，像一声声春雷，击散了笼罩在山城上空的浓雾，透下来一片阳光。

唱完了《国际歌》，许建业又高声喊起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就要来了！”

李大荣也会唱《国际歌》，刚才听许建业唱歌，他只是跟着唱，现在听许建业喊起了口号，他立刻精神大振，不仅跟着喊起来，也时而带头喊。

两个人的声音合到一处，更响了，在山城上空回荡。

卡车驶离了市区，许建业望着渐渐远去的山城，望着渐渐模糊的人群，

使足力气高声喊道：

“永别了，同志们！”

这天上午，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年仅28岁。

另据回忆，许建业牺牲于肖家湾刑场，后埋葬于大坪。

许建业就义后的第二天，徐远举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谈起了昨天的事情，那位朋友说：“我在路上看见一卡车士兵押着两个人去刑场，他们一路上高声呼喊口号，好像一点儿也不怕死。我看见路边有许多人都掉了眼泪，还有人说，共产党真勇敢！”

徐远举听了，心头不禁一阵发寒。许建业的表现他事先已经料想到了，但他没有想到重庆市民会有如此反应。本来，按照他的授意，这几天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国民公报》上登载了很多污蔑地下党的文章，他想把共产党搞臭。再加上一个公开判决，又能吓倒一批人。现在看来，他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真正得人心的还是共产党呀！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了狱中，难友们全都陷入悲愤之中。皮晓云痛哭失声，她在心灵深处痛苦地呼唤着：“老许啊！如果不是任达哉叛变，你不会被捕，也不会牺牲呀！”

被关押在白公馆里的许晓轩（即《红岩》中的齐晓轩）得知许建业牺牲的消息，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吊许建业同志》：

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

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

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

临危慷慨高歌日，争赌英雄万巷空。

许晓轩1938年来到重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工作需要，他经常更换职业，先在复兴铁工厂，后到国民党的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又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还在沙坪坝开过青年书店。当母亲埋怨他不管家时，他说：“国难当头，有国才有家。”他动员妹妹许永清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她也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9年春，许晓轩担任了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后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许晓轩担任区委委员后，经常深入基层、工厂去领导、发动、开展地下斗争。1940年4月，他去大溪沟21兵工厂活动，一天晚上在一工人家中开会时不幸被捕，囚禁在重庆望龙门22号军统看守所里。后来他得知家人正在设法营救他时，使用铅笔在包香烟的薄纸上写下“宁关不屈”四个字，托人捎出去，表现出他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斗争到底的决心，信的后面用的是他读书时常用的“安”字签名。这封显示革命者高风亮节的珍贵遗书，现珍藏在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展览大厅里。

1941年10月，许晓轩转囚贵州息烽监狱，被分配在木刻部雕刻模型，用来印刷信封、会计表格等。他曾在一棵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四个字，以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决心。在狱中他坚持学习外文。他经常对难友们说：

“既来之，则安之，应充分利用时间，为将来打好基础。”

1946年7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除释放100多人外，剩下的72人都转囚重庆白公馆看守所。

在狱中，许晓轩曾几次和难友们策划越狱，但都未能实现。特务要求许

晓轩保证不越狱逃跑，他严正地拒绝了特务的无理要求，因此彼罚戴重镣做苦工，还被关到地牢里。可是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屈服。

有一次，他到狱外做苦工，发现了一株石榴树苗，便把它带回来，亲手种植在白公馆监狱放风坝。冬去春来，经过难友们的精心培育，浇水，它渐渐地根深叶茂，年年开出火一样的石榴花。今天，当人们来到白公馆，看到这石榴树时，就会想起许晓轩不屈的革命精神。

1982年6月20日，胡绳同志参观白公馆后，为这棵石榴树作诗一首：

蟠屈生根乱石中，繁枝今日出墙东。

英雄已去精魂在，应其榴花岁岁红。

长期的囚禁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身体健康。在《红岩》中，曾对他做过这样的描写：

随着成岗的指点，刘思扬看见了那位他崇敬已久的老战友齐晓轩，他衰弱无力地静坐在太阳底下，衣衫破旧，手、脚几乎只剩下几根骨头，面容那样苍白消瘦，目光也是冷峻、凝滞的，眼眶深深地陷落下去。他一动也不动，就像一座石雕的塑像，比塑像只多一口微弱的呼吸。刘思扬惘然凝视着他，渐渐蹙聚着眉头：那么衰竭的生命力，怎能经受住无穷的折磨？他瘦骨伶仃的身体，能支持他永远战斗，丝毫也不影响他的机警和意志吗？

然而，他的意志和智慧却没有被监狱生活消磨掉，相反，倒把他锻炼得十分沉着老练，在关键时刻总是使敌人一筹莫展。敌人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很难对付的共产党人。

许建业牺牲的消息传来后，他和难友们一样难过，但作为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人，他想的要更多一些。敌人迟早要对狱中的难友下毒手，我们要及早做准备，避免造成更大的牺牲。

第四章 铁骨铮铮

两个叛徒邀功争宠，竞相叛卖。江竹筠与彭咏梧组成了一个家庭，但他们当时还不是夫妻。

六月的山城重庆，已是酷热难当。

傍晚时分，暮色沉沉，但却没有一丝凉意。

两队人马悄悄地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的铁门里溜出来，像两条毒蛇蜿蜒而去。

这两队人马一队前往上海，由刘国定带路；一队前往下川东，由冉益智带路。

刚才，徐远举在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两个叛徒，对他俩大加赞扬，并封官许愿。

“现在，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我们完全掌握了，但在川东地区，共产党的活动还很猖狂，正在酝酿暴动。而四川共产党的活动，又直接受上海地下党的指挥。你们俩对上海、四川两地共产党的情况都很熟悉，所以就有劳你们，亲自出马跑一趟，为党国建功立业，我在这里保证，党国决不会亏待你们。”

刘国定和冉益智同时面露难色。他俩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保全自己，邀功争宠，竟然争相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但这不过是躲在后边开黑名单，如今让他们亲自出面去带路抓人，不免有些胆战心惊。一来怕被地下党组织暗算，二来是心里有愧，怕见到自己人。

徐远举轻轻地哼了一声，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

刘国定和冉益智对望了一眼，马上表示愿为徐处长效劳。

徐远举的脸色顿时“阴转晴”，他伸手在刘国定的肩膀上拍了拍：

“老刘，好好干，南京方面已经来电。你一到南京，我们的毛人凤局长就要亲自接见你，对你论功行赏。”

刘国定受宠若惊，脸上堆出谄笑，胡乱地点着头。

被冷落在一旁的冉益智暗自气恼。他看得出来，徐远举对刘国定此去上海期望很大，而对他去下川东却没那么看重。他暗下决心，要搞出个样子来，把刘国定比下去。

徐远举的心思确实让冉益智猜对了，他知道刘国定和中共中央上海局有联系，要是能一举破获上海的地下党，那么他给国民党可就立下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功劳，升官进爵不在话下。

徐远举临时决定，与刘国定一起去上海。

可是，刘国定并没有让他美梦成真。早在四月份，李维嘉脱险转移到成都后，就立刻通过川康特委急电上海方面告警。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玻转赴香港，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全部转移了。刘国定扑了一个空，只逮捕了他知道的上海、南京的几个零星关系。

虽然如此，刘国定倒是“不虚此行”，在南京，他受到了国民党保密局局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赏，又被任命为军统中校专员。

从南京回到重庆，刘国定听说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被捕了，连忙告诉徐远举，此人手里存有很多黄金。特务严刑拷打何忠发，叫他把黄金交出来，被何一口回绝，最后壮烈牺牲。

金子没弄到手，官也只捞个中校，刘国定心里大为不满，这次他要讨价还价，起码给他个少将处长干干，不然的话，他就不能知道什么说什么。

他心里明白，当他肚里的油水被榨干了，也就成了臭狗屎。

与此同时，冉益智正带着一群特务沿江直下，扑向万县。领头的特务是二处渝组科长雷天元。在小说中，领头的特务头目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沈养斋。

冉益智在船上就打好主意，一下船就去找涂孝文，此人是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只要抓住了他，就等于抓住了整个下川东地下党。

冉益智知道涂孝文的住处，也知道住在万县的一些地下党负责人的名字，涂孝文肯定知道他们都住在哪里，即使不知道也不要紧，下川东工委有联络员，只要把这个人抓住，就可以顺藤摸瓜，将下川东的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

叛徒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了，尤其是那些在党内担负领导职务的人一旦叛变，造成的危害就更是严重得难以想象。

可惜的是，像这样的叛徒不仅仅刘国定、冉益智两个，涂孝文被抓住后，他虽然大骂冉益智无耻，痛恨他当了叛徒，可是他自己也经不住严刑拷打，第二天就叛变了。在万县的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他供了出来，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在国民党万县地方法院工作的江竹筠（即《红岩》中的江雪琴，同志们亲切地称她江姐），她是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工委的联络员。

1943年5月，在重庆机房街的一间房子里，住进来一对新婚夫妇。那男的年龄较大一些，而且脸色苍白，一看就是身染重病。那女的倒是年轻漂亮，而且精明能干。

这男的叫彭咏梧，当时是地下党重庆市委的第一委员，全面负责重庆市委的工作，掌管着上百名党员的关系。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职员。

彭咏梧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在重庆他没有家眷，住在单身集体宿舍里，不便于开展工作，容易暴露。另外，在长期的艰苦工作中，他的收入除了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外，剩余的全都作了党的活动经费，不久他就染上了肺病，经常在半夜吐血。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急需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和一个可靠的助手，这个人还要能够担起照顾病人的责任。

地下党组织经过认真挑选，最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江竹筠。当时，江竹筠23岁，彭咏梧28岁，两个人在年龄上还算般配。但彭咏梧在家乡已有家室，而江竹筠却还是个未婚女青年。要她朝夕与一位异性同志为伴，又要旁人看不出是假的，对于她来说，诸多困难可想而知。当她明白这确实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便像以往一样，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他们的“新家”暂时安在机房街，后搬至中信大厦。在这个“小家庭”里，竹筠称老彭为“四哥”。他稳重、亲切、富有正义感，地下斗争的经验丰富，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在“四哥”的帮助下，竹筠边学习边工作，加强了党性锻炼，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同时，竹筠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老彭，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患有严重肺病的老彭身体渐渐好起来。邻居们常常夸他们是一对“美满夫妻”。

他们的家其实就是市委的秘密机关。江竹筠一边细心地照顾着老彭的生活，一边还要协助他工作。

陈然在印《挺进报》的时候，经常能够见到江竹筠。根据当时负责《挺

进报》联络工作的吴子见的回忆，《挺进报》大部分都是通过江竹筠之手发行出去的，每次《挺进报》印完后，江竹筠都要亲自去取。《挺进报》印数最高时达 1000 多份，最少的也有 100 多份，在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出了 23 期，而从未在发行环节上出过问题，可以想见到江竹筠是多么机智勇敢。

在闲暇的时候，彭咏梧便把自己的经历详细地讲给江竹筠听。他原名彭庆邦，老家在云阳县。他 5 岁丧父，14 岁丧母，从小就是个孤儿。18 岁那年，他和年方 16 岁的谭政伦结了婚。谭政伦也是穷苦农民家庭出身，6 岁时寄居在有钱的姨母家中，长大后出落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人们都说她一定能找一个有钱的婆家，但她却出人意料地嫁给了彭庆邦。她觉得庆邦哥聪明好学，目光远大，是个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

两年以后，彭庆邦接任中共云阳县委书记工作。谭政伦领着年仅一岁的儿子彭炳忠来到丈夫身边，掩护他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41 年秋，彭庆邦奉命急赴重庆市委。谭政伦带着儿子暂回娘家。不久，彭庆邦就寄来一封信，要接他们娘俩去重庆。可是当时儿子正在出麻疹，又考虑到重庆花销大，太拖累丈夫，谭政伦就没有动身。从此之后，她就没有接到丈夫的来信。

原来，彭庆邦到了重庆不久，地下党内出现了叛徒。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让他改名彭咏梧，同时中断了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系，就这样他与妻子和儿子失去了音信。

江竹筠静静地听着。她也是苦出身，小时候当过童工，进过教会办的孤儿院小学，受过很多磨难。彭咏梧的经历引起了她的强烈共鸣，爱情也在心底悄悄地萌芽了。

由于志同道合，亲密相处，感情日渐升华，1945 年上半年，经组织批准，老彭和江竹筠正式结婚。次年 4 月，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彭云降生了。

带着孩子住在云阳老家的谭政伦，一次次给丈夫寄信，但总是只见飞鸿去，不见雁归来。

不久，弟弟谭竹安考进免费的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要去重庆念书了。临行前，谭政伦紧紧抓住弟弟的手，一再叮嘱：“竹安，你一定要访到姐夫的下落！”

竹安望着姐姐湿润的双眼，重重地点了点头。

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去寻觅彭庆邦的身影呢？

1946 年 11 月 7 日晚，重庆国泰电影院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电影晚会，谭竹安意外地碰见了他来渝多年欲寻未见的姐夫！亲人相见，欣喜万分，可公众场合不便细谈，只得约定下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再见面时，彭咏梧向谭竹安详细介绍了别后经历，请竹安姐弟给予谅解。

不久，江竹筠也与谭竹安见面了，谭竹安发现她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泼辣，为人谦和，聪明机警，有这样的党员做姐夫的助手，对党有利，对革命有利。竹筠与他姐弟相待，产生了亲密的友情。

然而，竹安在给姐姐的回信中，仍然只字不提姐夫的下落。他怕对姐姐的打击太重！

这时候的谭竹安，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与地下党员方卓芬（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夫人）有了联系。他虽然不十分清楚党的地下工作的情况，但是他知道重庆的国民党特务多么猖狂，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抓走杀害。他能够理解彭咏梧，也从心里谅解了他。

彭咏梧壮烈牺牲，头颅被割下来示众。彭咏梧前妻谭政伦以革命事业为重，毅然挑起了抚养江竹筠之子的重担。

1947年11月，朝天门码头一带浓雾弥漫，几步之外全是一片朦胧。

一对夫妻模样的人迎着江风和浓雾，沿着陡斜的石级向客轮上走去。在他们身后，还随行着一个拎行李的人。

这对夫妻就是彭咏梧和江竹筠，他们身后那个人是吴子见。

这次彭咏梧是受党组织指派前往下川东地区。当时，云阳、奉节一带，经过党的长期工作，已经形成了四个武装起义区域，群众手里也有了不止一枪。面对这种形势，重庆地下党组织认为，如今的“农村就像一堆干柴，一点就着”。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应该迅速发动武装斗争。彭咏梧此行就是去领导武装起义，江竹筠和吴子见协助他工作。

临行前，老彭和江竹筠带着他们一岁多的儿子彭云来找谭竹安，商量彭云的抚养问题。

老彭说：“请政伦来重庆行不行？这样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我们很快要离开重庆了。”

竹安慎重考虑后，肯定地说：“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你离家时她已跟随你革命，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我相信她会来重庆。你放心去好了！”

接着，竹安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

当时，彭咏梧夫妇走得太急，只好先把孩子寄养在地下党员王珍如那里。

船到万县，彭咏梧立刻与下川东地委的同志交换了意见。过几天，他就要继续沿江而下，转赴云阳。江竹筠很想和他共同战斗，但这时候她又接受了一个新任务：回重庆联系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到下川东来。她只好与丈夫告别。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然成了永诀。

回到重庆后，江竹筠一边忙着完成党组织交待给他的任务，一边还要分心安排孩子。王珍如是一个未婚女子，当时在北碚白庙子小学教书。一个未婚姑娘带着一个别人不知来历的幼儿，被人认为是私生子，校方听到流言，准备让王离职。

为了不使王珍如失业，地下党员蒋一苇（著名经济学家，后任重庆社科院院长）、陈曦夫妇将彭云接到自己家里。当时蒋一苇在办《挺进报》，陈曦在三联书店工作，都是特务迫寻和注意的人物，随时都有危险。

正在此时，谭政伦收到弟弟的长信，她读着读着，热泪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整整六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打击！

然而在感情与理智、家庭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她很快就冷静下来给弟弟回信说：请转告党组织，我虽然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庆邦，理解竹筠。

1948年2月，谭政伦来到重庆，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了只有1岁零10个月的彭云。

这一年三月，身处川东的江姐，得知谭政伦已到重庆抚育彭云的消息，

对谭大姐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她在给竹安的回信中写道：“你给了我温馨，给了我鼓励，我把它（指来信）看了两次，的确，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幺姐（指谭政伦）也成了我不能忘记的人物……我知道她会像亲生的孩子一样爱云儿，就像我对炳忠一样。”

至此，两颗革命女性的心，为着共同的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948年1月28日，江竹筠与输送到下川东的干部分头赶到云阳，住在了龙洞乡舅舅家中。她发现来迎接她的同志神情都有些异样，一种不样的预感揪住了她的心。

在她的追问下，同志们不得不向他说出了一个噩耗。

江竹筠返回重庆后，老彭来到了云阳县炉塘坪，举行关于发动武装起义的会议，他亲自担任奉节、大竹、巫山游击支队，政委，同时发展了一批同志入党。1948年1月，云阳、奉节、巫溪三县同时暴动。彭咏梧带领部队在云阳的南溪和青莲乡铜钱垭打了两次胜仗。泥耳岩一仗，我方除活捉敌中队副一名外，还缴获机枪1挺，马步枪10余支，经此一仗，敌军闻风丧胆，顿时后撤20里。

朱绍良闻讯后，急电国民党第79军军长方靖抽调三个团的兵力前去“清剿”，又命万县地区专员李鸿焘亲率保安团助阵。南北东西，一时对游击队形成铁桶合围之势。

敌军压境，游击队只得兵分两路向外线转移：前队于1月14日晚西去云阳，与巴北支队会合；后队由彭咏梧指挥，于15日中午北去川陕鄂交界的巫溪山区。由于行军迟缓，又走了弯路，16日早晨才走出30多里，到达巫溪县鞍子山，正在一位农民家借锅造饭，敌79军一个加强连突然来袭。

老彭亲自担任掩护，命令部队突围。掩护大家冲出包围圈后他才突围。已经跑出了敌人的射击圈外，他发现一个伤员掉在后面，转身搀扶伤员上陡坎，不幸被两颗子弹同时击中。牺牲前，老彭将一张写有联络地址的小纸条塞进嘴里，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细细咀嚼，慢慢咽下去。

在这场遭遇战中，彭咏梧及18名战士战死，另有40人被捕。

老彭牺牲后，他穿的衣服、戴的手表被敌军士兵抢夺一空。敌连长残暴地割下他的头颅挂在竹园坪场的城楼上示众。

三天以后，人头不见了。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头颅取走，埋在竹园坪场边高高的宝塔梁上。

在小说中，是由双枪老太婆向江姐讲述了彭松涛牺牲的经过，而这个经过显然是在真实素材上加以虚构而成的：

那天，双河场开抗丁抗粮群众大会，老彭临时决定去参加。还没有进场口，就发现乡场被匪军包围了，匪军在场口上架上两挺机枪，准备扫射、屠杀！可是开会的群众还不知道，还在高呼口号！眼看群众就要血染全场，老彭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立刻鸣枪示警，并且掩护群众撤退……就这样，为了上千群众，老彭他们三个同志……在《红岩》小说中，江姐是在去川北的途中，在县城门口看见彭松涛被割下来的人头。

江姐趋前几步，挨近围在城墙边的人群。她听见人丛里有低沉的叹息，有愤慨的不平，这种同情和悲痛，深深注进她的心坎。又是一批革命者，为党为人民，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虽然还不太了解情况，但是凭着经验，她知道牺牲的定是自己的同志。她在心中喃喃地说：“安息吧，同志，我们一定要为你们复仇！”

江姐想到自己的任务，尽量冷静下来，不愿久看，掉回头，默默地走开了。她刚走了几步，心里又浮现出一个念头：就这样走开，连牺牲者的姓名也不知道，这对得起死难的战友吗？应该仔细看看，了解他们的姓名，记住他们牺牲的经过，报告给党，让同志们永远纪念他们。鲜红的血，应该播下复仇的种子！

江姐转回头，再一次靠近拥挤的人群，强自镇定着脸上的表情，抑制着不断涌向心头的激怒。她的目光逡巡着，忽然看见城墙上，张贴着一张巨幅布告。布告被雨水淋透了，字迹有些模糊，几行姓名，一一被红笔粗暴地勾画过，经过雨水浸渍，仿佛变成朵朵殷红的血花……江姐挤过了几个人，靠近布告，她的目光，突然被第一行的姓名吸引住，一动不动地死盯在那意外的名字上。

是眼神晕眩？还是自己过于激动？布告上怎么会出现在他的名字？她觉得眼前金星飞溅，布告也在浮动。江姐伸手擦去额上混着雨水的冷汗，再仔细看看，映进眼帘的，仍然是那行使她周身冰冷的字迹：

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老彭？他不就是我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吗！不会是他，他怎能在这种时刻牺牲？一定是敌人的欺骗！可是，这里挂的，又是谁的头呢？江姐艰难地，急切地向前移动，抬起头，仰望着城楼。目光穿过雨雾，到底看清楚了那熟悉的脸型。啊，真的是他！他大睁着一双渴望胜利的眼睛，直视着苦难中的人民！老彭，老彭，你不是率领着队伍，日夜打击匪军！你不是和我相约：共同战斗到天明！

江姐热泪盈眶，胸口梗塞，不敢也不愿再看。她禁不住要恸哭出声。一阵又一阵头昏目眩，使她无力站稳脚跟实际情况是，江竹筠根本没有亲眼看见这一惨象，她是听人转述的。因此，她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也不愿相信自己心爱的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

1948年3月19日在给谭竹安的信中，她这样写到：

四号，我对他不能有任何的幻想了。在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的确已经死了，而且很惨。“他会活着吧？”这个唯一的希望也给我毁了，还有什么想的呢？……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样子的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

与小说中描写相符合的是江竹筠得知噩耗时的表情。她虽然悲痛万分，如同响起了一个晴天霹雳，但她还是强忍住悲痛，一个眼泪也没有掉。

她久久没有说话，在场的人心情越发沉重，那气氛好像凝固住了。

最后还是江竹筠反过来安慰大家：“不要难过，革命总会有牺牲的。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完成老彭的遗志。”

有谁知道，在这之后的静静长夜里，她一个人回想老彭的音容笑貌，回想两个人共同生活过的日子，流过了多少眼泪。

在同志们的护送下，江竹筠返回了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工作。

大年初一，她去探望寄养在同志家中的儿子。抱着失去父亲的云儿，她忍不住失声痛哭。女友不理解一向沉静的江姐为何失态，问道：“今天大年初一，你到别人家里哭，为什么？”

江竹筠沉默了片刻，问道：“你说，两岁的小孩能记得父母吗？”

女友愣住了。这时，她才将老彭牺牲的情形告诉了女友，两人抱头痛哭一场。

组织上考虑到江竹筠经受的打击，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也好照顾孩子。可江竹筠拒绝了，她要求重返下川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请党相信我，我要到老彭牺牲的地方工作。”

她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危难重重，但她不愿离开那些死了的与活着的战友，不愿离开老彭。

临走时，她异乎寻常地把住址暴露出来，把家具全部送人了，连结婚纪念品衣柜也送给了办《挺进报》的同志。

她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不久，她又来到万县，负责川东武装起义的联络工作。她要把老彭留下的火种再次变成燎原烈火。但她没有想到，她的上级成了叛徒，把她出卖了。

李青林被拖上老虎凳，一条腿活生生地折断了。就在她即将成为新娘的时候，她的爱人被迫撤回延安。

在《红岩》小说中，江姐是离开华蓥山根据地，在城里的秘密联络站被特务甫志高发现而落入敌手的。

叛徒一步步逼上前来，“为了找你，我吃尽了苦头，现在，你，你再教训我吧！”他伸手一摸，乌黑的手枪，突然对

准江姐的心窝。“举起手来！江雪琴，我今天到底找到了你！”

江姐轻蔑地瞟了一下枪管，她抬起头，冷冷地对着叛徒狰狞卑劣的嘴脸，昂然命令道：“开枪吧！”

叛徒一愣，仓皇地朝后退了一步。江姐立刻迈步向前，一步，又一步，把紧握手枪的叛徒逼到墙角。江姐站定脚跟，慢慢抬起手来，目光冷冷地逼视着不敢回视的叛徒，对准那副肮脏的嘴脸，清脆地赏了他一记耳光。

一群便衣特务冲进门来，惶惑地张望着。叛徒躲在屋角，一手握枪，一手捧住热辣辣的瘦脸发怔。

江姐不再说话，伸手披拂了一下自己的衣襟，凛然跨出堂屋，迈开脚步，径直朝洞开的黑漆大门走去……

实际上，江竹筠是在万县的住处被捕的。当时，出卖她的叛徒涂孝文并没有露面。

当天晚上，特务在万县特委会里审问江竹筠，逼迫她交出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员名单和武装起义计划，可是江竹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叫出涂孝文和她对质。

涂孝文低着头走进来。

“江竹筠，我知道的都说了，你的身份人家都知道了。你也别怪我，我也是被自己人出卖的，我不说人家也都知道。”涂孝文嗫嚅道。

“你这条恶狗！”江竹筠死死地盯着这个叛徒，两只眼睛里仿佛喷射出火焰来。“你为什么陷害好人？你乱咬人能有好下场吗？”

涂孝文低头不语。在江竹筠面前，他感到内疚，感到惭愧，他甚至有些悔恨，不该听冉益智的胡说八道。

特务们对江竹筠动起了重刑……

江竹筠是6月14日被捕的，就在这之后的几天里，雷震、黄绍辉、李明辉、黄玉清、李承林夫妇、唐虚谷夫妇、陈继贤、刘德彬等住在万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6月14日这天，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即《红岩》中的李青竹）进城找县委书记雷震、江竹筠研究工作，他刚走近江竹筠的住处，就远远地看见江竹筠被一群人押走了。江竹筠一边走还一边大喊大叫。李青林明白了她的用意，不动声色地离开了。

当时，李青林的公开身份是万县郊区清泉乡第六保国民学校的教员，这里是县委特意设置的一个备用隐蔽点。校长贺启惠是共产党员。另一位教师易明珍是新青社社员。

李青林立刻写了一张纸条派人送给贺启惠：“打扫清洁，有客人来。”然后她去烫了个发，这才坐着轿子回学校，布置撤退。当时，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是十分困难的，要撤退还得把预存的谷子变卖成现金才能有路费。

不幸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6月15日中午，她们三个人正在睡午觉，忽然听到住在大门边的贺校长的伯父急促地喊道：“启惠，有个姓雷的先生找你。”

她们翻身起床，李青林断然说：“特务来了！我们走。”

接着她又命令易明珍：“快，你出去说，校长不在。”

贺启惠跑到了一户农家躲起来，李青林从侧门跑出去，正要奔往后山进入密林，猛想起还有一份尚未处理的文件，又回头向学校走去，碰上了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漆玉麟。

李青林被捕后，冉益智向敌人无耻地献计说：“她是那边的负责人，乡下的关系都是她发展和掌握的，要从她身上‘榨油’。”

于是敌人便对李青林进行严刑逼供。但李青林连共产党员身分都不承认。

“我在学校教书，上课很忙，很少和外人来往，认不得那个姓江的。”

敌人不甘心，便搬出老虎凳这样的酷刑来折磨李青林。李青林仍然坚不吐实。敌人想不到一个女子竟会这样坚强，便狠心地往老虎凳上加砖头。加一块砖头，受刑人的痛苦便会骤然加剧许多。李青林在熬刑时几度昏死过去，最后她的腿骨被残暴的敌人活生生折断了。

当时和她一起受刑的女同志还有江竹筠、黄玉清等人，她们也都十分坚强，雷天元气得直骂，另外几个累得满头大汗的特务也大发牢骚：

“这几个娘们儿真硬气，整死也不开腔，那个把腿撬断了也不说。”

特务们在万县再也抓不到什么人了，便押着江竹筠、李青林等人乘民权号江轮返回重庆，涂孝文也在其中。

在船上，江竹筠突然指名道姓地大骂起涂孝文来，声音特别响亮，引来很多诧异的目光。

李青林立刻明白了江竹筠的用意。她是想让乘客和船员听到她的话，把消息传开，让党组织知道。

轮船眼看就要驶抵重庆朝天门码头了，望着这曾经战斗过的山城，她不由得回想起她在这里恋爱的日子。

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出生于四川泸县一个富裕家庭，后来父亲被国民党匪兵毒打致死，从此家道中落。她在中学时期就痛恨恶势力，同情贫苦人民，1939年，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42年，她转移到重庆，在南方局妇运组领

导下工作。

在工作中，她认识了从延安调来在《新华日报》工作的邵子南，两人在为共同的理想奋斗中相知相爱了。邵子南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他们的恋爱：

电影院不是我们的，特务是只嗅觉灵敏的狗；

公园不是我们的，远远望着，不敢挥手。

我们用工作织成爱的花环，幸福在我们疲劳的身上荡漾……

1947年春，内战愈演愈烈，国民党反动派随时可能对中共驻重庆的公开机关大开杀戒。在这生死攸关的日子里，李方琼与邵子南决定结婚，把两人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共同迎接严峻的考验。那一年，李方琼已经34岁了。

这天早上，李方琼没有看到通常已在街头贴出的当天的《新华日报》，担心出了什么事，不安地去采访部找邵子南打听情况。在她的手提袋里，放着一包邵子南嘱咐她买好的糖果，这是准备为结婚散发给同志们的喜糖。

《新华日报》采访部设在重庆城内一条名叫德兴里的小巷中。李方琼还没走近巷口，就发现情况不好，只见那里军警林立，杀气森森。原来，从这天凌晨起，国民党就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各部门驻地，限令中共公开机关撤回延安。这是蒋介石为关闭和谈大门，将内战升级而悍然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

面对军警的武装封锁线，李方琼心急如焚。她真想冲过去，声称自己是《新华日报》的家属，闯进那充满杀机的包围圈里去，和自己的心上人同生死共患难。但她马上就冷静下来，她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不了解大局和党组织的部署之前，她不能擅自行动。她抑制着满腔的怒火和眼中的泪水，提着那一包喜糖，痛苦地转身离去。

几天后，邵子南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全部被强迫撤回延安。李方琼和自己的心上人，一对将婚未婚的恋人从此天各一方。

这年7月，李方琼奉命去川东农村开展地下革命斗争，担任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

在嘈杂拥挤的江轮上，她凭栏眺望，思绪万千。她即将投身火与血的斗争，但怎样才能让子南知道自己参加了一场拼头颅洒热血的搏斗呢？她想起只有她才知道的邵子南的一个笔名“青林”，决定就用它作自己的代名。“无论是胜利归来，还是血染沙场，子南都会从报上知道我没玷污我们的感情和誓言。”从此她就改名为李青林。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被捕时，敌人从她的身上搜出了两把手枪。

在小说《红岩》中，江姐也是从水路被押在重庆的。而游击队得到的消息，却是沈养斋将派专车顺陆路押解江姐去重庆。于是，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亲自带人下山，准备拦住敌人的车队，抢回江姐。

这个情节完全是虚构的，那个双枪老太婆也是虚构的，不过这个人物还是有原型可寻的。当时有不少女同志参加了农村武装斗争，能打枪能打仗的也有不少，只不过没有上了年纪的老太婆。

根据徐远举解放后写的坦白材料，当时有一个叫张八妹的人，年纪在40岁以上，绰号“双枪老太婆”。1848年在岳武起义时被俘，由华蓥山押到了重庆，以后牺牲于渣滓洞。据华蓥山清剿指挥官彭斌向徐远举汇报，张八妹

被俘时，彭曾与她谈过话。彭斌问她：“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搞？”

她答复说：“你们国民党这样腐败，谁个跟你们搞呀！我要跟共产党革命到底。”

这个张八妹其实就是邓惠中。《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个就是邓惠中，那两个人分别是刘隆华和陈联诗。她们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只有邓惠中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在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曾参予过解放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内革命志士的营救，这显然与邓惠中的经历不符合，因为她本人就在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但如果从年龄和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来考虑，邓惠中与双枪老太婆这个艺术形象似乎更接近一些。

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丈夫很早就被敌人抓走了，生死不明，她拉扯着儿子华为长大。她经常告诉儿子：“孩子，快长大吧！红军一定会回来的！血仇要用血来报！剩下孤儿寡母，一样闹革命！”

邓惠中的丈夫虽然没有被敌人抓走，但也是在她30岁那年就去了延安。

邓惠中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在她6岁时不幸去世。她从小就与母亲过着含辛茹苦的生活。她渴望念书，反对缠脚，脚缠上就被她偷偷解开，又缠上又解开，最后成了一双半大脚。

15岁时，她嫁给县城里的小学教员邓福谦，小两口恩恩爱爱。邓惠中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常站在教室外面听丈夫讲课，晚上守在他身旁看他批改作业，丈夫常念文章给她听，又给她讲故事。后来，丈夫顶着家庭和社

会的压力送这个小媳妇进了岳池女子师范学校。虽然她的基础很差，可是她学习刻苦，多门功课都及格，语文甚至还名列前茅，毕业时取得了小学教员的资格。

毕业后，她先在岳池县江西馆小学教书，后来升任校长。

1934年以后，丈夫邓福谦到重庆从事抗日救亡的革命活动，邓惠中单独挑起了抚养三个孩子、照顾家中老人的重担。1937年冬丈夫决定去延安，邓惠中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典当家产，凑足路费，送丈夫上路，一直把邓福谦送到重庆。

邓福谦走时介绍邓惠中与几个地下党员认识，让他们共同从事进步活动。1938年，邓惠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她带着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组织救亡宣传，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由于工作出色，她担任了妇女特支书记、县妇女委员等重要职务，先后发展了10余名女同志入党。

解放战争开始后，邓惠中已是4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迈着一双缠过又放开的半大脚，深入到岳池、武胜地区的各个角落，冒着生命危险，发展党的组织，宣传“三抗”，组织农会，组建游击队。

她常为受苦受难的妇女排忧解难。一位妇女的丈夫抽大烟，赌博时输急了将她抵押给另一个赌徒。这个妇女情急之中跑到邓惠中家寻求保护。赌棍们到邓家要人，但慑于“邓大姐”的威仪，嗫嚅而退。事后邓惠中将她带到一个基层党组织隐蔽起来，后来这位妇女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

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双枪老太婆的豪迈和英武。

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入了党，早早地就当党内小交通员。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由于邓惠中等人做了长期的准备，到1948

年岳武起义时，附近几个乡的农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了数千人。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岳西支部，组建了“西南民主联军华盖山游击纵队第八支队”，有武装队员 400 余名，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员。

邓惠中像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一样，枪法很好。

1948 年 5 月下旬，她组织武装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建立起“地下游击队岳西大队”。军训中，她练习用手枪射击，命中率很高，博得在场的队员们齐声喝彩。

邓惠中也愿意随身带两把手枪。她被捕时，敌人当场从她身上搜出两把手枪。

部队缺乏子弹，她千方百计筹集弹药，又亲自带着儿子邓诚和几个队员到上级指定的地点运回武器弹药。邓惠中扮成有钱的太太坐在滑杆上，装弹药的提箱也放在滑杆上。遇到关卡盘查时，队员就用手枪抵住保丁下巴，顺利通过。

这个情节与小说中双枪老太婆营救江姐时的情景很相似。

滑竿接近桥头，老太婆就跳下滑竿，满不在乎地拍拍白大绸衫子，毫不在意地向卡子上的乡下打招呼：“又要检查？”

东西都在滑竿上，你们来看嘛！”她伸出一只戴着重甸甸的金手镯和硕大的宝石戒指的手，手里摇着一把鹰翎扇，象牙柄上坠着长长的青丝流苏，不耐烦地朝着滑竿的篷布一挥。

乡丁望着金珠宝玉的闪光，骄横的气焰立刻收敛了。

邓惠中经常用背篋给游击队背子弹，用糠壳之类盖在上面，分发到各个中队。有关她的传说越来越多，她成了来无影去无踪的双枪老太婆。敌人想捉拿她，她却神出鬼没地总能逃掉。在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抓住了敌人的警察局长，曾对他这样说：

“你亲口判过我的死刑，难道就忘记了吗？三年前我越狱出走，你还带着人马连夜冒雨追过我五十里路！”老太婆随手用鹰翎扇指着铺门上的告示：“你们不是又要通缉我吗？今天我是特地来投案请赏的，看你怎么处置！”

邓惠中也和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一样，被敌人抓进狱中，但她却不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幸运。

不幸武装起义失利，一片白色恐怖，形势危急。1948 年 8 月 2 日傍晚，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不久后，儿媳及女儿经取保释放。

邓惠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她都挺过来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9 月 29 日，邓惠中从岳池县大狱被押往重庆，关押在渣滓洞女牢。

在狱中她还惦记着狱外的同志，带信出来安排暴露的同志转移。

1949 年 11 月 27 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俩同时牺牲在渣滓洞。韩子栋的经历和小说中的华子良颇为相似。他坐了 14 年的牢，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又利用疯癫的外表，成功地逃离了虎口。

说到双枪老太婆，就不能不说一说华子良。他是小说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又是双枪老太婆的丈夫，被捕前是华盖山根据地的党委书记。

华子良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和双枪老太婆相比，这个人物要与真实的人物原型更接近一些。

当时在白公馆里，确实有一个疯老头，坐了14年的牢，他的名字叫韩子栋。

韩子栋是山东人，出身贫苦，后来考入北平一所大学经济系成为半工半读学生。

1933年，韩子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按照组织安排，他打入特务组织“蓝衣社”，获取特务情报转送出来。不久被检举有进步嫌疑，于1934年10月被捕入狱，先后关押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宪兵三团。他受尽残酷刑讯，五次三番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浇醒，几天下来，虚弱得不成人样。最后一次，刚把手脚绑在一起还没吊上刑架，他就昏死过去了。法医走来，看看他快没气了，就填了一张“死亡证明书”，将他抬进停尸房。由于当时他的身份还未暴露，主审特务害怕担当“杀人灭口”的罪名，急忙请医生到停尸房打针，做人工呼吸，又把他救活过来。

此后，韩子栋辗转关押于南京、武汉、益阳、息烽等地监狱。

在息烽监狱里，共产党成立了狱中党支部，支部书记是罗世文，支委是车耀先，韩子栋也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秘密工作。

在小说中，华子良是从罗世文、车耀先遇难时开始装疯的，而这个秘密只有他自己知道。难友们都把他当成一个胆小的疯老头，甚至有些鄙视他。

重庆解放前夕，狱中党组织急于与外界取得联系，而又没有人能把消息传递出去，齐晓轩和成岗在图书室的楼板下边秘密碰头，为这个问题大伤脑筋。

就在这时，楼板被揭开了，一个满头白发，满脸胡须像刺猬一样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就是华子良。

他不慌不忙一挥手，疯疯癫癫的神经质从他身上一扫而光：

“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我陪杀场的时候。”华子良冷静地回答着：“15年前，我是华蓥山根据地党委书记。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是我的上级。可是在敌人面前，我只是个嫌疑分子。在去刑场的路上，罗世文同志估计到敌人押我去，只是陪杀场，为的是再考察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他指示我伪装疯癫，长期隐蔽，欺骗敌人。枪声一响，我就变成了疯子。”按照狱中党组织的指示，他利用随特务到狱外买东西的机会，把狱里的消息传递出去，又带回外边党组织的指示。后来，就在他准备逃出虎口，带领地下党武装奇袭中美合作所，支援渣滓洞和白公馆难友提前越狱的时候，敌人逼迫他随特务部队出发，上山打游击。但他还是找机会逃脱了，带着解放军赶到了歌乐山下。

实际上，韩子栋并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被秘密杀害的，当时韩子栋还被关押在牢里。

在狱中，韩子栋也不是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只知道隐蔽。相反，他本人就是狱中党组织的成员。罗车二人就义后，他和同牢的许晓轩、谭沈明一起组成党支部，由许晓轩任支书。他们曾研究过集体越狱，但终因敌人看守严密，无法实现。最后决定，谁有机会谁先逃，出去一个就是为革命增添一份力量。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才于1947年8月18日越狱成功，而不是临近解放才逃脱。

他选定了逃走的时间后，立刻通知了狱中少数几个共产党员。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就是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他怕韩子栋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缝了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地塞到他的手里。

至于他的疯癫外表，这主要是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沉默寡言的孤僻性格。同时，他也有意保持这种外表，以骗取敌人的信任。

果然，敌人见他傻里傻气的，在重庆又举目无亲，就对他放松了警惕，开始叫他管理伙食团和小卖部，后来又叫他随特务看守上街买东西。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他摸清了四周的环境，为越狱作好了一切准备。他与许晓轩、谭沈明等人悄悄研究了三个具体意见：一是逃出后向大山跑，夜间要看准一个星座，不致迷失方向，最好准备一把刀子，遇上敌人就把他干掉；二是逃出后要化装；三是逃出后尽量接近抬滑杆的人，可找他们帮忙。另一位难友文泽还补充了一点，要设法过河，以甩掉警犬追踪。

1947年8月18日，重庆城骄阳似火，沉闷的空气叫人喘不过气来。一位表情痴呆、目光木然、衣衬褴褛的老头，肩挑空箩筐，脚步蹒跚地走着，跟在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服的看守的后边。他们出了白公馆，来到磁器口，直奔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几个麻将迷一坐下来，就打个没完。老头放下箩筐，独自在一旁坐下，滞涩的目光直盯着门外，屋里的一切都似乎没有看见。过了许久，牌迷们正打得难分难解，他慢吞吞地站起来，走到牌桌边说了声：“我去上个厕所。”没人理他。于是不慌不忙地走出去，径直往嘉陵江边奔去……

他，就是已经坐牢14年的地下党员韩子栋。

韩子栋到了嘉陵江边，正逢涨大水，仅有一只小木船靠在江边。

“老板，过河要多少钱？”

“8000元。”

“好，给你1万。我有急事，赶快送我过江。”

船老板见此入如此慷慨，便满口答应了。上船后，韩子栋突然叫肚子痛，装着直不起腰，顺势爬到船舱里，就这样顺利地过了江。

看守卢兆春等人，乘兴打了好几圈麻将，还不见韩子栋回来，才猛然想到这个人可能跑了，当即追到江边，连个人影也没看见，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白公馆，一时又不敢马上报告，一直拖到晚上9点钟才把这事告诉了看守长。特务头目气极败坏，下令紧急戒严，带上警犬四处搜查，也是一无所获，韩子栋早已走远了。事后卢兆春因失职被关到白公馆牢中直到1949年2月，释放后将其打发回乡种地。

韩子栋过江后，按照狱中难友的临别嘱咐，绕小道，穿丛林，翻山越岭，到了万县。而后又沿江直下，历尽艰辛，忍饥挨饿到了宜昌。他原打算去上海找组织，但一打听沿途行走很不方便，此刻又人地生疏，正为难时，猛然想起在狱中认识的一位叫郑大发子的。郑在狱中时，常去韩子栋管的小卖部拿东西，有时也不给钱。这样他们结成了同窗难友。后来郑大发子被释放出狱了，他对韩子栋说：“有机会请到河南许昌找我。”韩子栋就抱着这一线希望，北上许昌去找郑大发子。

到了许昌，还真找到了郑大发子，他留韩子栋（已改名余志民）住下，介绍他到一茶店当杂工。但是，韩子栋人在许昌，心想延安。不久，他对郑大发子讲要回老家山东，再三挽留也不行。郑大发子无奈，只好给他买了火车票，送他搭上了去郑州方向的火车。

在火车上他听人说，过了黄河就是解放区。他便在半路下了车，绕小道，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又不知走了多少天才过了黄河。

有一天，刚朦朦亮，韩子栋路过一座土庙，见墙上写着：

“蒋介石不死，内战不止。”他断定这里就是解放区，于是鼓起勇气进了村，很快找到八路军驻地，韩子栋像失散的儿子见到了母亲，激动的热泪夺眶而出。

屈指算来，他从脱险到找到解放军，路上共花了45天。随后，韩子栋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到了中央组织部。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组织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中组部副部长对他说：“你能经受长达14年的秘密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的党员中亦属罕见，堪称难能可贵。”

当问到韩子栋有什么要求时，他说：“只希望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出狱后五个月零五天的时候，韩子栋在由小萝卜头转送到他手里的枕套上写下了一首诗：

披枷带锁一老囚，笼里捉虱话春秋。
一死皎然无后恨，赢得大众来报仇。
谁谓念年牢狱苦，赴仁取义死未休。
生前无愧颜太守，死时犹抱击贼笏。
自古贪生如一死，吾久不计日与时。
借问陆公老放翁，家祭曾否告尔知。

解放后，韩子栋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技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先后担任贵阳市委副书记、市监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顾委委员。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双枪老太婆劫刑车的故事并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狡猾的敌人临时改变计划，由水路把蓝蒂裕押到重庆。

由于《红岩》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双枪老太婆劫刑车的故事也不胫而走，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还被编成各种艺术形式上演。

现在我们说江竹筠在押解途中，并未出现过营救行动，有人禁不住在心中暗自嘀咕：“这个情节难道完全是作者编造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当时被关在渣滓洞监狱里的蓝蒂裕，曾向同牢的难友讲过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小说中劫刑车的情节十分接近。

蓝蒂裕是1949年1月份被押进渣滓洞的，当时关在楼七室。他为人很公正，又很坚强沉着，难友们都很喜欢他，就推选他为楼七室室长。因为他胡子很长，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蓝胡子”，有位同志还写了一篇《蓝胡子颂》。

读过《红岩》的人也许还记得，双枪老太婆在桥头么店子里喝茶，那位老板娘唠叨了这样一段话：

“你老人家怕没走过这一方？如今连胡子老汉也不敢出门。前几天，说是县里要抓个蓝胡子，把赶场的胡子者汉都抓完了。白胡子，黑胡子，花白胡子，什么颜色的胡子都抓，就是没抓住那个长蓝胡子的共产党。后来才听说弄错了，该抓的不是蓝胡子，是一个姓蓝的胡子……”

江姐在被捕前还提到过“满脸胡须的老蓝同志”。

显然，这位姓蓝的胡子就是蓝蒂裕。

蓝蒂裕被捕后在梁平县监狱关押了20天。敌人原打算用汽车把他押到重庆。武装起义部队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在旱路上设下了伏击圈，准备把蓝

蒂裕抢救出来。

可就在汽车已经开始发动的时候，狡猾的敌人又改变了主意，临时决定改走水路，从梁平县到万县上船，结果使营救计划落空。

蓝蒂裕相貌相当英武，性格豪迈，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接触了几位早期共产党人，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此立下了人生目标和为之而奋斗的决心。他对好友说：“我们要干一番事业，一要靠有学问，二要靠强身。”于是，他不仅发愤苦读，而且还苦练气功、武术。

1938年，他在万县师范学校求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暴露了身份，组织上通知他投奔设在重庆西三街的《新华日报》门市部。

他到《新华日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回乡招报童。他碰到了一个叫做郑为洁的18岁的女共产党员，志愿跟他去做送报的工作。蓝蒂裕建议她到一个新地方改用一个新名字，他说：“就叫郑彻吧，彻底革命的彻。作一个彻底革命的新女性，怎么样？”正是这个姑娘，以后成为他忠实的革命伴侣。

1941年，蓝蒂裕一边在重庆北碚教书，一边努力做《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一次，他被邮检部门中的国民党特务发现了，把他抓了起来。特务们狠狠地吊打他，却未得到任何口供，入夜后，把他双手捆住，扔在了一间屋子里。

半夜时分，卫兵睡着了。蓝蒂裕在石头上磨断绳子，又在泥墙上用手硬是抠出一个洞，钻了出去。

特务们发现了，鸣着枪追来，他躲进一个山洞。待追兵远去，天色刚朦朦亮，他跳进了嘉陵江。当时正是早春季节，江水冰凉刺骨，遍体伤痕在江水的浸泡下变得疼痛难忍，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划着水……

上岸后，还没走到家门口，就和正欲出门找他的妻子碰上了。对心疼、吃惊的妻子，他来不及说别的，第一句话就是：“快，敌人在破坏《新华日报》，快送信去……”边说边拉着妻子向重庆市区跑去。

1944年，他的大儿子降临人世。妻子郑彻要给儿子取名字，他沉吟了半晌说：“就叫耕荒吧。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荆棘丛生，满目疮痍，正如一片荒芜之地。耕荒，就是要孩子以垦荒者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去进行革命的开垦，把祖国建成美丽的园林。”

过了两年，二女儿诞生了。在女儿半岁时，蒂裕给女儿取名，他对妻子说：“叫祝卉吧。卉是花卉的卉，一来她是我30岁时所生，祝卉就是祝贺这而立之年。二来，她诞生在这风雨如磐的时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今后她还将经历各种严峻的考验。我希望她像耶稣背负十字架那样，为人民大众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切。”

第一次脱险后，蓝蒂裕和妻子辗转到巴县，再操教员旧业。1944年他又一次因为《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而被敌特发现。两个特务遁迹来到他任教导主任的西彭乡中心小学。他得到讯息后，急忙赶回家收拾上路。妻子把家中仅有的一百块银元缠在他身上——这是虽不满于女儿婚事，却又疼爱女儿的岳母托人带给女儿作嫁妆的。

蓝蒂裕穿街过巷，刚跑出不远，那两个特务已渐渐追来。他向山上的柑桔林跑去。先是扔掉了头上的博士帽，继而又扔掉了呢大衣，然而身上的一百块银元仍坠着他。

他灵机一动，取出银元一把把撒在路上。

那两个特务见衣帽都抢着拾，见银元还有放过的？就这样他终于得以逃脱。

当他后来向妻子讲起这件事时，郑彻一点不为家中唯一的一笔财产的丢失而难过，反而爽朗地说：“钱财身外之物，只要你安全，再丢一百块银元也不可惜。”

自从北碚脱险后，蓝蒂裕就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党籍也成了大问题。直到1948年11月，他才重新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党组织派他回家乡梁平县筹备武装起义。

1948年12月10日早晨，天刚朦朦亮，蓝蒂裕的住地云龙大平寨被乡丁和警察团团包围。蓝蒂裕发觉后，首先把所有的文件付之一炬，再寻路逃跑时，已经来不及了。

当时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几个农民，也都是共产党员。为了掩护他们，他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肩上，在这以后的历次严刑审讯中，敌人只得到一句话：

“我就是共产党员，除此之外，你们别想碍到半个字。”

蓝蒂裕先是在云龙警察所关了三天，接着又被送进梁平县大牢里。

在梁平县牢中，敌人对他施加了重刑。

这种刑罚名叫“烧八团花”：就是用特制的绳子盘成小饼子，点燃一端，贴在受刑者的脊背上慢慢烧烤，吱吱冒油，使整个脊背焦糊发臭。受刑者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重庆军统集中营中，也有这种名目的刑罚，但有所不同：在集中营中，是先把受刑者的胳膊裸露开来，然后把大把大把燃炽的香火往上抖落，香火一落上去，立刻发出吱吱的响声，冒出一股股散发着焦臭的白烟。

敌人简直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酷刑，蓝蒂裕居然忍受过来了。

敌人拿他没办法，便把他吊到屋梁上。

在昏昏沉沉中，蓝蒂裕被一阵抽泣声惊醒过来。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来了。

母亲是赶来给他送饭的，看到自己的儿子受了这么重的刑，老妈妈伤心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流。

蓝蒂裕刚出生不久，父亲就被当地的恶霸欺凌而死，母亲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孤儿寡母不知受了多少苦。后来，蓝蒂裕长大了，是她靠给别人洗衣服、缝缝补补节衣缩食供他读书。想想这些往事，再看看儿子如今的处境，老妈妈悲痛欲绝。

看到了妈妈，蓝蒂裕忘了伤口的疼痛，只觉得心如刀绞。母亲好不容易把自己拉扯大了，自己不仅没有好好地孝敬报答她老人家，反而让她为自己担惊受怕。一阵酸楚涌上心头。

对着母亲的泪眼，他强忍着悲痛说：“妈妈，您要坚强些。如果我死了，会有更多的人来照看您。他们都是您的儿子！”

老妈妈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从那天开始，她的眼泪就一直没有干过。

敌人决定把蓝蒂裕押送重庆。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临走时他嘱咐同房的难友说：“胜利之后，请你们在庆祝宴会上替我摆上一双筷子，一个碗，也可以烧纸向我报告喜讯。”

当时他还不知道，一个劫刑车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可惜的是，敌人临时改变行动方案，他失去了最后一个脱险的机会。

敌人用尽了酷刑，但从江竹筠嘴里只得到一句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在难友的怀里，江竹筠流下了眼泪。

江竹筠一行被押到重庆，先是关进了二处，不久又转押至渣滓洞看守所。在二处的审讯室里，江竹筠再次受刑。特制的竹筷子把她的十个手指夹得鲜血淋漓，昏死后又用凉水喷醒，死去活来多少次，但她反复坚持的只有一句话：“我没什么可说的。”

被羁押渣滓洞看守所后，她又遭刑讯。敌人残忍地在她旧伤未愈的手指上猛夹竹筷。为了不致很快昏死，敌人布置行刑特务夹竹筷时慢慢加劲，到快昏死过去时就放松，然后又慢慢加劲，使江姐既难以忍受，又不致于昏死。最后，江姐鲜血淋漓的手指只要一碰竹筷，行刑特务还未使劲，她就昏过去了。

敌人非常想破获川东武装暴动组织，而叛徒又说这一切只有江竹筠最清楚。于是，敌人从早到晚，反复对她使用酷刑。

江竹筠晕死过去了。的确，没有人能用血肉之躯抵抗住这样的酷刑而不昏厥，但是作为对党无比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却可以用意志的力量支持住坚强的神经。

特务用冷水把她喷醒。她一醒过来，立刻在心里告诉自己：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保护组织和同志，什么也不能对敌人说。

敌人继续用刑。她望着连自己也认不出来的被摧残的身体，望着凝结着仇恨的遍体血污，嘴唇倔强地抽动着，说：

“我是共产党员，随你们怎么处置！”

“杀了我也不知道组织……你们是枉费心机，永远也达不到你们的目的……”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不是说还有更厉害十倍、百倍的刑具吗？请吧！拼一条命给你们整……”

小说《红岩》曾对敌人残酷拷打江姐的令人发指的场面做了大段描写。

“你说不说？到底说不说？”

传来特务绝望的狂叫，混合着恐怖的狞笑。接着，渣滓洞又坠入死一般的沉寂中。

听得清一个庄重无畏的声音在静寂中回答：

“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

江姐沉静、安宁的语音，使人想起了她刚被押进渣滓洞的那天，她在同志们面前微笑着，充满胜利信心的刚毅神情。听着她的声音，仿佛像看见她正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刑讯室里，面对着束手无策的敌人。可是江姐镇定的声音，并不能免除同志们痛苦的关切。

刑讯室里又传来了声音，是徐鹏飞毒辣的笑声。

“谅你一个共产党，还制服不了？你不愿讲，好嘛，我们帮你打开嘴巴。来人！”

接着，传来一阵狼嚎似的匪徒的狂吼。

夜，在深沉的痛苦、担心与激动中，一刻一刻地挨过。星光黯淡了，已经是雄鸡报晓的时刻。

在那斑斑血迹的墙壁上，映着江姐的身影消失了。大概她从倒吊着的屋梁上，被松了下来……

“现在愿意说了吧？”

魔影狂乱地移动着。

“不！”微弱的声音传来，仍然是那样的平静。

“十指连心，考虑一下吧！说不说？”

没有回答。

铁锤高高举起。墙壁上映出沉重的黑色阴影。

“钉！”

人们仿佛看见绳子紧紧绑着她的双手，一根竹签对准她的指尖——血水飞溅……

“说不说？”

没有回答。

“不说？拔出来！再钉！”

江姐没有声音了。人们感到连心的痛苦，像竹签钉在每一个人心上……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水的声音！

“把她泼醒！再钉！”

一根，两根！……竹签深深地撕裂着血肉……左手，右手，两只手钉满了粗长的竹签……

一阵，又一阵泼水的声音……

这段描写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有所出入的地方是徐远举当时并不在场。据解放后徐自己交待，审问江竹筠是由张界主持的。

还有一点书中没有写到。江竹筠受刑后，渣滓洞看守所中的大小特务全部摇头叹息：“共产党就是坚强，厉害就厉害在这些地方。”

在当时被捕的同志中，江竹筠是受刑最重的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已经很难体会到受酷刑的滋味。这里我们不妨来听听有亲身经历者的体会。

张泽厚，革命志士，曾被抓进渣滓洞，后幸免于难。1951年4月8日他在川北大学作报告时，有这样一段回忆：

夜里的昏暗电灯光下，又是残酷的毒刑逼供。拳打脚踢，打耳光，是家常便饭。吊打，血肉横飞，断了手腕，烂了背胸；坐老虎凳，折断了脚骨；铜针穿指甲，鲜血淋漓；红铁签烙周身，肉焦气臭；坐电刑，犹如万针刺心；踩杠子，骨断筋折，屎尿横流；辣椒石灰水灌鼻孔，口内鲜血直淌；

吊木脑壳，头痛得快将爆炸；坐软板凳，倒挂脚趾，周身骨节痛得像散开了一般；钢针铁棒毒打，皮破肉烂，然后贴上纱布和棉花，这就叫披麻带孝，隔两天把纱布棉花撕去，鲜血长流，痛苦极难当。残酷的毒刑近百种，折磨得我们的同志昏死过去，无人性的两脚兽，又用水喷醒过来。再用毒刑整得昏死过去，再用凉水喷醒过来。想死，哪能得死呢？想咽下最后一口气，可恶的匪徒们，却不让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呢！残酷的拷打，凶恶的用刑，死了过去，又被凉水喷醒过来……

当江竹筠被提出女牢去审讯时，渣滓洞 18 间牢房里的难友没有片刻心安，有人把头伸出牢房风门口张望；有人不断在设法打听情况；有人在向刚入狱的难友介绍江竹筠怎么不同于一般；有人在估计这次审讯会延长到什么时候；女牢的难友则在打听受了什么刑，准备着怎么让江姐回牢后舒服一点，使她伤痛减轻一点。

在大家心如火燎的等待中，两个特务拖着江姐从铁门外进来了。她还有些昏迷，拖着软弱无力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移动，鲜血从她血淋淋的两只手的指尖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落。

女牢里奔出来几位难友，把江姐轻轻地扶进牢房。

曾紫霞、皮晓云、牛筱吾等人含着热泪把江姐抬到了床上，盐水早已准备好了，一根一根蘸着盐水的竹签子递过来，难友们就用它来为江姐清洗伤口。李玉钿、胡其芬把家里捎进来的白糖找出来，冲成糖水，抱着江姐给她喂进去。

江竹筠的伤口渐渐地清洗干净了，一小碗石花粉末递过来，轻轻地撒下去。

在渣滓洞围墙的基石上，长着一种灰白色的苔藓植物，把它晒干了弄成粉末，有止血的功能。

江竹筠突然低低地呻吟了一声，把头向外侧转去，嘴角冒出了血沫。

“怎么了？”躺在对面床上的李青林吃力地欠起身，关切地问。她的腿伤还没有好，还不能起来活动。

“李大姐，你别担心，江姐已经醒过来了。她嘴里流血，是因为受刑的时候用自己的牙齿把嘴唇咬破了。”曾紫霞回过头去向李青林解释道。

江竹筠此刻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疼痛了，难友们的情谊让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一滴眼泪也未落的她，倒在难友的怀里，就好像见到了最亲的亲人，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如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哗哗地流下来。

“特务龟儿子真狠！”江竹筠一边流泪，一边恨恨地骂了一句。

难友在为江竹筠揩脚时，生怕碰痛她的镣伤，动作十分轻柔，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奇迹：江竹筠的脚小得出奇，在角度恰当时，她的脚可以从上了锁的脚镣里脱出来！难友们几乎惊叫了起来。从此以后，江竹筠在未取脚镣之前，除大小便外，几乎整天都用被子盖在身上坐着，或躺在床上。就连有的难友也不知道她在床上时根本没有戴上脚镣，只要有特务喊女牢的人出去或进女牢时，自然有人早已机灵地把江竹筠的脚放入了脚镣。

江竹筠在狱中多次受刑，最严重的一次是1949年1月16日，这一天是彭咏梧同志牺牲一周年的日子，又碰上江竹筠第三次受刑昏倒。

当时，江姐的身份并不是狱中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她坚贞不屈的表现却赢得了所有难友们的钦佩。于是，在1月19日这一天，由下川东被捕的同志提议，停止一切娱乐，向烈士表示哀悼，并征集诗歌、慰问信，送给江姐，表示狱中同志们对她的关心，更重要的是表示与敌人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这些诗歌和慰问信中，最著名的两首诗是由楼下五室的室长何雪松写的，一首是《海燕》，另一首是《灵魂颂》，后一首诗的副标题还特别注明“献给小江”。

你——

暴风雨中的海燕， 迎着黎明前的黑暗。

飞翔吧！

战斗吧！

你——骄傲的海燕！

你又镣铐着回来了， 毒刑没有屈服你的忠贞；

许多同志，因你的忠贞而安全了。

革命工作，因你的忠贞会开展飞腾， 你，你是苏菲娅的精灵， 你是丹

娘的化身！

啊！……

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优秀的典型，

你是受着考验的灵魂。

叛徒见你而颤栗，敌人见你而震惊。

你今天的事迹，将化成美的旋律，成为千百万人颂赞的歌声。

姑娘呵！姑娘！

我们没有什么来安慰你，但是，你在那里呻吟，我们却同样的痛心，请将息你的创伤吧！

我们得熬过这深沉的黑夜，迎接那霞光焕发的朝暾，朝暾！！

这后一首诗在《红岩》中只节录了一小段。

诗中的丹娘是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卓娅。苏菲娅是一位俄罗斯女英雄，因反对沙皇专制和封建农奴制度而被处以绞刑。

当时的革命者十分敬仰苏联，苏联小说和实际生活中无数英雄的名字也就为中国的革命志士所熟悉、所热爱，所以江竹筠便有了“中国的丹娘”这一美称。

何雪松出生在四川高县罗场，他的父亲是一位名噪川南的书画家，在父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具有了良好的书画素养，而且文学兴趣广泛，诗歌、散文、论文、小说都能写。抗战爆发后，他弃文从武，考入川康绥靖公署陆军教导总队，分配在第三营学军事。后来调去武汉，经阳翰笙同志介绍，被安排在由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放映队，一路宣传抗日，随第三厅的文化人士来到重庆。

何雪松到重庆时，失业军官很多。蒋介石为收买人心，打出“军官总队”的招牌。何雪松为失业所迫便去登了记，安排在海棠溪孙家坡第五军官总队任上校教官，兼《五总》月刊总编辑。

他主编的《五总》月刊，主要是登载军官们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他常找进步人士约稿、改稿、商量版面。

1947年7月，何雪松退役。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由共产党员暗中负责组织联络，准备在地方军中发动武装起义，接应李先念部队解放四川。正在积极筹备时，不幸被特务查出，经叛徒交代，何雪松在重庆被捕，解送白公馆监狱。这一案件牵连的人犯，被称为“小民革武装起义案”。

何雪松在狱中坚贞不屈。徐远举曾亲自找他谈话，劝他自首，只要表明身份，即可获释。何雪松严词拒绝，以致长期囚禁。

他写给江姐的那首《灵魂颂》在监狱中很快就传开了，有的难友还把它谱上曲，教给大家唱。

江竹筠读着这一首首斗志昂扬的诗篇，读着那一封封感人肺腑的慰问信，她不能不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她拿起用竹签子做成的笔，蘸着用棉花灰制成的墨水，在黄色的毛边纸上给渣滓洞的全体难友们写了一封回信：

“我的丈夫、同志、战友，是被敌人打死而割下首级的，今天来纪念他，愿大家继续努力，来完成我们的最后任务。毒刑、拷打是大小的考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

这封信被难友们利用放风的机会传了出去。

江竹筠写完了信，心情依然没有平静下来，她把同牢的难友召集到自己

床前，一字一句地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的最后任务。”

江竹筠没有点明这个最后任务是什么，但大家心里都清楚，那就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要视死如归，不玷污革命的荣誉。

王璞在下川东提前发动起义。敌人滥施酷刑，但下川东被捕的同志却无一屈服。叛徒涂孝文被李青林训斥得面红耳赤。

“江竹筠宁死不招，实在没办法呀！”张界向徐远举汇报完审讯江竹筠的经过，不禁有些灰心丧气。

“从下川东抓来的不只是一个江竹筠，还有那么多人，挨个给我动刑，我就不信他们个个都是江竹筠。”徐远举气极败坏地说。

徐远举此刻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知道共产党随时都可能举行武装暴动，而他必须在共产党动手之前破获他们的组织。

本来，涂孝文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就供出了川东临委兼上川东地委书记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如果能抓住王璞，整个上川东的共产党组织将群龙无首，起义也就组织不起来了。特务们明白这个道理，7月4日这天，火速赶到广安县城。王璞正好不在家，特务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工委书记骆安靖。特务就地进行三审六问，骆安靖经不起肉体的折磨，也成了叛徒，把他所知道的党的机密全供了出来。

徐远举最想抓到的就是王璞。虽然涂孝文、骆安靖也是共产党的高级负责人，但他们在党内的威信显然没有王璞高。此人当过重庆市委书记，现在又任川东临委书记，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

王璞就是《红岩》小说中多次提到的老石同志。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当时的敌人也认为他姓石。许云峰被捕之后，还念念不忘“千方百计保护党的组织，决不能让敌人嗅出老李、老石和市委的其他同志”。

徐远举不知道这个石果躲在哪里，但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只要一天不把他抓住，迟早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

王璞是在由岳池返回广安的途中得到了党内出了叛徒的消息，他当机立断，返回岳池罗渡乡，这才未被守候在他家中的敌人抓住。

王璞和毛泽东同乡。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39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局势恶化。他和妻子贺建修一道转移到衡阳。妻子带着一岁的女儿回韶山老家，王璞则经桂林、贵阳到重庆，夫妻从此永别。

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管帐，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

当时，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结婚后正值严冬，连被子也没有，还是彭咏梧从家里抱去一床薄棉被，才算救了急。

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是由王璞介绍入党的。她没有什么文化，平时也不愿意说话，但为人很热情，对王璞开展工作帮助很大。

左绍英原先住在重庆，拉扯着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绍英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这时候完全顾不上孩子和身怀有孕的妻子。他返回罗渡乡后，经过几天的筹划，立即召集第七、第八工委干部紧急会议，提出提前举行上川东武装起义。

会上也有同志担心，当前尚不具备发动大规模起义的条件，王璞则反复强调，敌人已经动手，如果再不起义，无异于束手待缚。重庆党组织的破坏已经波及到下川东，整个局势急剧恶化，提前起义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力量，还可以扭转被动局面。

王璞一向威信很高，又言之成理，大家的意见很快统一了起来，决定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东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即华蓥山游击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政委，纵队以下以各工委番号为序，建立第三至第八共计六个支队。

这边，华蓥山地区燃起遍地起义烽火，各工委领导的起义队伍纷纷亮出大旗。那边，国民党特务在监狱中对从川东地区抓来的共产党员抓紧进行严刑逼供。

下川东地工委委员杨虞裳被拖上了老虎凳。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知道党的很多机密，但对敌人却守口如瓶。特务一边动刑一边阴险地问他感觉如何，他回答道：“我肉体上虽然吃了一点苦头，精神上却非常愉快。”

特务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劝他投降。他斩钉截铁地吐出四个大字：“有死而已。”

宜昌特别支部书记陶敬之也是因为涂孝文叛变被捕的。重庆市内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时，他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他妻子从重庆连发三封急信要他火速离开宜昌，但他却没有走，他坚持要等到上级通知后再作出决定。当时，他的任务是领导打入地方军阀部队的地下党小组，进行策反工作，他担心自己突然失踪，会暴露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

特务对他用了名为“擦汗”的重刑，所谓“擦汗”，就是用粗糙的劈柴在受刑者背上来回擦动，用不了几下，受刑者背上就会一片血肉模糊。

不管敌人怎样用刑，陶敬之始终只有一句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唐虚谷被押进了刑讯室。他年纪已近四十，皮肤黑黑的，总爱眯缝着眼睛，穿着一身土布衣服，脚上穿着布鞋，一眼看上去，好像一位农村老大爷。其实，他是下川东两岸工委书记，领导着忠县的两个游击队和万县的七南支队，打过好几次大胜仗。

他总爱眯缝着眼睛，那是因为他高度近视。为了反对军阀割据，他早年曾参加过军阀罗泽州所办的团练干部学校，结业后回渠县清溪乡当过团练中队长，这段经历使他具备了最基本的军事知识，为后来从事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

他知道自己视力不好，就长期练习走夜路，走山路，最后练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夜路、山路，也不用电筒，更不用拐棍。

敌人给他用的刑罚是“夹竹筷子”。粗大的竹筷子连在一起，把手指头夹在里边，只要用刑的特务稍稍一使劲，就会疼得你如撕心裂肺一般。

唐虚谷的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怎么样？你说不说实话？”特务一边用刑，一边逼问道。唐虚谷的回话声音不大但却十分坚定：“竹筷子究竟是竹子做成的，但我们的骨头是钢的。”

《红岩》中有个老大哥，这个形象就是根据唐虚谷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小说中的老大哥很有学问，早年曾当过工人夜校的教师，领导过罢工斗争，曾数次被捕又数次逃脱。入狱后被关押在渣滓洞楼七室，他身体很差，咳嗽吐血，常常一口气缓不过来便昏过去了。但正是这个衰弱多病的老大哥，领导着楼七室的对敌斗争，是难友们的核心。他总是默默地在盘算着什么，轻易不說話，一开口便切中要害，发人深思。他是牢房里的主心骨。

实际生活中的唐虚谷也很有文化水平。早在1931年时就曾召集一批年青人讲解《共产党宣言》。后来，他顶替一个阔少爷的名字去上海念书，过着半工半读、半饥半饱的生活。毕业后，他从上海带回四川五大箱革命书籍。

唐虚谷通过顽强的自学读懂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等高深的革命理论书籍。在狱中，他成了难友们的理论教员，讲解政治经济学。

由于唐虚谷的理论、政策水平高，又有领导能力，在狱中大家都很信服他，尊敬地称他为“唐老大哥”。

唐虚谷一直没有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还得益于他的妻子张静芳。张静芳当过小学教员，也当过“老板娘”，是丈夫的好帮手。但与丈夫一起被捕后，她却装成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很好地保守了党的机密，又掩护了唐虚谷。

断了一条腿的李青竹被押进了审讯室。

主持审讯的张界听说过这个女人不好对付，但冉益智一口咬定她是共产党万县的负责人，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她。

为了让李青林承认她的真实身份，张界把涂孝文找来与她对质。

一看见涂孝文那张面孔，李青林就不禁义愤填膺。这个人不久前还是自己的上级领导人，一板正经地给自己布置任务，现在却成了无耻的叛徒。她横眉怒目，逼视着叛徒。

“李青林，你认得他吗？”张界指着涂孝文问。

“认得！”李青林回答得极干脆。

“你们是什么关系？”张界又问。

“我们是仇人，”李青林灵机一动。“多年以前我和他在泸县教小学，他追求我，我拒绝了。他是个下流东西，有一次强迫接吻，我打了他的耳光，因此怀恨在心，现在借你们来报复我。”

“你说，是不是这样！”李青林转过身声色俱厉地质问涂孝文。

涂孝文面红耳赤，低头不语。张界在心中暗骂涂孝文：“这个不中用的家伙！当了叛徒还总是吞吞吐吐的。”这个场面把张界也搞得很难堪，他挥了挥手，来人把李青林带了下去。涂孝文也被带走了。特务恨他叛变得不彻底，也把他关进了监狱。

“监狱之花”呱呱坠地，给牢里带来了光明。难友们把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集中起来，送给左绍英母子。小卓娅总算活下来了。

左绍英被捕了。

这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事件。她的堂兄人倒是不坏，就是爱喝几口酒。一次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行踪。1948年9月9日，特务冲进她堂兄的家中，把她抓走了。

当时，左绍英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已经不方便了。但敌人还是怕她逃跑，将她五花大绑起来，押进合川国民党县政府。

徐远举听说抓住了王璞的妻子，立即指令将她解到重庆。

在二处的刑讯室里，张界假惺惺地对左绍英说：“你看你眼看就要临产了，这可是女人的生死关呀！要是把你关进牢里，那里的条件很不好，就等于是把你送上了死路。我看你也是个聪明人，赶快把你知道的那点事情说出来，我马上就安排你保外分娩。”

“你叫我说什么呢？”左绍英一脸无奈的模样。“王璞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来找我们母子了，下川东那么大的地方，谁知道他能在哪儿？”

“你就是不为自己打算，也不为肚子里的小生命打算吗？”张界威胁道。

“我也知道，在监狱里生孩子很痛苦，但你们就是马上杀了我的头，我也没办法把他交出来呀！”

左绍英衣着简朴，相貌憨厚，像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说出的话也很有道理，张界不由得相信了几分。可是，他还存有一丝希望。

敌人开始给她用刑，两排竹筷子夹住了她的指头。她疼得大喊大叫，但就是不肯说出王璞的下落。

张界察言观色，断定她确实不知道王璞的行踪，就把她关进了渣滓洞看守所女牢房。

其实，左绍英知道怎样能找到王璞，但是她却不知道就在这个月初，王璞已经牺牲了。这个消息也是后来才传到重庆特务们的耳朵里的。

华蓥山武装起义势如烈火燎原，连县参议员、中小学校长、大中學生都加入了起义队伍，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如梦初醒，惊呼“华蓥山区成了四川的盲肠”，不得不亲赴岳池“督剿”。

国民党西南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同样神魂不安，一月之内连发三道金牌：9月5日指派少将高参樊龄出任“剿匪”指挥官；一周后，改派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长彭斌为“华蓥山剿匪指挥部”总指挥，樊龄、杨元森（军统头目、二处副处长），麦征甫（内二警副总队长）、廖禹（省保安二团团团长）为副总指挥；10月初，另派第七编练部中将司令兼108军军长罗广文组成“川东北清剿指挥部”，加强辖区内的“剿匪”行动，限期“剿灭”。

9月初，随第四支队活动的王璞率领队伍从三元寨转移，来到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刚住下不久，就被敌人包围了。天色将晓，王璞正和几个干部一道研究突围步骤和对策，一名游击队员在他身旁擦枪，无意中扣动扳机，枪走火了，击中王璞的下腹部，登时血流如注，当场昏倒。

战士们砍来竹子，做成担架，准备将王璞抬到山下嘉陵江边，雇船偷运去重庆医治。无奈抬出后寨，两次三番都被敌人火力压回。捱至午夜时分，王璞同志终因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

同志们掩面痛哭，把他的遗体暂时安放在寨后的石洞里。

部队冲出去后，敌人占领了木瓜寨，发现了烈士的遗体。他们割下王璞的头，悬在石盘乡一棵槐树上“示众”三天。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槐树下。

左绍英一进到渣滓洞，就快要临产了。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难友中传开了，大家尽最大的可能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做好一切准备。难友们对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亲身体会，就是正常的人也需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能顽强地活下去，不难想象在狱里生儿育女是何等艰难。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手头仅有的一些营养品全都积攒起来，留给孕妇和婴儿吃。

女牢里的难友们更加感到责任重大。孕妇能不能顺利生产？产后母子能

不能平安？产妇能不能尽快复原？婴儿能不能有奶吃？这一系列的难题都像石头一样沉甸甸地压在难友们的心头。

还有一些在今天不可能成为问题的问题，在当时都成了难题。比如草纸，每个月每人只能领到一点，除了解手之外，成年女难友来月经都不够用。生孩子怎么办？婴儿用的草纸怎么办？大家又开始攒起草纸来。

女牢里的难友们有岁数大的，比如李青林、胡其芬，也有岁数小的，比如曾紫霞，但她们都没有结过婚，对于生孩子毫无经验，真是干着急没办法。幸好唐虚谷的妻子张静芳生过两男两女四个孩子，邓惠中也生过三个孩子，大家就一致推举她俩负责照料左绍英。

张静芳跟大家说，孕妇生孩子要喝红糖水，可以补身子。可是大家手里只有一点白糖，这还是少数几位狱外有关系的人的亲属，送到二处熟识的人手里，再由二处开往狱中的汽车捎进来。

于是，大家就集体向特务看守要求，出狱代买一些红糖进来。过了好几天，也不见回音。后来据个别看守私下里说，这件事报告到徐远举那里，他坚决不同意。

“真是禽兽！”

“一点人性都没有！”

这件事情传开后，监狱里一片骂声。

左绍英临产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且看样子还有早产的可能。曾紫霞她们几个年轻女子也帮不上忙，就在一旁商量着给婴儿起个什么名字。核计了老半天，最后才定下来，生下个男孩就叫舒拉，生下个女孩就叫卓娅。

“邓大姐，你看左大姐能生个舒拉，还是能生个卓娅。”曾紫霞调皮地问。

“我看八九不离十是个卓娅。”邓惠中笑呵呵地答道。

还真让邓惠中说对了。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一个女婴哇哇哭叫着坠地了。

还不到天亮，母亲与孩子双双平安的消息就传遍了渣滓洞各牢房。早饭时，女牢门前堆了很多礼物——这是难友们一大早就凑到一起来的。

礼物中，有刚从身上脱下尚带体温的绒衣，从被窝里抽出来的热烘烘的毛毯，洗褪了色的旧衬衣，半新的毛巾、布帽，还有一些红烧肉罐头、半筒奶粉、一小瓶白糖、几十粒鱼肝油丸、一盒半盒筒装草纸……

男牢的叔叔们节衣缩食支援左绍英母子俩，女牢的难友们更是日夜操劳。江竹筠、李青林一针一线地缝制小衣服，邓惠中、张静芳每天换洗婴儿的尿布。其他同志也跟着忙活，女牢里顿时热闹起来。

随着小卓娅的顺利出生，大家的心情也轻松下来，但没过多久，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左绍英虽然很坚强，但情绪没有办法好转，情绪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营养极差，当然奶汁就更少。

母亲没有奶水，小卓娅饿得哇哇直叫，叫得大家直揪心。

大家那一点可怜的物质储备很快就用光了，张邓两位大姐就劝左绍英多喝开水。开水是狱里供应的，数量也有限，全狱难友便自觉地不喝开水，全部节省下来给左绍英母子。女牢里的难友们还把每餐饭菜中可以挤出来的水份和有营养的东西全都自动盛到一个碗里，端到左绍英母子面前。

大家望着左绍英，盼她多吃一些。左绍英望着面前的碗，大滴大滴的眼泪往里落。

“为了革命，现在什么也顾不上了。今后要是能够出去，我一定要教育孩子向敌人复仇。”

小卓娅一天一天长大了。每到放风的时候，难友们都用喜悦的目光瞧着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她给这个黑牢里带来了一线光明啊！

不知是谁在无意之中叫了她一声“监狱之花”，这个名字立即得到了全体难友的公认。是啊，“监狱之花”，多么意味深长的名字啊！像晨风一样清新，像朝霞一样美丽，像银铃一样响亮！在她的身上，寄托着渣滓洞全体难友的多少希望啊！

在《红岩》小说中，“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出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强烈的电闪，忽然照亮了楼口。铐上手铐的人在强光照射下，跨下楼梯，又向前走。在对面一间女牢门边，他突然站住脚，像铁铸的塑像似的矗立在狂风和闪电里，似乎要等待和谁告别。正在这时候，一个头发长长的孕妇，披着带血的长衣衫，突然出现在女牢的风门口。她伸出了双手，隔着铁门，紧紧抓住那个身材瘦长，戴着手铐矗立的人。

……女牢风门边紧握着的双手分开了，远远地分开了。戴着手铐的人，霍地回转身，高举双臂，在震耳的雷鸣中，向所有的牢房昂然呼唤：

“同志们，永别了。解放那天，请代向党和同志们致敬！共产主义万岁！”

按小说所写，“监狱之花”出生后，她的母亲又因难产去世了。她成了孤儿，在难友们的悉心照料下长大。而实际情况是，“监狱之花”在她短暂的生命中，享受了很多母爱。

当时在渣滓洞监狱里出生的婴儿除了卓娅之外，还有一个苏菲娅。她是1949年春节后出生的。当时女牢的牢门被特务封闭，与男牢隔绝开来，因而知道她出生消息的并不多。

苏菲娅的母亲彭灿碧与左绍英不同。她是个高龄产妇，又是第一胎，张静芳和邓惠中都说她很可能难产。

在牢房里生孩子，难产就等于死亡呀！

难友们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死在牢里，还没等彭灿碧临产，就三番两次地找敌人交涉，要求把彭灿碧送到狱外生产。生完了就回来，牢里所有的难友愿意为她担保，可是敌人软硬不吃，无论你说什么也不予理睬。

彭灿碧临产了，而且恰恰是难产。

看着她在痛苦中挣扎，难友们一个个手忙脚乱，连邓惠中和张静芳也没了主意。

那一夜，女牢里的十几个难友没有一个合了一下眼。她们实在没有办法，只有哭泣。守在彭灿碧身边的难友哭的声音小一点，守在床边不敢入睡的也在哭泣，一时还分不着任务，已经进了被窝的哭声比谁都大，哭得比谁都伤心。彭灿碧已经顾不上哭泣，已经忘了伤心，她疼得快昏过去了。

经过两天一夜的折腾，彭灿碧居然把孩子生下来了。母子都活着，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女牢里的人全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彭灿碧生的也是一个女孩，大家又给她起了一个俄罗斯女英雄的名字——苏菲娅。

这一次大家有了主意，一定要想办法加强彭灿碧的营养，免得像左绍英那样产后缺奶。经过多次交涉，敌人总算答应了代买鸡蛋和糖，也同意由女

难友到厨房里给产妇煮鸡蛋。苏菲娅要比卓娅好一些，她没有缺奶吃。

第五章 狱中追悼会

龙光章久病不愈含恨而死。难友们开展绝食斗争。面对白花花的大米饭，香喷喷的回锅肉，没有人心动。

寒冬季节的歌乐山，一片凄冷景象。刺骨的寒风穿过渣滓洞监狱一扇扇牢门，发出刺耳的怪叫。

这一天是 1948 年 12 月 15 日的深夜。从楼下六室的牢房里，传出一阵阵呼喊声，牢房的门被猛烈地摇晃着，不时被拍打得啪啪直响。

“ 快来人呀！龙光章不行了！ ”

瘦骨嶙峋的龙光章躺在床铺上，虚弱得已经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然而他的嘴唇却在不停地动弹着，一位难友俯下身去，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这才听清楚他是在断断续续地说这样一句话：

“ 给部队首长带个信，我不行了，我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龙光章是四川乐山地区的人，1942 年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当时才 16 岁。他先是驻防合川，后来调去湖北作战。在湖北，他起义参加了新四军。

参加新四军后，他被分配到江汉独立旅 32 团一营三连当号兵。1947 年，他随部队由兴东县到巴东县坪杨乡东，与巴东县保安团遭遇，激战半天，新四军打了胜仗，俘敌 500 余人。休整一周后到四川巫山县红岩子，又与巫山县民团发生遭遇战。龙光章和其他 8 名新四军战士以及两位老百姓在突围中受伤被俘。1948 年 4 月，龙光章等七人被押解到渣滓洞监狱。

龙光章来到监狱里，就不停地拉肚子。他的这个病根是在押解途中种下的，一路上总是吃不饱，又总喝生水、脏水，结果患上了痢疾。进到渣滓洞监狱后，虽然有饭吃，但饮食粗劣，虽然有狱医，但那个名叫刘石仁的中校医官医术并不高明，而且狱里缺医少药，结果使得他的病越来越严重，最后转成了黄肿病。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特务看守们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难友们就是喊破了喉咙，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龙光章就这样含恨死去了。

在《红岩》小说中，也有一个新四军战士病死在渣滓洞牢房里，他的名字叫龙光华，龙光华的原型人物就是龙光章。

不过，小说中的龙光华不是病死的，而是因为保卫水源遭到特务的毒打而高烧至死，他在昏迷不醒的时候也说着时轻时重，时断时续的吃语。

“ 班长！……部队……来了！ ” 龙光华猛然伸出激动的双手，站起来，奋身迎向前去：“ 指导员，指导员！ ” 他像看见了自己的亲人，扑了上去。“ 指导员……给我……一支枪！ ”

狱灯闪动了一下，龙光华一动也不动地紧抓住牢门，他的头向上昂着，一只手伸向前方，像要抓住他渴望的武器……

余新江赶过去，伸手去搀扶时，龙光华纹丝不动。一只手紧抓住牢门，一只手伸向前面，口微微张开，像没有喊完心里要说的话，一双永不瞑目的眼睛，凝望着远方一汪热泪，从余新江的眼眶里簌簌滚下。

“ 龙光华，牺牲了！ ”

龙光章被折磨致死的消息通过狱里的秘密联络通道迅速在难友中传开了，大家的心精不仅十分悲痛，而且无比气愤。

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即《红岩》中的猫头鹰，此人由于心狠手毒，当时难友们给他起的真实绰号就是猫头鹰）指挥几个特务看守冲向楼六室。

“死了个把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赶快抬出去埋了！”

回答猫头鹰的却是一片怒吼：

“不讲清楚，不许抬走！”

狱中的难友经过紧急商量，决定利用这件事展开一次大规模的斗争，改善狱中的待遇。

代表很快被推选出来了，他们是肖中鼎、何雪松等同志（小说中是余新江和刘思扬）。

在渣滓洞看守所李磊（即《红岩》中的那个身体肥硕，绰号猩猩的家伙）的办公室里，谈判代表提出了四项条件：

- 一、为龙光章开追悼会，设灵位，会后集体送葬；
- 二、白布裹尸，备棺盛殓；
- 三、改善生活条件，不许虐待政治犯；
- 四、今后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

李磊听完上述条件，装出沉痛的样子说：“死人固然不幸，不过，这事情有上面管。我也很难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只是龙光章身体本来就不好，请大家体谅所方困难……”

代表们一下子火了，单刀直入问他：“四个条件，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李磊翻了脸，变得强硬地站起来威胁说：“你们想聚众要挟吗？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放明白点，跟我提什么条件！”

说完，他一转身就走了。

当晚，难友们故意在狱中又吵又叫，闹得特务一宿不安。

第二天早起，难友们又要求进行了第二次谈判。李磊对其他条件都答应了，唯独不同意开追悼会，并说：“没有这个先例。”

谈判破裂了。难友们决定使用最后的武器，开展集体绝食。

中午，特务看守出人意料地送来了狱中少见的白米饭、回锅肉。

小说《红岩》对这个场面是这样描写的：

中断了几天的送饭哨音，忽然在耳边响了。余新江把头向地坝那边一转，看见猫头鹰正带着一群特务，走进地坝。

几十个饭桶整齐地摆在院坝正中。里面盛着的，不是污黑发臭的霉米饭，变成了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一大桶油浸浸的回锅肉，分成了几十份，搁在每一个板桶上。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来说，白米饭、回锅饭似乎并无多大的诱惑力，但对于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难友们来说，一见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实在是一个很强烈的生理刺激。

曾紫霞在解放后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极为真实的描述：

说一下吃吧！当人们已经起床很久、很久，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老高的时候，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可渣滓洞里送早饭的（准确些是上午饭）还没有进到院子里来。每间牢房门口都有人在探望、守候，无数双眼睛眼巴巴地望着进院坝的小门那边，看着有没有人挑着饭桶进门的影子。无数双耳朵尖起在听小门那边是否响起了开门的吱呀声音。一小时、两小时地，一分钟、一分钟地捱！没有坐过牢的人怎能体会到那饥饿使人头昏眼花、心头发慌、

四肢无力、阵阵虚汗的味道？！“饿牢”二字有多么丰富的内涵！虽然送来的饭菜是那么粗劣，几乎与猪狗之食一般，可饿牢的人顾不得挑选，就这样的饭还不能吃饱呵，只能比不吃强点。

通过曾紫霞的切身感受，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当时的环境里坚持绝食，需要多么坚定的意志。

难友们也想吃白米饭、回锅肉，但为了争取集体斗争的胜利，谁也不去正眼看它一眼。

饭凉了，菜也不再冒热气了。它们被原封不动地抬走了。

李磊没有想到难友们的决心这么大，有些着急了，一会儿去找一些身体差的个别谈话：“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是不行的，你们身体差，更要注意啊。”一会儿又叫来一些非党群众，装作关心地说：“你们案子不重，不要跟着起哄，否则自己吃亏。”他这些话，得到的只有白眼，没有人动摇。分化瓦解，欺骗拉拢全没有用。李磊慌神了，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乱子？他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他此时的心情正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

僵持下去，说不定，就在明天，也许后天，早晨开门放风的时候就会发现，已经躺着几十具，甚至几百具僵直的尸体。

被迫接受条件？这是中美合作所前所未有的事。

可是，听任几百个人质集体自杀，将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

如果将来清查起来，岂止是“玩忽职守”的一般罪名而已？到那时，不仅是自己，就是上司徐鹏飞和整个西南特区，也难免不受严重的处分。要是特别顾问一旦震怒起来，那……

前两天，他担心政治犯的反抗情绪终会爆发成为可怕的暴动。他日夜加强警戒，严密地防范着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可是现在，他发现监狱里还有比暴动更难对付的事件。如果是暴动，他还有权命令开枪，可是现在连开枪也没有用。权衡轻重，也许，赶快接受条件倒是一条出路。李磊找来猫头鹰，对他说：“算了，就让他们开追悼会吧！”龙光章遭受的种种磨难使很多难友落下了热泪。难友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正对牢房的山坡上，为的是每天都能看到他。

狱中追悼会开始了。

这是监狱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追悼会。

高墙上、岗楼里的敌人紧张地架起了机枪，各个岗哨也增加了看守特务。楼六室的牢门打开了，龙光章的战友们抬着战友的遗体，缓缓地走了出来。龙光章僵直的遗体上，穿着一件已经破旧不堪的军装。

在他们的后面，打出来一幅墨迹未干的挽联：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永不还家紧接着，难友们抬着早就准备好的花圈，从牢房里缓缓来到放风坝，这花圈是用放风时从墙角采集到的“鱼鳅蒜”小白花和青草扎成的。没有青纱，一位难友撕开了自己的一件青布长袍。女同志头上戴着白布，还有人戴着用白鞋带制作的白花。

院坝正中的祭桌上铺着白布，摆着“龙光章烈士之灵”的灵牌，还放着简单的祭品。祭桌两边摆放着各室难友送的花圈和挽联。挽联是用一小方一小方草纸联结起来的，迎着风哗啦哗啦直响，仿佛奏响了愤怒的哀乐。

狭窄的地坝，变成了悼念战友的庄严会场。

几百个战友，整齐地排列在警戒重重的地坝上。几百颗期待战斗和复仇

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监狱之花”抱在曾紫霞怀里。两只大大的、泪汪汪的婴儿透亮的眼睛，望着天空直转动，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疼爱着她、抚育着她的长辈的面孔。

追悼会由龙光章的难友夏金儒主祭。悼词简短而沉痛，一下子使得本来就伤感的难友们更加伤感起来，好几个难友泣不成声，地坝里一片唏嘘声。

龙光章被俘后，和战友们被解往巫山。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大雪纷飞，他们的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看守动不动就是皮鞭抽，皮鞋踢。还没到宜昌，就死了两个人。

到了巫山，他们被押进巫山县法院的一间小黑屋子里，每个人都戴着手铐脚镣，每天只给一个饭团子，刚够饿不死的。

年仅22岁的龙光章本来就有病，这么一折腾身体更坏了，但是他并没有向敌人屈服，也从不喊一声苦。他还鼓励战友们说：“总有一天国民党会垮台的，他们杀不绝天下的穷人。”

在巫山县关了两个多月，他们又被押往万县。敌人把他们每两人编成一组，合戴一副手铐，脖子上合锁一根链子，途中又拖死两人。

在万县监狱里，他们住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龙光章等人带头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暴动，使100多名难友安全逃脱。龙光章等新四军战士主动担任断后掩护工作，就在他们眼看就要冲出牢门的时候，敌人发觉了，用机枪封锁住了牢门，他们被阻在里面，又被逮捕，遭到残酷毒打。龙光章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病倒的。

1948年4月，龙光章一行七人从万县转押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上岸后，特务们把他们装进麻袋，先是送到二处，三天后又押进渣滓洞。

小卓娅突然哭叫起来。这一声声婴儿的啼哭，冲破了这里沉重压抑的气氛。复仇的怒火在难友们的心头燃烧。

追悼会快结束时，垂头丧气的李磊迫不得已地对着灵牌三鞠躬，讲了几句官样文章的话。

追悼会后，龙光章烈士的遗体裹上白布装入棺木，由几位难友抬了出去，安葬在渣滓洞外面正对牢房向阳的山坡上，这个位置也是难友们选定的，为的是大家每天都能够看到他。

不要眼泪，不要人们的慰藉。

记着呵——

中国人民还活着，这册血写的帐簿，将是一块历史的丰碑！

死，是永生。

死，并不是战斗之火的熄灭。

让他永不泯灭的忠魂，在青翠的歌乐山巅，

仰望黎明！

这首悼念诗是当时一位名叫艾文宣的难友写的。他是一名共产党员。1939年赴重庆，在《新华日报》工作。1945年受组织委派回乡，以乡长和教员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48年8月，参加岳武起义，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庭财物。起义失败后被逮捕，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后来在“11·27”大屠杀中牺牲。

楼六室中寂静无声。

追悼会开过了，战友的后事也料理完了，但难友们的心情却还是平静不

下来。望着龙光章躺过的床铺如今变得空荡荡的，刚刚止住的热泪又涌流出来……

那是刚关进渣滓洞的时候，敌人怕他们与其他难友发生联系，采取隔离方法。每次放风的时候，他们都是单独进行，和别的难友根本见不到面。

那一段时间，大家的心情苦闷极了。龙光章的心情和大家一样，但他没有坐着等待，而是沿着囚室的墙壁摸索。他用手抠掉墙上斑驳的泥灰，找到较宽的砖缝，用手指头不断地敲打着。他希望这声音能传过去，引起隔壁难友们的注意。

自从他们几个进狱之后，其他难友也很想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总是找不到机会。当龙光章的敲打声传过来时，他们立刻高兴起来。这声音说明对方非常想和其他难友取得联系。而怀有这种心情的人显然不是一般的囚犯。

对于这种敲打声，渣滓洞的难友们全都很熟悉，而且知道不同的敲打声代表不同的含义。这个办法是一个叫余祖胜的难友发明出来的，被大家称为“土电话”。

余祖胜是《红岩》中余新江的原型人物。余祖胜是兵工厂的一名工人，后来，因为反抗工头的殴打而被开除。1948年8月，他接受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建业布置的任务，第二次进兵工厂当了临时工。当时许建业布置给他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积极谨慎地为党发展组织；二是调查厂情，尽可能从各方面阻挠军火生产。

为了完成任务，祖胜决心当好“临时工”。工人搬家、生病，他主动去帮忙，工人也很关心他，彼此之间感情非常融洽深厚。在临时工这个战斗岗位上，他站稳了脚跟，为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许建业被捕后，特务搜查许建业的住处，从箱子中搜出余祖胜的自传和一份工作报告，因此他被捕入狱。

重庆解放后，据脱险志士罗广斌等同志介绍，余祖胜在狱中很英勇，受过老虎凳、鸭儿浮水等酷刑，一个字也未吐。

余祖胜心灵手巧，被称为狱中“工艺家”。一根小铁钉到了他手里，三磨两磨就成了一件锋利的工具。就是靠着这种工具，住在六室左右两边以及上边的难友们一齐动手，在墙上和地上打出了小孔。通过这些小孔，龙光章他们几个新四军战士与其他难友们建立起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很快，他们身上破破烂烂的衣服被女牢的难友们取走了，缝补得整整齐齐地送了回来，实在不能缝补的就改为他用。

战友们还不会忘记，龙光章虽然有病在身，但对敌人斗争却非常机智勇敢。有一次，难友们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张报纸残片，上面有一些有关时局的消息，大家便秘密地传看起来。

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消息被敌人知道了，半夜时分特务们突然大举出动，进行突击搜查。

当时，这张报纸残片正好传到楼六室夏金儒手里，他一看情形不对，急忙把它递给正坐在马桶上拉肚子的龙光章，想让他把报纸残片塞进马桶里。龙光章觉得这样做也不保险，就一口把它吞下去。结果敌人什么也没查到。

还有一次，看守长徐贵林组织突击搜查，刚好看见龙光章把一张纸片放进嘴里。徐贵林大声命令他吐出来，龙光章哪里肯听。徐贵林揪住他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子，登时他嘴里鲜血直流，但他硬是坚持着把纸片吞进肚里，让敌人无可奈何。

在《红岩》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为了破获狱中党组织，特务郑克昌化名高邦晋，打扮成一个受重刑的政治犯的模样，关进了楼七室，和他一起抓进来的几个学生受了他的蒙蔽，而余新江、丁长发却对他产生了怀疑。他们巧妙地设下一个圈套，使他暴露了丑恶嘴脸。

实际上，这段故事不是发生在楼七室，而是楼六室。与伪装特务作斗争的也是龙光章和他的战友们。

敌人怀疑楼六室的人与狱中党组织有联系，就派了一个特务伪装成犯人住进来。他自称姓汪，被捕之前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起初，大家对他还不错，但过了不久，他就露出了马脚。龙光章和战友们暗地里一商量，就开始故意找碴儿折腾他。晚上不让他睡觉，罚他的站，还找理由罚他把马桶挂在脖子上。

没几天，他就忍受不下去了，灰溜溜地走了。争水斗争的勇士不是龙光章，而是陶敬之。狱医刘石仁偷偷地为难友们做了不少好事。

1949年盛夏，酷热难当，干渴的滋味决不比饥饿更好受。

就在这最需要饮水的时候，整个渣滓洞监狱牢房里却连一滴水也找不到了。

火辣辣的阳光，逼射在签子门边。窄小的牢房，像蒸笼一样，汗气熏蒸得人们换不过气来。连一丝丝风也没有，热烘烘的囚窗里，偶尔透出几声抑制着的呻吟和喘息。

……

太阳渐渐偏西了，可是斜射的烈焰给闷热的牢房带来了更燥辣的，焦的皮肉的感觉。喉头似火烧，连唾液也没有了，这使他更感到一阵阵难忍的痛苦。

奈新江半昏半醒地仰卧在楼板上。他的双手又把衬衫撕开了，胸脯上露出正在化脓的刑伤，那是炽热的烙铁，烫在皮肉上留下的乌黑焦烂的伤斑。他张着焦裂的大口，一次次吐出一个单纯的字：

“水……水！”

《红岩》中的这一段描写、正是当时真实情景的写照。

这次缺水是李磊和徐贵林搞的鬼，虽然当时久旱不雨，但歌乐山中不乏水源。他们不是找不到，而且根本不去找，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报复狱中的难友，企图使其低头屈服，不敢再搞什么绝食抗议。

天气越来越热，牢房里还是一滴水也找不到。一位名叫吴学正的难友因为干渴而病死了。

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很多难友利用放风的时间，出去寻找水源。

在男牢后面有一块土地比较潮湿，地面覆盖着一层青苔。雨后，渍起了一潭潭浅浅的泥水，浮着一层肮脏薄膜的水面上不断鼓着水泡，子孓和沙虫很快也长满了。从那里挖下去，下面很可能找到山泉。

放风的时间一到，难友们就轮流到那里去挖坑。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挖。水坑在一点一点变深、变大。

在小说中，这个水坑终于挖出水来，一池清水映着碧天，闪动着微微的涟漪。

龙光华拎着水罐跑来了，舀起一罐水就跑。他接连跑了好几趟。他这是给处在干渴中的难友们送水。

特务们发现了，把他带进了办公室。只有几分钟的工夫，就打得他满身是血，嘴里也往外流血。正是因为这次毒打，他才发高烧致死。

实际上，龙光章已经在半年前病死了，他不可能参加挖坑找水。但是挖坑找水却是确有其事，也有人因此而遭到毒打。与小说中的记叙不同的是，这个水坑没有挖成，水也没有找到，而特务是当着众人的面毒打挖坑找水的同志。

那一天，在宜昌被捕的陶敬之和另一个同志在男牢房后面挖水坑，不巧被特务发现了。

几个特务气势汹汹地扑过来，给他俩戴上三十斤重的大镣，拉到烈日底下曝晒。这还不算，特务还用木板打他俩的手心，手心打肿了，又往他俩身上乱打。

“快说，还有谁挖过水坑？”

“说了就放你们，不说就让你俩死在这里！”

面对着敌人恶狠狠的逼问，陶敬之和那个同志始终一个字也不说。

烈日的炙烤，镣铐加身的折磨，再加上毒打，很快就使身体本来就不大好的陶敬之和那个同志支持不下去了，眼看着就要昏死过去。

拥挤在签子门前的各牢房的难友们，看到陶敬之他俩为大家遭到迫害，忍无可忍，一齐用拳头捶打着牢门，高声抗议。整个渣滓洞顿时像炸了锅，特务高举着打人的木板也不敢往下落。

成善谋也站在牢门口焦急地大声吼叫，忽然，他一眼看见狱医刘石仁走过来，立刻向他使了个眼色。

刘石仁会意了，凑了过去。

“你快去告诉徐贵林，就说这两个人身体很差，时间长了会出事情的。”成善谋压低声音说道。

刘石仁点了点头，快步离开了。

不大一会儿，特务把已经是奄奄一息的陶敬之和那个同志放回了牢房。显然是刘石仁的话起了作用。

刘石仁是1948年三四月间来到渣滓洞监狱的。因为他是医生，毕竟还有一些人道主义精神，看到这里的难友们的身体状况极差，二十多岁的人竟然满头白发，还有很多患有严重的慢性病，不免生出恻隐之心。

难友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主动接近他，争取他的同情。后来又托他往狱外捎信。几次信都捎到了，而且从未出过事情。胡其芬给姐姐胡庆芬写过多封信，都是由他带出去的。被捕前担任重庆安生公司经理，负责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并担任联络工作的何柏梁，在大屠杀开始前六天11月21日还从狱中带出一封信，就是刘石仁的功劳。

何柏梁也很注意争取这位中校医官。当时，他刚刚结婚，妻子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何柏梁就委托狱外的同志帮他妻子安排工作。

刘石仁除了在狱内外传递消息外，他做的另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利用他医官的工作之便，把带入狱的药品如维生素、鱼肝油等全部发给了病人，对医治难友疾病起了作用。他做的比较多的工作是他利用其职权，为难友开过一些应出狱就医或出狱生产的证明，对有的难友の出狱起了辅助作用。

因为刘石仁为难友们作过一些事，解放后脱险的难友向组织上做了反映，他被安排在西南农学院任校医，直到1981年病逝。

在写到找水斗争时，小说《红岩》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使许云峰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女战友，边挖，还低声唱着一首歌。娓娓的低音，激昂悲壮的感情，在他心里引起了深深的共鸣，使他清楚地记住了那充满战斗激情的歌词：……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

我们要把颠倒的乾坤扭转，我们要把不合理的世界打翻！

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个挖坑的女战士显然就是李青林。不过，自从1949年春节之后，特务就把女牢的牢门封死了，而在后墙另开一扇新牢门，女难友再也不能到渣滓洞的院坝里，只能在新门外一块只有几平方米大小的地方活动。因此，李青林不可能去男牢房后边挖坑找水。

但是她唱的那首歌确实在当时的狱中十分有名，几乎人人会唱。这首歌的歌词在《红岩》中反复出现过三次，但都只是截取了它的下半段。我们现在把它上半段补出来：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这是混乱的日子，黑夜被人硬当作白天，在人们的头上，狂舞的人享福了。

在深沉的夜里，他们飞旋于红灯绿酒之间。

呼天的人是有罪的，据说，天是不应该被人呼喊，而它的位置却是在他们脚底下面，牢狱果真是为善良的人们而设的吗？

为什么大家的幸福被少数人强夺霸占？

这首歌的歌词作者名叫何敬平，是《挺进报》被破坏后受牵连被捕的。被捕前他在重庆电力公司工作，是重庆电力公司党支部的组织委员。

他被捕后先被关押在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不久后被解送二处，遭到特务的吊打，因拒不招供而被移押渣滓洞囚禁。

1948年秋，解放战争已面临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难友们既盼望早日胜利，又提防敌人狗急跳墙下毒手，每个人的思想斗争都很复杂。就在这个时候，何敬平写出了他那不朽的诗篇《把牢底坐穿》。

当时，他一有空儿，就独自坐在床上，边思考边写。过了几天，他从床上跳下来，手上拿着一小方草纸，上面写满字迹工整、竖排的小楷诗稿——《把牢底坐穿》。给同室难友看过，他又修改重抄一遍，才传到楼一室，由另一位难友谱成曲。于是，这支歌就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难友们中间唱开了。

第六章 百炼千锤

陈然刑伤稍好，就戴着脚镣在牢房里跳舞、唱歌，乐观昂扬的精神感染了每一位难友。陈然等人被移押白公馆。

一辆汽车马达的轰鸣声由远至近，在静谧的山中显得分外刺耳。

“会不会又有同志被捕了？”渣滓洞监狱里的难友们都在心里这样嘀咕着。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从铁门外边走进来几个特务看守。他们并没有押什么人进来。

“陈然，出来！把你的东西全收拾好带上。”徐贵林隔着牢门恶声恶气地吼了一声。

“让陈然到哪里去？”有位难友试探着问道。

“转移白公馆。”

陈然从容不迫地把随身带的东西整理好，又与同牢的难友一一握手告别。他不知道特务说的是不是真话。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陈然在渣滓洞住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给难友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刚进来时，十天之内被提审三次，三次都受了重刑。他的双腿伤得很重，但敌人还是给他上了镣铐。陈然却满不在乎，腿伤稍好一点时，就在牢房里唱歌、跳舞，铁镣拖在地上哗啦啦直响。

1938年时，陈然在宜昌参加了“抗战剧团”。他是剧团中的歌手，也担任报幕、伴唱，还干些杂活。可想而知，他的嗓子是很好的，唱起歌来很动听。

陈然会的歌很多，其中大部分是苏联歌曲，如《卡秋莎》等，还有俄罗斯民歌，如《感受不自由的莫大痛苦》。陈然告诉大家，这首民歌列宁特别爱唱。

唱完了歌，就与难友们聊天，他总是神色自若，谈笑风生，仿佛根本不曾受过伤。

陈然的昂扬乐观的战斗精神感染了同狱的每一位难友。

一次放风时，一位难友和陈然聊起来。陈然告诉他解放军已向大西南进军，应该耐心地等待胜利的到来。那位难友说：“我又不是共产党员，感到坐牢很冤枉。”

陈然说：“冤枉？冤枉多着咧！抗战时四个迷路的学生被抓进来关到现在，你说冤不冤？”

难友看到陈然身上一道道伤痕，关切地询问：“前天提审你又受刑了吧？”

陈然淡淡地回答：“受了。”

难友好奇地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陈然反问：“你看像不像？”

难友肯定地说：“像！”

他俩对视一眼，会意地笑了。

在《红岩》小说中，陈然的这些事迹有很多都被移植到许云峰身上。比

如，许云峰受重刑被用担架抬进牢后，过了几天，刑伤刚好一些，就拖着脚镣在牢里走动。

黎明的阳光，在期待中，渐渐露出来。“当——啷，当——啷——”音节明朗的响声，在晨曦中，忽然从风门口传了进来。“当——啷，当——啷！”这声音出现在渣滓洞最宁静的早晨，这声音使楼七室的人都坐了起来，肃静聆听，这声音好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在弹奏着一支战斗进行曲！

有节奏的声响，是从囚禁重伤者的楼八室传出的。

清晨里惯常的宁静消失了，虽然室内悄然无声，可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激情。谁也想象不到，隔壁新来的战友，竟有这样超人的顽强意志，被担架抬进牢房时，已经是奄奄一息，才过了短短的几天，谁能想到他竟挺身站起，哪怕拖着满身刑具，哪怕即将到临的更惨酷的摧残，哪怕那沉重的铁镣钢锯似的磨锯着皮开肉绽沾满脓血的踝骨，那充溢着胜利信心的脚步，正是对敌人的极度轻蔑，迎着初升的红日，从容不迫地在魔窟中顽强地散步。他用硬朗的脚步声，铁镣碰响的当啷声，向每间牢房致意，慰借着战友们的关切；并且用钢铁的音节磨砺着他自己的，每一个人的顽强斗争的意志。

声音愈来愈响亮，愈来愈有力。“当——啷！，当——啷！”铁的链环，重甸甸地敲击在粗糙的楼板上。随着那刚强的脚步移动，不断碰撞出战鼓般的鸣响。在铁链的叮当声中，还传出了许云峰昂扬激越的歌声，这歌声好像远征归来的壮士，用胜利的微笑，朗声欢呼战友亲切的名字。

从以上描写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当年陈然英勇豪迈的风采。

这一次敌人没有说谎，陈然果真被移押白公馆，他是被当作重犯关到这里的。

与陈然先后从渣滓洞移押白公馆的还有罗广斌、李文祥等人。

罗广斌就是《红岩》的第一作者，当时在川西地下党内工作，是被刘国定出卖的。

罗广斌和重庆第七编练司令罗广文是同父异母兄弟。这个罗广文于1946年夏天率部前往华蓥山一带镇压农民起义，杀人如麻，人称“罗屠户”，当地的小孩儿一听到罗广文三个字就不敢哭了。

徐远举在没有下令逮捕罗广斌之前，曾把罗广文专门找到二处，拿出逮捕令给他看了。罗广文不但没加阻拦，反而说他兄弟由于父母溺爱，非常调皮，应该有人管教一下。罗广文还告诉徐远举，罗广斌现在就住在成都家中，具体地址是少城某街。按照罗广文的指点，果然特务在成都罗家中把罗广斌抓住了。

他本来被关在渣滓洞，因为在难友中传递纸条被发现，这才转移到白公馆。

李文祥是地下党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当时他结婚不长时间，结果夫妻双双都被抓进监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表现得很英勇。这次是被当作“共党要犯”转移到白公馆的。

刘国钰挂念着关在渣滓洞里的未婚妻，他用歌声唱出自己的心声。曾紫霞用全部心血绣了个枕套，却不知交没交到刘国钰手中，这成了她的终生遗憾。

来到白公馆，陈然、罗广斌、李文祥都被关进楼上一室。在这里，陈然见到了早被关押在这儿的刘国钰、王朴。

战友相见，好像见了亲人，几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刘国铨和陈然都爱唱歌。这一下子囚室里可热闹起来，整天歌声不断。

刘国铨特别爱唱的一首歌是高尔基作词的《囚徒》：

太阳出来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

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却逃不出牢监，我虽然生来喜欢自由——

挣不断千斤锁链！刘国铨还会唱很多古典名歌，其中有一首是歌德作词、舒伯特作曲的《魔王》：

在夜半风中，骑马飞奔，是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

他把那孩子抱在怀里，紧紧地抱着，使他温暖。

“儿子，为何这样惊惶骇怕？”

“啊，父亲你可看见魔王？”唱完了这首歌，刘国铨又和陈然探讨起歌词的哲学含义来。王朴、李文祥听他们谈得那么有趣，也被吸引了过来。谈了一阵，刘国铨站起身来，走到牢门边，向远处凝望着，嘴里还在小声地哼着《魔王》的最后几句歌词：

父亲在发抖，他加鞭狂奔，把喘息的儿子紧抱在怀里。

惊慌疲倦，回到家里，怀里的孩子已经死去！陈然见他陷入了沉思，没有上去打扰他。陈然能够猜得出来，他是在想念关在渣滓洞里的未婚妻曾紫霞。

自从刘国铨被从渣滓洞押走之后，曾紫霞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这一天，李磊来到女牢。面带微笑，神态端庄，故意作出文质彬彬的样子。他同这个女难友寒暄两句，又向另一位女难友询问几句，好像很关怀的样子。

女难友们心中嘀咕着：“这家伙今天不知又要耍什么花样，搞点啥名堂。”

李磊先自我表白道：“我是最了解女人、也最同情女人的。”然后他转向着罗娟华、左绍英说：“像你们，整天在屋里做家务，哪里知道男人在外边都干了些什么，可如今要你们为他坐牢，真不值呀！”

罗娟华顺着他的话头说：“就是呀！我那男人经常不回家，他在外边犯了啥子法我咋个晓得呀？把我抓起来也真叫活天冤枉，我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要我都晓得了时，你们也早把他抓到了。”

左绍英附合道：“真是，抓不到男的尽抓些女的干啥？”

李磊把脸孔转向曾紫霞：“俗话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你一片真心还在这里坐牢，刘国铨已出狱了。我亲眼看见他在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公子少爷有钱有势的哪个不是三房四妾呵！自古道：红颜薄命，红颜能有几时？你还不想出去都成了老太婆了，难道他还在外边等你？”

曾紫霞白了他一眼：“既然刘国铨都放了，为什么还把我关起来不放？”

李磊假惺惺地说：“我还是很关心你们的，这不是来关心你们吗？”

“既然所长关心就把我们放了嘛！”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

“你们这些女人家一起吼什么？我看你们最好自爱一些，检点一些。”

李磊的话音刚落，女难友们就把他围在当中数落开了。

“所长，你的话说过头了！”

“所长，你不是常说要讲理不要骂人吗！”

“所长，这种话可不像你说的！”

李磊被几个女人如此冷嘲热讽脸色气得发青，可他又毕竟不是初出茅庐

的后生，还必须维持“君子”风度，于是他迸发出比平时高八度的嗓音：“男不与女斗！……好男不与女斗！”边喊边跨出女牢牢门。

李磊前脚刚走，女牢里调皮的难友就在后边学着李磊的腔调，摹仿着李磊的姿态表演开来。这一下可不得了，有的难友笑得直捂肚子，有的笑出了眼泪。

女牢里发出的阵阵大笑传到男牢，男牢风门口便有人伸出头望着女牢问：“什么事？”

这一问又使女牢爆发出一阵大笑。

男难友也想笑一笑：“快传点消息来吧！”

大家都在开怀大笑，唯有平日里热情活泼的曾紫霞愁眉苦脸地坐在一边。她相信李磊说的是假话，但是刘国铄毕竟是豪门子弟，难友们能相信他这种人会坚持到底吗？她从一些难友的表情上，已经看出她们对李磊的话有了几分相信。

李青林一拐一拐地走过来，坐在曾紫霞身边，她看出了曾紫霞的心思：

“紫霞妹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相信敌人，还是相信自己的同志？”

“当然是相信自己的同志。”曾紫霞不知道李青林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刘国铄是不是自己的同志？而且你比所有人都更了解他，怎么能因为一两句谣言就怀疑起自己的心上人了呢？”李青林见曾紫霞没有回话，又接着说下去：“现在如果有人说刘国铄爱上别人了，你相信吗？”

曾紫霞难为情地摇了摇头。

“我的傻妹子哟！”李青林轻轻地抚摸着曾紫霞的头发。“你要像相信他对你的爱情一样，相信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

李青林把这最后几句话故意说的很响亮，她是想让全牢的难友们都听得见。

曾紫霞明白她的好意，心里非常感激。

不久，刘国铄又一次从白公馆被押到渣滓洞审讯，李磊的谣言不攻自破，曾紫霞那颗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她真不敢想象，要是自己的心上人叛变了，自己还有什么脸面见人。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这样一个消息：刘国铄想在敌人的办公室里与曾紫霞见一面，但敌人用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她见面的希望。

李青林也知道这件事，她考虑了很久，向曾紫霞提出让她绣个枕套给刘国铄，用以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套去却是可能的。

曾紫霞感到李青林的建议不可能实现，第一没有布，第二她根本不会绣。但李青林亲自筹划，亲自手把手地教她将它绣出来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枕套呢？是用曾紫霞的一条长裤改的，按李青林的设计，把裤子的那条缝放在枕套的三分之一处，接缝处抽几股纱锁成胡椒眼花，使接缝显不出来。她设计的花样是：一面用红线绣两颗红心，一支箭穿着两颗心，象征曾紫霞和刘国铄的两颗心是爱神之箭穿着的；另一面用蓝线（没有绿线）绣一棵挺拔的松树，盼他像青松一样坚强。

在李青林精心设计绣成的这个枕套中，不也寄寓了她对自己和邵子南那美好爱情的怀念吗？

枕套绣好了，曾紫霞把它交给看守黄茂才，托他设法转给刘国铄。

黄茂才是1948年4月到渣滓洞的。当女难友向他诉说冤枉，没有换洗衣

物，家中人不知下落时，他表现出了同情，并同意为她们送消息出狱。开始大家是试探性的，无论邮寄或送出去的信都是很普通的事，如要点衣物或告知父母亲属被捕消息之类，收信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不是党员或进步人士。

试探成功了，送出的信都有了回音或反应。

李青林首先了解到黄茂才的一些情况，得知他家住在农村，出身贫苦，刚从成都绥靖公署调来不久，不是老牌特务。李青林和江竹筠、胡其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他有被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就让大家经常找机会接近他。

刚开始，大家给他讲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告诉他狱里有许多人家有钱还为穷人闹革命，责问他家里没有钱为什么要去为别人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一番话说得黄茂才低头不语。看得出来，他真的动心了。

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黄茂才也看出来国民党早晚会垮台，就对难友们更关心了，除了给大家狱内外传递消息和东西，还把外边的报纸偷偷送进狱里。

曾紫霞把枕套交给黄茂才后，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交到刘国钰手里。过了几天，黄茂才偷偷告诉曾紫霞，他已把这件事办妥了。曾紫霞听了，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

解放后，曾紫霞见到了曾与刘国钰同牢生活过的罗广斌，请他回忆是否见过刘国钰用过这样一个枕套。

罗广斌能清楚地说出曾紫霞出狱后送进白公馆的所有东西，记得那上面全是她写的刘国钰的名字，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刘国钰有过这么一个枕套。

这用心血绣的枕套传到哪里去了呢？曾紫霞有说不出的遗憾！

白公馆里有一个受到特殊待遇的小孩，他就是小萝卜头。每天他都来到老师黄显声将军的牢房里，学习文化知识。

陈然来到白公馆的第二天上午，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受到特殊待遇的孩子。每天上午，都有一个特务把他带到楼一室隔壁的牢房里。

刘国钰告诉陈然，隔壁住着一位名叫黄显声（即《红岩》中的黄以声）的将军。到他牢房中去的那个孩子叫宋振中，大家都叫他小萝卜头。黄将军是小萝卜头的老师，每天都教他读书识字。

在《红岩》小说中，黄将军只是一个配角，因而对他的描写并不多：

住在成岗和刘思扬隔壁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黄以声，身材魁伟，是国民党东北军的军长，特务称他“黄先生”，生活受优待，很少和人讲话，成天靠着栏杆，或者迈着机械的军人步伐，在走廊上走来走去。走到尽头就来一个立正动作，再向后转，再机械地前进。他喂着两只猫，一大一小，散步时，溺爱地把猫抱在怀里，轻轻地叫“乖乖，乖乖”。

历史上的黄显声，却是一位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

“九·一八”事变时，日寇铁蹄长驱直入，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就撤出沈阳城。待正规军退走后，担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黄显声将军，命令自己所辖的12个公安总队和所有的警察部队全部投入对日寇的抵抗。黄显声命令部队“非到不能抵抗时决不放弃驻地”。从18日晚到21日深夜，经过整整三昼夜的激战，沈阳各城门、东关公安总局、公安总队部大门先后被日军坦克冲破，公安军警无法抵抗日军的强大攻势，他们才以

分队为单位撤出。

黄显声与张学良曾是东北讲武堂陆军预备学校的同学，彼此意气相投，既是挚友、至交，又是上下级，情同手足。“西安事变”前，黄显声追随张学良任东北军53军副军长兼119师师长，在东北军中团结友好，作了坚决抗日的准备，组成核心组织。“西安事变”后，他联络进步青年，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漳河战役。后来到武汉多方活动营救张学良，甚至与宋子文当面顶撞。营救未能成功，他又联络流亡内地的东北军积极抗日，准备到延安抗大受训，并且准备组织新东北军。他将从沈阳带出来的100支手枪，10万粒子弹运到延安，支持八路军抗战。1938年正准备于2月6日去延安时，被特务张碧天告密，以“通共反抗中央”的罪名，于2月2日在武汉被捕。

一个爱国军人，家乡沦陷，生灵涂炭，日寇铁蹄长驱直入践踏大半个中国，自己不仅不能驰骋疆场，反倒不明不白地沦为阶下囚，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他从湖北、湖南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一次与难友吟诵古词，念到“报国欲死无战场”一句时，竟号啕大哭。在息烽监狱里，黄显声始终保持了一个爱国军人坦荡正直的高尚情操。他步伐豪迈，嗓音洪亮，经常向难友们宣称：“咱们坐牢，也要虎入笼中威不倒，不能灰心丧志。”黄显声性格刚烈，嫉恶如仇。有一次，他看见军统特务郑星槎欺负别的难友，忍不住怒火中伤，扑上去就挥起拳头狠狠揍了他一顿。还有一次，特务让狱中的难友阅读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黄显声不但一页不看，还把发下来作笔记的本子撕掉当了擦屁股的草纸。

在白公馆监狱里，黄将军收了一个学生，他就是小萝卜头，大名宋振中。

小萝卜头八个月时，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就由妈妈抱着进了监狱。宋振中一天天长大了。他是穿着妈妈为他改过的难友的灰色囚衣长大的，是妈妈用监狱里的霉米烂菜喂大的，是坐在长年不见阳光的囚室里长大的，这样的生活严重地影响了他身体的正常发育——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脖子，瘦小的身子，就像一个“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的爸爸名叫宋绮云，他是一位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1929年，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前往西北军著名将领杨虎城的军部，任《皖南日报》主编，后来出任《西安文化日报》社长。党内职务是中共西北特支委员。在他的领导下，《西安文化日报》办成了一份进步报纸。“西安事变”发生后，这家报纸及时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印发了许多宣传品。他还想办法从上海买来一部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连同报社的一部分机器和铅字，派人秘密送往革命圣地延安。他又秘密动员了十几个印刷工人前往延安。“西安事变”前后，他积极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并任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给杨虎城将军当秘书，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卓著。1941年秋天，他回家探亲，没想到让敌人知道了消息，结果落入了魔掌。

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也是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经历过革命斗争的考验。还是在江苏省家乡邳县的时候，丈夫是中共邳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她是县委第一任妇女委员。有一次，敌人派兵来抓宋绮云，他事先得到了消息，连夜逃走了。敌人扑了个空，就把正在学校里教书的徐林侠抓了去，关进了苏州监狱。当时她怀着六七个月的身孕，但这却不能得到敌人的丝毫同情，他们为了从她嘴里逼问出宋绮云的下落，对她严刑拷打，还用绳子拴在她的大拇指上，把她吊起来。即使是这样，敌人也没从她嘴里得到一点口供，只好把她释放了。

小萝卜头跟着妈妈先是被关在贵阳息烽监狱，1946年7月，他又和父母一起被押到重庆的白公馆，关进一间地下牢房里。

这里的条件要比息烽监狱还恶劣。阴暗潮湿的地牢里，终年不见阳光，臭虫、蚊蝇乱跳乱飞，就像看守一样可恶。难友们全都睡在破布烂草上，吃的是发霉带臭味的米饭，唯一的菜只有几颗大豆。

对于这样的环境，徐林侠倒不是太在意，自己的孩子是在苦水里泡大的，能经得住苦难的折磨。她真正着急上火的是孩子的教育，小萝卜头眼看就要到6岁了，该让他读书识字了。

作爸爸的宋绮云也惦记着这件事，他三番五次向特务提出，应该让孩子出去读书，可是特务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们害怕孩子出去上学会泄露监狱的秘密。后来又经过多次交涉，特务们才勉强同意在监狱里找“犯人”给孩子当老师。

一听到这个消息，徐林侠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小萝卜头更是一蹦三个高，拉着妈妈的手又笑又叫：

“我要读书了！我要上学了！”

徐林侠一边为孩子高兴，一边又在心里发愁。监狱里找不到铅笔，就连一张像样的纸也很难找到，让孩子拿什么读书写字呀？忽然，她看到了平时发给自己用的草纸，顿时有了主意。

她一边把草纸剪成一块一块的，用针线钉成本子，一边把小萝卜头叫到身边，叫着他的乳名对他说：

“森森，你能去读书，这个机会来得可不容易，这是你爸爸和叔叔伯伯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你可要用功呀！”

“我知道，妈妈。”

“森森，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要送你去读书吗？”

小萝卜头眨巴了几下大眼睛，摇了摇头。

“你看监狱里的那些大人，都在刻苦学习，他们是准备将来出狱后、建设我们的国家。你看你爸爸，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打太极拳，也是为了将来做准备，你要向他们学习。”“我懂了，妈妈。”第二天上午，小萝卜头被特务押送着离开地牢，来到楼上黄将军的牢房前。

他停住脚步，伸出小手在牢门上轻轻拍了几下。

“请进！”门里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

小萝卜头跨进门去，恭恭敬敬地给老师鞠了一个躬，然后问候道：

“你早，黄伯伯！”

看到这样聪明伶俐又懂礼貌的学生，黄将军喜出望外，连忙拉他坐下来，教他认起字来。

一个上午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特务又把他押回女牢。

特务刚一打开牢门，小萝卜头就像燕子一样扑进妈妈的怀抱，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他恨不得把一个上午听到的、看到的、学到的一股脑地都讲给妈妈听。

他告诉妈妈，黄老师给他上了第一堂语文课。第一课的课文是：

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才知道，他学习的第一册语文课文就是当时在狱中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给他编的。后来他又听说，罗老师和另外一名同志一起被敌人杀害了。在押往刑场的路上，罗老师脸不变色心不跳，还高声朗诵自己

写的就义诗。

小萝卜头听到这个消息后，小拳头摸得紧紧的，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但就是没有流下来。他在心底暗暗发誓：自己长大后，一定要为罗老师报仇！

从此以后，小萝卜头每天都由特务押着去上课。来到黄老师的牢房门前，他总是要先敲门，进门后总是要先给老师敬一个礼，然后就开始上课。

监狱里的学习条件很差，但他们俩一个教的认真，一个学的努力。黄将军用黄泥粉笔在地上写字，教小萝卜头认。有时候粉笔用光了，他就用手指头在腿上划。小萝卜头没有笔，就全神贯注地用耳朵听，用小脑袋瓜使劲记。回到牢房后，就趴在地上用小石头划字。地牢里夏天特别闷热，冬天特别寒冷，可是小萝卜头却不管这些，一下课回来，就趴在地上不停地写呀画呀。

黄将军不仅教他认字读书，还经常给他讲一些历史、地理故事，教他作一个正直的人。小萝卜头记忆力特别强，老师讲完了，他就都记住了，回到牢房就讲给妈妈和其他难友听。

有一天下课回来，小萝卜头显得异常激动，一进牢房就把一件东西举到妈妈眼前。

徐林侠眼前一亮，这是一枝红蓝铅笔。对于正在学习的孩子来说，这可比金子还要宝贵呀！

“森森，这是哪里来的？”

“黄伯伯送的，他说这是给我的生日礼物。”小萝卜头又是兴奋，又是骄傲。

有了铅笔，他却舍不得用，平时还是用小石头在地上写写画画，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才拿出来用一用。他拿它简直像宝贝一样，从不让别人动它一下。

监狱里学习没有课本，罗世文编的语文课本很快就学完了，黄将军编的课文他也学会了。没有书读的时候，他就捧起黄将军送给他的那本小字典翻来翻去。有的字难懂，不好认，他就向黄将军请教。有时候他学会了个难字，就去考问狱中的大人。你还别说，有的大人还真叫他考住了，弄得很不好意思，他却在一旁得意地格格直笑。

小萝卜头学习十分用功，进步也特别快，于是，黄将军便给他增加了学习科目，上午教他学语文、算术，下午教他学俄语和画画。

小萝卜头对学习俄语很有兴趣，黄将军教给他一个单词，他就很快记牢了。不久，还学会了简单的俄语对话。有时候他看见特务在一旁监视，就用俄语和黄伯伯对话。特务听不懂俄语，干着急也没办法。看着特务那个怪模样，小萝卜头偷偷直笑。

小萝卜头生平第一次来到监狱外边，兴奋地东张西望。小萝卜头最喜欢的玩具扑克牌被敌人抢走了，他没有哭，倒安慰起自己的小伙伴来。

凡是读过《红岩》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情节：

一只长着光亮的翠绿翅膀的小虫，越过栏杆，飞到走廊上来。虫子的头上，长着一块美丽的透明的薄壳，像小姑娘披上了薄薄的蝉翼般的纱巾。这虫子纤细而温柔，透过薄壳还可以看见它红珠子似的小眼睛。入春以来，这种虫子很多，常常撞进铁窗，陪伴着长年没有呼吸过自由空气的人们。

又飞来一只，它们并排在一起，故意在人面前骄傲地爬着。

“哟，多好看的小虫！”小萝卜头尖叫了起来，伸手捉住了一只。当他

去捉第二只时，它张开翠绿的翅膀飞走小萝卜头两手轻轻捧着那只虫子，惟恐伤害了它。刘思扬摸了摸口袋，摸出一只偶然带来的，被特务没收了火柴的空火柴盒，丢出铁窗，送给小萝卜头。小萝卜头打开火柴盒，把虫子放了进去。他正要关上盒子的时候，突然瞥见那只虫子，在盒子里不安地蠕动。啊，它失去了自由。小萝卜头若有所思地停住了手。他把盒子重新打开，轻声说道：

“飞吧，你飞呀！”

虫子终于轻轻扇动翅膀，飞起来，缓缓飞出栏杆，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小萝卜头高兴地拍着手叫：

“飞了，飞了，它坐飞机回家去了！”一个从襁褓时期就失去自由的孩子，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使得他小小的心灵变得如此多愁善感，甚至对一个小小的虫子，也不忍心把它暂时拘禁起来。看到这里，很多人对小萝卜头的不幸遭遇流下了热泪。

小说中还描写到，有一次，小萝卜头上完课后，双手抓住比他还高半头的楼栏杆，踮着脚跟，看白公馆墙外的群山。

他不知道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因为他没有出过监狱大门。但是他又告诉特务看守，他去磁器口耍过一回。

这些描写完全来自真实的生活，小萝卜头确实去过一趟磁器口，但不是像小说中写的那样是随特务看守去买菜，而是随妈妈去看病。

那是在1947年，小萝卜头6岁的时候。当时，徐林侠病了，而且病情十分沉重，两条腿肿得无法从裤腿里伸出来。多年的监狱生活把她折磨得浑身都是病，她是靠着坚强的意志才支撑到今天。这一次，她那虚弱的身体实在不能给她作主了。

妈妈病了，小萝卜头心里十分着急，难友们也很着急。经过大家的斗争，敌人才同意送徐林侠去城里看病。但只能是她一个人去，不能带小萝卜头。

徐林侠虽然病得很重，但头脑却很清醒。她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小萝卜头已经6岁了，却从来没有见识过监狱外的世界，应该趁这个机会带他出去走一趟，不然也太对不起孩子了。于是，她向敌人提出，必须带上孩子一起去看病，她离不开孩子，不然宁肯病死，也不去看病。敌人拿她没办法，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

徐林侠病得连路都走不动了，敌人却害怕她逃走，给她带上了手铐，然后把她和小萝卜头一起锁在轿子里，抬出了白公馆。

轿子向离白公馆不远的小镇磁器口走去，那里有一个诊所。

轿子里四周都遮得严严实实，只留了一个小小的透气孔。小萝卜头就趴在这个小孔上，贪婪地向外边张望着。他第一次看见了外边的田野，田野里的青草；他第一次看见了路边的土地庙和里边的泥菩萨；他第一次嗅到了外面新鲜的空气，听到了鸟语、闻到了花香。这一切本来都是平平常常的，但他却感到无比的新奇和生动，一边看一边不住嘴地问妈妈：“这是什么？”

“那是干什么的？”

轿子抬进了磁器口，他的眼睛更不够用了，他第一次看到了用石板铺成的小街，街边的杂货店，背着背篓赶路的行人突然，他的目光被路旁的一个棺材铺吸引住了，那里摆着一口油漆描金的棺材，他觉得这东西很好玩，就问妈妈：

“快看，那是什么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

“那叫棺材，是装死人用的。”

“那我们死后也装在那里边吗？”小萝卜头天真地问。

徐林侠听了，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她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说道：

“孩子，你不会死。等你长大了，还要消灭反动派，建设新中国。全世界的孩子，将来都要过幸福生活！”

小萝卜头虽然只是通过那个碗口大的轿孔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却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磁器口看病回来，他兴奋得不得了，见人就讲他的所见所闻。一连好几天，他都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从早到晚唱着快乐的歌。

难友们听着他那兴致勃勃的描述，从心里为他高兴，可是一转眼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个在监狱里长大的孩子太可怜了！这样的孩子太让人心疼了！过了几天，小萝卜头的兴奋劲消失了，他陷入了沉思和悲哀之中。5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和爸爸妈妈是“没有自由”的人，可是那时候他对“没有自由”这几个字并没有什么太深的体会，这一次见到了外面的世界，他的心底才真正涌起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有时候，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牢房的高墙下，通过电网的空隙，望着分割成一块块的支离破碎的天空，自言自语地说：

“我要是有自由该多好啊，我一定要不停地到处奔跑！”

有时候，他又一个人蹲在牢房的角落里，拿出纸笔画呀画呀。黄将军教给他画过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他最喜欢的是梅花鹿和仙鹤。他画的梅花鹿和仙鹤像极了，谁见了谁夸。每当这时候，他就在心中这样想：

“要是能变成梅花鹿，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要是能变成仙鹤，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该有多好呀！”

女牢里有一个马桶，特务雇了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负责倒马桶。每天吃饭前后，这个女人就来把马桶搬出去，然后拿着从管理室取来的钥匙，把白公馆大门打开，走出一小段路，把马桶往山根下一倒，再回来锁上大门。

小萝卜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就在他那个大大的脑袋瓜里打起了主意来。以后那个女人每次来倒马桶，他都上前帮人家一把。他人小力气小，也帮不上什么忙，但一来二去倒是和人家混熟了，到了大门也没人在意。

有一天，趁特务没看见，他就跟在那个女人身后跑出了白公馆的大门。

站在大门口，小萝卜头立刻被外面的景色吸引住了。歌乐山上有青翠的树林，山间有蜿蜒流淌的小溪，蓝蓝的天上飘着一朵朵白云，黄昏归林的乌鸦一群群从天空飞过。

“我要是能像鸟儿那样飞走多好呀！”小萝卜头的目光随着鸟儿向远方移动着……

在《红岩》小说中，只写到小萝卜头一个孩子。其实，当时在白公馆里关押过的孩子不止小萝卜头一个。

那是1947年深秋里的一个早晨，小萝卜头刚睁开眼，就发现牢房里又来了一个新难友，她还带着一个小女孩。当时天气已经很凉了，可是那个小女孩还穿着单衣，此刻她还没睡醒呢。

小萝卜头一骨碌爬起来，跑到妈妈身边。妈妈告诉他，新来的这位阿姨叫葛雅波，那个小女孩是她的女儿，今年12岁了，比他大4岁。

那个小姑娘醒了，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小男孩站在她面前。他那张小脸绷得紧紧的，带着几分严肃，但更多的是好奇。

“我叫宋振中，妈妈叫我森森，大家都叫我小萝卜头。”他先做完了自我介绍，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碧涛。”小姑娘怯生生地答道。

小萝卜头见她还有点怕生，就主动上前拉住她的手，亲热地说：

“碧涛姐姐，我可是这里的老政治犯了，这里的所有人我都认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的忙。”

李碧涛见他小小的年纪，却一副大人腔，忍不住笑了。

两个孩子没说上几句话，就成了好朋友。

望着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得那么开心，徐林侠和葛雅波两位母亲从心里感到了一丝安慰。

第二天，小萝卜头到楼下男牢房门外的走廊里，看难友们在草纸上写字、学习。小碧涛看见了，也想走出去跟他玩。她没走出多远，就被特务看守杨进兴看见了，一把揪住她的小辫子，把她拖回牢房，还骂了一通特别难听的话。

小碧涛又怕又气，躲进妈妈怀里哭起来。

这时候，小萝卜头攥着小拳头冲过来，高声叫道：

“不许欺负小孩！不许骂人！”

杨进兴瞪了小萝卜头一眼，扬长而去。

小萝卜头望着不断抽泣的小碧涛，向四周望了望，突然跑到墙角，敏捷地从一堆杂物里翻出一副扑克牌，吹去了上面的尘土，塞到了小碧涛的手里。

这副自制的扑克牌比火柴盒大一点，是难友们送给小萝卜头的，也是他唯一的玩具。

小碧涛止住了哭泣，和小萝卜头玩起扑克牌来。他们俩只会玩“比点”、“算得快”、“排龙”等几种游戏，但是却玩得津津有味，玩了一遍又一遍。

他俩最爱玩的一种游戏叫“开宝塔”，用扑克牌扣着一行一行排起来，一行比一行多，排上十几层，然后从下边往上边翻开。要是能把所有的牌都按一定数翻开，就算“宝塔”开了。

“宝塔”很难开，排一遍不行，他俩就再排一遍。你排不行，我就来排……

一副小小的扑克牌，在这阴暗狭窄的牢房里给两个孩子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扑克牌玩累了，他俩就坐在一起谈东说西。

小萝卜头告诉碧涛，在这里叫“坐牢”，坐牢的人就没有自由了。他还告诉碧涛，这几天又来了什么新难友，长的什么样，叫什么名字，还有谁又被特务提走受审上刑了，谁是不屈的好汉……

碧涛告诉小萝卜头，外边有街道、商店，还有学校；田野里有河流、村庄，还有大山；过年的时候，孩子们全都穿上了新衣服；爸爸妈妈从外边回来，给孩子们带来好吃又好看的糖果和点心……

在监狱里长大的小萝卜头从来没见过外边的世界，小碧涛讲的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他听得入了迷。

在小萝卜头短暂的一生中，和小碧涛在一起玩耍的那些日子，是他感到最快活的时光。

一天下午，敌人突然对“白公馆”进行突击搜查，一群如狼似虎的特务涌进女牢房，把屋里的东西翻个乱七八糟。有个特务一眼看见放在小碧涛床

铺上的那副扑克牌，不容分说就把它抢走了。

唯一的玩具被敌人抢走了，小碧涛伤心地哭了很久。小萝卜头上前安慰她说：

“姐姐，别哭了，我们长大了再找他们算帐，把他们全都关起来！”

小碧涛还是哭，小萝卜头又说：

“姐姐，以后我们自己再重新做一副扑克牌！”

慢慢地，小碧涛不再哭了，小萝卜头发现她的心情还很不好受，就像小大人似的告诉她：

“东西要藏起来，不能随便放在床铺上。”

然而，小萝卜头与碧涛姐姐再玩扑克牌的心愿终于没有实现。1948年，小碧涛和她母亲由打入军统的舅舅保释出狱。临分手那天，小萝卜头哭了；抓住碧涛姐姐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小碧涛的妈妈葛雅波拿出一瓶乳剂鱼肝油，交还给徐林侠。在狱中，药品是极其缺乏的，有时竟像金子一样宝贵。这瓶鱼肝油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这瓶鱼肝油是黄显声将军送给小萝卜头的。他见小萝卜头长得又瘦又小，便利用自己狱外的社会关系，弄来了一瓶鱼肝油。在当时这是十分稀罕的东西，徐林侠没舍得给孩子吃。不久，小碧涛被抓了进来，徐林侠便把这瓶药放到葛雅波的手上。

葛雅波哪里肯要，把它放回徐林侠的手上，说道：

“你还是给森森吃吧，你看他长得那么瘦小，鱼肝油对他太有用了！”

“森森过惯了艰苦的生活，不吃也行。我担心小碧涛一下子适应不了这里的环境，缺乏营养，还是给她吃吧！”徐林侠不等葛雅波说话，就硬是把药瓶塞到她手里。

小萝卜头也在一旁说：“阿姨，你就给碧涛姐姐吃吧，我用不着。”

葛雅波心里十分感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把这瓶药收下来。但是她却没有给女儿吃，而是把它收藏起来。如今他和女儿要出狱了，便把这瓶药拿了出來。

妈妈把那么珍贵的药品送给别人，小萝卜头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他妈妈总是愿意帮助别人，这样的事情他见过的太多了。

有一个姓王的小孩，因为狱中生活条件太差，生了一身疮，又得不到医治，脖子上都生了蛆。特务们把他拖出牢房，扔进了死亡室。徐林侠和难友们一起和特务交涉，把他抱了回来，就像护理自己的孩子一样护理他，总算把他救活了。从此后，她只要得到一点好吃的东西，总是舍不得自己吃，全都分给那个小孩和小萝卜头，而且每次都是那个小孩吃的多，小萝卜头吃的少。

碧涛姐姐跟着妈妈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30年后的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孩子来到白公馆旧址，他们在小萝卜头当年住过的牢房里停留了很久。他们离开之后，工作人员发现在小萝卜头的塑像前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个洁白的小花圈，还有一副精心制作的小扑克牌。

上边提到的那个姓王的小孩，也是在监狱里出生的，他要比小萝卜头还不幸，从未看见过监狱外边的天空、树林、溪流是什么样子。

他的父亲叫王振华，是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大学肄业，因参加托派组织而被捕，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恋人黎洁霜。在狱中，受到共产党员的

影响，思想逐渐进步。他们在息烽监狱里被关了好几年，但同在一处却见不到面。转押至白公馆后，经过坚决斗争，敌人才允许他们在狱中结婚，同囚一室。他们生下了两个小男孩，一个叫王小华，一个叫王幼华。小萝卜头也很喜欢这小哥俩儿，他们就住在黄将军的隔壁，每次上完课后，他都要从他们住的牢门口往里望几眼，但是却没有更多的机会和他们在一起玩耍。

和狱中其他难友相比，小萝卜头还是有一定“自由”的。起初他去黄将军那里上课时，来回都有特务押解，时间一长，特务就放松了对他的看押，上下课时常让他自己走。由于他年纪小，特务们平时对他也看管不严，他可以在楼上楼下随便走动。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狱中唯一的“自由人”。狱里的同志就利用他这个便利条件，偶尔叫他带带口信。小萝卜头很机智，警惕性又高，每次任务都能完成得很好。

有一天，小萝卜头要去楼下看爸爸，走到爸爸住的牢房门口，刚想和爸爸打招呼，就看见爸爸正在和一个叔叔小声说话，看样子是在研究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爸爸一抬头看见了小萝卜头，没有像往常那样露出慈祥的笑容，而是表情严肃地向他使了个眼色。

小萝卜头顿时明白了，他转身走到门外的栏杆边，坐到上边，作出玩耍的样子。每隔一小会儿，他就抬起头，大眼睛骨碌碌地向左右张望。

忽然，他看见走廊另一头晃过一个特务看守，正朝这边走过来。

这可怎么办？小萝卜头急中生智，假装不小心从栏杆上滑下来，“唉哟唉哟”地叫起来。

“瞎叫什么？”特务看守不耐烦地嚷道：“别在这里玩，快走！”

特务看守把小萝卜头赶走了，伸头往牢房里瞧了两眼，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就一晃一晃地走开了。

特务看守刚一离开，小萝卜头又回来了。爸爸站在牢房门口，伸出手来抚摸着他的头发，夸奖道：

“森森真机灵！”

从此以后，只要看见妈妈或爸爸在牢房里和人小声说话，他就会很快走开，坐在门外的栏杆上放哨。如果有特务过来了，他就想办法弄出些响动来，屋里的人就会停止谈话。

小萝卜头的出色表现使妈妈、爸爸和难友们对他越来越信任了，开始把一些重要一点的任务交给他去完成。

有一天，妈妈把他拉到身边，拿出一个刚缝好的小布口袋，塞到他手里，轻声地说：

“你去把这个交给院子里的那位疯伯伯，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要是被人发现了，你就说这是你留着自己用的，千万不要说是送给疯伯伯的。”

小萝卜头每天都能在白公馆的院子里看见疯伯伯，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打扫卫生。小萝卜头本来还有些瞧不起他，但如今妈妈却要送东西给他，看来这里边一定有名堂。

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送给疯伯伯一个布口袋，但是从妈妈的神情上，他敢断定这件事情一定很重要，于是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小萝卜头把那个布口袋藏在衣服里，一蹦一跳地向院子里走去。他一会儿蹲在这儿挖挖土，一会儿跑到那儿瞧瞧天，好像在一心一意地玩耍。

慢慢地，他凑到了疯伯伯身边，一看左右没人，就迅速地掏出那个布口袋，塞到疯伯伯的手里。

他头也没回地走开了，又在院子里玩耍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黄将军也知道小萝卜头在监狱中传递了不少消息，一在报纸上看到了什么有用的消息，就讲给他听，通过他再讲给难友们。有时候，他从报纸上看到解放军向西南挺进的消息，就把胜利捷报写在小纸条上塞给小萝卜头，让他带到楼下给大家看。

那时候，大家只要听到小萝卜头在院子里喊一声“蒋王八又打败了！”就知道这准是解放军又打了一次胜仗。

转眼间，1949年的春节就要到了，小萝卜头又给大家送来一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蒋介石的好几个兵团都被消灭了，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抵长江北岸，渡江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狱中的党组织想利用过春节的机会，开一个庆祝会。

送口信的任务又落在小萝卜头的肩上。

爸爸亲口把开会的时间和具体要求告诉给小萝卜头，他一字不差地记在心里，然后高高兴兴地执行任务去了。

他从楼下跑到楼上，从女监跑到男监。不大工夫，开庆祝会的消息就在白公馆里所有难友中传开了。

小萝卜头回到了牢房，妈妈和难友们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都夸他是监狱中的小“小交通员”。

春节那天，放风的时间要比平常日子长一些，难友们心照不宣地一起聚集到院子里，开起了庆祝会。他们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气氛十分热烈。

“欢迎小萝卜头出一个节目！”有人提议道。

小萝卜头大大方方地站出来，给叔叔阿姨们跳起秧歌舞来。他又是蹦，又是跳，看得大家直拍巴掌……

小萝卜头遇难时年仅8岁，但是因为他曾在监狱中干过革命工作，所以解放后被评为烈士。陈然接过从门缝里塞过来的报纸，借着微弱的灯光读起来。宣灏惨遭毒打，许晓轩挺身而出。他说出了一个特务们完全想不到的理由。

陈然被关进白公馆后不久，黄显声将军就让小萝卜头去打听陈然的情况。从那嘹亮的歌声中，黄将军就喜欢上了这个还未见过面的年轻人。

陈然也是通过小萝卜头得知黄将军每天都能看到报纸。他是当时狱中唯一受到这种优待的难友。不过，他每天看过的报纸，第二天就被特务取走了。

狱中不通消息，外边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狱中的难友却全然不知，这是最令大家着急的事情。

黄将军十分了解难友们的这种心情。当他通过小萝卜头得知陈然的床铺就紧挨着他住的这间囚室时，不禁生出个主意。

这两间屋子原先是相通的，中间有一扇门。改成囚室后，这扇门就封死了。但黄将军发现，门上有个缝可以塞进去纸片。

夜深人静，陈然忽然听到耳边响起两下轻轻的响声。

他警觉地坐起来，寻找着声音的来源。

“啪啪！”又是两声。

他听出来了，这是隔壁的黄将军在敲那扇封闭的门。

陈然也伸出手去，在那扇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不大一会儿，从门缝里塞进来一张报纸，报纸里还夹着一个小纸条。借着从签子门射进来的微弱灯光，他看清了纸条上写着这么几个字：“天亮前务必归还。”

陈然哪里还能等到天亮，立刻贪婪地读起来。这报纸是国民党官方办的，通篇没有多少真话，但是陈然从字里行间还是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来。

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了，47万国民党军队全部被歼，东北全境获得解放；东北野战军改成第四野战军，向平津挺进；中原野战军在挥师东进，与华东野战军会合；黄伯韬兵团被包围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碾庄地区，已经是插翅难逃……

陈然越看越兴奋，一夜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报纸原路送回。

他悄悄喊来刘国钰，从他那里要来一支短短的秃头铅笔，又从香烟盒里找出一张小小的薄衬纸，然后凭着记忆，把他看到的那些消息简要地写在上面。

白公馆的楼上楼下有一些秘密孔道，这是难友们以前发现的，用来传递过几次纸条。如今，这些秘密孔道可派上了大用场。

陈然写的纸条在白公馆的难友们中间传开了，写在上面那一条条鼓舞人心的胜利喜讯好像一股温暖的春风，吹遍了这阴冷潮湿的监牢。

从此以后，难友们每天都能看到这给人带来欢乐的纸条。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重要会议，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

“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河北西柏坡，到达北平！”

“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南京宣告解放！”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下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看到这一条条消息，难友们尽管还要抑制住热烈的欢呼，强压住激动的心跳，但却压不住心花怒放。大家都亲切地称呼这些小纸片是“《挺进报》白公馆版”。

大约是半年后的一天，这个秘密被特务发现了。

小说《红岩》对这件事是这样写的：狱中有个难友叫胡浩，由于长期的折磨他变成了高度近视。这一天放风的时候，他正躲在屋角里激动地读成岗抄写在一张小纸片上的中共中央七届二次会议文件，竟没有发现看守长杨进兴（白公馆看守长的真名实姓就是杨进兴）偷偷地靠了上来。

特务早就怀疑狱中有党组织，而且怀疑狱中的党组织与外边的地下党有联系。看到了这份共产党的文件，更相信这是地下党通过秘密渠道送进来的。胡浩不是共产党员，他不可能直接得到这种文件，肯定狱中还有其他人与狱外有联系。于是，他们当众毒打胡浩，企图从他的嘴里掏出文件来源的秘密。

皮鞭在空中抽得呼呼地响。一下，又一下，血从破裂的肉体上流出来，淌到光滑的地板上。声音低沉下去，呻吟着，喃喃地断续地在空中萦绕：

“……我写的……我……写……的……”

冷水泼在血泊里，抓住头发，向上提，再提。

“问你是谁写的？”

“我。”

当时在白公馆中并没有人叫胡浩，但是却有一个叫宣灏的人，曾因传看“狱中《挺进报》”遭到了毒打。

他是江苏江阴人，家里很穷，11岁就帮着父亲挑担卖鱼，16岁到水果店

学做生意。18岁又到上海东南医专解剖实习室当助手。1935年回到家乡当小学教师。1940年，他看到一则以“中央军校特种技术训练班”名义打出的招生广告，以为能学到一些军事知识，也好抗日保国，没想到受了欺骗，进去之后才发现这是军统局办的特务训练班。他在这种地方照常和外面思想进步的朋友通信，照样读他爱读的进步书籍。结果入班不到四个月，就被关了禁闭。

一天夜晚，外边下着细雨，他从禁闭室里逃出来，想跑到皖南去投奔新四军。刚跑出十几里路，又被捉了回来，送进息烽监狱，后转来白公馆监狱。在长达9年的囚禁中，他与一批批革命志士接近，深受熏陶感染。如今，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宁死不招，他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那些他敬爱的共产党人。

外边不断传来令人心悸的叫喊，皮鞭抽打在宣灏身上，就好像抽打在每个人的心头。

特务们在故意大声吆喝着，不断地催促着搬来更多的刑具。

杨进兴一边指挥着特务们拷打宣灏，一边用阴险狡猾的眼神向牢房这边扫来。他知道，共产党员不会让无辜的群众为他们牺牲。

陈然早想挺身而出，承认这纸条是他写的，但是他住在楼上，宣灏住在楼下，如果他承认了，就有可能暴露狱中的秘密联络通道，甚至会把黄将军牵扯进来，从此断绝消息的来源。

刘国钰也想挺身而出，但是他不知道怎样说才能让敌人相信，他在狱中也能够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

正在大家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许晓轩站了出来。

“住手！不许打人！纸条是我写的！”

这声音不大，但却使特务们放下了鞭子。

杨进兴兴冲冲地向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即《红岩》中的陆清）报告。他以为这回可抓住了一条大鱼。

陆景清可要比杨进兴还老奸巨滑。他早就听说过，这个许晓轩在难友中威信很高，很可能是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人。此人1940年就被捕入狱，早已将严刑拷打视为家常便饭，恐怕从他嘴里掏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来。

许晓轩被带进了陆景清的办公室。

“许先生，请坐。”陆景清对许晓轩很客气，脸上还挤出一丝笑容来。

“既然你说纸条是你写的，我倒是愿意相信。”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扬了一下从宣灏手里抢来的那张纸片。“但我不相信你能写这么一手漂亮的字。”

许晓轩看了陆景清一眼，走到桌边拿起了铅笔，坐下来，摊开白纸，但他又停下笔，要来了刀子，从容地把笔芯削得又尖、又细，然后，在白纸上沉着地写起来。

杨进兴站在齐晓轩背后，尖锐的眼光，注视着他每个细小的动作。

按小说所写，许晓轩写完了几行字后，陆景清马上把这张纸和原来那张破皱的纸条，一齐装进公文袋，送到中美合作所的技术检验室进行笔迹鉴定。几个钟头后，鉴定结论出来了：字迹相同。

实际上，陆景清并没有搞什么笔迹鉴定，他只是和几个特务把两张纸放在一起端详了半天，翻来覆去没看出什么破绽来，也就没深究。

许晓轩斗争经验很丰富，也很有远见。为了预防意外，他平时就注意模

仿陈然的笔迹，结果模仿得很像，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陆景清还是不死心，又是一声冷笑：

“许先生，你被捕前虽然是共产党的区委委员，但你已经坐了八九年的牢，你怎么能知道狱外的消息呢？”

许晓轩也冷笑一声，他说出了一个特务完全想不到的十分简单的理由：

“那天，我在放风的时候，走到院坝里散步，偶然发现了管理室的门没有上锁，里面又没有人，于是，就走了进去，随意翻阅着报纸，为的是想看一看有没有释放政治犯的消息，不料在报纸上，发现了公开刊登的我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一番话说的杨进兴脸色灰白。他发觉自己被牵连进去了，而且有重大责任。忘记锁门的疏忽，在他是常有的事情。

“随你们怎么办吧！”许晓轩站起身来，缓步踱到窗口，望着远处油绿的青山和浮在空中的白云。

陆景清也拿这位老政治犯没办法，只好罚他戴上重镣，关进地牢。

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浪就这样平息下来了。陈然不敢相信，一个已经坐了八个月牢的领导干部会准备去当叛徒。一个已经成了叛徒的人痛心地流下了眼泪。

一连好几天，陈然都注意到李文祥的情绪有些不对头。

一大早起来，他就坐在牢门口望着外边出神。陈然喊他的名字，他好像没听到一样。

自从住进白公馆的同一间牢房后，陈然就和李文祥成了好朋友。陈然喜欢写文章，李文祥爱好文艺，两人很有一些共同语言，常常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探讨文学艺术问题。两人虽然时不时地发生一些友好的争论，但难捱的牢狱时光也被打发掉了不少。

可是近来陈然发现，李文祥整天唉声叹气，好像有什么心事。陈然找来一本蔡仪的《新艺术论》，兴致勃勃地给他看，他却晃了晃头，说：“我懒得看理论上的东西。”

陈然猜想他一定是在想念新婚妻子熊咏辉，就开他的玩笑。难友们都笑了，可他却一声不吭地把脸扭到了一边。

这一段时间，特务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问。每次回来，他都往床铺上一躺，两眼望着天棚发愣。

在陈然的再三追问下，李文祥终于说出了实情。这几次到渣滓洞受审，敌人既不打他，也不骂他，而是把熊咏辉从女牢提出来，让他俩见面。

新婚不久的夫妇在这种场合见面，当然会百感交集，当然会掉眼泪，而就是这些使李文祥觉得内疚，他觉得是自己连累了熊咏辉。

“老李，这是敌人在用感情因素……”陈然及时地刹住了话头。他看出来这是敌人在搞诱降，但面对着一位当过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有着十几年党龄的领导，他无法把“诱降”这两个字说出口。

“陈然，咱俩是好朋友，我有心事也不瞒着你。你说，咱们受苦受难了这么多年，一点报酬和享受都没得到，眼看革命就要胜利了，我们要是死了，这划算吗？”

陈然吃惊地盯着李文祥的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话是他这种人应该说出来的吗？

“老李，我觉得你的想法有点不对头。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

“你说我自私？”李文祥有点不高兴了。

“老李，我们都相信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正因为这样，我们跟敌人斗争就更有劲头了。敌人想拉拢我们，正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末日快到了。”陈然想用热情的话语帮助他振奋起来。

没想到李文祥眼睛一闭，脸上分明流露出不耐烦的模样。

12月13日这天，李文祥又被特务带出白公馆，前往渣滓洞。

昨天晚上，陈然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然而，任凭陈然磨烂了嘴皮子，李文祥还是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最后甚至流露出一打算在这里坐牢的念头。

陈然这样的硬汉子哪里见得惯如此窝窝囊囊的人，本来心里就有火，又听他有向敌人屈服的意思，实在忍不住了，冲他叫道：

“你记住，你要是敢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的事情，我就撞死在你面前！”

李文祥被带走了。

陈然目送着他远去的背影，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他的心头。难道……他不敢往下想，也不愿往下想。

他收回目光，一转头，又在牢房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身影。

这个人就是叛徒涂孝文。

涂孝文虽然当了叛徒，可是特务却不相信他。徐远举认为他还有所隐瞒，就把他送进了白公馆。没把他关进渣滓洞，就算是照顾他了。

陈然最初来到白公馆时，感到非常不习惯，这里不仅关着自己的同志，还关着犯有过失的国民党特务，也关着像涂孝文这样没有多大利用价值的叛徒。

涂孝文也知道没有人瞧得起他，所以整天躲在角落里，不与任何人交谈。

有一天，突然一只卤蛋扔到他的床铺上。他吃惊地抬起头来，刘国钰正朝他微微点了点头。

卤蛋是刘国钰的家里人捎进狱里来的。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上难找的美味佳肴了。刘国钰给每人都分了一个，同时没有忘记涂孝文。

涂孝文坚持不要，可刘国钰硬是坚持着要他吃下去。

在这之前，许晓轩、刘国钰、陈然、王朴几个共产党员聚在一起开了个会。许晓轩首先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涂孝文虽然当了叛徒，但与刘国定、冉益智不同，他一直在铤徨犹豫之中。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拉他一把，而不是推他一把。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地下党组织遭到进一步破坏。

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刘国钰等人就有意去接近他，当他生病的时候，又把自己珍藏的营养品拿出来接济他。渐渐地，涂孝文和大家有了来往，话也多起来了。

有一次，涂孝文和刘国钰谈着谈着，他的眼泪流下来了，他说他犯的错误太大了，自己没有脸请求组织原谅，但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他还大骂冉益智无耻，这个家伙居然劝诱自己说出下川东党组织的机密。他更痛恨自己是个软骨头，未能经得住考验。

刘国钰安慰他说：“过去的事再后悔也没有用，关键看将来。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坚守住最后防线，不要再交待什么人了。”

涂孝文使劲眨动着闪着泪光的眼睛，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个保证涂孝文倒是做到了。从此之后，他没有再给敌人提供过什么情况。

陈然也跟涂孝文有过交谈，但他从心底蔑视这种没有气节的人。可是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一个坐了八个月的牢，表现出了很好的气节的人，会不会丧失气节呢？

陈然下定了自杀的决心，他要以自己的不怕死来谴责叛徒的怕死。陈然开始加紧实施他的自杀计划。

这一次到渣滓洞与妻子会面，特务对他可不像以往那么客气，只让他们匆匆见了一面，就把熊咏辉带回了女牢。

一个不知什么名姓的小特务走过来，好像幸灾乐祸似的告诉他：“这可是你最后一次同太太见面喽！”

什么？李文祥哪能听不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不是要枪毙我？会不会连我妻子一同枪毙？我要是一个人死了，我妻子怎么活下去？有没有既能活命又不当叛徒的办法？我要是只讲几个已经暴露的同志的名字算不算叛徒？……

当天晚上，他翻来覆去在床铺上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这个李文祥走进了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机关，成了可耻的叛徒，出卖了何柏梁等 10 余名同志。徐远举给了他一个少校的官儿，留他在特务机关协助工作。

李文祥叛变的消息很快就传进狱里，而且传来了李文祥为自己叛变编造的三条堂而皇之的理由：

一、我叛变不该我负责，我是被上级出卖的。我还坚持了 8 个月。我提供的那份名单上的人，他们早该转移了，如果还不走，也不该怪我。

二、我只有枪毙和投降两种选择，苦了这么多年，眼看胜利了，自己却得不到胜利，太惨了。

三、组织已经破坏，我只有为自己打算，为妻子着想。

李文祥的叛变，在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中的难友们的心头，涂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为什么一个老党员，一个负责干部，已经经受了 8 个月的考验，最后却又叛变了呢？一时间，狱中斗争气氛沉寂下来，有不少人感到失望。

李文祥叛变的消息传到女牢，起初很多人不相信。大家商量好了一起瞒着熊咏辉，她在狱中表现得还很坚强，应该把消息弄准确了再告诉她。12 月里的一天，曾紫霞突然看见曾在新中国剧社工作过的程谦谋被抓进了渣滓洞监狱。曾紫霞很快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曾紫霞，出卖他的人就是李文祥。

熊咏辉终于知道了她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想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纷纷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她没有别的指望，同女牢的伙伴共同生活到天亮就是她的愿望。

就在这时，传来了叛徒丈夫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的消息。她的脸上又布满了愁云，他成了叛徒的妻子，要继续坐牢已办不到。她想采取什么手段赖在

这里，李青竹、江竹筠几个人对她进行了耐心深入的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赖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

“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

她哭着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可都知道呀！”

难友们虽然不断劝慰她，可总找不到万全之计。曾紫霞十分理解她的处境，于是要她记住一个地址，让她在绝对安全而又不影响同志的情况下去找那个人，要那人把她送离重庆。就这样，难友们看着她痛苦而艰难地离开了渣滓洞女牢（后来才知道，她为了不让别人受到牵连，没有去找那人）。

李文祥的叛变对陈然打击最大，他的心头就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沉重。他思来想去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多领导干部经不起考验？他们是领导者，为什么反而没有普通党员意志坚定呢？他又联想到，很多人曾像自己一样，认为自己的身份只有上级领导知道，因而明知有危险，也没有采取措施。很多同志就是这样被自己的上级出卖后入狱的。

陈然把自己的想法和王朴讲了，王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沉痛地说：“不能用理想主义来看待党组织，也不要盲目迷信上级，要有现实主义的观点。这是血的教训呀！如果我们日后有谁出狱了，一定要把这个教训写出来反映上去。”

陈然还有一件更着急的事情，那就是不能眼看着同志们的情绪由此而低落下去。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斗争，如果不始终保持昂扬的情绪，就很可能向敌人屈服，李文祥就是一个例子。

可是，怎么才能鼓舞起大家的斗志呢？

当敌人又一次提审他时，陈然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自杀！

他决心以自己的死来谴责叛徒的怕死，以自己的死来抹去难友们心上的阴影。

他要以自杀的行动鼓舞大家向凶残的特务作坚决的斗争，向全狱的人宣告：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

陈然开始认真地实施这个计划。

当然，他不能贸然去死。最初他想到了绝食，这样就可以把自杀变成一个振奋难友们斗志的过程。但转念一想，这样会太伤难友们的心。后来，他又设想抓住一个机会，一个能让全狱的人都能看得见、听得见的时机，最好是在放风时，摆脱特务的监视，站到楼顶上，向全体难友，也向凶神恶煞的特务看守，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纵身从楼上跳下自杀。能碰在电网上死去更好。

就在陈然加紧实施他的自杀计划时，外面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这是一纸求和声明：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

“只要和平早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等七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紧接着，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上台，派出和谈代表，声称要

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

不管国民党政府宣布和谈是真是假，这起码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已经能够左右中国大局，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再与人民对抗下去了。一个新时代很可能马上就要来到了，狱里的同志们情绪又高涨起来，陈然也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监狱里掀起了学习热潮。

狱中图书馆给难友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江竹筠相信能活着出去。

渣滓洞和白公馆相距五里之遥，两处的特务相互间可以用电话联络，两处的难友却处于隔绝状态。1948年春天，共产党员李子柏由白公馆移监渣滓洞时，1941年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白公馆狱中党支部委员谭沈明曾嘱咐他，要争取建立两处之间的联系。但这个想法一直未能实现。

李文祥叛变后，渣滓洞的同志们不知道白公馆的难友们情况如何，更不知道陈然有自杀的打算，但他们对外边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也开始考虑怎样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在1947年1月17日这一天，利用渣滓洞各狱室连日来举行追悼会，纪念彭咏梧牺牲一周年的机会，江竹筠把自己近日来的想法拟成一份讨论大纲：

- 一、被捕前的总结；
- 二、审讯时的应付；
- 三、狱中学习心得。

在每一项下边，都附有详细的说明以及她个人的一些体会。

这份讨论大纲与江竹筠给难友的回信一起传递到男牢里，难友们见了，都深为激动。每个狱室都由共产党员带头，在不泄密的情况下进行讨论，尤其是讨论关于保持革命气节的问题。

由此，渣滓洞监狱中出现了一股学习和讨论热潮。

在此之前，女牢已有学习讨论的传统。起初是秘密进行的，看上去就像是三三两两在闲聊。这样做是因为彼此的身份还不十分清楚，另外还要防备牢里混进“红旗特务”。

后来，女牢里基本上分为三个组，三个组的主持人分别是江竹筠、黄玉清和曾紫霞，她们三个人拟定学习计划、讨论内容等，李青林、胡其芬当参谋。实际上许多事都是大家商量，她们三人主要是作具体安排。

最麻烦的是没有书，她们三人先把自己记忆的东西一块凑出来，用竹签子蘸红药水或墨写在草纸上（当然以江竹筠为主，她记得又多又准），写好后给李青林、胡其芬、张静芳等年纪较大、文化也较高的难友看后提出补充，然后再重抄一遍。

三个组不是同时学习，一个组学习，一个组站岗放哨，一个组做牢里该做的事。

女牢里学习的较久、有些内容反复学习过的有《中国土地法大纲》、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在地下斗争时期，为了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最小的限度，党组织交代任务，同志之间接头，凡是能用脑子记忆的都要求不用纸笔记，有的反复背诵达数十遍，因此这些

难友们都练就了记忆的特殊本领。《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学习内容就是几个难友靠记忆整理出来的。

《新民主主义论》在女牢中学的时间最久，也学得最仔细。老同志的本事在学这篇文章时表现得特别突出，她们硬是背得烂熟，而且理解得相当好。曾紫霞入狱前没有学过《新民主主义论》，出狱后，1949年11月在西康荣经民盟办的妇女班里居然能讲《新民主主义论》。她看到印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同在狱中凭记忆写出来的章节的标题完全一样，只有一个地方次序番号颠倒了。

围绕着江竹筠提出的讨论大纲，女牢组织的讨论也非常热烈。这些讨论与后来那些“放空炮”的会议完全不同，提出的问题都是在实际斗争中感到有必要解决的，因而大家讨论起来就十分带劲。

根据曾紫霞解放后的回忆，当时的讨论中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一人问：“在敌人面前暴露了身份和没有暴露身份是否应该不同？是不是任何人任何情况都应做出昂首挺胸、大义凛然的样子？”

一人答：“暴露身份和没有暴露身份的当然不一样，有个人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到临牺牲时也没有表现慷慨就义的气概，记得当时有同志说反正都要牺牲了，无论如何也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才对，可我们的领导批评了这种说法。我记得他反问我们：‘如果敌人是假枪毙呢？你岂不就暴露了？还有同你要好的、联系密切的人岂不是会因为你的暴露而受到牵连甚至被捕吗？’”

又有一人问：“说了死了的人也不对吗？反正人已经死了。”

一人答：“也不是说不能往死人身上推，如果死了的人是暴露了身份的，你说了死人以为没有关系，可就容易暴露你自己。如果你已经暴露了身份，为掩护自己和其他同志，往死人身上推当然不能说是错误。但是如果死人没有暴露身份，你自己暴露了而往他身上推，就有牵连到死者的亲属朋友的危险了。”

另一人答：“敌人审问你你自己必须注意他的目的、他掌握了你多少情况。最好的对付敌人的办法不是一句一个不知道，而是让他从你嘴里得不到一点东西还要相信你说是真的。”

接着一人说：“有一定经验的共产党员在被捕后也不是每个问题都处理得那么恰当的，谁都不是生来就是成熟的革命者。”

除了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之外，狱中的难友们还抓紧学习文化知识，积极锻炼身体。尤其是随着形势的好转，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变得大起来，难友们更有了学习和锻炼的自觉性。

谭沈明曾这样对难友们说：“我们被捕太久，组织上可能已经不知道我们了，但为了革命，为了真理，我们要永远坚持下去。”

他入狱前仅有高小文化，但他通过顽强的自学，能够用俄文写读书笔记、日记，而且数年坚持不断。解放后，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同志把他写的俄文笔记送到外语学院，请那里的老师翻译出来。外语学院的老师起初并不知道这些笔记是什么人写的，一边翻译一边赞叹道：“完全达到了大学水平，这个人可真不简单！”

狱中是根本没有学习条件的，但这点困难实在算不了什么。没有桌子，他们以床铺、地板、膝盖、枕头代替，铺上纸就可以写东西。没有笔墨、纸张，用烂棉絮烧成灰，调上水就是“墨汁”。把竹筷子削尖就是上好的笔，

烟盒纸、草纸、白衬衣撕成块就是纸，有人干脆用黄泥搓成“粉笔”，在地板上书写。狱中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军事的学习小组，先后有车耀先、许晓轩、谭沈明、李子柏、何雪松、韩子重等参加，他们多数是川东、川西负责军运的老同志和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搞秘密工作的，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一碰头就爱谈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关于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一谈起来，就没完没了。

《红岩》中有一段描写极为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狱中浓厚的学习气氛：

……牢狱里一片静寂，鸦雀无声，刘思扬缓步走到牢门边，他发现，几乎每个牢房，每个人，都在静静地看书。

他立刻醒悟了：这里不仅有复杂的斗争，而且有顽强的学习。在渣滓洞的时候，他就曾经想过，如果在集中营里能够读书，他一定要好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失去自由，但不能失去思想，他深深地觉察到战友们专注的学习，正是一种顽强的战斗。

当时，白公馆里确实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有一个小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从息烽监狱开始就存在，车耀先同志曾做过图书管理员。息烽监狱里的囚犯移押白公馆时，这个图书馆也随着搬了过来。

在这个图书馆中，有不少反动书籍，如《世界伟人希特勒》、《墨索里尼自传》、《总裁言论集》等，这是特务有意摆放在这里的，为的是毒害狱中人士的灵魂。但为了摆样子，也有一些古文、历史、字典、文学名著之类的书。

渣滓洞里有一段时间也可以借阅书籍。当然借不到进步书刊，但是《红楼梦》、《古文观止》这些书还是让难友们读得津津有味。

当时，狱中有很多人学俄文，也有一部分人学英文。女牢中的胡其芬英文功底深厚，大家就请她作老师。狱里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胡其芬只好天天口头授课，再定期布置作文，由她边批改边讲解。

大家学得认真，胡其芬教得更认真。曾紫霞还记得，有一次，胡其芬问她：“我发现你每次作文都用 Marchon，这是为什么？”

曾紫霞答道：“我总想表达前进这个意思，但我的英文太差，只知道一个 Marchon，不知道换用别的词。”

胡其芬笑了。

曾紫霞还记得，有一次江竹筠对她说：“看现在时局的变化，我们在年底就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坐牢这段时间，充实好头脑，出去后也好为党多做工作。”

江竹筠的话流露出了当时狱中难友们的共同心情。

第七章 春节大联欢

渣滓洞各牢房一片忙碌景象，难友们在为欢庆春节准备着。杨汉秀在女牢里教大家跳陕北大秧歌，累得满头大汗。

二月春寒，浓雾笼罩着歌乐山。

一年一度的春节快要到了。以前，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牢中都有人抹眼泪，以女牢为甚。如今情形大变，全牢上下居然洋溢着一股喜迎新春的气氛，女牢中更是不时地传出笑声。

女人的感情也许天生比男人更丰富、更强烈，因而她们比男人爱哭，也更爱笑。

一点小事可能说来并不可笑，可只要有一个人开了头，一笑就没有个完，一直笑到捂着肚子喊疼，眼泪直流。

女人的笑声又尖又脆，惊动了值日的看守，直往女牢门口探望。他们要是吼一声：“不准笑！”女难友们就会回一句：“笑都不能笑吗？你们有规定不准笑吗？”结果笑得更厉害了。

男牢里没有女牢这么多开心的笑声，但他们心底的喜悦却是难以压抑，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监狱里不免听到坏消息，而这些坏消息总是免不了跟叛徒有关。1949年1月，川康工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叛变，供出了成都军运负责人韩子重、川康特委委员华键等一批地下党负责人，他们被捕入狱，很快就被押到重庆。

从新入狱的同志口中，渣滓洞的难友们听到了一连串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乘胜入关，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组成百万大军，合力围歼傅作义指挥下的五十多万国民党军队。1月14日，解放军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成了俘虏。傅作义见大势已去，只好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与此同时，淮海战役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毙蒋匪兵团司令黄伯韬，活捉黄维，孙元良兵团全军覆没。我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抵长江北岸，一场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正在准备中。国民党重放和谈空气……

国民党反动派快完蛋了！

天快亮了！

这几天，渣滓洞里的情形与以往明显不同。特务的看管松懈了一些，白天有时候牢门也不上锁，放风的时间也有所延长。每天不仅有开水供应，吃饭时还可以见到一点蔬菜。

李磊对待难友的态度大变，一见面就笑嘻嘻地问好，还说要给各牢房增装电灯。春节期间，还要改善监狱里的生活。

春节就要到了，而今年的春节全然不同于往年。难友们不约而同地打好了主意，要好好庆祝一下这个民间节日，就把它当作欢庆全国解放的彩排吧！

春节还没到，大家就忙活开了。过春节应该放鞭炮，那才叫热闹，可是监狱里弄不到鞭炮，有人就出主意写春联。

这件事很容易办到，难友们中间诗人很多，一个个才华横溢，写副对联那是手到擒来。只可惜没有红纸，只好写在草纸

最忙的还要数余祖胜。入狱之后，他在放风的时候，偶尔拾到了一个铁

钉子，他如获至宝，在地上、石头上磨呀磨呀，终于磨成了一把小雕刀。他又找来红色的、黄色的牙刷柄，把它刻成一个个红心、红星、短剑的模样，分赠给难友们。这一次他要尽最大的能力多刻一些，再刻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英文缩写。他要让更多的难友在春节这一天收到这份礼物。

别人帮不上他的忙，就到处帮他收集牙刷柄。有人把没用坏的牙刷也给他送来了。

余祖胜从早到晚不停地刻呀刻呀，居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刻出了上百颗五角星。

女牢里的难友们商量着要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可是演什么节目好呢？这可一下子把人难住了。

一个叫杨汉秀的难友提议：“咱们就扭一个陕北大秧歌吧！”

“不会扭怎么办？”曾紫霞问。

“我会跳，我来教你们。”杨汉秀说着就起身扭了起来。

这倒是个好主意。女难友们全都跟在她后边学起来，就连左绍英也抱着小卓娅直摇晃。

难友们对杨汉秀并不了解。听在垫江被捕的盛国玉讲，被关押在二处时，她曾趁上厕所的时候悄悄告诉盛国玉：“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后来，敌人要把盛国玉一行三人转移到渣滓洞，杨汉秀出钱请人炒了三大盆菜，为他们饯行。临上车时，杨汉秀又走过去对盛国玉说：“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果然，几天后她也被移送到渣滓洞监狱。

在狱中，杨汉秀是个很特殊的人物。特务们对她都很客气。听黄茂才偷着告诉江竹筠，这个杨汉秀是大军阀杨森的亲侄女，她父亲是杨森军阀系统中的补给司令。杨森当时是重庆市长兼任警备司令，她的二弟杨汉烈是国民党第20军79师师长。

尽管如此，大家对她的印象并不坏。狱中难友们每次与敌人进行合法斗争或是谈判之类的事情，她总是抢先出面与特务交涉，而特务对她总是要顾忌几分。由于她有多种社会关系，在狱中经常能收到吃的、用的东西，每次她都不吝惜地分给大家享用。

她平时总爱穿一件褪色的列宁服，显得很精神干练。她还说她去过延安，当时还有难友表示怀疑。如今看到她跳陕北大秧歌那么熟练，那么投入，难友们对她顿时增添了好几分信任。

其实，不光是狱里的同志，就是狱外的同志也有很多不清楚杨汉秀的真实情况。当时地下党是单线联系，而与她联系接头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同志已经牺牲了，她一时无法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说起杨汉秀的经历，确实有传奇色彩。

她是渠河上有名的杨大小姐。她父亲杨懋修是杨森的二弟，是广安、渠县一方的著名土豪。杨汉秀出嫁时抬盒摆了半条街，嫁奁谷在千石以上。可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却抛家别子，丢下富豪日子不过，要上前方杀敌，投军又不找当国民党集团军司令的杨森，而是去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同志受中共中央的派遣，住在万县杨森总部，杨汉秀是那时候认识他的，亲切地称他为朱伯伯。她常常坐在屋角里，听朱德和杨森之间的争论与对话，朱德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在她幼小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投奔革命的经历像唐僧取经一样充满磨难。1939年夏天滞留成都，因

为当地党组织对她的动机存疑，有所考察。好不容易北上到了宝鸡，又遇胡宗南封锁陕北，只好在秦岭一所学校教书。1940年只身过黄河，在晋南中条山中打游击。后随游击队长淦玉梅赴八路军总部，在陵川县又被顽军庞炳勋部包围，并转解至洛阳劳动营关押。在集中营里，她按行军支部的指示，亮出杨森家族大小姐的身分，她和淦玉梅方才脱险，装扮成朝鲜妇女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儿她见到了自幼就尊敬崇拜的朱德伯伯，并随他到了延安。

在陕北，她先后在延安女大第七班和鲁艺美术系第四期当学员。杨汉秀在这里亲聆朱总司令的教诲，于是就改名吴铭，以示和封建家族的彻底决裂。她严格要求自己，在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都表现得很积极。直到康生发动“抢救运动”时，同学们才知道她竟是军阀地主家庭中的“大小姐”。

抗战胜利后，她由关中被召回延安，先后受到朱总司令和王维舟同志的接见，才知道随着《双十协定》签定后的形势变化，我党在重庆公开成立了四川省委。党组织决定调她回四川工作，若和平协定得以维持，就作上层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

当时，周恩来不停地在延安和重庆之间飞来飞去。有一次，在随同周恩来从延安飞在重庆的人员中，多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年轻女性。人们都不认识她，只听到周恩来称她“吴铭同志”。有的人不禁感到好奇：这个“无名同志”究竟是什么人呢？

她一下飞机就受到特务的监视。但她毫无畏惧，充分利用“杨大小姐”的特殊身分，镇定灵活地完成着党的任务。她回到渠县老家，收回了被她父兄掠夺的田产，利用蒋介石“抗日胜利后三年减免四川田赋”的诺言，成功地抵制了反动政府为发动内战而搞的征粮。内战爆发后，她又以修建舞厅为名变卖田产，暗中购买武器被服，给地下党领导的起义聚集点送去。她自己还假称画画写生，上华蓥山勘察地形，准备起义枪声打响后，直接上山参加武装斗争。

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后，杨汉秀在1947年被捕，先后被关在渠县警察局和成都将军衙门省特委监狱。

因为她是毁家纾难的著名抗日战士，特务找不着她“从事共党活动”的证据，到头来只好雇一乘轿子送她回渠县。1948年8月，反动派对华蓥山起义进行了疯狂的大清剿，杨汉秀由西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亲加逮捕，专车押送重庆，先关老街监狱，后囚于渣滓洞女牢。

扭完了秧歌，杨汉秀出了一身汗。她走到牢门前，用手擦了擦鬓角上的汗珠，凝神远望。

一群吱吱叫着的麻雀，扑过电网，向远方飞去。她的心也飞向远方，飞向了延安……大合唱拉开了春节联欢会的帷幕。新颖别致的春联贴在了一间间牢房门口。在敌人的机枪监视下，精彩的节目层出不穷。

大家热切期待着的春节终于来到了。

凌晨，夜色渐渐隐退，牢门外15瓦的狱灯还在闪耀着依稀微弱的光亮，岗亭上还不时传来“梆梆梆”的竹柝声响。

就在这时，从一号牢室暮地升起来嘹亮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应和着。开始，歌声略

微显得不十分整齐，后来慢慢地统一了。300个人一条心，300个难友一个愿望，它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铁流。

唱完了《国际歌》，大家又唱叶挺将军的《囚歌》，何敬平的《愿把牢底坐穿》。这两首歌大家人人会唱，也都爱唱。

接下来又唱起了一首渣滓洞洞歌，这首歌从词到曲全是渣滓洞狱中的难友自己谱写的，平时各牢房经常唱，今天变成大合唱，唱得分外有感情：

远处有鸡啼报晓，太阳随黎明而到，黑夜已经死灭，这世界已再没有强盗。离乡背井的人赶快回家去团圆，被侮辱与损害的已不再呜咽嚎啕，艺术家、科学家、作家、教育家，抬起你的头来，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工作和歌唱吧！不再有人捏住你的笔杆锁住你的嘴巴。种过田的总得有饭吃，作过工的总得有福享，挨过饿的不去再挨饿，受过冷的不愁再没有衣裳，坐牢的已不再是革命战士而是那些妖魔鬼怪、豺狼虎豹。啊……天亮了，远处有鸡啼报晓，太阳随黎明而到，黑夜已经死灭，这世界已再没有强盗！当唱到“坐牢的已不再是革命战士而是那些妖魔鬼怪、豺狼虎豹”一句时，稍微出现了一点混乱。有人接着往下唱，有人却回过头来重复这一句。没有任何人出面指挥，大家的心意很快就相通了，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一句。最后，大家开始齐声高唱渣滓洞全体难友共同议定的“洞歌”，它就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这是古代的“囚歌”，但却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为世代所传颂。这首诗很长，抗战时期，作曲家江定仙截取其中部分段落配上曲，由诗成歌。这首歌的歌词并不是所有的难友都弄得懂，但是一的“天地有正气”一句就把人带入十分庄严的境界之中：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有明。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舌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凜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同志们唱得酣畅，唱得兴奋，歌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早晨。在歌声中，狱中春节联欢会拉开了大幕。第二个节目是互赠贺年片，互送礼物。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祝同志们春节愉快！

楼下一室全体同志敬贺一张香烟盒纸，制成四张贺年片，用竹签笔写着苍劲的蝇头小楷，下端画着刚出土的小草，引用白居易的诗，寓意深刻。

楼上一室的同志用贴锡箔的白纸片，写上工整、秀丽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

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的同志，把罐头上的广告牌纸保留下来，在反面写着：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

越过高墙，穿过云端；

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新年礼品琳琅满目，雅致大方，大多是同志们的精心创作之物，凝结着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黄泥精制的围棋、象棋、跳棋，也有纸壳扑克、84张牌。最灵巧雅致的要数五角星、小红心。这是余祖胜的作品。五角星象征光明、象征胜利，表达了难友们爱党爱国的一片赤诚。

第三个节目是张贴春联。

监狱里吃两顿饭，平时开饭的时间很晚，今天却提前了许多，而且那一排热气腾腾的稀饭桶还散发着米香，这香味可是从前不曾闻到的。

看守把稀饭桶摆放进放风的院坝里后，各年房的门就打开了，难友们争先恐后地涌出来，互致问候。

“过年好！”

“过年好！”

每间牢房都有几个人顾不上拜年，他们抢先把饭桶提到自己所在的牢门口，盛出一点稀粥当浆糊，把事先写好的一小块草纸黏贴成长条，然后把春联牢牢地贴在签子门的两边。

还没等难友们吃完饭，各牢房门口都已经是焕然一新了。

楼下七室的对联：

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横额：乐在其中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
横额：极乐世界楼上五室对联：

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横额：万象更新楼上二室对联：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横额：春回大地早在构思这些对联的时候，难友们就想到了既要含蓄巧妙，又要有过春节的喜庆气氛，还要有战斗意义。现在看来，这些目的都达到了。

李磊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看过来，摇头晃脑地品评着这一副副春联。当他走到楼下七室门口时，脚步停了下来。

“我看横额上这个‘乐’字用的不好，我建议换个字。”李磊搞不明白这些坐大牢的人有什么欢乐而言。

一位难友挖苦道：“把‘乐’字换成‘苦’字怎么样？”

李磊自讨没趣，悻悻地走开了。

猫头鹰和一些小特务也来看对联，更是看得莫名其妙。他们被难友们的兴奋、喜悦、冲动弄呆了。

吃过午饭，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李磊已经回五灵观家中过年去了，徐贵林早就拖着老婆、孩子进了城。当班的正好是黄茂才，他是难友们多次教育的策反对象。女室的杨汉秀、胡其芬、曾紫霞等人便大胆地向他提出：“过春节，我们要表演文娱节目，请你行个方便，开门大放风！”

黄茂才见上司不在，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为防万一，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墙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

牢门一开，难友们狂奔而出，有的伴随着铁镣的哗啦声跳起“踢跼舞”，

有的在放风坝上翻跟头，有的拍手欢跳，有的相互拉扯放声大笑……在这个阴森、恐怖的监狱里，一个史无前例的春节联欢会开始了！

没有乐器，脸盆、漱口盅以及铁镣的碰撞声变成了一支“交响乐队”；没有导演和节目主持，难友们即兴发挥，不拘一格，节目层出不穷。

楼四室的精彩节目“空心筋斗”开始了。表演者头朝地，脚朝天，翻身腾空旋转360度，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一连串人影，形成一根长长的抛物线，从院坝这边翻到院坝那头，赢得了难友们齐声喝彩。

接着七八个人围拢过来站成一个大圆圈，五六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圈，三四个人再站上去，一层、二层、三层……最小的圆圈上只站着一个人，手执小红旗，迎风招展，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布置，借此侦察墙头上的电网设施。这个节目叫“叠罗汉”，是楼五室的同志为刺探敌情有意安排的。它引来又一阵的欢呼声。

放风院坝里变成了一个大舞台。楼下八间牢房前的台阶上坐的全是人，楼上的楼栏后边也是人，就好像是两层的戏台。

院坝里的精彩节目一个接一个。

在楼上，几个难友把李承林扶了出来，一来让他看看节目开开心，二来也让他出来换换新鲜空气。

李承林是在万县和江竹筠一起被捕的。他的公开职务是和成银行万县分行的副经理兼营业部主任，在党内是江竹筠的联络员，他的妻子曾琼英也是地下党员，他们的家成了党的联络点。

他妻子曾琼英是和丈夫一道被捕的。但由于她身怀有孕，暂时得到保释。

李承林拖着病弱的身体被关进渣滓洞监狱。

曾琼英哪里还能休息，急忙赶到重庆，托人营救。和成银行总经理、四川金融界巨子吴晋航先生亲自出面作保，徐远举以案情严重为由，概不买帐。但也给了吴先生一点小面子，同意家属可以送点吃的、穿的、用的进监。因为李承林患有肺病，曾琼英设法送去了几瓶鱼肝油。这在当时算是名贵药品，对身体衰弱特别是对肺病有滋养功能。

李承林的牢房关着6名难友。他提出这些鱼肝油应归大家共同分用。其他同志不干。经过反复争议，最后商定，由3个体弱有病的同志食用，包括李承林本人在内，并由他掌握，平均分配。

过了几天，难友们发现了秘密：李承林“作弊”。原来，他用滴管分给那两位同志的是每人每天6滴，而他自己却是4滴，少了两滴。尽管那两位同志提出“抗议”，他依然我行我素，实行不均的分配。

“两滴鱼肝油”的故事在难友们中间早已流传开来。因此，当李承林出现时，很多人向他微笑致意。

李承林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的江竹筠。她的脸色虽然比以往苍白了许多，但却依然像从前一样整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身上的阴丹士林布旗袍一尘不染。

江竹筠也看见了李承林，兴奋地向他挥手致意。李承林也扬起手臂，使劲挥动着。

突然，从女牢里传出了歌声，随着歌声跑出了杨汉秀，她腰间系着大红大绿的绣花被面，边唱边跳，在放风坝里扭起了陕北秧歌：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随着欢快的歌声，踏着轻盈的步履，一群女难友，浓妆淡抹，翩翩起舞。丝光被面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五十多岁的邓惠中也加入了跳舞的行列，提着个空桶扭起来。跛脚的李青林正踏着有节奏的舞步，江姐的脸上布满红云。只有有着崇高理想的人才能在这个时候跳得这样优美，这样自如，这样使人感动。

左绍英抱着“监狱之花”，楼上楼下地忙着给叔叔伯伯们拜年。小卓娅被大家轮流抱着，她咧开小嘴，恬静地笑着。

欢快热烈的秧歌很快就使大家热血沸腾，很多人都冲进院坝，参加到跳舞的行列中。

联欢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看守的特务被这沸腾的场面惊呆了，他们拉响了枪栓，几乎是一触即发。

一位难友一边跳舞一边大声地说：“真有意思，这里又可以跳舞，又可以唱歌，还有人架机枪保卫我们的安全。”

轻快的秧歌舞曲久久地在空中缭绕，整个渣滓洞又爆发出了充满激情的大合唱：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那猪羊出了门。

《红岩》小说对这次大联欢作过生动而精彩的描写，但与事实还是有一定出入。比如，小说中写的联欢发生在元旦，实际上是春节，两者相差一个多月。

另外，在一些文艺作品以及回忆录中孙明霞（即曾紫霞）都是头上打了一个鲜红的蝴蝶结。可是据曾紫霞自己讲，当时她跳舞时头上根本没打蝴蝶结，而是在脖子上围着一条鲜红的小围巾，这是刘国钰留给她的唯一纪念品。

一个个人影溜进了楼上一室，“铁窗诗社”在铁窗下宣告成立。黑牢诗人蔡梦慰决心写出一首长诗来。

整个渣滓洞监狱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别开生面的春节联欢会把岗楼、碉堡上持枪警戒的特务们的注意力全吸引过去了。就在这时，一个个分散的人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了楼上一室。

刘振美站在牢房门口，与进来的每一个人紧紧握手。

刘振美是1947年3月在泸县被捕的，1948年转押到渣滓洞。他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思想进步，热爱共产党，因而多次遭到特务逮捕。1940年底，他在剧团里痛打特务，被当作危险分子关进西昌邛海监狱一年又十个月，中间多次被拉去陪杀场。有一次，土已经埋到了他的胸部，但他仍不屈服，后被朋友赎了出去。

今天，在这里要举行“铁窗诗社”成立大会，由刘振美主持。

早在1948年“六一”周年纪念日，刘振美就作过《无题》七律诗一首，请“洞中诗友”斧正：

凤尾重来逞艳姿，巴山夜雨梦回迟；
史家高秉董狐笔，诸子低吟鲁迅诗。
初稼新逢六月五，厄杨仍发一年枝；
余杭入狱从无泪，坐看中天日影移。

同一天，担任过《挺进报》刻写工作的古承铄又将一年前被捕时所作新体诗《“六一”大逮捕有感》奉献给了狱中难友。

假如天崩地裂，假如天要垮下，假如一动就会死，假如有血才有花……

只要能打开牢笼，让自由吹满天下，我将勇敢上前，毫不惧怕！这两首诗，抒发了作者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和至死不渝的革命立场，表达了铁窗难友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大无畏气概。这两首诗很快就在难友们中间传开来，大家争相传诵。就从这时候开始，他们秘密酝酿着在这座杀气腾腾的黑牢里，组织一个反监禁、反迫害、反杀戮的文艺联盟。

1949年春节将至，入狱才三个月的傅伯雍为庆祝三大战役胜利赋七绝诗《入狱偶成》一首：

权把牢房当我家，长袍卸去穿囚褂；
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放心花。

这首诗，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了各个牢房。第二天放风时，难友们纷纷在烟盒纸、草纸上写上和诗，传递给他。

杨虞裳的和诗写道：

英雄为国就忘家，风雨铁窗恨磕牙；
革命成功终有日，满天晴雪映梅花。

刘振美的和诗是：

誓歼国贼野心家，生命何须问子牙；
乐观主义心无畏，坐对铁窗吐笔花。白深富的和诗是：

只为祖国不为家，消灭群凶与爪牙；
正气歌声震寰宇，要叫铁树开红花。艾文宣在和诗中写道：

别妇抛雏不顾家，横眉冷眼对虎牙；
深知牢底坐穿日，全国遍开胜利花。张学云在和诗中号召大家。

对敌斗争靠大家，酷刑难熬紧咬牙；

蒋贼兵败末日近，坐穿牢底戴红花。接到和诗，傅伯雍仿佛看到了难友们的一颗颗红心。于是他就和艾文宣等人商量，成立一个“铁窗诗社”。

机会终于来了。在春节这一天，利用大放风的绝好机会，20多名革命诗人席地而坐，宣告“铁窗诗社”在铁窗烈火中诞生了。

为了防止特务闯进来，事先就布置好了由余祖胜、张朗生轮流在牢门外放哨。

主持人刘振美首先发言：“组织诗社的目的，是要以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把竹签笔当作战鼓、号角，揭露强盗的罪行，迎接革命的胜利。”

杨虞裳接着说：“革命者决不能沉默，每个战友都应拿起笔来战斗，既要无情揭露敌人，又要写出我们的理想、未来和狱中生活。但是要注意监狱的特殊环境，传递诗歌必须保密。”

蓝蒂裕补充说：“短诗以口传为主，需要抄在纸上传阅的，一定不要写作者姓名，防止敌人搜查。”

为庆贺“铁窗诗社”的成立，杨虞裳带头朗诵了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何雪松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灵魂颂》。张朗生、陈丹墀、张学云等都相继朗诵了自己的新作。诗友们心情激奋，直至“收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铁窗诗社”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集体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铁窗诗社”成立后，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节节败退，敌人对难友的监

视更加严密，放风被取消了。敌人只要发现有字迹的纸屑，总要追查到底，手铐脚镣随时可以加在难友身上。然而诗友们仍要作诗，要歌唱。一支竹签笔搜去了，再削一支继续战斗。在这期间，“铁窗诗社”的诗友们先后创作了许多熠熠闪光的诗篇。

“铁窗诗社”的诗友们绝大多数在黎明前倒下了，他们留下来的诗稿也大多残缺不全，而且他们很少被称为诗人，但是他们每一个人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首壮丽的诗篇。

他们都是真正伟大的诗人。

在“铁窗诗社”成立的集会上，有一个人很少说话。他叫蔡梦慰。他平时在牢里也很少说话，而且身体很不好，患有严重的肺病。但是他行动起来却不慢，散会后一回到牢房，就拿起笔写起诗来。

他正在创作一首长诗，计划写五章，暂定名为《黑牢诗篇》。他要用诗的语言揭露这禁锢的世界，歌颂闪光的意志，诉说心灵的期待。

读者们一定还会记得那个陈柏林，他被捕前是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家书店的老板就是蔡梦慰。

蔡梦慰出身贫苦，但酷爱文学，抗战胜利时在成都《工商时报》、《遂宁导报》当记者，写过很多文章，展示了出色的写作才华。1945年，他参加了民盟。

1946年6月，民盟组织交给蔡梦慰一个艰巨的任务：在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上创办成都现代书报社。蔡梦慰任经理，另一位同志作副经理——一共就他俩。经过艰苦努力，仅仅几个月时间，到书店来租阅进步书刊的青年就达到四五百人。对贫穷的学生读者，他们免收租金。蔡梦慰主动接近这些青年，帮助他们挑选书刊，热情介绍进步书刊。他还做了一副木推车，将书送到各个大学。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文献》、《整风文献》，在四川都是从现代书报社发行出去的。

现代书报社被特务监视以后，组织上决定让蔡梦慰转移到重庆经营民联书店。

民联书店的地址在重庆邹容路，楼下营业，楼上是寝室，蔡梦慰改其名为现代书店。这里有两个青年店员，一个是陈柏林，一个是潘星海。他们俩后来都被抓进渣滓洞，被敌人杀害了。

现代书店被查封后，他又转移到西南土产公司，同时悄悄筹办文城出版社。就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许建业，参与了《挺进报》的秘密散发工作。

被捕之后，徐远举见他文笔很好，动了爱才之心，想让他为己所用，便劝他投降，但被他严辞拒绝了。

《红岩》小说中曾多次引用过蔡梦慰《黑牢诗篇》中的诗句，但却没有出现过这位黑牢诗人的形象。下面就让我们从他著名的《黑牢诗篇》第一章、第三章中选出数节抄录下来，作为对这位诗人的永恒纪念：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锢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
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气呵，
日光呵，
水呵……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
被当作牲畜，
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长着脚呀，
眼前却没有路。
在风门边，
送走了迷惘的黄昏，
又守候着金色的黎明。
墙外的山顶黄了，
又

绿了，多少岁月呵！在盼望中一刻一刻的挨过。讲着人的语言，穿戴着人的衣冠，完全同人类一个模样儿，却长着蛇与狼的肺脏。让天真的生物学者去疑惑——世界上会有这种动物！这里的二百多个人，每一个都是活证，每一个的身上永留着它的爪痕。热铁烙在胸脯上，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用凉水来灌鼻孔，用电流通过全身……人的意志呀，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像金子一般的亮！像金子一般的坚！可以使皮肉烧焦，可以使筋骨折断；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用刺刀来切割胸腹吧，挖得出的——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第八章 黎明前的黑暗

台上的李宗仁答应释放杨虎城，台下的蒋介石却不答应。周养浩和徐远举一唱一和，把杨虎城骗到了贵阳。

这几天，徐远举从来没有这样心烦意乱过。

一翻开报纸，全是和谈的消息。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一登上代总统的宝座，就慌不迭地找毛泽东谈判。这次可不像三年前的重庆谈判，共产党的腰杆硬了，口气也硬了，一口气就提出了八条二十四款和谈条件，其中最让徐远举关心的是共产党也把释放全国的政治犯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作为和谈条件提了出来。

看来，共产党人既没有忘记自己的同志，又没有忘记老朋友。当年，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功勋卓著。如今，共产党大有夺取天下之势，更是把张杨二将军当成了千古功臣。

李宗仁不敢贸然接受共产党的和谈条件，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代总统只是个傀儡，真正说话算的还是蒋介石，不过他还是要作出一点姿态来，于是便在南京公开表示可以释放政治犯及张杨二将军。

消息传到重庆，新闻界人士吵吵嚷嚷地找到杨森，找到徐远举，要求去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探望杨虎城。紧接着，“西安事变”中担任过西安戒严司令，如今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打来电话，表示要亲自来重庆接杨将军出狱。

这种事情徐远举可作不了主，他一边矢口否认杨将军关押在重庆，一边紧急请示毛人凤。

这种事情毛人凤也作不了主，他立刻赶赴蒋介石的老家浙江溪口，向蒋介石当面请示。

很快，徐远举就接到毛人凤的指示，用军用飞机将杨虎城悄悄送往贵阳黔灵山麒麟洞，继续秘密关押。

徐远举、周养浩等人火速赶到关押杨将军的杨家山囚室，请他作好离开重庆的准备。

杨虎城还没等徐远举把话说完，就大发脾气：“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

徐远举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让周养浩出面。周养浩施展骗术，好说歹说才使杨虎城相信，此去贵阳是为了从那里转往台湾。张学良已经去了台湾，总裁特别指示也让杨虎城去。

杨虎城对周养浩的话也是半信半疑，但他看得出来，如今去不去贵阳已经由不得自身了，于是就提出了几个条件。

“你提什么条件都行，我们尽量照办。”周养浩听出杨虎城的口气有些松动，心中大喜，又是点头又是哈腰。

“第一个条件，把我夫人的骨灰带上。”

“可以。”周养浩不加思索就答应下来。

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性格刚烈，对蒋介石、戴笠以及看守特务极为仇视，终日痛骂。在贵州息烽监狱时，还曾以巨碗痛击特务队长李家杰的头部。李家杰怀恨在心，就千方百计挑拨杨将军夫妇之间的关系，又找借口强

迫杨将军夫妇分居。杨夫人经不过一再刺激，身体日益衰弱。

1940年秋天，杨夫人生下一个女孩，取名杨拯贵。由于产后失调，再加上积郁过重，造成神经失常。杨将军多次恳求戴笠送他夫人出去治病，但戴笠总是借口说这种病不可能短期治愈，只可长期调养。这么一耽搁，杨夫人的病日益加重，终日狂呼怒骂。1949年春天，她含愤去世。

对于夫人的去世，杨将军深感自责：要不是追随自己过狱中生活，夫人怎会染病身亡？所以，他决心要把夫人的骨灰时刻带在身边。

“我还有一个条件。”杨虎城想了想又说：“我的两个孩子已到了读书的年龄，可是你们又不准出去读书，那只好让宋绮云夫妇跟我一起走，给他们当老师。”

杨虎城此时的想法是，把宋绮云夫妇和小萝卜头带在身边，危险要小一些，敌人毕竟不敢轻易对自己下毒手。

他万万没有想到，如果让小萝卜头随父母留在白公馆，也许还有一线生存的机会。

周养浩和徐远举迅速交换了一下意见，对杨虎城的第二个条件也答应下来。

“还有，我的副官阎继明，勤务张醒民随我多年，感情很深，也让他们跟我一起走。”

“这个自然。”周养浩再次表示同意。

两天以后，周养浩亲自陪同杨虎城一行乘飞机飞往贵阳，住进黔灵山戴笠生前的住室。

到了这里，杨虎城很快就发觉自己受骗了。在外围担任警卫的既有国民党正规军，又有贵阳的宪兵。毛人凤还把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鹤调来，加强看管。

杨虎城要找周养浩，可是这时候连他的人影也见不到了。

张群领受蒋介石特殊使命，来四川主持西南军政大计。张群发话，徐远举不敢不放人，但他还是把刘国铨的名字从放人名单上划去了。

骗走了杨虎城，让徐远举头痛的事情还没有完。刘航琛、何北衡、卢作孚这三位西南地区的头面人物，一起找到了新来的国民党西南军政最高长官张群，联合要求释放刘国铨，把他送到香港去。

张群把刘、何、卢三人的联名保释信批交给徐远举，让他掂量着办，意思是只要徐远举同意，就可以放人。

接着，何北衡又和成渝铁路工程处警务处处长曾晴初来到曾家岩徐远举的家中，向他当面求情。

“现在是和谈时期，李代总统已明确表示要释放政治犯，徐处长就请高抬贵手吧！”何北衡此刻有求于人，态度显得格外谦恭。不过，他现在可不怕徐远举了。当年他就是张群面前的大红人，如今张群再次坐镇西南，他的腰杆又硬了。

“这个老滑头！”徐远举心中暗骂，脸上却堆着笑容。“我也知道现在是和谈时期，但刘国铨是共党要犯，又毫无悔改之意。要是把他放了，兄弟我向上边也不好交待呀！”

“可是张长官的意思……”何北衡故意只说了半截话。

“请二位容我去请示毛局长，如果他肯点头，我立即放人。不过你们放心好了，刘国誌在狱里也不会受什么苦。像他这种人，多给他一些教训也是有好处的嘛！”

打发走了何北衡和曾晴初之后，没过几天，徐远举又被张群叫到了长官公署。

张群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身穿西装的先生，经张群介绍，徐远举才知道此人是家住重庆的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

张群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纸，递给徐远举。

“这是民盟中央开列的在重庆、成都两地被捕的民盟盟员名单，也有在外县被捕的。他们虽然是政治犯，但都不是共产党，你过一下目，该放就放了，也算我们表示一下和谈的诚意。”

徐远举接过名单边看边在心中暗数，这上面一共列有37个人的名字。

“徐处长，你看怎么样？”张群好像有些不耐烦起来。

“这上面列的并不都是民盟盟员，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徐远举用手指头点着名单上的几个名字，说：“杨伯恺、田一平这两人就是共产党员。还有刘国誌，他也是共产党员，他自己都承认了呀！”

还没等张群开口，那个范朴斋先说话了，而且对徐远举毫不客气。

“你们天天喊要释放政治犯，他们就是共产党员也应该放。”

徐远举不晓得此人有何来历，没敢与他顶撞，把脸转向张群：

“据我掌握的情况，这张名单上有很多人不是民盟的盟员。”

张群没有回话，反而把目光转向了范朴斋。

范朴斋一挺身从沙发上站起来，气呼呼地对徐远举说：“我开的名单我负责，他们是不是盟员难道我不知道吗？我说他们都是盟员，必须释放。”

张群挥了挥手，拿出一副和事佬的口吻：“你们俩去商量一下，拿出个意见来告诉我。”

张群离开了。徐远举无可奈何地与范朴斋坐到一起讨价还价。按徐远举的想法，放三五个人应应景就行了，但看样子张群不会答应，范朴斋更不会同意。

徐远举明显感觉到，张群和他的前任朱绍良全然不同，这位张长官明显不想让自己的手上沾上鲜血。但是他万万不敢得罪这位曾当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张大人。1946年他就是国民党政府重庆行辕主任，如今又领受了蒋介石的特殊使命，前来四川主持西南军政大计。别说他一个小小的处长，就连他的顶头上司毛人凤，也不敢和张群过不去。

这次张群来四川上任，很多作法令国民党中的死硬分子大为不满，徐远举对此也有所耳闻，但他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内幕。这次张群要他放人，他觉得这里边也一定有名堂。

徐远举不愧是个老牌特务，没见到的事情也能让他猜对三分。

张群此次领命来四川之前，特地先到上海，看望被软禁中的民盟主席张澜。张澜对张群说：“今天的大局你还不清楚吗？最好是跟人民走。”

张群长叹一声：“我也明白不行了，但我不能背离蒋公。现在我要回四川了，表老还有什么指教？”

张澜说：“你回去应该为四川人民做点好事，首先应该释放政治犯，关起民盟那么多人应该放。还有征兵征粮少做些，也不要准备在四川打内战，这就为四川人民造福了。”

张群当面一一答应：“这些事回四川后我一定设法办。”

随后，张群又在贝当路毕加第公寓中楼 50 号宴请黄炎培。黄炎培为张群分析了局势，劝张群要考虑退路，并指出国民党要求恢复和谈，先要表示和谈诚意，立即可以做的是释放政治犯。黄炎培提出，上海被捕的盟员陈维稷（也是中共党员，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多年）、苏延宾、陈四维、笕移今等应该立即释放；重庆和成都也有不少盟员被捕，请他回到四川就释放。

张群长叹道：“我明知事已不可为，但与国民党四十年关系，与蒋四十年关系，还有什么办法？至于被捕的盟员，我到了四川就查。过去一件件事都是你要我帮忙，今后要你为我帮忙了。”

长谈之后，张群黯然离去。

张澜和黄炎培决定利用时机，设法营救一批被捕入狱的革命同志。张群一到四川，重庆方面就派出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去和张群交涉。张群会见了范朴斋，要范开出名单，以便释放。民盟组织经过研究，提出了一份 37 个人的名单，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或交叉党员，民盟组织是想趁机多营救出一些中共同志。

几天后，张群又约见范朴斋，他先郑重其事地请范把他的话转达给张澜主席：“征丁已由 42 万人减少到 6 万 2 千人了；征粮已停征实物；建军任务除郭汝瑰、陈春霖两军及孙元良两军是旧番号整补外，新番号如罗君彤之十八纵队等六个师都取消了。”

随后，张群才把徐远举找来。于是就出现了刚才那一幕。

经过反复争执，徐远举终于作了较大让步，同意在 3 月 30 日那天黄昏和晚间，分三批放出 21 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如仲秋元、屈楚等。如果没有这次成功的营救活动，这些人生还的希望很小。

但是徐远举坚持把刘国铨的名字从放人名单上划掉了。他告诉范朴斋：“我人是不能不放，但我总不能全放呀！”

徐远举不想释放刘国铨，但他又怕张群的面子上交待不过去，便做了个姿态，准备把曾紫霞放掉。

实际上，直到这一年的八月末，曾紫霞才获释出狱。就在曾紫霞即将出狱之时，江竹筠用竹签子在毛边纸上给谭竹安写了一封信，托曾紫霞带了出来。这是她在狱中写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江姐写道：

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我有必脸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 6 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

曾紫霞很快就把这封信交到了谭竹安手里。他和姐姐谭正伦把这封信秘密保存起来，同时下定决心，不管担多大的风险，也要把彭云抚育成人。

解放后，他们把这封信交给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馆。凡是前来这里参观的为父母者，读着江姐的最后一封信，无不耸然动容，伫立凝想：江姐给自己孩子定的养育标准，现在有多少父母真正做到了呢？

这一年四月份，杨汉秀也出狱了。她是被杨森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接出渣滓洞的，软禁在重庆金汤街市民医院的特等病房里。

出狱之前，杨汉秀特地找到左绍英。她早就听说左绍英除了在监狱里生的小女儿外，还有一个女儿寄养在地下党员袁尊一家中，而此时袁也被捕关进了渣滓洞监狱，孩子的处境十分危险。

杨汉秀把小卓娅抱在怀里，一边亲着她的脸蛋，一边对左绍英说：“你放心，如果我能出去，就一定设法找到你的女儿，把她养起来，然后再交给你。”

一提到孩子，左绍英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她在狱外有两个不知下落的苦命孩子，她被抓走的时候，那两个可怜的孩子还躺在床上熟睡呢。

难友们经常安慰她，她听了之后只能是凄然地答道：“为了革命，什么也顾不上了，像这样的孩子多得很……”

杨汉秀出狱后，从医院偷偷回到广安，找到了左绍英的女儿王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迫害，她谎称王凯是拣来的孩子，为她改名叫李凯，请农民李自才照料。

9月2日，重庆市区突然着起了一场大火，朝天门一带市区顷刻间化为焦土，上万人葬身火海。这把火是特务故意放的，但为了掩人耳目，杨森下令由重庆警备司令部提出几个关押已久的犯人，声称他们是“放火的共产党人”，拉到火场上枪毙了事。

火灾发生时，杨汉秀目睹了现场惨况，怒不可遏，当面指斥杨森反动成性，杨森恼羞成怒，指示他的爪牙、重庆警备司令部刑警处处长张明选将她暗中逮捕，秘密关押起来。

9月23日夜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沿着成渝公路飞驰而来，车后座上坐着一位身穿褪色列宁服的女子。她就是杨汉秀。

汽车开到歌乐山金刚坡下，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杨汉秀猝不及防，前额重重地撞在前边的椅子上。

她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阴谋。这天下午，她的亲伯父杨森下达了将她处死的命令。

坐在她身旁的特务把早已准备好的绳索熟练地套到杨汉秀的脖子上。杨汉秀觉得情形不对，立刻高声怒骂起来，可是她还没骂上两句，喉咙就像被塞进了一块火炭，什么也喊不出来了……

两个特务手忙脚乱地把杨汉秀的尸体抬下车来。他俩事先已经相中这儿的路边有一个废弃的碉堡，正是弃尸的好地方，就在里边挖下一个浅浅的土坑。

正要把她推进坑里，一个特务发现杨汉秀还有一口气，就对准她的心脏补了一枪，然后推进坑里，找来一块大石板，压到她身上，胡乱地埋上一层土，仓皇离去。

特务看守黄茂才被难友们争取过来，由他接通监狱内外的联系。地下党派人打入集中营警卫部队内部，摸清了集中营内的情况。

春节联欢会过后，特务就把女牢通向放风院坝的牢门封闭了。他们已经觉察出来女牢与男牢有联系。

女牢的难友对此早有准备，还没有堵完门时就在一个地方用小木块垫上，以后再取出，这个小洞就成了男女牢房之间的通讯孔道。在女牢门封闭后，靠天花板顶的墙边留了一条钉着交叉木板条的通气带，有两尺多高，女

难友在双人铺的上铺站着，就可以同在女牢墙外台阶上散步的男难友对话。

特务看守还没有想到，他们本身也为难友们当过“通信兵”。有时候，他们闲着无事，就抱着小卓娅到那边的院坝里去玩。在她身上随便放个纸条很不容易被发现。男难友们装作逗孩子玩，就把纸条取走了。

从男牢传来消息说，敌人加强了防范，他们那边与狱外同志的联系几乎中断。而在这个时候，与狱外党组织的联系与生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于是，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的重担就落到女牢中同志们的肩上。

胡其芬、李青林、江竹筠等人，还有当时尚未出狱的曾紫霞，天天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要想与狱外同志取得联系，首先要找到一个能够在狱内外来回走动的人。排来排去，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黄茂才。他可以借休假之机进城，而且他为狱中同志办的很多事情足以证明他可以信任。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女牢的难友们轮番找他谈话，让他明白国民党就像一株靠不住的枯树，唯有弃暗投明，多为革命做好事，才能争取个人将来有政治出路。

男牢里经常找他谈话的有陈作仪、韩子重等人。他们讲的道理黄茂才都能听得进去，尤其是韩子重的话更让他动心。韩子重在国民党四川军管区里当参谋，他父亲是军管区副司令。像他这种人都认为国民党非垮不可，看来国民党真是大势已去。

确定了送信的人，还要找一个收信的人。这个人第一要绝对可靠、安全；第二要便于联系，既要黄茂才容易去找，又要对方容易被找到；第三要能够将情况反映到上级组织那里，也就是说有组织关系的人。讨论来讨论去也未能提出可靠的人来。

最后，还是曾紫霞提了一个人，大家都觉得挺合适。

这个人叫况淑华，和曾紫霞在重庆大学医学院是同年级、同班、同寝室的同班同学，一起参加过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政治上很可靠。更重要的是同曾紫霞一块搞学生运动的一批人没有一个被捕的，在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之后，对这样一批人一定会有党组织去找他们。因此，只要和况淑华联系上，就一定能同党组织联系上了。况淑华的家住在七星岗协合里，是市中区比较热闹的地方，而她家又不是在热闹的大街上，家中的人也比较少，不会使黄茂才的行动被人发觉。

刚开始交给黄茂才带给况淑华的信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也没有要与地下党组织接头的意思。试了几次，没有出现问题，才把比较重要的信交给黄茂才带出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女牢中难友们的分析和判断都是正确的。况淑华一接到狱中来信，就立刻转交给当时沙磁北碚区的地下党领导小组组长刘康同志。

关押在狱中的难友坚持不懈地与狱外的同志进行联络，是为了争取有朝一日能冲出牢狱，为一个壮丽的理想生存下去，而狱外的党组织也一直在千方百计为解救他们进行着艰难的努力。

1949年7月，川东特委在原市中区临江路45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专门研究了如何加快营救狱中的同志，决定“在不放弃通过个别上层人物和个别社会关系……营救个别被关押战友的同时，还应积极作好准备，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进行动狱。”

9月，川东特委正式决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具体由特委委员林向北负

责。林向北随即找来地下党员张平河，指示他立即潜入磁器口 24 兵工厂，设法打入该厂警卫队，获取武器，集聚力量，待命行动。

张平河奉命潜入兵工厂后不久，一件意外的事一下子大大加快了营救的进程。

一天，张平河在磁器口街上看到一张交警一旅招兵的布告。他知道交警实际就是军统的特务武装，交警一旅如果是警卫渣滓洞的部队，那么打进去对营救工作不是更有利吗？他决定到磁器口正街他的同学陈立群的亲友蔡遇欧处打听个究竟。

一到蔡家，想不到又遇上一件意外的好事。原来蔡遇欧有个老乡叫徐荣辉，就在交警一旅干训班当军官，而交警一旅也正好就是警戒渣滓洞的部队。张平河不由得喜出望外，便忙托蔡遇欧帮忙把他弄进去当兵混碗饭吃。经蔡遇欧两次说情，徐荣辉答应帮忙。于是，在磁器口正街一个茶馆里，张平河用一包美丽牌香烟、两盘五香瓜子、两盘椒盐花生米、三碗香片沱茶，就取得了一个当兵的名额。第二天，徐荣辉便把张平河带进集中营交警一旅干训班，介绍给一姓孙的副官，补了一个无军饷、只管饭吃的传令兵名额。

张平河打入交警后，川东特委认为这个机会很好，决定让杜文举、陈立洪同志也打进去。张平河便对孙副官说有两个亲戚失业在家，也想来混碗饭吃，并主动暗示也不要军饷。于是杜文举、陈立洪也补上传令兵名额“参军”了。

川东特委指示他们二人由杜文举负责，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一是摸清集中营兵力部署、营房驻地、军事设施、哨卡、路线情况；二是将这些绘制成图。

他们接受任务后，立即机智地开始了侦察。经过近两个月的侦察，他们基本摸清了集中营内的情况。兵力部署方面有交警一旅一个总队约 500 人驻防集中营内，一色美式装备。但驻地分散，兵力不集中（各处均 100 人左右）。还有交警一旅干训班约 300 人驻五灵观，离渣滓洞较远。集中营辖区内有军统特工人员 100 余人，分别持有特别通行证、夜间通行证和临时通行证。凡是持特别、夜间通行证的，可以在辖区内通行无阻。集中营内共有三道警戒线，每道警戒线都有木杠挡路和岗亭守卫。监狱四周布有电网。在白公馆、渣滓洞之间有个较大的军械库，不远处还有一个电讯器材库，电话总机也设在这里，直通两个集中营和大小营门的分机。

侦察清楚后，他们立即潜入 24 兵工厂工人宿舍，将地形图绘制完成并由陈立洪带出交给了林向北同志。

川东特委对这张地图非常重视，并据此安排了营救计划。遗憾的是，由于敌人提前进行屠杀，筹集人员、武器遇到了很多困难，营救计划没能实施。这三位同志也于解放前夕先后撤离。

蒋介石亲自下令斩草除根。杨虎城将军又被骗回集中营，两把匕首刺进了他的心脏。年仅八岁的小萝卜头和父母一起倒在血泊中。

1949 年 8 月，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由台湾飞抵重庆，陪同他的是大特务头子、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这次来重庆，他的心情一点也不好。对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他早已失去信心，但是他总以为西南地区可以抱残守缺。现在看来，西南地区也是

朝不保夕。

前几天，美国一位参议员诺兰跟他说，只要国民党能在四川死守三个月，美国人就可以出兵援助。蒋介石可不敢相信这种大话，他早把落脚点定在了台湾。不过，他对美国人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所以他把撤离大陆前的最后指挥部设在重庆。这次来，他就是要坐镇指挥对西南的防卫，如果真的打不过共产党，他就要让这座山城化为灰烬。

抗战八年，蒋介石在重庆呆了八年，对这座城市生出了几分感情。但是他不能眼睁睁地把它留给共产党。

一到重庆，他就把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重庆市长杨森找来开会。当场他就布置任务，要军统西南特务机关做好准备，把过去逮捕的共产党重要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如果让他们活下来，日后就会成为共产党最得力的当地干部。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准备，一旦重庆不保，就要炸毁所有的兵工厂和重要的电力设备。

“过去就因为我们杀人太少，才造成今天失败的局面。”蒋介石扫了张群一眼。“对共产党人的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酷。”

会后，毛人凤单独留下来，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杨虎城将军及其家属、随从。

“留他干什么？”蒋介石面露凶相。“早就该杀了！”

“那两个孩子呢？”

毛人凤指的是8岁的小萝卜头和杨将军6岁的小女儿杨拯贵。

“斩草除根的道理你不懂吗？”蒋介石白了毛人凤一眼。

毛人凤告辞出来，立刻驱车直奔枣子岚垭濠庐何龙庆的住宅，把徐远举和周养浩找到这里，先传达了蒋介石的密令，接着开始商讨具体方案。

徐远举提议，把杨虎城等人用车拉到川黔公路上的荒山野岭，杀死后就地掩埋。

毛人凤连连摇头：“这件事一定要干得机密，干得利落。我看还是提到重庆来干掉。”

他们商量的大约半个小时，徐周二各人各负其责，领命而去。

9月1日，周养浩和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第三科副科长郑文松乘一辆吉普车，带着两辆卡车赶赴贵阳。

坐在车上，周养浩就想好了对付杨虎城的办法。一见面他就使劲陪礼道歉，然后再告诉他蒋总裁来到重庆，要亲自接见他。目前时局不稳，总裁担心杨将军的安全，一谈完话就派专机送他去台湾。

9月2日中午，徐远举亲自挑选的刽子手来到中美合作所大礼堂，毛人凤早已等在这里。

毛人凤没心情讲什么闲言碎语，一张口便说：“杀杨虎城等人最好不要用枪，免得有声音。”

“报告局长，”西南特区行动组组长熊祥立正答道：“卑职已经和杨进兴商量过了，用刀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还准备了斧头。”

说着，熊祥从腰间抽出一把带鞘的匕首，递到毛人凤眼前。

毛人凤没有用手接，只是扫了一眼，有些不放心地问：“这行吗？”

熊祥、杨进兴一齐说：“我们有经验，绝对没问题。”

“那好吧，汽车一到立刻动手。”毛人凤转向徐远举，吩咐道：“你去安排汽车夜间过江的问题。要保证汽车一到江边，立刻上轮渡。”

一切布置就绪，毛人凤命令参加行动的所有刽子手当场宣誓：“保证完成任务，绝对遵守秘密，如有违反，甘受重处。”

宣誓完毕，熊祥、杨进兴等人先行离去。毛人凤又和徐远举商谈了一会儿警戒问题。

最后，徐远举又向毛人凤请示了一个问题：“听说杨虎城身边有个小箱子，里边装了不少美钞、英镑，这些东西如何处理？”

毛人凤微微一笑，答道：“你就收下，当奖金分给弟兄们吧！”

9月6日，一辆军用大卡车沿着黔渝公路向重庆急驶而来。

驾驶室里，坐着一位身材高大魁伟，长着很长胡须，头戴呢帽，上身穿黄色条纹内衣，下身套着一条蓝裤子，脚蹬一双双鼻梁鞋的老人。

这位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名震中外的“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原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

杨虎城与张学良联合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十年内战的最后结束，有功於国家民族。但蒋介石对其耿耿于怀，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37年，杨虎城出国归来，本想领兵抗日，然而迎接他的，却是特务的秘密逮捕还有辗转各地达12年之久的囚禁。

下午三点多钟，卡车在距重庆138公里处的东溪停下来。周养浩跳下吉普车，来到军用卡车驾驶室旁。

“杨将军，现在天色尚早，赶了一天路你也累了，我看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兄弟我先行一步，到渡口去联系船。”

杨虎城“嗯”了一声，就算是答话了。

周养浩继续驾车开路，晚间七点多钟时，赶到了长江南岸，见到了早已守候在这里的杨进兴。他把郑文松留下来帮忙，自己则从海棠溪渡口过江，赶回家中。他算是大事完毕了。

晚上10点钟左右，杨虎城将军乘坐在那辆大卡车到达江边。车上除杨虎城父子外，尚有张鹤及全副武装的队员10余人。

过得江去，汽车到达集中营戴公祠停车场，已是11时左右了。特务告诉杨虎城，要他在会客室暂住两天，等候飞机到台湾。

戴公祠会客室，建在松林坡半山腰上。这幢孤立的平房隐没在树荫深处，一到夜间就显得阴森、莫测、恐怖。

在特务的“搀扶”下，杨虎城顺着石梯向会客室走来。身后，儿子杨拯中捧昔母亲谢葆贞的骨灰盒跟在后面。此时的拯中虽不满20岁，但10余年的监狱生活，长期的焦急苦闷和营养不良，使他过早地白了头发，显得十分憔悴苍老。

刚踏进会客室，早已预先埋伏在屋外的凶手王少山、林永昌两人立即用匕首猛地刺进走在后面的杨拯中背部。“啊，爸……”拯中挣扎着惨叫了一声，立即倒地身亡。杨虎城听见儿子的惨叫声，刚要转身时，杀人经验丰富的刽子手熊祥、杨进兴迅速从两旁将匕首刺进了他的心脏。杨虎城踉跄挣扎了几下，也倒在地下。

为掩尸灭迹，凶手们马上将杨虎城父子埋入会客室旁的花台下，盖上泥土，并种上花草。

9月7日凌晨1时，又一部卡车驶进松林坡，车上坐着未绮云、徐林侠，还有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和杨虎城将军在狱中所生的女儿杨拯贵。

宋绮云、徐林侠抱着小拯贵，拉着小萝卜头，顺着石梯走进戴公祠的警

卫室。

一路上的颠簸劳累使得两个大人十分疲劳，一进屋里就坐下来休息。两个孩子还没有睡意，一块儿玩起来。

突然间，两个杀气腾腾的刽子手闯了进来。宋绮云和徐林侠一看到他俩露出了狰狞面目，就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

徐林侠抢先一步，把两个孩子挡在身后，高声说：

“我们既然落到你们手里，就不怕死，可决不许你们伤害这两个孩子！”

毫无人性的那两个凶手，好像根本没听到徐林侠说的是什么，拔出亮闪闪的匕首，一言不发地扑上来，劈胸就是几刀。

徐林侠和宋绮云立刻倒在血泊中。

这残暴的凶杀惨象把两个孩子吓坏了，他们哇的一声哭起来，小拯贵一头钻进了小萝卜头的怀里。

两个凶恶的刽子手一边连续不断地用匕首刺着宋绮云夫妇，一边还厉声地向孩子喝道：

“不许哭！不许哭！”

小拯贵还是哭个不停，小萝卜头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两个刽子手杀害了宋绮云，却故意给徐林侠留了一口气，想让她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小拯贵是怎样被杀害的。

刽子手挥舞着血淋淋的匕首扑向两个手无寸铁的孩子，小萝卜头拉起小拯贵，扑到爸爸和妈妈身边，想寻求他们的保护。可是他们已经再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心爱的孩子了。徐林侠的嗓子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她把牙齿咬得直响，两道极其愤怒的目光死死地盯住那两头野兽。

一个刽子手恶狠狠地刺了小拯贵一刀，鲜血立刻染红了她的衣服。小萝卜头急忙把她抱起来，还想躲避开来，可是那两个灭绝人性的畜牲已经向他举起了杀人刀，他高声喊道：

“我不要死！我要活！我要出去……”

这凄惨的声音在漆黑的夜色中回响着，可是谁能听得到呢？

刽子手杀死了两个孩子之后，又在徐林侠身上补了几刀。为了掩人耳目，特务们把全部尸首都埋在室内，并打上了三合土。

四周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顺利地完成了暗杀杨虎城等人的任务，徐远举如释重负，但他也略有遗憾。从杨虎城的那个小箱子里，只找到了几张美钞，不过十几元钱，还有一些小面额的英镑，另外还有一枚金牌，一枚金戒指。这么点东西还真没让徐远举看上眼，他索性上交了。

徐远举逮捕了痛斥过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大喜，重赏徐远举。黄显声拒绝一个人逃走，他要救走更多的难友。

徐远举又要抓人，还要杀人。

他要趁蒋介石在重庆的机会，显一显他的本事。

他要抓的人是总裁恨得咬牙切齿的人，他要杀的人则是共产党要犯。既然毛人凤已经传达了总裁“清理积案”的密杀令，他就决不能放虎归山。

在杨虎城未遇难之前，他就派出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二处副处长杨元森、特区二科科长濮齐伟、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会同国防部军法

局高级法官毛惕园一起，把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案卷全部整理出来，开列名单，先交毛人凤过目，再上报国防部保密局设在嘉陵新村六号的办事处审核，最后送交已经从南京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签准。

一旦名单批准下来，徐远举就要大开杀戒。

徐远举想要抓的人第一个就是周均时。

周均时可不是一般人物，与国民党 CC 派主要头目朱家骅是同学，也是好朋友，但他们两个人走的却不是一条路。周均时 1913 年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转入波兰，潜心钻研弹道学、力学、公算学、计算学。同学们赞誉他“博学多才，通四国语言，聪明又善思考钻研，其才力胜众矣”。

1920 年，周均时怀着“工业救国”的赤诚回到祖国。

然而他富强国家的宏图大志，都在重重阻挠下屡遭失败。于是，他投身教育，寄希望于下一代。他先后在北京、上海各大学作教授，担任过重庆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业试验所所长等职。教学之余仍致力于研究，著有《高等物理学》、《弹道学》等书。他学问渊博，为人正直，诲人不倦，在科技界、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声望。

抗日战争时期，周均时气愤地抨击蒋介石：“彼非真抗战者，特借抗战以遂其领袖欲。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以造就个人势力，推其用心，国家可亡，民族可灭。”

抗战胜利后，他依然抨击蒋介石，毫不留情。1947 年，周均时被选为重庆文教界“国大代表”，他不避风险上台慷慨陈辞，直抒爱国之见。他还时常当众诋毁蒋介石：“把国民党当成他的私党，排斥了三民主义革命性，成为遗害整个国家的工具，实际上他只为他的个人主义、自私主义、官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蒋介石对周均时可谓恨之入骨，但一时还找不到整治他的把柄。没想到这次来重庆，徐远举却让他出了一口恶气。

1948 年春天，周均时参加了以李济深、何香凝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重庆负责人之一。不久，他暗中做策动国民党地方部队起义的工作，不幸被叛徒告密。1949 年 8 月，周均时被捕，囚禁在白公馆。

听到这个消息，蒋介石大喜，立刻召见了徐远举，还给他一笔重赏。

和周均时一个时间被捕的还有周从化。这也不是个一般人物。他出身行伍，却好学深思，在川军将领中有“智囊”的美称。

他作战十分勇猛，又足智多谋，一步步地从士兵一直当到第 23 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 41 军参谋长，川北团管区司令，官衔是中将。

1942 年秋，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育长的杨杰（又名耿光）卸任驻苏大使职务后，应邀到成都讲学，与周从化多次密谈，介绍了不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又对中国时局做了不少分析，对他的思想转化有所促进。

从此以后，周从化在川康军政界上层人士中竭力倡议团结合作，与蒋介石的分而治之策略分庭抗礼，从而被特务告密而受到查办，虽然没有查出什么事实定不了罪，还是把他调任一个挂名不支薪的中将闲职。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民意挑动内战。周从化积极向川康军政界上层人士宣传中共和民盟的主张，并向驻成都的部分师、旅、团的军官做工作，希望他们不要为反共内战卖命，同时也不准自己从远征军回来的

儿子随部队去东北参加内战。

1948年春，周从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事业，他不顾个人安危，进入蒋介石设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反共基地，担当起军事策反工作的重任，同时还承担了筹组川康民革地下组织和人民自卫军的任务。

1949年8月，他在成都家中被捕，特务用专机把他转押到白公馆，关进了平三室。空有一腔报国壮志的将军，转眼成了阶下囚，他满怀悲愤，在牢房里低声吟出一首诗：

神州嗟浩劫， 四族胜狼群；
民生号饥寒， 民权何处寻？
兴亡匹夫志， 仗剑虎山行；

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吟完之后，他觉得意犹未尽，又高声朗诵起来，这声音慷慨昂扬，在狭小的囚室里回荡着。陈然站在楼上一室的牢门口，听着从楼下传来的朗诵声，就知道这个新被抓进来的人一定是自己的同志。这时候，值日看守杨钦典走上楼来，陈然便向他问道：“那个人是谁？”杨钦典见四周无人，便低声告诉他：“听说是个将军，还受了刑，挺坚强的。和你一样的人。”杨钦典和陈然很处得来。他佩服陈然的气节，喜欢听他说话，也从心底信服他。陈然刚来白公馆不久，他俩就攀上了老乡，都是河北香河县人。说起家乡的风土人情，两个人就有说不完的话。陈然告诉杨钦典，全国快要解放了，那时候就要往共产主义奔了，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还要分土地给劳动人民。

杨钦典听得直点头，他向陈然表示，自己也是穷人，不能跟着别人干坏事，坑害为穷人打天下的人。

陈然本来想多和他唠两句，但他今天却神色有些异常，神秘地向陈然摆了摆手，就向隔壁黄将军的牢房走去。

杨钦典今天来找黄将军，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

黄将军在狱外有许多朋友，一直在积极地策划营救他。这一次他们找到了杨钦典，还弄到了一张可以在集中营辖区内活动的通行证。杨钦典认识后山的一条小路，直通歌乐山下。只要趁夜深人静，由杨钦典把黄将军送上路，他就可以逃出虎口。有一辆卡车等候在歌乐山下，只要黄将军一上车，就可以直奔潼南方向。

这个计划应该说是很周密的，但黄将军听过之后，却久久没有开口。

他并不是没有逃出虎口的机会。

1944年底，日寇兵逼独山，威胁贵阳，息烽监狱准备释放一批政治犯。戴笠来到息烽亲自找人谈话，第一批谈话的就有黄显声。

谈话后黄显声闷闷不乐地回到监舍，对难友说：“戴笠释放我的条件是我参加军统当特务。我渴望自由，但我怎能为他去卖命！”

1946年，戴笠乘飞机摔死，息烽监狱撤销，黄显声和另外71名犯人转押白公馆看守所。为了重获自由，黄显声托出狱的难友带出几封信，分别投书东北元老莫德惠和刘哲，请他们保释自己。莫德惠身居国民党要职，读到黄显声的信，老泪纵横，病心疾首，但尽了一切努力却都付之东流。

国民党保密局司法科科长罗起凤签署意见报蒋介石批准，请求释放黄显声，历经一年，批示转下来，竟是蒋介石的手谕：缓放。至此，保释出狱彻底失望。

有一年，罗起凤曾到息烽监狱清理积案。他对黄显声的人品十分崇敬，

同时他也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必然失败。于是，他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准备私自下达命令释放黄显声。待黄显声出狱后，立即安排飞往香港，他也随之逃往香港。

这个计划很有可行性。但是征求黄显声同意时，他却说：“我怎么能逃跑呢？我黄某光明磊落，他们偷偷摸摸抓我，我要堂堂正正地出狱！”

杨钦典看出黄显声在犹豫不决，不禁替他着急，催促道：“你快决定吧，杨虎城将军……”

他下边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黄显声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杨虎城被秘密杀害的消息，他也不再相信同养浩三番五次对他作出的不会杀害他的保证，他知道公开释放根本没有可能。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黄将军，你同意了？”杨钦典高兴地问道。

“麻烦你给我带个口信，就说我同意他们的营救计划，但时间要往后拖。”黄显声思忖片刻，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道：“时间就定在解放军逼近重庆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会乱作一团，警戒也会放松。我要多救几个难友出去。你去告诉李英毅，让他作好准备。”

李英毅是张学良将军的副官，追随张将军多年，忠心耿耿。黄显声很想带他一起逃离虎口。

杨钦典眼睛中闪动着泪花，转身刚要走，黄将军又把他喊住了。

“再拜托你一件事，把这封信捎给我的朋友。”

这是黄显声从白公馆送出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万一不测，是为张学良先生牺牲，他是为了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这是对得起国家人民的，是光荣的……”

杨钦典走后，黄显声从床铺底下抽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用手指肚试了试锋刃，掀开皮背心，掖到腰间。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白公馆，陈然等人欣喜若狂，他们拆下一床红色被面，制成一面五星红旗。

10月7日傍晚，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陈然的耳畔却响起了“啪啪”两下声响。又是黄将军在隔壁敲门，这是送报纸的暗号。这声音与以往明显不同，既急促又响亮，而且时间也比以往约定的提前了许多。陈然略感意外，但还是赶快伏下身去，从门缝边拿起一张报纸。

像以往一样，他的目光在报纸上迅速地移动着。他要先大致浏览一遍，再选择重要的内容细细看。

突然，他的目光好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牢牢地盯住了报纸上的一段话：

“10月1日上午9时，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升起了一面五星国旗，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

陈然一时愣在那里，张大了嘴巴竟然说不出话来，脑子里仿佛空空如也。

人兴奋到了极点，都会出现这种异常。

刘国钰最先发现陈然的情绪不对头，凑过来问：“你怎么了？”

这一句话好像把陈然唤醒了，他压低了声音欢呼起来：“快来看，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同室的难友全都围拢过来。

顷刻间，就好像有一股强大的电流从这里经过，大家都兴奋得身上有些发抖了。

我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

我们的革命成功了！

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水夺眶而出。每个人的肩头都湿了一片，那是被别人的泪水打湿的。

入狱不久的丁地平高兴地 from 床上翻到地上。还没等他爬起来，王朴又扑上去和他拥抱在一起。

他们几个人又手挽着手在牢房当中站成一个圆圈，一起低声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此时此刻，他们还不知道，彭德怀、贺龙领导的第一野战军，连续攻克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已准备向西南挺进。

人民解放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尚未解放的地区全面进军。

然而他们可以想象得到，全国解放指日可待，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彻底砸烂这两口活棺材的日子不远了。

夜渐渐深了，但大家却毫无睡意，还是兴致勃勃地议论着。

“咱们也来做一面五星红旗吧！大家看怎么样？”罗广斌提议道。

这个建议立刻得到大家的双手赞成。

监狱里找不到红布，罗广斌就把他的一床红色绣花被面拆下来。陈然找出一张黄纸，用来制作五角星。

材料凑齐了，可是马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大家只从报纸上看到，新中国的国旗上边有五颗五角星，却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排列的。

于是，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刘国钰思索了半天，才开口说：“我看，这五颗星应该放在旗帜的中央，排成一个圆形。”

“你讲讲这是什么道理？”丁地平含着一杆用黄泥巴做成的烟斗问道。

丁地平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今年5月份才被关进白公馆。当时他戴着脚镣，身上布满刚刚留下的刑伤。这是他被捕后在二处受尽拷打留下的。

丁地平朴实、直率，《红岩》小说中的丁长发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出来的：“一个靠近墙角的人，两腿肿胀，乌紫发黑，双手捂住下巴，噙着杆黄泥巴烟斗，闷声不响。”

别看 he 其貌不扬，但他的经历却很让难友们敬佩。1947年秋，“川康边人民游击队川南分队”正式成立，丁地平任川南分队政委。他们拉起队伍上了龙泉脉的二峨山，会合另一支游击队，准备到洪雅山区打游击，迎接全国解放。在攻打借田街时，丁地平冲锋在前，腹部重伤，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作战。这次战斗大获全胜，攻占了伪区署，夺得一批枪支弹药。打完仗后，上级将丁地平转到成都治伤，伤好后，他化名丁文到重庆中央医院子些管理工作。

就在这时，他被叛徒出卖了。

听到丁地平的提问，刘国钰又把自己的想法讲得更深入一些：“这五颗星放在中央，就象征着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大家都觉得他的见解有道理，就一齐动手制作红旗。

在小说中，也有一段绣红旗的故事，但那是发生在女牢中。作者把发生在男牢中的事情移到女牢去，也许是考虑到做针线活似乎更符合女性的身份特征，同时也考虑到这样可以更好地刻画江姐的形象。

珍藏的红旗拿出来了，在大家眼前闪着夺目的光彩。

这面红旗，是那位不知名的同志——“监狱之花”的母亲，留下來的。残留着弹孔，染透斑斑血迹的红旗，被她珍藏在一床旧棉絮里。

当红旗在大家眼前出现时，几只拿着针线的手，团团围了上来。

“五星红旗！五颗星绣在哪里？”

“一颗红星绣在中央，光芒四射，象征着党。四颗小星摆在四方，祖国大地，一片光明，一齐解放！”

“对，就这么绣。”

尽管她们并不知道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她们却通过炽热的心，把自己无穷的向往赋与祖国。不知是谁抢先绣上了第一针，接着，许多灵巧的手，飞快地刺绣起来。热血沸腾着，把坚贞的爱，把欢乐的激情，全寄托在针线上，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织绣出闪亮的金星。

红旗正中，闪现了一颗星，接着，又出现了四颗实际上，这面红旗不是绣出来的，制作过程也没有这么复杂。罗广斌把被面铺在地上，几个男子汉细心地把被面上的绣花全都拆下来，又用铁钉磨成的小刀把黄纸刻成几颗五角星，用饭粒粘贴在红色的被面上。

红旗制成了，陈然又提议：“咱们大家合作一首诗，留一个纪念。”

在这个时候，大家好像全都成了诗人，每人都能随口说上一两句。别看丁地平是个农民，但他读过六年私塾，还念过成都中学，肚子里很有一些墨水，他说出的诗句大家都拍手叫好。很快，大家就集体创作出了一首诗，名字叫《我们也有一面红旗》：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心，贴在角上，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瞧，这就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等到解放大军到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冲出去。大家让罗广斌执笔，把这首诗写了下来。天快要亮了，红旗必须收藏起来，免得被特务发现。丁地平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小块，罗广斌手捧这面红旗，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去，就像在放一个熟睡的婴儿。大家相信，等到重庆解放那一天，如果有谁能够活下来，一定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可惜的是，这面红旗却未能打出去。除了罗广斌以外，其他几位参加制作红旗的人都在胜利的前夜饮弹倒下，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

第九章 大屠杀

一辆大卡车载着陈然等 10 人驶进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大门。敌法官宣布蓝蒂裕死刑，他却笑着与之告别。陈然连中三枪未倒，敌人改用机枪射击。

10 月 27 日下午，像往常一样，狱中的第二顿饭早早地就开过了（白公馆和渣滓洞看守所一向只供应两顿饭），这时候，一辆军用大卡车吼叫着沿着盘旋的山间公路驶进白公馆。

几个身着美式军装的特务跳下卡车，直奔看守所所长办公室。

没过多久，监狱沉重的铁门推开了，看守长杨进兴拎着一大串钥匙来到楼上一室，打开牢门，冷冰冰地说：

“陈然、王朴，你们两个人听着，赶快把衣服换掉，立即进城，徐处长找你们谈话。”

陈然和王朴缓缓地站起身来。

又是二处提审，大不了又是一通拷打。

他们走出牢门时，刘国铨脱下身上的大衣递给脸色蜡黄的王朴：“你的衣服太薄，把这件大衣披上吧！”

“让他们带上行李行不行？”罗广斌试探着问。

“不行！”杨进兴瞪大了眼睛。“快走，不要罗唆！”恶狠狠的声音不断地催促着。

人们默默地看着陈然和王朴走出白公馆，牢房里留下了他们的行李和囚衣。

晚上，他俩没有回来。

第二天，他俩还没有回来。和陈然很要好的那个杨钦典也没有露面。

半夜时分，突然闪过一道电筒的白光，牢门被打开了，又是杨进兴来了：“陈然、王朴的行李在哪儿？快点拿出来！”

“他们不回来了吗？”人们从梦中惊醒。

“转到渣滓洞去了！”

真去了渣滓洞吗？牢房里每个人的心中都像压上了一块石头。

刘国铨一边把家中好不容易才送进来的两只罐头塞进王朴的行李中，一边又问：“再给他们带点草纸和换洗衣服吧！”

“明天再说！”咔嚓一声，铁门上了锁。

就在陈然和王朴被押走的第二天，10 月 28 日凌晨，渣滓洞看守所的看守长，那个绰号猫头鹰的家伙就凶神恶煞地冲进院坝，在他的身后跟着一群拿着雪亮手铐的特务看守。

猫头鹰恶声恶气地在发号施令：

“楼七室的蓝蒂裕，立刻出来，徐处长有请。”

“成善谋、雷震，出来！”

“楼阅强、华键，出来！”

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提审，也不是移监。特务既没有让他们收拾东西和行李，也没有让他们换衣服。

渣滓洞的难友们消息不那么灵通，不像白公馆的难友们早已知道国民党政府已于 10 月 15 日从广州迁到重庆，蒋介石也来到山城，主持“非常时期”

的决策会议，计划在大西南进行最后顽抗。妖雾茫茫的重庆城弥漫着血腥的气息。

但是，他们已经预感到，敌人很快就要下毒手了，黎明之前往往是最黑暗的时候，已经陷入灭顶之灾的反动派，必定会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这几天，猫头鹰一反常态地在监狱里乱窜乱叫：“都给我老老实实地呆着，谁要是敢逃跑，我的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老子我从14岁起就参加军统，为蒋委员长当侍卫，给戴老板当勤务，什么没干过！老子的刀下鬼至少也有上百人，你们可要小心点！”

别看他叫得凶，谁都看得出来，他心里发虚。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共产党来了饶不了他这号人，往台湾逃他没有资格。他只有豁出去了。

蓝蒂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从容不迫地与同室的难友们一一告别。

自从被捕入狱后，他就自知必定牺牲，早就做好了准备。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他完全可以含笑九泉了。如果说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那就是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5岁的儿子和一个3岁的女儿。他盼望他们能够快快长大成人，接过父辈肩上的担子。前几天他就写好一首诗，里边全是他对儿子的嘱托。临出车门前，他把这首诗交到难友手中。

“拜托了，交给我儿子，告诉他，这是他爹临死前写的。”

蓝蒂裕大踏步地走出囚室。他这首留给儿子的诗是这样写的：

你——耕荒，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

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

愿作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1964年2月7日，出访归国途经昆明的周恩来总理，特意观看了一出根据烈士遗嘱编排的话剧《从荒沙中来的战士》。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走到后台，握住剧作者的手说：“是的，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你更要永远牢记你父亲留下的遗嘱，做革命的好后代。”这位剧作者就是蓝蒂裕的儿子蓝耕荒。10月28日上午，浓云密布，天气阴冷。位于重庆左营街的警备司令部从门口到广场、走廊直至街口，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8时左右，五部吉普车驶出市区老街32号，后边紧跟着一辆大卡车，车上载着陈然、蓝蒂裕等10个人，其中还有涂孝文、蒲华辅、袁儒杰三个叛徒。

车队一直驶过警备司令部的大门，在广场上停了下来。

陈然等人一个个跳下车来，立刻分别被持枪的匪兵包围起来，按顺序押上台阶。

台阶上边的柱子上，刚刚贴上了一张大布告，用朱笔打出的交叉记号惊心触目。

一切都明白了。

这批公开处决的政治犯名单是由徐远举亲自拟定的。本来在这份名单上有周均时、周从化等人的名字，但张群却不同意，这几个人都是川康地区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不想担这个罪名。杨森也不同意，这次公开处决是以重庆警备司令部名义执行的，实际上是二处一手操办，连布告都是他们拟定好的，

他不愿意代人受过。

那三个叛徒的名字是徐远举临时加上去的。去掉周均时那几个人，他觉得一次枪毙的人数不够多，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干脆就让那几个叛徒充数吧。对于他来说，他们已经完全没有用处了。

二处的法官张界拖着长长的腔调点名，验明正身。

首先点到了陈然的名字。

陈然盯了一眼坐在案桌旁装模作样的法官，跨前一步，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你们今天要枪毙我们，还是看看你们能活多久吧！”

华蓥山游击队挺进大队长楼阅强大声怒斥道：

“人民解放军就要来了，我们已经胜利了！你们的狗命危在旦夕！”

在离开渣滓洞之前，他曾经跟难友们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3月，上川东起义失败后，一部分战友们撤往梁平、垫江地区。一位名叫王继云的游击队员，经过敌军哨卡时被发现了，当时他的枪膛里只剩下最后一粒子弹。敌人包围了上来，他索性站住了，高声喊道：“奉劝你们，不要再为反动派卖命了！”说完后，立刻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楼阅强告诉难友们，如果有那么一天，敌人要把他押上刑场，他一定要像王继云一样英勇。

蓝蒂裕听到张界喊自己的名字，又听到他在有气无力地宣读自己的“罪状”：

“查蓝匪蒂裕，四川垫江人，现年33岁，一贯蛊惑人心，鼓吹武装叛乱……”

蓝蒂裕平静地听完他的判决，好像是老朋友一样向他招了招手：“张法官，咱们再见了！”

“你的生命马上就要完结了，我们怎么还能再见？”张界纳闷地问。

“你们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绝逃不脱人民的惩罚。不要多久，我就要在阎王殿看见你！”

蓝蒂裕转身就走，留下一串长笑，扔下了一帮目瞪口呆的敌人。

张界等人慌了手脚，连例行公事的讯问也忘了，事先按规矩给死囚准备好的送行酒饭也没敢端出来，就匆匆下令将他们押出去。

囚车缓缓驶出警备司令部大门，围观百姓大批拥到路边。王朴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大声对群众演讲：“我们是为革命而被捕的，今天牺牲是光荣的，胜利就要来临了！解放军快到了，我们死了也很甘心，很快乐！”

刚才被押上卡车的时候，陈然抓住机会告诉涂孝文：“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可以用死来赎罪了。你要表现得英勇一些，也算你曾经加入过共产党。”

涂孝文抖动着嘴唇，没能说出话来，但陈然看到他重重地点了两下头。

囚车向民生路驶去，陈然带头唱起了《国际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陈然听到了，在这歌声中也有涂孝文的声音。

汽车驶过民生路，七星岗，英雄的歌声一直在响……

汽车驶过观音岩，两路口，这歌声如炸雷般震动着大地……

楼阅强唱起了游击队员最爱唱的《一杆红旗哗啦啦飘》，当年在华蓥山中，这歌声震山应水，分外响亮。今天，它在重庆市区响起，好像冲锋的号角：

一杆红旗哗啦啦地飘。
一心要把
革命闹；
盒子枪、土枪，卡啦啦地响，打倒那劣绅和土豪！
囚车驶进大坪刑场。

陈然和成善谋肩并肩地向刑场走去。

在办《挺进报》期间，他俩曾用纸条互相致意，但却不知道对方是老熟人。落入敌人手中之后，他俩几乎没有见过面。如今在这种地方又见面了，两个人多想再紧紧地握一次手，但是却做不到了，因为手被反绑在身后。

“致以革命的敬礼！”陈然用肩头碰了碰成善谋的肩头，说出了他当年写在纸条上的话。

成善谋马上接口道：“紧紧地握你的手！”

他说的也是当年写在纸条上的话。

两个战友又靠近了一些。他们的两颗心紧紧地连到了一起。

两个匪兵推搡着陈然走向山岗。他们嫌陈然走得慢，伸手想挟持他。陈然用肩膀使劲把匪兵推开：“滚开！我自己会走！”

他用反绑着的双手扯下背后的死囚标签，愤怒地扔在地上：“这是什么东西！”

英雄们站成一排，他们昂首挺胸，拒绝下跪。

陈然转过身来，面向黑洞洞的枪口，对刽子手大声命令道：“从正面向我开枪！来吧！”

“预备——”在敌人即将下达罪恶的杀人命令时，英雄们使足全身的气力呼喊起来，口号声响入云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哒哒哒……一排子弹嘶叫着飞向陈然。他连中三枪，然而他的身躯仍倔强地站立着，他还在拼尽全力喊最后一句口号。刽子手吓得双手发抖，不敢放枪了。“机枪射击！”监斩官下令。哒哒哒……又一排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只度过26个春秋的陈然宽厚的胸膛……

杨钦典眼含热泪，讲述了陈然的牺牲经过。白公馆的难友们策划暴动，但单独突围会危及渣滓洞难友的安全。

当陈然的鲜血浸透了大地的时候，在场有一个人的心灵被彻底震撼了。

他就是杨钦典。

从白公馆到刑场，杨钦典跟随了陈然一路。他想找陈然说几句话，却找不到机会。他知道陈然此去必死无疑，但却不敢抬头多看他几眼，他觉得内心有愧，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杀了一样。

在从刑场回来的路上，他听到两个当兵的在低声议论：“那个人真是条汉子！”

他知道他们议论的是陈然。想一想陈然牺牲时那惊天动地的情景，再看一看自己这身打扮，他深深觉得自己的人格是那么卑下和渺小。自己这特务生涯太可耻了，只有像陈然那样活一辈子才算没有虚度此生。

第三天，又赶上他值日。他装作巡视牢房，来到楼一室牢门口。

罗广斌早就看见他走过来，急于向他打听陈然的消息，已经守候在牢门

口了。

“陈然他……”杨钦典刚说出这三个字，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

罗广斌顿觉不妙，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抓住杨钦典的衣服，一连声地催促道：“你快说，别哭呀！”

杨钦典一边擦眼泪，一边把陈然、王朴牺牲的经过讲了一遍。还没等讲完，他又泣不成声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稍稍平静一些，哽咽着对罗广斌说：“小罗，你如果能出狱，一定要照顾好陈然的老母和他的妹妹啊！”

陈然、王朴牺牲的消息很快就在难友中间传开了。没有人发出号召，大家自动绝食一天，以示悼念。

刘国钰躺在床铺上，泪水已经打湿了他的枕头。

陈然牺牲前，由许晓轩和谭沈明负责主持，曾策划在白公馆搞一次暴动。陈然、王朴、周从化、刘国钰、罗广斌等人都参加了这一秘密活动。

他们对狱外的形势变化非常了解，深深知道坐镇重庆的蒋介石不会把重庆拱手交给共产党。在解放大军攻占山城之前，敌人肯定要搞一次大破坏，屠杀是不可避免的。具体时间就看解放军的进兵速度。从目前的情形看，指望外面援救已经不可能，只有破釜沉舟，拼命突围，或许还有一丝生还的希望。

从年初开始，他们就着手加强对特务看守的争取工作。黄显声将军也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做看守工作。六个看守中，他们同五个都取得了联系，四个被争取过来，收到很大效果。

然而，还没等他们开始实施暴动计划，敌人已经抢先杀害了我们的同志。

刘国钰一翻身坐起来，他觉得情况紧急，不能再拖延下去。他要去找许晓轩商量对策。

许晓轩此刻的心思与刘国钰完全一样。在放风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凑到了一起。

周从化是军人出身，对行军打仗很有经验。他认为，暴动后解决白公馆内看守的武装这容易办到，但要想冲出外边警卫连的包围却很困难。

谭沈明有他的顾虑：白公馆单独举行暴动，突围出去的可能性很小，只有白公馆和渣滓洞同时举行暴动，那边关押的人多，让敌人顾此失彼，才能有逃出去的希望。然而，两个监狱里的难友怎样才能通气呢？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许晓轩，他一向很受难友们的尊敬和信任。

许晓轩紧皱着眉头，思忖片刻才说：“要是能够两处同时暴动突围，我们这里的希望要比渣滓洞大得多，即使单独干，我看也有逃出去的把握。只要出了大门，后边就是大山。我们如果能选准解放军快要打进来的时候暴动，敌人不敢搞大规模的搜山。我考虑的问题是，假使我们逃出来，敌人肯定会对渣滓洞的难友施行报复，当人质杀害，军统特务干这种事情可不是第一次呀！”

许晓轩没有往下说，别人也没有多说话。

在生死关头，真正的共产党员永远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而决不是相反。

谭沈明说：“以前罗世文死的时候，脸色都没有变。我们大家也要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刘国钰接上去说：“陈然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到时候，我们要让口

号声和歌声盖过敌人的枪声。”

江竹筠扶着李青林登上刑车。眼看着丈夫齐亮被敌人带走了，妻子马秀英昏倒在牢里。江竹筠和几十名难友倒在山坡上。

在军统重庆集中营西南角一个偏僻的山坳上，有一个地方叫电台岗垭。这里原来是中美合作所的军统电台。1946年电台迁移后，此处仅剩几幢土墙平房，大部分已经坍塌，无人居住，四周杂草丛生。

11月14日，大坪屠杀后的17天。

一大早，中美合作所交警大队和西南长官公署警卫连就把小小的电台岗垭围了个水泄不通，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特务相中了这里的荒凉，把它选定为一个理想的杀人场。

主持屠杀的刽子手是雷天元、漆玉麟、熊祥等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重庆站法官龙学渊监斩。二处张界负责照相。这些照片都要送到台湾备核。

这次将被秘密处决的人员名单是徐远举主持拟定的，以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名义上报。张群接到这份报告后，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批示：由二处自行处理。徐远举猜不透张群的真实动机，就把秘密处决的时间往后拖了拖，再次请示。张群推托不过，只好找了个理由：“我没有时间看卷，你斟酌处理吧。”

徐远举听了，不禁从心底升起一股寒意。

看来国民党是江山难保了，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连张群这样的西北大员都害怕担上杀共产党的罪名，也好给自己留个后路。

由此徐远举不禁联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他陪毛人凤去昆明，找国民党云南省政府秘书长、CC派头目朱景暄，传达蒋介石的旨意。他们本想在朱家客厅里谈，没想到朱景暄马上摆手对他们说：“这里谈话不行，我家里的人靠不住，我儿子也赤化了。另外找一个秘密一点房间去谈吧。”

由此徐远举又联想到自身，大家都害怕共产党日后饶不了自己，有钱的国民党大小官僚更是早早就逃到了台湾和香港，自己还留在这里杀共产党人，难道就不替自己想想吗？

可转念一想，自己过去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双手的鲜血想洗也洗不掉，现在要想回头也来不及了。再说，蒋介石现在还在重庆，自己杀的共产党人越多，他越会对自己有所垂青，肯定会把自己带到台湾去。

由自身他又联想到其他特务。他们要是也为后路着想，还能动手杀人吗？

想到这里，他立刻把参加这次秘密处决行动的刽子手全都找到自己的办公室。

“你们只要把事情办好了，我立刻把你们都送到台湾去。当然，赏金是少不了。”

“多谢处座。”雷天元等人顿时喜形于色。

雷天元等人退出去后，徐远举又想起了一件事。他抓起电话机，通知中美合作所的警戒部队，立刻把驻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警卫连全部撤掉。这些人和狱中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会产生感情，最起码会有同情心。对于执行特殊任务的人来说，同情心是最可怕的。他要预防万一。

刑场上一切准备就绪，李磊、徐贵林带了几个看守匆忙乘车返回白公馆。梆梆梆……

上午9时，急促的梆子声突然响了起来。渣滓洞看守所外面的炭坪上，汽车嘶鸣。同志们心中一紧：又要提人了！

曾作过重庆安生公司经理的何柏梁说：“今天该提我了吧？”

“不，应该我去！我年轻，当过兵。我在九泉给诸位把招待搞好！”门边的张学云幽默地说。

“还是我最合适。”曾担任上川东第七工委书记的刘石泉接上话：“我在华蓥山煮过饭，可以先去为大家把饭煮好，保证满意！”

徐贵林站在院坝中央，声嘶力竭地嚷着：“你们都给我听着，喊到名的立刻收拾东西，上车转移。”

一群特务看守提着哗哗响的钥匙，拎着手铐，扑向各个牢门口。

“江竹筠、李青林，出来！”

江竹筠知道离别的时候到了，她首先把自己在狱中默写下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交给了同牢难友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她细细地梳理好头发，与难友们依依惜别。

在《红岩》小说中，是这样描写江姐就义前的这个场面的：

江姐换上了蓝色的旗袍，又披起那件红色的绒线衣。她习惯地拍拍身上干净的衣服，再用手扯平旗袍上的一些褶皱。

“明霞，帮我扯扯衣服。”

孙明霞知道，江姐素来爱好整洁，即使在集中营里，也一贯不变。所以平静的江姐，总是给人一种精神焕发的庄重的感觉，特别是在刚刚破晓的今天，江姐更是分外从容和认真。孙明霞渐渐感到，江姐心里充满着一种庄严的感情，也许竟是一种从容献身的感情？她立刻蹲在江姐脚边，轻轻拉平她衣襟上的褶皱，禁不住滴下了眼泪。江姐

似乎没有看见这些，又弯下身去，拭擦鞋上的灰尘。

孙明霞擦着泪水，转过头去，为江姐收拾行装。江姐再次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回头在室内试着走了几步，像准备去参加欢乐的聚会，或者出席隆重的典礼似的。她轻轻走到“监狱之花”旁边。孩子静静地熟睡着。江姐凝望了她一阵，终于情不自禁地俯身在脸蛋上吻了一下。

胜利的欢乐和永诀的悲哀同时挤压在孙明霞心头，她从未体验过这种复杂而强烈的感情。“江姐，我宁愿代替你去……不能，不能没有了你！”

“明霞，别这样。你们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即使只剩下你一个人，也要坚持！”江姐略停了一下，又轻声说道：“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孙明霞抬起泪眼，凝望着江姐，一动也不动。

这段描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只是曾紫霞（即孙明霞的原型人物）此时已经出狱了。

小说中没有写到，这时候江竹筠的怀里揣着一张儿子的照片。这是曾紫霞出狱后通过黄茂才带进来的。她把这张照片拿出来，轻轻地亲吻了一下，放在了贴胸口的地方。她不能让它被敌人搜走。

李青林听到敌人叫自己的名字，也默默地换好了衣服。

她早已作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但在死亡的威胁下她却十分乐观。她曾托一个出狱的难友带了两句话给她的五姐：“黑暗将要过去了，曙光快要来到。”她还要五姐给难友筹足路费。她相信总会有难友冲出黑牢的。

江姐扶着跛了一条腿的李青林走出牢房。在经过男牢时，她俩不停地向

难友们点头告别。

男牢的难友们全都拥挤在牢门口，向他们尊敬的江姐致意，与她做最后的告别。

来到外边的炭场上，一个特务见李青林行动困难，想扶她上汽车，李青林用力推开对方伸出来的手：“不要碰我！我嫌你手脏！”

这个细节也被写进了小说，但被作者改成了特务在走廊里递给她一根手杖，她把手杖扔掉了。

江竹筠扶着李青林，帮助她登上了囚车。

在男牢那边，特务正在不断地提人。

“杨虞裳、唐虚谷，出来！”

“蒋可然、陶敬之，出来！”

“齐亮，出来！”

杨虞裳听到敌人喊自己的名字，没有急着换衣服，也没有和难友们告别，而是高声朗诵起诗来：

筑墙自围莫笑咱， 只为挣断铁锁枷！

越狱脱险成功日， 神州开遍自由花。

板筑缘在墙坍塌， 砸烂铁锁折断枷；

作茧自缚非夙愿，

碧血丹心换中华！

这两首诗是今年初夏时他和另一位难友白深富合作的。

一天夜里，风雨交加，渣滓洞监狱的一段土墙轰然倒塌。

李磊怕难友们逃走，急忙找人补墙，但又怕从外边雇人泄密，就把补墙的任务交给了杨虞裳、白深富、刘振美等 10 位难友。看到他们在外边夯墙，狱中有少数人觉得不可理解，便出言奚落：“筑墙自围，无异木匠做枷，作茧自缚。”杨虞裳、白深富等人没有加以辩解，照样夯墙不误。很快，围墙就补好了，李磊前来视察了一番，觉得很满意。可是他哪里知道，杨虞裳等人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明面上老老实实干活，暗地里却在墙泥里掺了很多砂石和腐草，夯墙时把石碾子重重举起来，却轻轻放下去，这样筑起的墙从外边看起来挺结实，内里却是虚泡泡的。墙筑好后，杨、白二人就写了上面两首诗，剖白其中的奥秘。

听到杨虞裳的高声朗诵，很多难友都明白了他的用意。

在《红岩》小说中，老大哥和难友们一起突围出去了，而实际上，老大哥的原形人物唐虚谷也是在这次大屠杀中牺牲的。

他走到女牢门口，与妻子张静芳告别。

“你如果能够出去，照顾好孩子，让他们跟党走！”

面对着自己的伴侣和革命领路人，张静芳没有掉眼泪，她伸出手去紧紧地握了握丈夫的大手：

“老唐，你走吧，等着我！”

被李文祥出卖的重庆地下党工委书记齐亮走出牢房，穿过走廊，和每一个牢房里的难友握手告别。

他一边握手还一边大声说：“再见了，同志们！快胜利了，我们先走一步……”经过女牢门边，他突然站住脚。女牢风门口，他的妻子马秀英含着泪水，伸出双手，隔着铁门紧紧抓住他。马秀英嘴唇颤动，想要说什么又什么也没有说……

门边紧握着的双手分开了，永远地分开了，亲人熟悉的背影慢慢走出了看守所铁门……

送走亲人之后，马秀英昏厥在铁窗前……

男牢楼七室唱起了那首题名《天快亮了》的渣滓洞洞歌，立即引起整个渣滓洞监狱难友们的放声齐唱。在激昂的歌声中，一双双含着热泪的眼睛，目送自己的同志从容步上刑车远处有鸡啼报晓，太阳随黎明而到，黑夜已经死灭，这世界已再没有强盗。

……

敌人先后从渣滓洞提走了 29 人，又从白公馆提走了一人，共分三批将他们押到电台岚垭。

因为一次处决不了这么多人，敌人就把等待处决的人押到离刑场远远的一间房子里，让张界假装问话，拖延时间。

在刑场的后边有一个事先挖好的长方形土坑，处决一批照完相后就地淹埋一批。走上一条人迹罕至的荒凉小道，江竹筠明白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她把千言万语凝结为一句响亮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反动派！”同行难友一齐高呼。

格格格格……

尚未到达预定的刑场，刽子手们就慌忙射出罪恶的子弹。

江竹筠倒下了，李青林倒下了，难友们都倒下了。他们的鲜血在枯草萋萋的小山坡上流淌……

丧尽天良的匪徒杀人之前，竟强迫烈士们把穿在身上的西装、毛衣连同鞋袜一起脱下来，每人身上只剩下内衣内裤。第二天，他们就把这些抢掠来的东西拿到磁器口摆地摊叫卖。

这些人真是披着人皮的禽兽！

他们的肚子里还有人的心肝吗？！

毛人凤再次下达屠杀令。渣滓洞警卫连长被约进黄茂才的宿舍，与狱中的共产党员谈话。刘康接到胡其芬的密信，立即实施营救计划。

就在江竹筠等人就义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又由毛人凤陪同着乘“中美号”专机飞到重庆。

飞机还没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降落，他就把儿子蒋经国唤到跟前，让他先不要进市区。留在机场把飞机油加足，把起飞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机组人员必须 24 小时全天候待命，随时准备起飞。

对于战局的发展，他比儿子心中更有数。刘邓大军直逼重庆，依靠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宋希濂率领的两个兵团，根本挡不住共军的势头。重庆的陷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可不想当共产党的俘虏。

蒋介石这次来重庆，带来了四大任务：破坏、屠杀、潜伏、游击。而这些任务主要是由毛人凤指挥他的部下来执行。

毛人凤一到重庆，就紧急召见徐远举和周养浩，让他们把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分别造册送核，一律杀掉，一个不留。

“新世界看守所里的那些人怎么办？”周养浩问。

新世界看守所位于重庆旧市区内，原来是小梁子新世界饭店，1949 年被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改成临时拘留所，关押的全是当年逮捕的人。这些人

并不都是共产党员，有许多人只是被特务认定有嫌疑，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进来。

“你回去搞一个名单，把那些情节较重的全部杀掉。记住：宁严勿宽。”毛人凤指示道。

徐远举和周养浩唯命是从，匆匆离去。

江竹筠等难友牺牲后，渣滓洞里的气氛好像凝固了。难友们的心情不仅仅是悲痛愤怒，还有焦急和期盼。

谁都明白，随着解放大军的逼近，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正在悄然逼近。

一连几天，特务们都带进一批理发人员，将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政治犯一律剪成平头，以示死囚特征。

敌人还在松林坡、步云桥一带大挖尸坑。

难友们盼望着解放大军能够如神兵天降，把这里的吃人野兽收拾干净。

他们当然知道，坐以待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要做最后的努力，和死神抗争。“从来壮烈不贪生”，但是只要有一丝可能，就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狱中党员陈作仪、韩子重联合何雪松，通过黄茂才，曾两次趁放风时机将渣滓洞监狱警卫连长邬治声约到狱内黄的宿舍谈话。

邬治声率领的警卫连有100多人，他和连队里的一些人眼见得解放军就要打过来，内心十分惶恐，都想逃走，只是找不到适当机会。他们见特务杀害了那么多人，也深感同情和愤慨。但是，要让他带人把狱中的难友全都放了，他还没那个胆量。不过，要是有人来搭救狱中的人，他表示倒是可以网开一面。

女牢的难友和警卫连的官兵以及一般的特务看守关系更好一些。当时除了李磊和徐贵林外，渣滓洞的匪特官兵全都没有家属。他们出身大多贫苦，一个月挣的钱也不多，经常找女难友给他们缝缝衣物，补补袜子。那时候人都穿线袜子，破得快，补起来也麻烦，很少有男人会干这种活。

徐贵林的老婆听说女牢里的人针线活好，亲自上门要求给她绣一对枕头。她的态度特别客气。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活不能干，李青林却认为不应该放过这个机会，出面承接下来。

李青林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什么花都会绣，还会自己画样子。她绣出的枕头，谁见了谁夸好。

江竹筠和李青林遇难后，很多敌特官兵见了女牢的人，都低下头，一脸难过的样子。

可是，就在策反工作逐渐深入，个别敌特很有可能掉过头来帮助难友们的时候，邬治声所在的警卫连接到了调防的命令，看守所的一般特务看守也都被撤换了。

11月20日，黄茂才来到女牢门口，告诉胡其芬，他明天早晨就进城去，可能再也不回来了。像他这样的人，大都被遣散返乡。

胡其芬当机立断，立刻动手写了一封信，托黄茂才带出去。她已经意识到，如果黄茂才一走，狱内外唯一的联系渠道就可能从此中断。

11月21日早晨，黄茂才不负所托，把胡其芬写的信交给了家住七星岗协合里的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当即将这封信转交给了沙磁北碚区地下党领导小组组长刘康同志。

刘康展开这封写在草纸上的信，首先注意到这封信的署名为“吉祥”，

而且注明以后沿用此名与党组织联络。

吉祥必能如意。刘康领悟了狱中同志起用这个化名的用心。

刘康急急地从头看下去：

10月28日，歌乐山难友公开枪决10人后，11月14日又秘密于白宫（白公馆）附近电刑房内烧死50人，竹姐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沉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

我们是第二看守所，与24兵工厂连界，现住有二百十余人。十之八九都是经过长期革命工作的锻炼，在敌人面前表现忠贞亮节的人。

其次是提供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作为将来交换条件，将来如点交政治犯（确数蓝可告知），阻止屠杀，徐于执行命令有大权。可以拖延处决，等待大军到来。

此外，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等局势紊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抢救我们。我们即积极进行了解周围情况，有充分了解时，再设法通知你。

这封信中提到的“蓝”，就是指黄茂才。胡其芬在如此紧急关头，还没有忘记委托组织上为他解决职业及经济问题，留他在重庆住一段时间。

可惜的是，第二天况淑华去找黄茂才时，他已经离开重庆，不知去向了。解放后，黄茂才曾被判处无期徒刑，1964年释放回农村老家。从渣滓洞脱险的同志得知了这个消息，把他当年的表现如实地写了一份报告交给组织。经过各方的调查核实，1982年4月他被宣告无罪，并在5月被增选为政协委员。

读完信后，刘康立刻意识到狱中同志们情况万分危险，命悬一线，他决心不顾一切，单独组织武装营救。

刘康与有关同志不断碰头，日夜奔走。在短短的五六天里，终于为武装劫狱筹集到相应人员（约20人）和武器，并设计了两条劫狱后的退路：一条是经中梁山撤往北碚，北碚有民族资本家卢子英作掩护；一条是通过磁器口趁夜过嘉陵江退往江北第10区，10区乡长陈秉国是有把握的策反对象。

刘康迅即派人赶往两地联络布置。与此同时，劫狱经费（50两黄金）也准备好了。

就在这万事齐备的时候，大屠杀开始了。

杨进兴从身后射出黑枪，黄将军倒在血泊中。刘国钰大踏步跨出牢房，耳边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在关键时刻，杨钦典弃暗投明。

1949年11月27日。20世纪100年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天。从这一天起，一场持续三天的灭绝人性、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开始了。

11月26日晚，毛人凤在枣子岚垭漱庐紧急召见徐选举，把经过蒋介石亲自批准的一份屠杀名单，交给徐远举负责执行。

在这份名单上，只列着渣滓洞监狱中囚犯的名字，却没有白公馆中的人。在此四天之前，毛人凤特派他手下的另一员得力干将徐钟奇（保密局法

官)前往白公馆,与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密商,然后列出屠杀名单。

徐钟奇把列好的名单交给毛人凤,指着上边的一个人的名字问:“这个人有两个小孩,还不懂事,怎么处理?”

毛人凤眼睛一瞪:“留下来谁抚养呀!养大了叫他们找我们报仇吗?”

徐钟奇不敢再吭声了。

此时此刻,毛人凤用不着向徐远举要求什么,他相信对方完全知道事情的紧迫和严峻。

11月25日,解放军占领距离重庆只有100多公里的南充县城,从贵州沿川黔公路进逼重庆的另一路解放军,已经打到离重庆不足100公里的綦江。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用三辆卡车装运黄色炸药企图炸毁綦江大桥,第一辆卡车还没等赶到目的地,就被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截获。其余两辆见势头不对,调头就跑。

宋希濂的部队早已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弃甲丢盔而逃,整个重庆乱作一团。刚才徐远举乘坐的车子经过市区时,简直是步步受阻,他又不敢发脾气,那些当兵的个个手里都有枪,惹火了就会给你一梭子。

徐远举心中突发奇想,要是这时候解放军派一个先遣部队潜进市区,说不定连蒋介石都能抓住。

他听人家说,蒋介石已经离开了市区,在他的专机“中美号”上过夜。

他不敢把这个想法说给毛人凤,但他想到此处却不禁觉得毛骨悚然。

徐远举带上毛人凤交给他的名单,赶回老街。他没有回家,就在办公室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雷天元、龙学渊、熊祥三个人召到办公室。徐远举指示由雷天元、龙学渊共同主持渣滓洞的屠杀。要多用绞死或勒死的办法,尽量减少枪声。屠杀后,要将渣滓洞看守所放火焚毁,毁尸灭迹。整个屠杀期间,徐远举和二处副处长杨元森在城里坐镇,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

徐远举再次关照雷、龙、熊三人,事成后每人都有一笔奖金,马上送他们乘飞机去台湾。

雷天元等人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到军统集中营五灵观一号,把李磊和徐贵林找到这里,先向他们出示了屠杀名单,然后简单地商定了屠杀办法。

与此同时,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也接到了由毛人凤转来的蒋介石签准的屠杀名单。他们一边布置警戒力量,一边从所内看守中紧急挑选刽子手。

下午4时左右,白公馆看守所的特务们仿佛突然上足了发条,显得异常紧张,连不该当班的也出动了。牢房铁窗下不时掠过条条人影。正在吃晚饭的难友们立即感到气氛不同往常。

“同志们,这是最后的晚餐了!”楼下平四室的许晓轩从风洞口伸出头,向各牢房高声说道。

“迎接苦难!”各牢房报以有力的回答。

楼上平二室的门推开了。杨进兴闯了进来,杨钦典跟在后边。

杨进兴的脸上露出阴沉的狞笑,对囚禁了12年之久的黄显声说:“周主任请你谈话,马上就去,李副官也一道走!”在沉寂的空气中,黄显声慢慢拿上自己的帽子出了牢房。“黄伯伯,给我们带糖回来呵!”隔壁牢房里王振华和黎洁霜夫妇的两个天真的孩子挥着小手不停地叫喊。黄显声回过头来,无言地举起手中的帽子挥了挥,脚步沉重地走下了看守所外那条长长的

石板路……在《红岩》中，对黄将军的遇难情形做了如下描写：

黄将军迈开沉着的军人步伐，沿着山边的一条通向梅园的石板小道，大步走去。一面走，一面却用眼角冷冷地注意着紧紧跟在旁边，又不时窜到背后的阴险的特务。

周围一片沉寂，没有人声，也听不见鸟啼，只有皮鞋踏在石板上，发出一声声空洞的回响。

小路曲曲折折地转向一道小溪。透过密林，隐约地看见了对面的山头，山头上，掩映在林荫深处的建筑，便是人所共知的美国特务的巢穴——梅园。黄将军走到溪边，跨上一座小桥，年久失修的桥板，已经破败不堪。因此，他低下了头，避开那些腐朽的木块。

“黄先生，桥不好走，小心一点。”

黄将军没有理睬，昂然跨过桥头，又向前走。

就在这时候，两声闷哑的枪声，骤然在桥头响起，接着又是两枪。

枪声不大，被周围黑森森的密林和淙淙流水掩盖着。黄将军猛地向前踉跄了一下，又摇摇摆摆迈了两步，他吃力地站定脚跟，怒目回视。胸口涌出的血不断洒滴在桥头的石板路上，血水无声地溅进了小溪，溪水渐渐被染红。杨进兴提着冒烟的手枪，迫不及待地冲上去，从血泊中抓起黄将军的手臂，扯下了那只他垂涎已久的游泳表。

小说中的描写与事实基本上没有出入，只是需要补充几句：与黄将军一起遇难的还有张学良的副官李英毅。他们遇害的那座桥叫步云桥。

夜色降临了，歌乐山上的狂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呼啸着，像一个垂死的野兽在发出哀鸣。

杨进兴返回牢房。他和陆景清带领着一大批荷枪实弹的刽子手，从各牢房的窗前匆匆走过，一边恶狠狠地吼叫着，一边用手电筒不停地四处乱叫。

值班看守员杨钦典跟在后边，手里拿着一份提人的名单。

“周从化，出来！”

已经54岁的周从化将军，入狱后惨遭毒刑，下肢已经瘫痪，还被钉上了十四斤重的大铁镣。今天下午，他已经预感到死亡的威胁，就用吃饭用的筷子在牢房的土墙上，用力刻下两排大字：

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

这是他那首题为《仗剑虎山行》诗中的最后两句。

两个特务闯进来，将他架了起来。他望着刻在墙上那十个笔力刚劲的大字，放声长笑……

一位身材修长，颇有学者风度的老人被押了出去。他就是被蒋介石恨之入骨的周均时。在松林坡刑场，他高呼“联合政府万岁”的口号，倒在血泊中。

王白与和黎又霖被捕时仅相差两天，被捕后一起被押到白公馆。他们都是民革成员，都是因为策反地方军队起义而被捕的。黎又霖在狱中屡受刑，特务拿出纸笔，让他招供。他一连三次都写的是同样一句话：“没有说的，请枪毙。”

如今，他俩一起走向松林坡刑场，还是一样的气宇轩昂。

王白与昂首阔步，边走边呼：“痛快！痛快！”

黎又霖三天前一口气写了四首七言绝句，写完后他传递给了邻室的难友王国源，希望他能替自己保存下来。

他边走边高声吟诵着那四首诗中的一首：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他吟得音韵铿锵，气势豪迈，哪里像是赴刑场，简直像是去赴一个盛大的宴会。

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被押出了牢房。

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各抱着一个出生在狱中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才一岁。这一家人慢慢朝前走。铁窗后面，几十双闪着泪光的眼睛在和他们告别。黎洁霜苍白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神态异常严峻，像一座莹洁的大理石雕像。

前几天，王振华就对黎洁霜说：“我虽然过去参加过托派，但在狱中思想转变了。如果敌人要下毒手，我一定要喊共产党万岁，你也要跟我一起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男女两个人的齐声呼喊从狱外传进来。

“妈妈我怕，我怕！”到了刑场，王小华看见凶神恶煞的刽子手，吓得大哭起来。

儿子的哭叫声，似钢针扎在母亲的心上，黎洁霜紧紧抱住孩子对杨进兴说：“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

“不行！一齐打！斩草除根！”杀红了眼睛的杨进兴劈手夺过黎洁霜怀中的王幼华，一枪先把他打死了。黎洁霜顿时晕厥过去。枪声再次响起，一家四口倒在血泊中……

沉闷的枪声夹在风声中连续不断地传进牢房里，猛烈地撞击着还活着的难友们的耳鼓。他们都挤到风门洞口，大声地互相鼓励。

“迎接黎明前的黑暗！”

“我们要用血的洗礼迎接重庆解放！”

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政工干部文泽，眼看着一批批难友被押出去杀害，满腔怒火已经把他周身的热血烧沸了。他抓起竹签子笔，刷刷地写起来——

黑夜是一张丑恶的脸孔，惨白的电灯光笑的像死一样冷酷。

突然，一只粗笨的魔手，把他从恶梦中提出。呵，兄弟，我们走吧，狗们的死就在明朝！假如是必要，你就迎上仇敌的刺刀。但是真理必定来到，这块污土就要燃烧。“文泽，出来！”他好像没有听到特务的吼叫，继续奋笔疾书——呵，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颤栗、恐慌，他们要泄忿、报复，灭掉行凶的见证。他们要抓本钱，然后逃掉。但是听着：狗们不能被饶恕，血仇要用血来报！最后一个字写完后，他把手中的竹签子笔向身后一甩，把写好的诗塞到同室难友的手中，扬长而去。这首诗后来被脱险的同志藏在鞋中带了出来。“宣灏，出来！”身体衰弱的宣灏吃力地站起来，他首先来到同室的罗广斌身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小罗，拜托了！”“你放心吧！”罗广斌在黑暗中庄严地点着头。宣灏话中的意思只有罗广斌和少数几个共产党员明白。11月15日，就在江竹筠等人被害后的第二天，宣灏把一封写好的长信交给了罗广斌，请他转交给共产党组织。这封长达两千多字的信是他半夜里偷偷爬起来，借着牢房门缝透进来的一点灯光写成的。亲爱的同志，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为了写这封信的开头，他思考了很久，最后他才决定称呼同志。他认为自己有资格和共产党人互称同志了。

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像你们一样，用

行动来保证了的。在九年多监禁期中，我不断地读书和磨练自己的文笔。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弟兄的队伍中去！

一次次难友的牺牲，更加强了我这心愿：我决心，只要我能活着出来，我要运用我熟悉的工具——笔——把他们秘密着的万千的罪恶告诉给全世界，作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可是朋友啊，我的希望将付之流水了！我是多么可怜自己，替自己惋惜，替自己哀悼啊！

朋友，我们的生命，是蒋介石匪帮，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就应该自己负起责任来！朋友，请你牢牢记住：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罗广斌把这封信藏到了牢地板下边，解放后从原处取出。在《红岩》小说中，抄录了胡浩的一封长信，这封信完全是按照宣灏的遗书编成的，甚至有一些句子与原信完全相同。主要的不同在于，宣灏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作者借胡浩的信却讲述了另外四个人的故事：

我是抗日战争期间，从山东流亡到四川的年轻学生。因为不愿作亡国奴，十五六岁的我和几个与我一样无知的同学，万里迢迢，投奔到大后方来求学，一心想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可是，我们走错了路。我真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投奔到抗日的圣地延安去啊！我们多么无知，多么愚蠢，一点也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嘴脸，反而以为他们也在抗战。回想起来，真是心痛欲裂，直到被捕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谁在抗战，谁在反人民。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叫天不应、叫地无门的冤屈：1941年，我们四个流亡学生，买不起车票，从青木关中学徒步进城投考一所职业学校。谁知从歌乐山走小路下山时，竟误入了中美合作所禁区。那时，特务在边界上的电网还没装好——可是，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啊！——于是，不由分说，把我们逮捕了。严刑拷打，有冤难申。特务看了我们的准考证，明明知道我们是无辜的学生，然而，丧心病狂的特务，深怕我们出去，泄漏了他们反人民的秘密勾当，硬说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侦探。遍体鳞伤的我们，竟被投进这人间地狱……

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事情，作者没有丝毫的夸张或虚构。然而，就是这四个完全无辜的年轻学生，也在这个大屠杀之夜被拉出去枪杀了。他们都有父母，但他们的父母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儿子到哪里去了。

杨进兴又像恶狼一样窜回来。

“坐下，都给我坐下，不关你们的事！”

没有人理会他的叫喊，依然聚集在牢门口。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楼下平二室、平四室首先唱起来，这雄壮的歌声穿透了这血腥的夜色，惊破了刽子手的胆。

“不准唱！不准唱！统统给我住嘴！”杨进兴带人来干涉。

然而，他的吼声很快就被难友们的歌声和怒骂声淹没了。

坐牢九年的共产党员许晓轩被提出去了，临行前他郑重地委托同室的难友向党组织转达他的遗言：

“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

的纯洁！”

在狱中，有一次，许晓轩与陈然谈话，他无比感慨他说：“在我被捕前，已经发现个别同志思想作风有脱离党的腐化倾向，当即组织学习，开展批评。万没想到后来少数分子的腐化，造成了整个组织的大破坏，感到十分沉痛。党要向人民负责，否则就对不起人民。希望我们党组织能够经常注意党内教育、审查工作，决不能允许非党的思想在党内蔓延滋长。”

陈然深有同感：“矿砂只有经过提炼，才能生产出金子。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我们党应该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洗刷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不让任何病毒细菌侵蚀党的组织。”

烈士们在牺牲的时候，心中还始终惦记着他们的党怎样开展党内教育，怎样获得发展。

谭沈明和许晓轩一齐被押了出去，他指着杨进兴骂道：“你作恶多端，人民一定会把你捉拿归案，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刽子手举起了枪。许晓轩面对敌人高声喊道：“你们这些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了，人民要审判你们了！”

枪声响了，他高举起戴着镣铐的双手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小说中，齐晓轩不是这样牺牲的。他带难友们突围后，已经负伤。这时候，敌人的探照灯死死地盯住越狱的人们，机枪子弹不断划过夜空。

忽然，光柱发向齐晓轩，不断地把他罩住。可是，齐晓轩并不躲避那灼目的光亮，反而停住了脚步，挺立在光柱之中。他看了看渐渐远去的战友，从容地转回身来，面对着射向他的无数弹流。

齐晓轩蔑视的目光，俯瞰着山脚下的敌人，矗立在一块巨大高耸的岩石上，吸引着全部毒弹的袭击，他决心让

自己的战友们赢得时间，转危为安。

“扫射吧！”他把双手叉在腰间，一动不动地分开双脚，稳稳地踏住岩石。“子弹征服不了共产党人！”齐晓轩苍白带血的脸上露出冷笑，让鲜血从洞穿的身上流出，染遍了脚下的红岩……

这段描写虽然完全出自作者的想象，但读起来却毫无虚假之感。假设白公馆真的举行暴动，突围成功，而且又遇到了小说中写到的危急情况，没有人会怀疑许晓轩会挺身而出。

正像他在为搭救宣灏挺身而出时告诉特务的那样：

“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刽子手扑到楼一室门前，开了锁，电筒闪着寒光。

“刘国铤、丁地平，出来！”响起狼一般的嚎叫。

“你丁爷爷早就等不及了，我来了！”丁地平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大吼一声，大踏步跨出牢房。

刘国铤却坐在床铺上没有动，慢条斯理他说：“急什么，等我写首诗！”

“他妈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写诗！”

“老子诗兴大发，关你什么事！”

刘国铤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与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刚走到牢门边，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这时隐隐约约地传来隆隆的声响。这不是雷声，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顿时，刘国铨的诗情像地下的岩浆一样喷发出来，他高声朗诵道：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刘国铨扬头挺胸，大步跨出牢门，又大声对刽子手也是对难友们说：

“你们有今天，我们有明天！”

刘国铨在隆隆的炮声中，向松林坡刑场走去。和他合戴一副手铐的是同室的难友谭谟。

丁地平一路破口大骂。他骂得解气，刘国铨听得痛快。

敌人用美制的手枪和刺刀把刘国铨他们几个人残忍地杀害了，然后把尸体推下尸坑，取下手铐，草草地检查了一遍，又匆匆离去。

重庆解放后，刘国鸾亲眼看见从万人坑里掘出来的哥哥刘国铨的尸体：他的头被打扁了，眼珠子流出来了，肚子被打穿了，嘴唇被刺刀割掉了……

11月28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在刘国铨的尸体旁边，有一个人微微动弹了一下，他就是谭谟。他身中三枪，但却未伤到要害。天亮后被山上的凉风吹醒，他带着满身血污，挣扎着从尸堆中爬了出来……

11时左右，以杨进兴为首的刽子手已经把国民党保密局本部司法处下达到白公馆监狱名册上的20人全部杀完。而以雷天元为首的刽子手，对二处寄押在白公馆里的人只杀了9个，还有19人（包括两名儿童）关在牢房里。按照徐远举的命令，这些人要移到渣滓洞一起杀害，现在看来，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等明天再说。

就在这时，白公馆看守所长的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电话是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打来的，他告诉雷天元，要杀的人太多，人手不足，请求紧急支援。

雷天元放下电话，就带着特务赶赴渣滓洞。

杨进兴把剩下的16名男犯集中到楼下二室关押，在成都被捕的郭德贤母子三人仍然关在楼上。

他也许是杀人杀得太累了，不知躲到哪里睡大觉去了。

整个白公馆监狱留给了杨钦典、李育生两个人看管。

杨钦典和李育生是好朋友，他的心事李育生都知道。他早就暗中表示过，如果有机会他一定帮杨钦典暗中放人。

杨钦典在狱里狱外走了好几趟，确信没有其他人了，就把李育生留在外边放风，自己返回牢中，迅速拿出一把钥匙和一把铁锤，递给了站在牢门口的罗广斌。

“记住，陈然的母亲和妹妹！”杨钦典的身影一晃，就消失在黑暗中。

罗广斌没有丝毫迟疑，他打开牢门，指挥每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接年龄和身体状况交叉搭配，相互照顾。

他安排妥当后，又急忙跑上楼去搭救郭德贤母子。

这时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但郭德贤仍没有睡。她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看到熟睡中的两个孩子，一想到他们即将失去母爱，不禁一阵悲伤涌上心头。

她轻轻脱掉两个孩子的衣服，在他俩的枕头边上放上两颗糖，又写下他

们的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和一些重要事情的经过，用一个小盒子装好，放进孩子的大衣口袋里。

突然，响起两下急促的敲门声，紧接着门上的锁头被打开了，罗广斌冲进来：“快走，特务都撤退了！”

郭德贤来不及多想，慌忙给两个孩子穿上衣服，背起来就下了楼。

17个大人排成一行，郭德贤背着6岁的儿子小波，难友周居正背着她5岁的女儿小可，他们借着夜幕的掩护，冲出了高墙，又冲出了电网。就在他们刚刚进入白公馆后山上的丛林中时，被敌人哨兵发现了。

“口令！”

没有人答得上来。敌哨兵开枪了，子弹在难友们身后和身边呼啸，恐怖的枪声在死亡的峡谷中回响。怀着求生的欲望，难友们冒着枪击，忍着荆棘割伤的痛楚，流着激动的泪水，在树丛乱石中滚爬……

难友们渐渐跑散了。郭德贤跑着跑着，抬头一看，一直跑在她前面的周居正不见了。她只好一个人往前跑。当她背着小波艰难地爬到歌乐山三百梯时，不料一脚踩响了敌特在禁区埋设的警报器。幸好上面岗亭的特务已经逃窜，母子二人有惊无险。

事后，她才得知，那天晚上，周居正和她跑散后，她的女儿

小可从周居正背上滑下去，散失于丛林乱石中，周居正在黑暗中摸索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离去。天亮后，她被附近一个老太太捡到了。解放后，郭德贤在报上登刊“寻人启事”，才把女儿找了回来。

一群手持汤姆生冲锋枪和手提机枪的匪徒冲进院坝。罪恶的子弹射向牢房中手无寸铁的难友。张学云从牢房死角里猛扑出来，双手死死抓住伸进风洞口的枪筒。

渣滓洞监狱的大屠杀是从晚上7点钟开始的。

从岗亭上传来的梆子声似乎比以往更急促，一阵紧似一阵；从歌乐山上刮下来的风似乎比以往更寒冷，一阵比一阵刺骨。

渣滓洞看守所的办公室里换上了特大号灯泡，站在楼上男牢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猩猩和猫头鹰狰狞的面孔。他们正在指挥大小特务紧张地搬运东西，焚烧档案和文件，还有几个陌生的面孔也在进进出出，他们是徐远举派来的杀手。

“解放军可能打到綦江了，不然敌人为啥这样慌张？”

“天亮前更黑暗，大家要提高警惕！”

“准备敌人狗急跳墙！”

毫无睡意的难友们挤在门边，一边观察一边议论分析。

炭坪上响起卡车的轰鸣声。这个时候发动汽车干什么？

不大一会儿，特务看守李福祥、余相北就手拿名单进来提人了，他们的背后还跟着一群看守，手里拎着刻着USA字样的手铐。

“蔡梦慰，收拾东西，换衣服，跟着转移！”

蔡梦慰知道敌人要对自己下毒手了。他装作收拾东西，把已经写好的《黑牢诗篇》用布包好，用绳子扎紧，藏在怀里。这首长诗一共有275行，字字句句都是他全部心血的结晶，他不能让它毁掉。

“蔡大哥！”同室的小难友蒲小路哭着扑过来，紧紧地抓住蔡梦慰的双

手。

蒲小路从小失去了母爱，由于不堪继母的虐待而离家出走，成了一个流浪儿。到了成都时，他被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连长抓去当了勤务兵，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干活，稍不如意就遭到拳打脚踢，而且一块军饷也不发。

有一次，蒲小路偷看部队的花名册，也不过是出于好奇，可是被连长发现后，竟然说他是八路派来的“小探子”，把他送进了监狱。

刚入狱时，蒲小路头上生满了痢痢疮，晚上还尿床，脾气又倔强，常常和难友们顶嘴，说打就动手，来饭了就抢。

蔡梦慰和难友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弟妹一样关心他，爱护他，想办法为他治病，又教他学文化。他永远也忘不了蔡大哥曾经用草纸给他订了一个识字课本，还手把手地教他练字。

蒲小路在大家的调教下，越来越懂事了。他经常利用扫地的机会，给难友们传递消息。

有一次，李磊想让他给自己当差，13岁的蒲小路白了他一眼，说：“要么放了我，替你干不行！”

看到蒲小路的成长，蔡梦慰从心底为他高兴。可是，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越变越可爱的孩子了。他用手抚摸着他的头，说：“我走之后，你要听难友们的话，永远做一个好孩子！”

蒲小路哽咽着连声答应。

蔡梦慰昂首阔步走出牢房。

在押往松林坡刑场的路上，他趁敌人没注意，把那卷《黑牢诗篇》抛到路边的草丛里。解放后，清理屠杀现场的同志拾到了这些被雨水浸湿的、用草纸写成的诗稿。

和蔡梦慰一起遇难的还有何柏梁，他入狱之后，一直在对看守进行策反，他一直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在11月11日捎到狱外的信中，他还叮嘱家人：“要是我们有平安自由出去的机会时，请以送一根领带来作记号。”

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弄清楚烈士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浪漫的请求。

女英雄邓惠中被提出了牢房。在去刑场的路上，她见到了与自己同时被捕的儿子邓诚。儿子搀扶着母亲，母亲拉扯着儿子，母子俩一脸无畏，迎着刀丛枪林走去。

走了一批，又走了一批。

吕英、陈俊卿、李明辉、刘石泉、古承铄、陈继贤……

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只有歌声为战友送行。

当雷天元带领一群刽子手赶到渣滓洞监狱的时候，已经是28日凌晨了。到这时候为止，这里总共才处决了48人，狱中还剩下将近200人。

按照李磊和徐贵林商量的办法，一律用绳索勒毙，现在看来，这样干速度太慢。

雷天元打电话紧急请示徐远举，要求改用枪杀。徐远举迟疑片刻，便表示同意。到了这种时候，也顾不上保密了。

凌晨两点钟左右，夜色漆黑如墨，山风呼啸，细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

突然，一声尖厉的口笛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

“楼上楼下的都听着，楼上的全部下来，女的到楼下八室集中，动作要快，我们要办移交了！”徐贵林扯着嗓子在放风坝上吼叫。在他的身后，一

字排开三名看守。

在特务的监视下，男牢楼上楼下全部难友分别关进楼下一至七室，两间女牢的难友关进了第八室中。

“移交给谁？”几位难友同时质问道。

“警备司令部杨森。”特务看守支吾着。

转移完毕，一把把铁锁又锁紧了牢门。

突然，一群手持汤姆生冲锋枪和手提机枪的匪徒冲进院坝，领头的就是杀人不眨眼的熊祥、王少山。他们像魔鬼一样站在每间牢房门口。

徐贵林一声口笛响过，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各牢房同时喷出了火舌。

格格格格……哒哒哒……

美制冲锋枪在疯狂地吼叫，无数子弹向牢房内无处躲藏的难友们身上倾泻……

“新中国万岁！”

“共产党万岁！”

口号声、歌声，夹杂着敌人的枪声，响彻渣滓洞内外！

第一排枪声响过，很多同志倒在血泊之中。

在第一批就义的难友中，有两位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大男孩，一个叫杨友华，一个叫史德端。

杨友华是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的成员，他曾协助为《挺进报》购买手摇转轮油印机，为华蓥山武装起义部队买药品、枪支等，并且常常邮寄散发《挺进报》。他是被叛徒李忠良供认出来的，被捕后关进二处，当晚就遭受到了最残酷的刑罚——用烧红的烙铁在背上烙烤。他被烙得皮焦肉烂，却牙关紧咬，坚不吐实。

关进渣滓洞监狱后，他接触到很多阅历丰富、知识广博的革命者，使他获得了极好的学习机会。据脱险志士回忆，他曾向成善谋烈士学习过数学、历史、哲学，向懂音乐的同志学习过音乐知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用竹签子蘸棉花灰墨水写字，还在粗糙的草纸上仔细抄录鲁迅先生的《彷徨》。

在大屠杀之夜，当敌人射来第一批罪恶的子弹时，他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英勇地倒下了。

史德端是在1948年5月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逮捕的，起因就是他写信给香港的沈志远先生，请教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回信被学校当局查出来。他酷爱文学，入狱后身边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共产党人和志士，不仅使他在政治上成长很快，在诗歌创作上也结出累累硕果，被难友们称作“我们的小诗人”。1949年3月，因查无罪证，他被宣布无罪释放，不料在办理出狱手续时，特务从他身上搜出一篇诗稿《天亮了》，就追问是谁写的，不交待就不放人。史德端虽然看到了自由就在一步之遥的地方，但为了保护难友，不肯说实话，结果又被送回了牢房。这天晚上，他也是高喊口号英勇地倒下了。

就在子弹向囚室里倾泻，吞噬着难友们的血肉之躯时，一个个令敌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几乎同时发生了。

第五室的共产党员，新闻记者胡作霖陡地挺直躯体，两手紧抓牢门，用他宽厚的胸膛去堵住敌人喷吐火舌的枪口……

他是1948年6月7日被捕的，在狱中，他将叶挺将军的《囚歌》谱上曲，并教难友们唱。在这个大屠杀之夜，他还听到有人在高唱《囚歌》。

第六室里，何雪松强撑起负伤的身体，像钉子一般铆在牢门边，用身体挡住罪恶的子弹。倒下去时，他还用尽最后的力气斥责刽子手：“你们也活不了多久……”

他没有回头，但是他知道难友们正在从后窗突围，他能多坚持一会儿，难友们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

何雪松生前还不是共产党员。解放后，根据他的生前要求和狱中表现，中共重庆市委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敌人的枪筒从第七室的风门口伸进来，猛烈地抖动着，呼呼闪着火苗。突然间，一个人影从牢房死角里猛地跃起来，双手抓住已经打得发红的枪筒往里拖……

这个人是共产党员，名叫张学云。

张学云是四川越西县人。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他的家乡，两次住在他的家中，从此在他的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种。1948年，党组织安排他打入国民党军队罗广文部332团三营七连当连长，从事军运策反工作，因叛徒出卖，在泸州被捕。

张学云与他的妻子余显容十分相爱，他曾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这样赞颂他俩的爱情：

我们的爱是伟大的有意义的，有理想的，不是仅肉体的欲念，也不是仅才子佳人们卖弄风流的陶醉，更不是“卿爱我，我怜卿”似的有闲人含有病态的怜念。我们真正是：如电一般地感人，如火一般地热烈，如钢铁一般地坚强，如泰山一般地崇高，我觉得我俩都是生命的星光，我失了您即是失却光明，即是失却人类幸福的象征，因为您是多么地爱好人类的幸福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美好情感，有着幸福家庭的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毅然告别了娇妻，踏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张学云使劲往怀里拖枪，只要能把枪夺过来，就可以还击。可惜的是，汤普生冲锋枪的枪匣很长，被窗棂卡住了，急切间很难得手。他急红了眼睛，大声对难友们喊道：“我是军人，我掩护你们！快逃呀！”

他猛地松开抓枪的手，随即用双手抓紧牢门，用他那宽厚的胸膛堵住喷吐着火舌的枪口……

与此同时，三室的新四军中原军区32团一营三连二排排长，年仅27岁的李泽一个箭步跨到门边，以熟练的战斗动作紧紧抓住伸进来的枪筒，与刽子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夺枪斗争。

遗憾的是，因为子弹匣过长，枪筒卡在门框里，不能得手，他最后壮烈牺牲在风门边。

枪声一阵猛似一阵，牢房里碎屑飞溅，墙壁被打得如同蜂巢一样，密布着无数子弹穿过的洞眼，空气中弥漫着血水的热气和令人窒息的火药味。难友们纷纷倒下了，鲜血涌泉般流出“共产党万岁！”……

枪声中，还不时传出阵阵高昂的呐喊声，这是许多难友最后的呼声。

“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我们站出来你们打好了！”五室的陈作仪被打伤了腿，仍大声斥责敌人，声音中蕴藏着深深的愤恨。

哒哒哒哒……罪恶的子弹密集地飞向他的身躯……

牢房里渐渐没有了声音，只能隐约听到尚未断气的难友发出的呻吟声。

“停止射击！”指挥屠杀的徐贵林大声对刽子手发布命令。“全都到后窗去，前面不要站人！”

哒哒哒哒……

枪声在后窗口又嚎叫起来，未中弹的难友中弹了，已经牺牲的，身上又贯穿了新的弹孔。

又一声口笛响起，射击停止了。徐贵林大声命令：“把门打开，进去仔细检查，挨个给我补枪，往头上打，每人头上一枪！”

砰砰！砰砰！枪声又在满是硝烟的牢房里响起来。

“我是小孩呀！……”蒲小路满身是血地从地上爬起来，声音中带着恐怖。他确实是小孩，那年才13岁。

“该死的小共匪，给我打！”徐贵林一声令下，枪声响起，小路再没有了声音。

特务打开了第八室的牢房，女难友全集中在这里。刚才敌人开枪时，左绍英和彭灿碧首先想到是孩子的安危，她们用身体挡住射来的密集枪弹，希望孩子能死里逃生。

第八室里满地都是尸体。胡其芬、李惠明、黄玉芬、张静芳、朱世君等人都倒在血泊中。只有两个年幼的小女孩——小卓娅和苏菲娅在尸堆里爬来爬去，哭叫着找妈妈。她们哪里知道，她们的妈妈已经永远不能说话了。

身负重伤的罗娟华在昏迷中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她挣扎着艰难地向孩子身边爬去，想用自己带血的身躯把孩子掩护住。一寸，一寸……然而，就在她刚刚抑到孩子身边时，灭绝人性的刽子手竟端起冲锋枪对准罗娟华和两个孩子，打了满满一梭子50发子弹！

50发子弹……连床都剧烈抖动起来！

补枪完毕，门重新锁上。除几个人在走廊上巡视外，其余的刽子手争先上楼，到各牢房搜寻值钱的衣物，并找来一些可以燃烧的木柴堆积在楼下。

天亮之前，渣滓洞这场大屠杀暂时告一段落。

徐贵林高声喊道：“各位辛苦了，每人赏银元一块。”

分赃完毕，他带上几个特务乘车赶奔广元。按徐远举的布置，潜伏人员全在那里碰头。

雷天元带人进城向徐远举复命。然后，他又找来一大桶汽油，火速返回渣滓洞。

汽油泼到早已堆放好的木柴上，霎时间，烈火腾空，浓烟滚滚，整个渣滓洞在燃烧。

这时候，牢房里还有30多人未被打死，但大多身负重伤。因为当时解放军进军神速，连打炮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刽子手们急着逃命，屠杀时比较慌张，尽管经过补枪，仍有部分同志未中要害。

由楼上二室转移到楼下二室的唐文渊，曾是叱咤华蓥山的起义勇士，起义失败后转移到重庆，受聘担任重华学院的副训导长兼生活指导主任。1948年春节前夕，因为行踪暴露而被捕，关进了渣滓洞监狱。

他侥幸躲过了第一轮扫射，又躲过刽子手的逐个补枪。当烈火熊熊燃烧，门窗都已烧坏时，他乘着浓烟掩护，砸开门窗跑了出来。

还有一些身负重伤的难友，也被浓烟熏醒了，他们从尸堆里爬起来，挣扎着冲出去。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八号牢房后侧、狱中厕所旁那段有缺口的围墙冲去。

这就是杨虞裳、白深富等人修补过的那段断墙。由于修补的不牢，入秋

的一场大雨，又把它冲出了一个缺口。难友们后来都知道了，这个地方非常不结实，稍撞即倒。

现在，这堵断墙便成为在大屠杀中侥幸活下来的难友们突围脱险的唯一通道。

当难友们冲到缺口处的时候，他们的身影被火光映照出来，让滞留在炭坪上的匪徒发现了，他们立刻抓起冲锋枪和手提机枪扫射起来。顿时枪声大作，缺口被封锁住了。

冲在前边的部分难友跳出缺口后，迅速分散脱险。跑在后边的难友又暴露在纷飞的弹雨中。

楼四室的共产党员张现华（重庆大学学生）、张孟晋（重庆大信高等商校校长）等 10 多名难友被罪恶的子弹击倒在围墙旁的水沟边。

当唐文渊已经跨上围墙缺口的时候，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胸部，他踉跄了一下，头部又中了一弹，他饮恨倒下了。他的眼睛大睁着，张开的嘴仿佛要喊完一句他没有喊完的口号 1987 年 4 月 5 日，击中烈士左胸部的那颗子弹被清理人员从烈士的遗骸中找出来了，由烈士长孙捐献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珍藏在陵园的文物库房里，编号为“00423”。

除了从围墙缺口处逃出来一小部分难友外，还有两位难友在这场大屠杀中侥幸生存下来。

当特务们正在封门放火烧监时，女难友盛国玉趁混乱中跑出，躲在厕所下面的尿槽里，待特务都跑了才爬出来。她是在这场大屠杀中唯一幸免于难的女难友。

傅伯雍是从渣滓洞煤窑的下水道里逃出来的。

燃烧了好几个小时的大火终于熄灭了，整个渣滓洞监狱变成了一片乌黑的灰烬。烈士的遗体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下一小方一小方躯体和烧得脱离了躯体的人头……

在《红岩》中，渣滓洞的难友未等敌人动手进行屠杀，就组织了暴动。尽管很多同志中弹倒下了，但他们是倒在突围的途中。突围脱险的难友很多，连“监狱之花”都被一个女同志抱了出来。突围时，还有人打出了红旗。

与真实情况相比，小说的艺术描写更能令人欢欣鼓舞。然而，我们却永远不要忘记，在历史上的这一天，真正发生的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我们的先烈是用赤手空拳面对着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刽子手。在这场较量中，前者肯定要失败，但是他们却在烈火和热血中获得了永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真正的胜利者，而那些暂时胜利

的刽子手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被所有热爱真理的人世代唾骂下去。

周养浩借重杨进兴，再举杀人屠刀。松林坡刑场再次枪声大作，血肉横飞。就在重庆宣告解放的前一天，32 名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中。

11 月 29 日，人民解放军已陆续攻占重庆南岸的长江各渡口。整个重庆陷入了一片混乱。

蒋介石已经撤到了白市驿机场的“中美号”专机上。他已经做好了飞往成都的准备，但还是有些不甘心，又叫儿子蒋经国通知杨森，让他死守重庆。接着又给毛人凤下命令，让他用飞机作弹把所有的公路、山洞、桥梁炸掉。

蒋介石还下令把停泊在重庆的海军兵舰一律炸沉。

毛人凤听了，心中暗暗叫苦：“都什么时候了，还怎么去炸呀？”据他掌握的情报，海军中有很多官兵与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打得火热，说不定这时候已经起义了。

但是，委员长的命令他可不敢违抗，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一转身，他就把这个任务布置给了徐远举。

徐远举这时候已经顾不上杀人了。关在新世界临时拘留所中的那些人，毛人凤全都交给周养浩去处理。

昨天上午，兼任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周养浩把一份列有 32 个人的名单交给杨森，杨森当即批准。当天下午，周养浩就把屠杀任务布置给了稽查处行动组长廖雄。

四点多钟，廖雄就在稽查处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屠杀方案。最后决定，刑场设在松林坡，由行动组副组长王耀彩带人先去布置，把尸坑掘好，他又从行动组员中挑选出李家华、麦育平等七个人担任刽子手。

周养浩对廖雄的布置大加赞扬。为了更有把握，他又从徐远举那里借来杨进兴帮忙。

29 日早晨，一阵阵枪炮声从长江南岸传来，而且越来越清晰。听着这声音，囚禁在新世界临时拘留所中的革命志士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他们期待着黑暗的年狱之门轰然倒塌，遍洒金色阳光；然而他们又有些担忧，不知道敌人会不会这个时候……

上午 9 时，廖雄率领一群特务和交警队员闯进新世界拘留所，一连声地催促：

“快！赶快！马上转移。叫到名的马上收拾东西，到院子里列队。”

匆忙中有 32 个人被推到院子里。特务没有让他们吃早饭，就恶狠狠地催逼着他们带上各自的行李，登上停在外面的一辆军用大卡车。

汽车驶出市区，向郊外开去。

李子坝……沙坪坝……杨公桥……

终于，卡车停在一个满山长着松林的地方，这就是中美合作所境内的松林坡刑场。尾随其后的吉普车也停了下来。廖雄跳下车来，大声吩咐道：“先提 10 个人上山。”山坡上的松林间，王耀彩带着七个行动组员外加一个杨进兴，已经像噬血饿狼一样埋伏在那里了。“下来，快下来！”持枪的匪徒首先拖下反绑双臂、年仅 21 岁的女记者黄细亚，拽着她拖向林中。黄细亚是个刚烈女子。19 岁那年，家里给她包办了一门婚姻，她宁死不从，竟然把一包红头火柴药面吞进肚子，幸好抢救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不久她就从家中逃了出来，跟随着一群流亡学生来到重庆，进入重庆市立二中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西南风晚报》当记者，经常以采访为名，传递革命消息。1949 年 9 月，她被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黄细亚年纪不大，诗却写得很好。被捕之前，她曾经写过一首诗送给诗友。在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那首诗其中的一段蓦然间涌进她的脑海——

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以你诗的镰刀，去收割人类的幸福。

牢记着吧，诗人！

在凯旋的号声里，我们将会交换一个微笑……

砰砰砰，枪声响过，三发子弹射进黄细亚的头部、胸部。她提在手里的

一个书包掉在地上，装在里边的茶杯打碎了。她的诗绪在血雨中飘零……

共产党员彭立人刚一被推下车，就高呼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一人高呼，众人回应，悲壮的口号声在山谷间久久地震荡、回响……

枪声再次响起来，一批戴着手铐的革命志士倒下去了。

半个小时后，廖雄命令将剩下的 22 人一起押上山去杀害。他有些急不可待了。

走在众人前边的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名叫钟奇，被捕前公开身份是《和平日报》的记者。

1949 年 10 月，他接受地下党的指派，准备携带一部电台送给贵州松桃游击队。他还没有动身，贵州那边的地下党组织忽遭破坏，他也被牵连被捕。

就在刚才离开新世界临时拘留所的时候，他把刚刚写好的一封遗书交给了留下来的难友。这封信是他写给妻子萧德琪的：

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至爱的贤妻！

枪声响了，钟奇倒下去了。就在他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仍然在心头默念着那封遗书……

这次屠杀经过两个小时才结束。刽子手们将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推入坑内，草草掩埋，扔下散乱一地的磁盆、水瓶、茶杯、皮鞋，扔下溅在山坡上、马路边、水沟里的一片片鲜血，扔下这里被他们一手制造出来的血腥空气，于下午 3 时回城复命。

1949 年 11 月 27~28 日，共计 180 人被害于渣滓洞看守所；

1949 年 11 月 27 日，共计 27 人殉难于白公馆看守所；

1949 年 11 月 29 日，共计 32 人由新世界临时拘留所被押至松林坡枪杀；

1949 年 11 月 14 日，江竹筠、李青林等共计 30 人，死难于电台岚垭刑场；

1949 年 10 月 28 日，陈然等 10 人被公开枪杀在大坪刑场。

经有关方面的核实和统计，重庆军统集中营历年来的死难者目前有案可查的总数是 321 人，其中经审查已被定为烈士者共计 285 人，加上 5 个随父母亲牺牲的小孩，共是 290 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 31 人。在总计 321 人中，死于 1949 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 207 人，其中烈士 185 人。

在 285 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 161 人，约占总数的 57%。民盟成员共计 25 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读到这里，你无论如何不会觉得这一连串的数字是枯燥的。在这每一组数字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个血与泪写成的故事。

有一个细心人告诉我，据他了解，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在全国各地举行“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斗争史实展览”时，每到一处都要搞一个开幕式，而在那前后的几天里，都会遇上变天，或细雨霏霏，或雷电交加，或大雪飘飘，或寒风呼啸。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

但我宁愿相信这是苍天有情，为我们的英烈而感泣；我宁愿相信这是我们的英烈精魄有知，在九天之上“泪飞顿作倾盆雨”。

第十章 没有写进小说的故事

谭政伦背着彭云找他的亲妈妈。邵子南望着心上人的遗容，悲痛欲绝。事隔 28 年，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杨汉秀。余显容看到张帆这个名字，立刻昏了过去。

1949 年 11 月 30 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重庆市区，山城宣告解放。

从白公馆、渣滓洞脱险的难友们，纷纷从各自的隐身处走出来，聚到一起，相拥而泣。他们这是为自己的劫后余生而流泪，更是为死难烈士未能看到解放这一天而痛苦地流泪。

罗广斌和川军爱国将领周绍轩一起来了。那天晚上，难友们冲出白公馆，四散突围，和罗广斌跑在一起的，最后只剩下周绍轩了。他俩翻过歌乐山，跑到白市驿，躲在周绍轩将军原部下一个团长的家里。四天以后，他们确知重庆已经解放了，才来到市里。

为了迅速找到突围脱险的同志，有关部门在磁器口、红岩村等地设立了好几个“脱险同志联络处”。相继有 35 位脱险者来到联络处报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白公馆突围出来的一共是 19 人，另外还有一人是侥幸脱险的谭谟：

罗广斌	周居正	毛晓初	郑业瑞	任可风
段文明	贺奉初	杜文博	杨其昌	周绍轩
尹予勤	王国源	李荫枫	江载黎	李自立
秦世楷	郭德贤	谭谟	郭小波（小孩）	
郭小可（小孩）				

从渣滓洞突围出来的一共是 15 人：

肖中鼎	刘德彬	傅伯雍	盛国玉	孙重
钟林	张泽厚	杨纯亮	李培基	周洪礼
刘翰钦	陈代纯	周仁极	李泽海	杨同生

谭政伦也背着江姐的儿子彭云来到联络处。

重庆解放那天，谭政伦就兴奋地对彭云说：“云儿，天亮了，我们出头啦！你妈妈就要回来啦！”

云儿偏着脑袋用小手搂着谭政伦的脖子问：“妈妈，您不是我的妈妈吗？我哪儿还有一个妈妈呢？”

谭政伦爱抚地对云儿说：“我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叫江竹筠。走，我们去找她！”

他们走了一个联络处又一个联络处，一连找了三天，也没有发现江竹筠的名字，也没有老彭的消息。

在弟弟谭竹安的陪同下，她又到方圆十多里的军统集中营去找。直到 12 月 13 日，和江姐一道遇难的 30 个人的遗骸才在电台岚垭被挖掘出来。除了江竹筠和李青林之外，其他尸体都已腐烂，无法辨认。

望着江姐的遗体，谭政伦的嘴唇翕动着，泪流满面。谭政伦虽然从未与江姐见过面，但在她的心中，早已把江姐看成自己的亲姐妹了。

不久，又一个晴天霹雳向她袭来——一年前老彭就壮烈牺牲了。党组织和弟弟谭竹安为了不让她伤心，一直没告诉她。如今解放了，老彭牺牲的消息再也瞒不住她了。噩耗接踵而来，谭政伦顿觉天旋地转。

“妈妈！妈妈！”这是彭云在焦急地呼唤她。

“妈妈！妈妈！”这是彭炳忠在焦急地呼唤她。

她一手搂着一个孩子，决心把这两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彭和江姐。

几十年过去了，两个孩子早已长成了大人，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彭炳忠是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无线电子学副教授；彭云是中科院电子计算机博士。

1952年谭政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接过了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的烈属证书。1956年，谭政伦从工农速成干校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卫生教育馆办公室工作。同年当选为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多年来一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1976年5月31日，年仅59岁的谭政伦因脑溢血突发，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12月13日那一天，当李青林的遗骸被清理出来后，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满面泪水，悲痛欲绝。

他就是李青林的未婚夫邵子南。

当李青林遇难时，邵子南正作为参加城市接管工作的干部，满怀与爱人相会的激情，随同排山倒海的解放大军向重庆飞奔而来。

可是他还是来晚了，再也看不到他日夜思念的爱人了。

半个多月后，重庆各界举行烈士追悼大会，在李青林的遗像下挂着一幅挽联：

求自由惨遭屠杀可歌可泣可称民族英雄为主义壮烈牺牲不屈不挠不愧女中豪杰邵子南望着心上人的遗容，读着这幅挽联，满腔悲愤从笔端涌出，化作了悼念的诗句：

今天，我走在大街上，大声地说着我们的党，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毛主席！

我到处都看到你的存在，我到处都感到你的生命！

解放军一进城，李碧涛就拉着妈妈的手，从城里步行十几里到沙坪坝去打听小萝卜头的消息。当她听说自己的狱中小伙伴和他的父母一起遇害的确切消息，浑身战栗起来，连心都疼得发抖了。

12月11日这一天，人们政府派人把杨虎城父子、宋绮云夫妇以及小萝卜头的遗体挖掘出来，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再运西安，又举行了社会各界公祭。公祭结束后，杨虎城的遗骸被运回陕西长安安葬，宋绮云夫妇和小萝卜头的遗骸被安葬在西安南郊风景优雅的杜甫祠堂旁边，还专门为他们修建了烈士陵园。每到清明节，前来这里祭吊的人络绎不绝。

重庆解放后，杨汉秀的亲友们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但却没有线索。大家以为她是在火烧渣滓洞时牺牲了。不久，曾在南方局做过组织工作的龙潜来歌乐山烈士陵园凭吊难友，打听当年周副主席从延安带回来的一位女同志的殉难情况，却没查到名字，只留下一首悼诗走了。

1977年，杨汉秀的儿子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写着“吴铭同志”字样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示。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杨汉秀。

1975年夏天，据歌乐山地区的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发现过一具带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这位牺牲的烈士就是杨汉秀。

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杨汉秀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重庆解放后，一位解放军干部去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参观凭吊，在渣滓洞一间牢房的地上，捡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第二批”、“第三批”几行字。他判断这是烈士牺牲前写的，就珍藏起来留作纪念。后来他把这张纸条献了出来，经鉴定，这正是胡其芬的笔迹。这显然是她在大屠杀进行中情况十分危急时写下的。

这就是烈士留给我们的绝笔。

12月27日，解放大军攻占成都。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群众队伍中，有一位年轻女子不住地踮起脚张望。

她就是张学云的妻子余显容。她虽然知道丈夫被捕了，但却不知道丈夫已经牺牲。她多么希望在解放大军的行列中突然发现丈夫熟悉的面庞呀！

一天上午，张学云的老乡、曾任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中将参赞并一直为营救张学云多方奔走的韩百城先生高高兴兴地找到余显容，拿着一张刚买的报纸告诉她，这上边登着重庆“11.27”殉难烈士的名单，他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张学云的名字。

余显容接过报纸一个个名字挨着细看，“张帆”二字猛然映入眼帘，她顿时昏了过去。

张帆是张学云的笔名，是他离开成都那一天夜里给自己起的。他告诉妻子，这是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意思。

1950年1月初，重庆举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余显荣和二哥去参加，但他们去晚了，张学云的遗体已经入殓装棺了，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成。

在余显容的身边，至今仍珍藏着一个黑漆木盒，这是张学云亲手精雕细刻送给她的。他本想在这个盒子中装一件珍贵的礼品送给她，但他总是在艰难困苦中度日，一直没有送成。但在余显容看来，这个空盒子却比装上任何宝物都更珍贵。

陈然的母亲和妹妹来了。

余祖胜的弟弟来了。

蓝蒂裕的妻子带着孩子来了。

唐虚谷和张静芬的子女都来了。

他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但是他们却赢得了一份永远的骄傲。他们的亲人大无畏的革命战士，他们的名字在中华民族的英烈史册上永远熠熠发光。

重庆解放的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地下党的代表就立即赶到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凭吊烈士，安排后事，在刑场旁一座高岗上安葬了烈士遗骸。1955年4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又为烈士建墓立碑，碑文上有这样一段话：

烈士们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将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完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勇前进。

回到人民手中的歌乐山恢复了它的青翠秀丽，全无一丝当年的恐怖阴森。每年一到“11.27”烈士殉难日，就有很多人来到烈士长眠的地方，献上鲜花，献上思念，向为新中国献身的烈士表示自己的崇敬和悼念。

只有置身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刻，你才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江竹筠在她的信中引用过的那句话：

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

罗广斌挑灯夜战。他要尽快完成狱中难友的嘱托，把他们用血泪凝成的意见向党组织汇报。

罗广斌来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后，就被分配参加处理殉难烈士的善后和筹备追悼会的工作。

罗广斌白天紧张地忙着工作，晚上回去也不休息。他要赶写出一份报告来。

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里，不屈的共产党员们都很明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胜利即将来临，死亡也即将来临，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由于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和上下川东起义失败，造成了党组织的大破坏。这血的教训，无比沉重，也无比宝贵。

于是，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交换意见，从革命队伍内部找问题，总结川东地下党大破坏和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他们约定：不论是谁，只要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些血泪凝成的意见向党组织报告。为的是总结血的教训，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革命志士用生命换来的政权建设好、巩固好。

如今，他活着出来了，怎么能忘记狱中同志的最后嘱托呢？！

必须尽快把报告写出来！

他感到了自己肩头上那副担子的重量。

他不会忘记，狱中同志们最感痛心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恰是被自己景仰的上级出卖的。为什么绝大多数普通党员在酷刑下，在刑场上都能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而少数几个资历深、职务高的领导干部却无耻地叛变了呢？

狱中同志痛心地看着，少数领导人脱离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脱离激烈斗争的锻炼，滋长了消极思想。有的人从生活腐化开始，走向政治上的腐化。

正是他们的叛变，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他不会忘记，左倾盲动思想害了多少好同志，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多大损害。上下川东地区一共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每次都以惨败告终。狱中同志有的直接参加了起义，有的参加过为起义服务的工作。他们大都认为，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根据上级指示，组织下乡，发动武装斗争，原来是不错的。问题出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发生了“过左的盲动倾向”，对形势估计不足，盲目乐观，缺乏准备，而又急于求成，造成重大损失。

他不会忘记，麻痹轻敌的教训是多么深刻。许多同志恨特务，怕特务，又轻视特务，却不知道实际上特务对我们已有多年的研究。有的同志的信件长时间被检扣、被偷看而未发觉。有的同志明知有危险，却图侥幸不走，程谦谋就是这样被捕牺牲的。他生前说过：“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他不会忘记，狱中同志热切希望在他们身后，党能切实加强党内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

他更不会忘记，狱中难友志士们一致的强烈要求。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一定要把屠杀革命志士的特务、出卖革命出卖组织的叛徒，缉拿归案，严加惩办。其中最主要的有：毛人凤（军统总头目，国民党保密局局长），徐远举（军统西南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周养浩（西南区副区长），雷天元（二处科长），左志良（二处科长），张界（二处主任法官），卢章（二科科长），漆玉鳞（二处行动组长），李佑生（渣滓洞监狱训导组长），

陆景清（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白公馆监狱看守所所长），张鹤（前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徐贵林（渣滓洞监狱看守所所长）。

叛徒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骆安靖。

罗广斌一边回想着一边写着，雪白的纸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1949年12月25日，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突围脱险后的第28天，一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由罗广斌亲手交到了中共重庆市委。

这份报告长达两万余字，共分七个部分。第七部分为“狱中意见”，共有八条，记述了狱中共产党员们给党的最后寄语：

-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
-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 五、切勿轻视敌人；
-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 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八条意见有悲愤，有忧虑，有深刻的思考，有希望和建议，但没有顾忌，没有隐讳，没有灰心丧气。经历血与火考验的共产党员们完全向党组织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就总结当时的斗争经验而言，以上八条意见未必完全准确全面，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烈士们那一颗颗对党无比忠诚的红心。4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来重读这份“狱中意见”，不是仍然会感到有许多新的启迪吗？

卢汉下达逮捕令，徐远举却自己送上门来。徐贵林扮成菜贩，杨进兴改名杨大发，但都瞒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叛徒刘国定、冉益智被枪毙，大快人心。

在《红岩》小说中，所有的特务头目和刽子手的下场都没有作交待。对一部小说来说，这样处理是对的；而对于一部纪实作品来说，如果不作这方面的交待，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疏漏，况且，我们的读者也很希望知道这些反面人物的结局。

1949年12月30日凌晨，蒋介石沮丧地乘飞机逃离重庆。当天上午，徐远举也率领一部分军统特务乘飞机逃到了成都。

到了成都，徐远举不负前言，把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王少山、陆景清等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都打发去了台湾。他暂时还不能走，毛人凤给他布置的许多差事还未办完。

12月9日，十几架美制大型运输机从成都起飞，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飞机上坐着最后一部分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按计划，这些飞机在这里加完油后立刻起飞，途经广州逃往台湾。

然而，这批飞机还未起飞，已经宣布起义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卢汉便下了命令，派出大批起义部队扑向飞机场，当即便把这批飞机扣留了下来。

在尚未逃离大陆飞往台湾的国民党要人中，除了那些国民党政府的高级

官员外，还有一批双手沾满了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鲜血的国民党军统（后改名为保密局）特务头子徐远举、周养浩，还有保密局本部经理处处长郭旭以及保密局本部总务处处长成希超等。

这些军统特务们感觉末日降临，纷纷各自寻找出路逃命。

早在卢汉的部队将飞机场包围之前，除周养浩未来得及行动外，消息灵通的徐远举、郭旭等人早已窜入昆明市区。卢汉立即命令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李志正出动警察局全体人马，在昆明市布下天罗地网，务必将那几名逃跑的军统特务抓获归案。

10日凌晨5时，李志正局长得知郭旭和成希超藏在市内的皇后饭店，便命令警察第六分局局长黄秉新率领本局警察快速赶到该饭店，当即将二犯逮捕并送往钱局街昆明监狱严加看管。另外一部分警察则前往飞机场去逮捕周养浩。但罪大恶极的徐远举却不知去向。

一个小时后，李志正就得到消息，徐远举此时正藏匿于曾在卢汉手下担任过云南省保安司令部总务处长的朱家才（即朱子英，当时为军统运作人员）的家中。李志正知道卢汉是朱的老上级，便向卢汉要了一份逮捕徐远举的手令，亲自带人包围了朱家。朱家才不能违背老上司的命令，但又不愿意直接出面逮捕徐远举。他向李志正求精，最好由警察们出面，将藏匿于朱家的徐远举骗出来在途中逮捕。

李志正想了想，表示同意。

李志正带人来到太和街警察局第六分局，准备从这里派人去抓徐远举。队伍集合好了，正要准备出发，徐远举却一个人开着朱家的一辆美式吉普车自己送上门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天一大早，徐远举起床后见朱家才不在家，副官又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朱的去处。狡猾的徐远举感到情况不妙，赶忙换上了老百姓衣服，慌忙跳上朱家才的私人吉普车向外面逃去，谁知忙中出错，竟然把车开到了警察局第六分局的门口。

李志正立刻拦住汽车拉开车门，将身穿一件蓝布大褂的徐远举揪了出来。

领头逮捕周养浩的是警察局外事科长吕小垣。他带人火速赶到飞机场，正要展开搜查，却意外地遭到了空军总站站长蒋绍禹的故意刁难，不给他们拨发车辆，因此也就无法拘捕周养浩。消息报告给卢汉后，卢非常生气，命令李志正重新派人前去处理此事。

李志正不敢怠慢，亲自带上几个人来到了飞机场。警察们仔细检查了这批被扣的人员，却没有见到周养浩，李志正经过仔细分析，认为飞机场当时戒备森严，周养浩逃跑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又集合了全体警察，将周养浩的相貌特征及身材等情况告诉大家，命令扩大搜索范围继续寻找。

不大一会儿，几名警察带着一个人来见李志正，一看正是周养浩。

原来，周养浩随着一批人跑到了一辆破旧汽车里面藏了起来。他没有想到警察会这么快就找到了他。

此刻的周养浩光着头，面色苍白，样子十分狼狈，完全没有了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那股神气劲。

徐远举和周养浩都被关进了战犯看守所，成了囚犯。

关押改造期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改造政策的感召下，徐周二入能够

走改恶从善的道路，对自己过去所犯的严重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写了不少认罪悔罪材料。

1973年，徐远举病故。

1950年春天，正是菜花飘香的季节。这一天，重庆市郊南岸裕华纱厂（现重棉三厂）的托儿所所长叶大姐，正利用厂休日在串门走户，收集潜藏敌特的线索。忽然间，她看见一个草帽遮颜的菜贩，一边在家属区叫卖，一边不时地扭头后窥。叶大姐见此人举止不像个卖菜的，又联想起市军管会公安二处情报科南岸片情报组的刘文华曾跟她说过，要注意发现在逃的“11.27”大屠杀的刽子手这件事，便上前搭讪起来。

一听菜贩是河南口音，叶大姐更加警觉，便佯装买菜，借看秤之机，看清了菜贩的脸面。“此人好面熟呀！”叶大姐不觉一惊：“哦！他不是渣滓洞脱险难友常提起的看守长猫头鹰吗！”她灵机一动，摸摸口袋，假装忘了带钱包，以借钱为名走进一个姐妹家，叮嘱这姐妹暗中跟随那个菜贩，设法弄清他的落脚点。然后她又来到菜贩前，付了菜钱……叮铃铃！叶大姐向公安二处情报科打电话报告：“发现刽子手……”“我马上赶来！”刘文华放下电话，急奔裕华纱厂。布控、调查迅速展开。警民共同编织的大网，急速收拢。公安二处内勤科根据情报材料和脱险同志的检举证实：这个隐名改姓的菜贩子，正是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

3月22日，重庆市公安局18分局按照市公安局一处的命令，在弹子石惠工村57号将徐贵林逮捕归案。

1950年6月18日，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在解放碑召开了千人大会，宣布对这个刽子手处以极刑。

1950年初，四川南充县青居乡馨坝和平三村来了两个陌生男女，男的三十出头，浓眉横眼，一脸横肉，身穿呢大衣，手带一只游泳表。女的一头烫发，外穿一件红呢大衣。

第二天，那个男的请客设宴，自称叫杨大发，广安人，自幼父母双亡，随叔父在外做小生意。现在解放了，要回广安，家已无人，想在这里佃田务农。几天后，杨大发换上了土布衣服，找村上姓杨的认了门干亲家，租了几亩地，就种起庄稼来。

在减租退押和土改中，他积极斗争地主，被评为贫农，分了田地，还当上互助组长。他三天不讲两句话，对人和气，倒像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杨大发还积极参与村里的学习文化活动，主动把分得的粮食捐献给了村农民协会，后来他被村里人选为互助组长。

没过多久，村里人就在他身上发现了不少疑点。有一天，他们夫妇发生争吵，杨又凶又恶，只听女的说：“你恶啥子，你自己干过些啥？政府到处捉特务，你敢到乡上去坦白？”男的不吭气了。

杨大发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就是那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杨进兴。

1949年12月5日，在最后进行了一次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活动之后，杨进兴等人来到了成都市观音巷的成都大饭店，领受了上司徐远举布置的潜伏在大陆打游击的任务，便以平民身份在四川农村隐蔽了下来。

根据群众检举的情况，南充县公安局迅即展开外调。1955年2月，公安人员带着杨进兴夫妇的照片和群众的检举材料来到重庆。被俘战犯徐远举、周养浩看了照片，摇头说不认识，原戴笠的警卫邓培新等人看后，认出他就是杨进兴。

1955年6月17日，公安局扫残组同志突然出现在这位“贫农”的面前。

“不准动！”两支手枪对准这个凶恶的鹰犬。

“你……你们弄错了吧，我……我是个贫农。”杨结结巴巴地说。

“黄将军的游泳表呢？”

“啊！”这位“贫农”脸色大变，瘫软在地像癞皮狗似的被戴上了手铐。

在重庆市公安局的审讯室里，经过7个小时的审讯，假杨大发——原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向坐在对面目光严峻的公安人员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杀害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和黄显声等人的罪行。

当年8月13日，杨进兴，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在重庆公审后，被处以死刑。

1958年春节正月初二。江西萍乡县安源镇九荷村，从一幢一楼一底四间一厢的新房子里走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他背犁牵牛，向田里走去。在这房子的正堂挂着三张“劳动模范”的奖状。

三天后，村民们惊奇地看到这个老头被公安人员押进了九荷村办公室。从重庆来的公安局侦察员当众宣布：宋玉成，真名漆玉麟，化名高文斌，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校行动组长……

“啊！”在村办公室外围观的老乡们，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惊讶声。

漆玉麟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军统特务，在其长达17年的特务生涯中，逮捕和杀害了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重庆解放前夕，他亲自参与制定并执行电台岚垭密裁计划，将关押在渣滓洞监狱里的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革命者分三批杀害。

重庆解放前夕，漆玉麟被留下来组织反动武装，但很快就让解放军打得如鸟兽散。他一个人逃回老家湖南株州宋家桥，用宋玉成的原名住了下来。

不久，宋家桥一带展开了征粮剿匪运动，漆玉麟感到老家不是久留之地，就通过当乡长的帅仁祥，开了一张路条，转到江西萍乡九荷村落脚。

群众怀疑宋玉成来历不明，土改时未分给他土地。1952年搞土改复查，土改工作组明确告诉宋玉成：没有迁移证，不能落户。漆玉麟又来到长沙，找到已下台的帅仁祥，出具了一张“宋玉成系良民，一贯务农，并无什么问题”的证明，并办了一张迁移证，在九荷村分得四分半土地。

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里，宋玉成总是积极劳动，热心公益事情，而且逢人便说“现在比解放前好一万倍有余”。他当上了管理小组会计，选举组长，二等劳动模范。1954年，盖起了一楼一底的新房。第二年又和已被镇压的安源煤矿霸头赵海桃丢下的寡妇王顺兰成了家……

1955年4月，重庆市公安局“扫残敌川北工作组”派出两名干部，辗转追捕漆玉麟到仪陇、遂宁、盐亭等县，先后发现其行踪。

1957年7月19日，江西萍乡安源派出所从帅仁祥口中了解到漆玉麟解放前曾在重庆市干过“公事”这一线索，向重庆市公安局发出调查函。宋玉成、宋世元、漆玉麟……多影叠合，这个潜藏八年之久的军统行动组长的狰狞面目终于毕露。

重庆解放后，脱险同志联络处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竟是叛徒冉益智。

他没有料到，有那么多知道他底细的同志逃出敌人的魔掌。他一被认出来，便遭来一片怒斥声。

“冉益智，你赶快到公安机关投案，听候审查。”

冉益智面如死灰，像狗一样溜走了。

当天，他就被我公安机关抓获。

重庆解放前夕，另一个叛徒刘国定逃到成都。他四处筹款准备逃往香港，终因款项不足未遂。解放后，刘国定自知罪责难逃，便向公安机关投案，1950年由成都押回重庆。

到了这个时候，刘国定还心存幻想，企图保住狗命。他在一份交待材料中这样写道：“总之，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作为过去是一个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作为形式上的特务，我也愿意受人民政府的处罚。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致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便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

叛徒有着属于叛徒的共同思维逻辑和心理。让我们来看看冉益智在他解放后写的《我的愿望和要求》中的一段话：“我以待罪之身，除静候组织处分外，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以求主动自赎。为了免犯错误和增进效能起见，可否给我以一定的工作联系，此外可否报考军政大学或其他的学校，以俾重新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叛徒不严惩，天理不容，国法不容，人心不容。

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作出了公正判决：根据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第二条，处以刘国定、冉益智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剥夺其上诉权，以维法纪。

和刘、冉二人一起被处决的还有李文祥、李忠良。

天网恢恢，历史无情，卖身求荣的叛徒决不会有好下场，也不应该有好下场。

后 记

我们是解放后出生的。与我们一般年龄的人，大约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红岩》，看过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也含着眼泪听大人讲过小萝卜头的故事。革命者的坚贞不屈，叛徒的卑鄙无耻，特务的残忍狡猾，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构成了我们少年时代乃至一生的善恶是非的判断准则。

成年后，我们逐渐知道，《红岩》小说中的很多素材都是取自真人真事。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江姐，在小说中叫江雪琴，实际上她的真名叫江竹筠。但我们总那样认为，艺术总是要比生活的真实来得更完美一些。

也许我们的这个想法直到今天也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有机会全面接触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斗争史实材料时，却不能不感到心灵的强烈震撼，也不能不承认没有夸大过的真实很多时候要比加工过的艺术更具冲击力量。说心里话，我们没有想到，在遭到严刑拷打时，我们的英烈竟是那样坚贞不屈；在死亡来临时，他们又是那样的从容不迫。对于金钱，他们视若无物，上百两千黄金献给党亦在所不惜。他们做出的每一件事情假设发生在今天，都会引起轰动。然而他们却淡然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从无张扬之意。

于是，我们把小说中的人与事和当年发生的真人真事一一对位，试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希望这样做能给人们心灵带来的震动更强烈一些，思考更多一些。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把一种精神传达给读者，这种精神就是在我们这个民族历代仁人志士身上不断发扬光大的崇高品德和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此种种，都在我们的革命英烈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如今只是 40 多年过去了，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能找到多少呢？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温先烈事迹，再倡红岩精神。

书成有感，以此为记。

旭辉徐彬

1996 年 12 月于北京

